

现代戏剧的先声?

——《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前后的论争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从1827年《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发表至1830年全剧发表,该剧在俄国批评界引发了激烈争论,其焦点主要是作品的体裁与风格问题:诗歌还是戏剧?浪漫还是古典?如果是诗歌但不押韵,如果是戏剧却违反古典戏剧规范,因而在众多批评家那里形成了肯定与否定的对决。普希金本人则意识到这是一种对古典戏剧的革新,一种浪漫主义戏剧的实践,虽然超出了当时观众对戏剧的认识,但也不愿为迎合观众而放弃新的艺术体系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正是迈向现代戏剧或曰现代文学的脚步。

关键词: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体裁;论争;现代戏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01-10

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由于别林斯基的名字过于显耀,往往使我们产生错觉,似乎俄国文学批评就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而且之后也就只有他独步天下。事实上,在他之前之后都有一批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传统文学批评史撰写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批评家的声音往往被弱化。其实,别林斯基的声音,既是与其前辈的论争,也是与其同代人的对话,还引发后人对其的回应。如果我们把别林斯基(1811年生)称为新生代批评家的话,那么他之前出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批评家,我们就称为老一代批评家,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一场论争将涉及巴·彼·斯温因(1787)、谢·阿克萨科夫(1791)、波列沃伊(1796)、瓦·德·科莫夫斯基(1803)、纳杰日金(1804)、尼·亚·梅尔古诺夫(1804)、韦涅维季诺夫(1805)、舍维廖夫(1806)、基里耶夫斯基(1806)等人,他们,包括年轻的别林斯基,在《鲍里斯·戈都诺夫》全剧发表前后展开了激烈论争。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体裁、风格等问题,以及内容上如何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该作品究竟

是诗歌还是戏剧?是古典还是浪漫?历史人物如何塑造?由于在该剧中普希金杂糅了多种因素,使得当时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和界定成了难题。

一、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的不同解读

别林斯基说过,“普希金的每一部新作品,不论对公众或是享有特权的文学法官们,都曾经是引起纷争的苹果”^{[1]6}。1820年代的普希金,在不同的美学标准下,遭遇着不同的命运。对于古典主义者来说,普希金的才能只是模仿,因而也就不承认其有什么天才;而承认其天才的浪漫主义者,到《奥涅金》发表时,则认为其天才衰落了,已经江郎才尽;一直不承认其早期创作价值,到《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才兴奋起来,这是纳杰日金前后对待普希金态度的变化。纳杰日金在《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后,在众多否定声音中,积极维护普希金。他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评价引发了俄国批评界围绕该剧的激烈论争。

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首先是关于

收稿日期:2022-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它的体裁属性的争论,是诗歌还是戏剧?无论是在该剧完整本出版之后,还是此前片段发表时,几乎在所有评论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起源主要是,1827、1828年允许单幕发表时,无论是书刊审查官还是多数读者,都是把它当作诗歌作品看待的。素以诗歌创作面世的普希金,似乎没有别的身份,这是普希金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同样也是俄国第一部历史剧(悲剧),自然那时的读者对它并没有别的期待,顺着惯性,依然把它当作诗歌看待,也许就是把它当作《奥涅金》长诗之类的作品的一部分来看待;沙皇最终允许普希金自负其责地发表,也是把它当作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并不允许上演,因而也就不担心戏剧上演的力量带来的潜在危险。《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单幕发表在波戈金的《莫斯科导报》上,当时富有威望的专家和戏剧爱好者谢·阿克萨科夫就曾这样讲道:“1827年波戈金主编的《莫斯科导报》的出现,是新闻界的一件重要事件,第一期就首次刊登了大家早有所闻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普希金的新诗作,它简单轻盈却和谐的不押韵五步诗给所有人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诗,惊异于它,并为它高兴。”^{[2]115-116}

然而,尼·亚·梅尔古诺夫——普希金的弟弟列夫·普希金的同学,告诉《莫斯科导报》杂志主编波戈金自己对该剧片段的印象,表达了与那些受传统古典戏剧教育的读者相反的意见:“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在寄宿大学,且带着法国流派偏见的人,完全不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惊讶于它的五步格……千万不要拒绝在你的杂志上的这部作品显示出来的真正价值,它可以解释和显示比理论文章多得多的东西……”^{[3]694}梅尔古诺夫跟踪戏剧片段发表后的社会反响,他发现多数媒体与自己的诗学立场相悖,所以他希望《莫斯科导报》在这一问题上不要只抽象地谈论施莱格尔和谢林的浪漫主义戏剧的基础,而要在实践中原则上支持在当代作品中出现的这一新的艺术体系。他认为,施莱格尔使用“小说”这一术语,包含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很广,不只是散文,也包含诗歌,甚至包括但丁的诗在内,以及用于阅读的戏剧;梅尔古诺夫还举出,赫尔德J. G. 就称莎士比亚的戏剧为“小说”。这样,在他们(无论是施莱格尔还是赫尔德还是梅尔古诺夫)概念里,凡不是按照古典主义原则创作的戏剧作品都被称为“小说”。因此,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是对原有古典主义戏剧的革新,是一种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在俄国的诞生;被大家当作“不押韵五步诗”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却是可以“用于阅读的戏剧”

(而不是用于表演的),也是广义的“小说”。这也就是梅尔古诺夫所说的显示着“比理论文章多得多的东西”。这里,我们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梅尔古诺夫把《鲍里斯·戈都诺夫》当作“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在俄国的诞生”。二是,梅尔古诺夫已经把《鲍里斯·戈都诺夫》移出“诗歌”领域,纳入“戏剧”领域,但却不是“用于表演”的戏剧(也就是大家习惯的古典戏剧),而是“用于阅读”的戏剧,进而将其纳入了广义的“小说”领域——这已经是一种“新的艺术体系”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梅尔古诺夫把《鲍里斯·戈都诺夫》当作“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在俄国的诞生”是有道理的。普希金于两次流放中就已经接触并潜心研读了莎士比亚,且特别关注了莎士比亚历史剧及其对英国历史史料的处理。这促使其思考俄国该有什么样的历史剧,该如何处理俄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何创作俄国的历史剧(悲剧)。普希金在当时未发表的几篇《〈鲍里斯·戈都诺夫〉序言草稿》以下简称《序言草稿》)中明确说出:“在开始阅读悲剧(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引者)之前,先浏览一下卡拉姆辛《俄国国家史》的第一卷。书中妙趣横生,充满对当时历史微妙的暗示。”^{[4]170}“对莎士比亚、卡拉姆辛以及古代编年史的研究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以戏剧形式来表现现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时期。”^{[4]174}也就是说,卡拉姆辛的《俄国国家史》为他提供了素材,而莎士比亚为他提供了戏剧形式,因为他又讲道:“以莎士比亚为榜样,我仅着力描写时代和历史人物,而不去追求舞台效果和浪漫主义的激情。”^{[4]170}“我不为其他任何影响所干扰,在自由广阔地塑造性格以及在结构朴实和不刻意追求方面,我模仿莎士比亚;在事件明快发展方面,我跟随卡拉姆辛的方法;而通过编年史我则力求揣摩当时时代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特征。”^{[4]174}梅尔古诺夫敏锐准确地判断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创作试验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关系。

其二,《鲍里斯·戈都诺夫》一旦被纳入“用于阅读”的戏剧,也就是纳入了广义的“小说”领域,那么就意味着普希金有了更大的叙事空间以更灵活的手法处理历史事件,显示时代、思想、人物之间的张力。普希金对这一“新的艺术体系”的试验无比在意,而且他意识到这不仅对他的创作,乃至对整个俄国戏剧的发展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两次在《序言草稿》中说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决定出版这部悲剧,虽然一般说来,我对自己作品的成败总是抱着相当平心静气的态度,但我得坦率地说,我对于《鲍里

斯·戈都诺夫》的失败却会十分敏感。”^{[4]173}“我对这部戏剧的出版久久犹豫不决。以前我的诗歌的成功与否……都很少触动我的自尊心。……我深信《奥涅金》的某一章高于或低于另一章,对于我国文学来说,都并无区别。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我这部戏剧的失败将会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坚信,对于我国舞台更适宜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民众规范,而不是拉辛悲剧的宫廷习俗,而且任何一点失败都可能延缓我国舞台的改革进程。”^{[4]174}可以看出普希金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在创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此前俄国戏剧一直浸泡在古典传统中,这并不应该是俄国的戏剧,他力图改革俄国戏剧舞台,甚至是那么的急切,任何延缓都让他焦虑。

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舍维廖夫也发表了见解。他在文章《1827年文学观察》中对该剧片段给予了很高评价:“最重要、最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年)《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的发表……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特殊的作品……所有理解这一现象重要性的人都会……嘲笑那些微不足道的批评家们——他们幼稚地表达遗憾,说什么该片段写的不押韵。有必要在普希金面前重复每个人都期待着鲍里斯的出现吗?有必要谈论他的语言或俄语如何与该剧一起成熟了吗?”^[5]如果说舍维廖夫这里谈论的是《鲍里斯·戈都诺夫》作为一部真正俄罗斯民族的成熟作品,那么下面他则是从风格、诗学原则和美学接受上为《鲍里斯·戈都诺夫》辩护:“我们发现,各种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中有一些奇怪的要求,要求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道德上纯洁的人,具有美德的形象。我们要提醒这些学究们,上道德课不是诗人的事情。诗人是要反映生活中一切强烈的感受,一切以某种思想或以某种情感在自己身上打下独特印记的个性。如果诗是非同寻常的人的生活的鲜活图景,那么诗人给我们呈现的就不应该是完美的天使,而是携带着他们的善与恶的人。如果诗人……引领心灵到达了所希望的和谐……那么诗人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如果有时……对人的心灵产生了道德上的恶的作用,不要责怪诗人,因为诗人是自由的……而要责怪不洁的心灵、不洁地接收这些印象。”^[5]舍维廖夫这里的“道德纯洁性”是有所指的,因为普希金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塑造的是具有鲜明个性却并非“良善”的人物,语言也并非纯粹“高雅、纯洁”的,然而舍维廖夫强调了“诗人的自由”以及“艺术的真实”,诗人有权且应该按照人的原本善恶来塑造人物。普希金也意识到,他所反映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理论基础以

及他对戏剧革新的理念,都需要加以解释。在这一点上,舍维廖夫的文章尤其明显地说服了普希金,因而他在《序言草稿》中这样说道:“当我要塑造普通、粗鲁的人物时,风格就可能是粗犷、通俗的——至于其中一些低俗猥亵之处,请不必留意。”^{[4]170}“还存在一些粗俗的玩笑和民间场面。如果诗人能够避免这些,当然很好——一个诗人不应当出于善意就变为低俗——而如果不能避免呢?他也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去用别的什么取代它们。”^{[4]175}这里普希金既坚持适合人物的粗犷、通俗风格这一“艺术的真实”原则,也坚持不应变得低俗,同时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宫廷虚假的流俗而强求变得高雅。这些“粗俗”和“民间”元素已经超出了古典戏剧的规范,然而诗人要挣脱“古典”藩篱,自由地创作,这造成了对当时观众的戏剧先见的挑战。他已经是在“新的艺术体系”(后被称为所谓的“浪漫主义戏剧”)与当代观众固有的趣味之间的张力中审视自己这部悲剧作品的价值,也就是按照梅尔古诺夫所指出的那样。

上文中舍维廖夫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批评家表达遗憾,说什么普希金的戏剧片段写得毫不押韵,他指的是在1827年的《祖国纪事》第1期上其创办人及主编巴·彼·斯温因发表的文章《关于1827年杂志和文集说几句公正话》。在这篇文章中,一边戏谑地提到普希金的戏剧片段所显示的普希金的“天才”,一边表达遗憾说写得毫不押韵,接着高度评价鲍·米·费多罗夫的作品,包括他的悲剧《戈都诺夫》^①,说是极为“精彩的”。斯温因把普希金放到与鲍·米·费多罗夫“同一水平”进行评价,这不能不伤害到普希金;更何况,普希金的戏剧是“小说式”地“重新定义历史”,他作为这一形式的首倡者,无奈地观察到,那些听了太多关于他的这部悲剧的议论,对他的悲剧样式非常了解的文学家们,都在试图模仿这一“新戏剧”去诠释历史情节,可他的这部悲剧正在被禁止发表。他不得不忍受他只是被作为这一“新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来对待,当时已有众多作者开始模仿普希金创作同名戏剧《戈都诺夫》。

不过,普希金依然应该感到庆幸,天才诗人和哲学家德·韦涅维季诺夫对戏剧片段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讲道:“两位天才(指卡拉姆辛和普希金——笔者)像竞赛一样为我们描绘了同一幅图景,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并以自己的观点。所有我们能从普希金的悲剧中辨认出来的东西,迫使我们进行思考。如果说史学家以其基调的勇敢而达到了史诗的高度,那么诗人同样将一种庄严的历史严格地带进自己的作品。……无论如何,我们面前的这一

戏剧片段足以证明,如果说诗人忽视了某些关于形式的武断的要求,那么他更忠实于不可违背的和最基本的诗学的规律——并没有背离真实,这是其良心的勇敢使然,诗人以这份勇敢表现其灵感。这一幕(指1827年发表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片段——笔者),以其质朴和表达的强烈而具有的散文性,可以大胆地将其与莎士比亚和歌德那里具有的一切优秀的东西相提并论。”^{[6]66}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的“散文性”(亦即“小说”性)的判断以及可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评价。这是韦涅维季诺夫1827年的文章《普希金的悲剧片段分析》,1831年在他去世后才发表,这时《鲍里斯·戈都诺夫》全剧已面世。尽管如此,他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暗示了整部作品可能具有的巨大艺术意义,对戏剧片段的高度评价与判断即便在整部剧发表后也没有失去意义。像其他许多后来的批评家那样,韦涅维季诺夫指出了这部作品作为诗人创作新阶段——其完全独创的阶段——标志性意义;同时,他强调了普希金这一阶段的兴趣与被卡拉姆辛及其《俄国国家史》所唤醒的创作冲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指出了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为学者之间的区别。将两位进行比较,也是当时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文学批评中最大胆、最独特的批评。

二、对《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的争论

1830年12月几经周折《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终于面世。纳杰日金此时已经创办自己的刊物《望远镜》(1831年1月起,半月刊),他在第4期发文《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两位老相识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体裁。这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但并非我们通常概念中的评论文章,而是像一篇散文,记述作者参加一个沙龙的宴会,宴会上众多人物,众多话题,其中当然谈论刚发表的《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表现众人对新剧的态度;然后是作者与宴会上唯一的熟人关于新剧的单独谈话,以此表达作者的观点。文章题目本身就已经表明该文的争论性:是一种谈话,里面必有不同的观点;而文章则采用批评中流行的文体——模拟讨论和争辩(这在对普希金的攻击性批评中是常用的手段),纳杰日金嘲笑沙龙里那些关于文学的闲谈,那些从赞美普希金到完全否定他的新作的善变者,以及企图给“浪漫主义悲剧”这一新体裁套上坚硬的“诗歌规范”的枷锁的说辞。

我们说,此篇评论文章标志着纳杰日金对普希金创作态度的转变,因为,就在此前他还在《欧洲导报》1830年第2期上这样讲道:“《鲍里斯·戈都诺夫》先行发表的几幕,已经完全剥夺了此前诗人巨大的荣耀,坦率地说,我们在其中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普希金了。”^{[6]349-350}在另一处(《欧洲导报》1830年第7期)评论《奥涅金》第七章时,他建议普希金:“烧掉《戈都诺夫》,去完成《奥涅金》。”^{[6]349}而现在,在阅读了全剧后,他坚决捍卫《鲍里斯·戈都诺夫》,反对将其按照“老旧的古典主义”条条框框,要求诗人遵守那些规范来处理自己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情节或事件,因为所有这些规范和诗学概念,都要考虑到要在舞台上实现。普希金的戏剧完全与之格格不入。《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一系列由人物体现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片段,是将历史事件转换为对话和场景。^{[6]73}在普希金之前的创作中,纳杰日金只发现了自由地幻想的游戏,反映生活偶然的外在的表象,没有任何总体思想;现在《鲍里斯·戈都诺夫》被他评价为普希金的创作转向了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创作。这看似前后矛盾的态度,实质上是统一的。恰恰是纳杰日金的艺术观决定了他对待普希金不同阶段创作的不同态度。后来,纳杰日金承认自己对普希金早期创作评价的片面性,因而他尤其留意批评界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评论。1840年1月29日,在普希金去世三年整时,他给克拉耶夫斯基写信说:“普希金在世时是我第一个,也是唯有我一人力挺《鲍里斯·戈都诺夫》,给予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而当时那些崇拜他的人却一个个都阴险地窃窃私语。”^{[6]350}纳杰日金从诗歌还是戏剧的体裁角度,肯定了其“浪漫主义戏剧”的实践,并且在思想上走向了更成熟——进入了历史哲学的思考。

尼·波列沃伊从20年代就一直关注着普希金的创作,他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也并非一贯。他是把普希金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看待,肯定其早期创作,在《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面世后则谴责其偏离了浪漫主义轨道而予以否定。这与否定普希金早期而肯定其后期的纳杰日金相反。《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出版后,波列沃伊发表一则札记《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1831),这样开篇写道:“早已期待的普希金的作品终于置于公众评判之下了。诗人称它既不是悲剧,也不是戏剧,也不是历史剧。当然,他自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但似乎想看看别人怎么看,怎么确定作品的性质。俄国批评界于是有了件有趣的任务!鉴于人们都听说普希金完成了一部悲剧,我们说,他

现在出版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正是人们所说的那样,也就是传说的那样,是一场悲剧。”^{[6]51}波列沃伊这句末的“悲剧”一词意思是,这部剧的出版真是“个‘悲剧事件’呀!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敏感于该剧体裁的“四不像”,不赞同普希金“奇异”的形式,不接受作为整个情节基础对历史事件的诠释,他认为普希金这是受了卡拉姆辛的影响。

其实,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第二幕发表时,波列沃伊也将其作为诗歌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虽然他认为这些片段的意义还有待于在整个作品面世后才能评价,但认为它们已经证明了普希金不断成熟的天才的多样性和力量。可是现在对于整部《鲍里斯·戈都诺夫》,他则认为《鲍里斯·戈都诺夫》时空错乱,弄错了时代,搞到古典时代去了。也就是说,波列沃伊将普希金视为浪漫主义实践的代表,他还嫌这部戏剧“浪漫”得不够彻底,还有“古典”的腐味儿;作为戏剧,在当代法国浪漫主义戏剧为主流的背景下,《鲍里斯·戈都诺夫》“是走向真正的浪漫主义戏剧的一步,勇敢的一步”,但只是未来真正浪漫主义戏剧的一点希望的影子,“他的第一步对于俄国诗人来说是勇敢的,无畏的,伟大的,但是不完满的,不牢固的”,“俄罗斯语言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完善的程度,但是,创作的性质上却是落伍的,短视的”^{[6]52}。

两年后,1833年波列沃伊在《莫斯科电讯》第1—2期再发同名文章,更详细地对《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进行论述。他将《鲍里斯·戈都诺夫》作为普希金最终定型的创作,其中表达了整个普希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的时代、他接受的教育和传统造成了普希金的局限性。伊·基里耶夫斯基曾宣称普希金远远走到了自己同时代人及其审美力的前面,波列沃伊则相反,认为普希金是一定阶段俄国贵族文化及其固有的嗜好和情致的代表,他对拜伦的“遵从”即源于此,从小就敬仰卡拉姆辛的权威即源于此,这种权威在他的悲剧作品上打下了古典主义的烙印,并导致他歪曲历史真相。波列沃伊认为,在卡拉姆辛的影响下,普希金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历史事件变成一部惩罚戏剧,而无法将鲍里斯·戈都诺夫作为谗言和历史不公的牺牲品加以揭示。波列沃伊在剧中看到的是古典主义的残余。在该篇文章中,波列沃伊表现出从先前批评普希金的卡拉姆辛倾向,转向了现在批评普希金作品“奇怪”的体裁。他还在该文中回答了自己在札记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普希金不讲明自己作品的体裁。在他看来,普希金意在创作浪漫主义戏剧,但错误地将浪

漫主义戏剧理解为就是可以脱离规则,没有意识到浪漫主义戏剧自有其应遵循的规则,这样其作品只是以表面的混乱而区别于古典主义,实际上是混乱的古典戏剧。他这样写道:“《鲍里斯·戈都诺夫》在历史的真实性上不能令人满意,在戏剧的审美上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偏离了历史,诗人并没有以任何想象的东西来弥补这一偏离。无论是各幕之间,还是各部分的发展,还是性格的表现,都没有统一性;没有生活的细节,一切都不是在观众和读者的视野中完成的;事件刚要展开,人物刚要与我们熟悉,旋即就都消失了,因而如果他们不再重新出现,不再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我们既不知道事件如何,也不认识人物,他们就都隐退到幕后去了。应当说,浪漫主义戏剧是建立在严格的事件统一上的,不仅给出了丰富的手段在各幕中发展细节和性格,而且要求必须有这一发展,它有自己的真实,自己不可破坏的规律。”^{[7]259}就这样,从是古典还是浪漫风格的角度,波列沃伊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基本上把《鲍里斯·戈都诺夫》归于失败的“浪漫主义戏剧”之作。

与波列沃伊看待《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观点大相径庭,基里耶夫斯基看到的是该剧的独创性、诗化悲剧的力量,并从整个俄国戏剧发展史的视野加以评说。

基里耶夫斯基早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发表时就有过评说,那时他的意见与韦涅维季诺夫接近,他在1828年第6期《莫斯科导报》发表的《论普希金诗歌的特点》中就已经将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归为诗人的成熟阶段,认为是普希金“渴望独特性”^{[8]80}的标志作品;它反映了诗人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同时,也表达了俄国文学这一时代整体上的独特性。基里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转向戏剧对于他来说是有机转向,因为“如果仅仅作为诗人,他显然显得太多维,太客观了”;对于一位诗人不需要这么多维度,这么客观,因此,“他是为戏剧而生的”^{[8]82}。这样,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给诗歌以戏剧类型的注脚,基里耶夫斯基将之奉为典范。

基里耶夫斯基1832年在《欧洲人》第一卷发表文章《1831年俄国文学观察》。这时《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不仅已经面世,而且成了热烈讨论与批评的对象。基里耶夫斯基强调说,关于俄国悲剧的概念及其特点,不是批评家,正是作家给出了文本诠释,普希金是第一个勇敢的践行者,批评界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评论十分清楚地证明这些文章作者的美学观念的不成熟,表现出他们对取自欧洲

各国的某种艺术体系的依附。基里耶夫斯基认为,如果不带偏见地看普希金的这部悲剧,通过它本身的实质来确定戏剧类型,那么,《鲍里斯·戈都诺夫》是那样一种悲剧,即其中主要的推动因素不是情感,不是事件,不是意志,而是思想!如果按照基里耶夫斯基这样的观点,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岂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式思想小说的前辈!当时整个的欧洲戏剧是描写事件,发生的或应该发生的,其中展开的是由事件导致的剧情。而普希金是写事件的结果——德米特里的被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通常是写事件的结果出现之后人物的内在精神。面对必须把普希金戏剧不同寻常的、没有被纳入时代美学概念中的形式与深深根植于当代人意识中的悲剧体裁概念统一起来这一问题,基里耶夫斯基也主张将它看作惩罚悲剧(却是肯定这种类型),结构上属于古希腊悲剧。这样他就为普希金的作品在世界悲剧体系中找到了位置,符合基里耶夫斯基的“体系”思想和崇高道德倾向。不过,作为启蒙思想坚定的拥护者,基里耶夫斯基在文章最后也指责普希金不够关注当时社会的趣味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想使自己的悲剧更通俗些,“当然在《戈都诺夫》中普希金高于公众,不过他可以更高些,如果他更为公众理解些”^{[6]145}。

普希金原则上不能同意这样的指责。他有意识地不在公众习惯的轨道上和美学偏见中,而是在与他们的冲突中创作自己的悲剧,他寄希望于自己典范的力量和自己天才的影响。艺术上的独立不羁,是普希金最珍视的品格,也是其艺术的底线。我们知道,他后来在自己的杂志《现代人》1836年第2期上的文章《巴黎科学院》中,借用法国科学院的一桩人员轮换之事,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原则。法国戏剧家斯克列布(Эжен Скриб)凭借自己高超地猜中观众口味的技艺,坐上了法国科学院院士的交椅——不久前去世的同行阿尔诺(Антуан Арно)留下的位置。而阿尔诺又是怎样的呢?普希金写道:“阿尔诺写了几部悲剧,在自己的时代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现在完全被遗忘了。这些诗人们的命运总是这样,他们为公众而写,猜透他们的想法,附和他们的口味,而不是为自己,作品不是独立的灵感的结果,不是出于对自己的艺术无私的爱。”^{[9]14}在普希金看来,无论是斯克列布还是阿尔诺,都是媚俗之流。迎合与献媚的“艺术”,其生命总是短暂的,即便是其创作者凭着投机爬上了当下某个高位。

不过,普希金整体上认可基里耶夫斯基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分析,不久前他还言辞凿凿地

说俄国没有真正的批评,现在却在给基里耶夫斯基说:“您关于《戈都诺夫》……的文章令所有人喜悦,我们好不容易终于等到真正的批评了。”^{[10]95}的确,《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发表后,正如舍维廖夫所说,各重要刊物均未予以重视,即便有不多的回应与提及,亦是相当不友善的,如我们前面讲到的纳杰日金在《欧洲导报》1830年第2、7期上激烈的嘲讽。《鲍里斯·戈都诺夫》完整本面世后,虽有各种评论出现,如不署名的小册子《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外省小城来莫斯科的地主与俄国文学老师自由评论人的谈话》(莫斯科,1831),以及各种报刊上热烈的评论,但仍然不乏肤浅甚至嘲讽。而基里耶夫斯基的文章以其创见和严肃性显得卓尔不凡,是广阔而深厚的美学评述并具有历史前瞻性。

但是,对于基里耶夫斯基的观点也有质疑声。瓦·德·科莫夫斯基针对基里耶夫斯基的评论,给尼·雅季科夫写信说:“他(基里耶夫斯基)将该悲剧置于对他的观点来说最有利的角度面对读者。但是依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一,不叙述事件而叙述结果的戏剧是不是在直接违反戏剧概念?其二,剧中德米特里被杀的展开和呈现是否合理?”^{[11]63}可以看出,批评还是集中于戏剧的体裁问题,以及与体裁相适应的戏剧的情节安排等问题。

这样,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体裁问题,关于普希金诠释戏剧规律的正当性以及是否允许他这样做,无论是庸俗的小文,还是著名批评家的文章,都提了出来。这是该悲剧面世后各方最为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显示了在理解历史与艺术时,存在于普希金与他的读者之间的距离——甚至基里耶夫斯基也指责普希金这一点。

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年轻的别林斯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正是借一篇评论该剧的文章登上文坛。在1831年6月10日第45期《叶子》杂志上,别林斯基发表自己生平第一篇批评文章《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回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831年出版的〈谈话〉》。文章主要是针对上述我们讲到的那本“不署名的小册子”,别林斯基认为,这份《谈话》只能单独出版,因为“没法发表在任何一份杂志上”^{[6]89}。从《谈话》中别林斯基引录了那些对普希金的攻击,这些攻击亦常见于第三厅内部。别林斯基只用了一句话评论它们:“这算什么呢?”^{[6]89}当然,普希金与第三厅的复杂关系别林斯基不会知晓。文中他对自己的两位前辈——著名批评家波列沃伊、纳杰日金的评论持怀疑态度,嘲

讽他们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回应。别林斯基认为《鲍里斯·戈都诺夫》遭遇的是奇怪的命运:当它还不完全被公众所知,只是几个片段发表时,在“我们文学界引起极大骚动”^{[6]89},等到整部戏剧面世,却在批评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针对波列沃伊,他指出:“《莫斯科电讯》,正如它自己不止一次宣称的,从不错过任何文学现象,这次也用几行字表达自己的判断,指责普希金不知害臊地把自己的《戈都诺夫》献给纪念卡拉姆辛。《电讯》出版人竭力要从卡拉姆辛那里劫走他应有的荣誉。”^{[6]89}针对纳杰日金,他则怀疑其批评的真诚信,不无揶揄地指出,纳杰日金曾劝普希金烧掉《戈都诺夫》完成《奥涅金》,现在却“以该作品保护人”^{[6]89}自居,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喜欢逆水行舟,故意悖忤众声,好让舆论斗起来。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别林斯基并没有直接表达对《鲍里斯·戈都诺夫》评价。

1834年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则对普希金的创作有了基本的定位,认为“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完美的代表”^{[12]64,65,69,72},但是对《鲍里斯·戈都诺夫》没有更多的评述,只说“普希金统治了十年:《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他最后一个伟大的建树”^{[12]74},此剧之后,我们便“认不出普希金了:他死了,或只是暂时昏厥;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也许他还会复活。这是个问题,这个哈姆雷特的生还是死的问题将隐藏在未来的迷雾中”^{[12]74}。对于《鲍里斯·戈都诺夫》详细的论说,是到了1840年代,11篇有关普希金的专论中,用第十篇整个篇幅来评述该剧。这时离该剧发表已十年有余,因而别林斯基的这篇评述就有了总结的味道,他讲到,该剧问世时公众是完全冷淡地接受,认为该剧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曾伟大的有才能的诗人完全衰落了。现在激烈反对者之多,一如当时热烈崇拜者之众。这两派都对,也同样都错,因为“普希金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艺术高度,同时,任何一部作品也从来没有暴露过在《鲍里斯·戈都诺夫》里这样巨大的缺点。这个剧本,对于他说来,真是一场滑铁卢之战,他在这次战役中广泛而深刻地发挥了他的天才,但无论如何,他还是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首先我们要说,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完全不是一出戏剧,而只是一部采取对话体形式的叙事长诗”^{[1]631-632}。这样看来,别林斯基同样认为这是一部“诗歌”而非戏剧,而且他还分析为何它没有戏剧性:“但是这个缺点不能归咎于诗人:原因在于俄国历史,诗人正是从俄国历史中汲取他的戏剧内容的。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历史不同

于西欧国家历史的地方在于:在俄国历史中,占据优势的是纯粹叙事的因素,或者宁可说是伦理的因素,而在西欧国家历史中占优势的却是纯粹戏剧的因素。彼得大帝以前,在俄国发展了家族的和宗族的原则,但从来不曾有过个性发展的迹象:然而没有强烈的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戏剧难道是不可能存在的吗?”^{[1]632}“因此,如果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里没有任何戏剧性,那么,这不能归咎于诗人,却只能归咎于历史,诗人正是从那里面给他的叙事戏剧汲取内容的。也许,正因为这缘故,他在这种体裁方面只作了一些尝试。然而,鲍里斯·戈都诺夫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位人物都更适合于用来写成——如果不是戏剧的话——戏剧形式的长诗,在这样的长诗中,像普希金这样的诗人本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华的全部力量,避免历史与美学方面的许多巨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在他的戏剧中比比皆是。……普希金盲目地追随着卡拉姆辛——于是他的戏剧就变得有些像传奇剧了,他笔下的戈都诺夫就变成一个传奇剧的恶徒受着良心的折磨,在他的罪恶中受到了惩罚。这是一种道德的、可敬的思想,但却已经陈腐到这种地步,就连有才能的人也无法把它起死回生……”^{[1]635-636}可以看出,别林斯基虽然将不具备“戏剧性”的原因归于俄国历史中就不存在有个性的人物,选取这样的人物也就是无法创作出“戏剧”;不过他似乎也归因于诗人不具备戏剧才能;同样认为这是把人物处理成了陈腐的“惩罚戏剧”式的人物。我们认为,别林斯基这样评价,恰恰是没有看到普希金的创作走向了更高的层面——揭示人的内在精神层面,他对普希金的这一否定,一如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之后的《双重人格》的否定;也许普希金这样处理人物,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洞察的创作源头。

总之,别林斯基也几乎认为普希金从此衰落了,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俄国的历史原因也好,还是他选择的艺术形式也罢,终归,《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他的滑铁卢之战,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体裁问题上,别林斯基同样把它看作诗歌,是戏剧形式的长诗,仅仅是形式上的戏剧,而实质上则是诗歌;而且在人物性格处理上,盲目追随卡拉姆辛的历史诠释方式。别林斯基的这些评述与当时的主流见解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在30年代《文学的幻想》一文中,别林斯基之所以没有评述《鲍里斯·戈都诺夫》,也许是文章目的所限,也许是因为还不能彻底把握该剧;而这时,40年代,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已经日臻成熟!也就是

说,不是他的幼稚之见,也不是他的随口之言。不管是在《文学的幻想》中,还是在40年代的论说中,别林斯基对该剧之后普希金整个30年代的创作都不看好,认为普希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1830年是俄国文学的一个“凶年”,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期”,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学“一个崭新的时期”,但前后两个时期“没有一点过渡”,是一种“强制的断裂”,是一种“不自然的跳跃”。“1830年结束了(或确切地说)突然打断了普希金时期,因为普希金自己,连同他的影响,都一起结束了;从那时候起,就几乎再没有从他的竖琴上弹出一个熟悉的音调来。”^{[12]93}30年代的普希金,对于别林斯基来说已经“不包括在(当代作家)内,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历程”^{[13]284}。

三、结论

综上所述,1827、1828年波戈金的《莫斯科导报》开始登载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至1830年全剧发表,关于它的争论不断。

在承认其是诗歌一方,巴·彼·斯温因站在古典诗歌的角度,认为写得毫不押韵而加以否定,谢·阿克萨科夫却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不押韵的五步诗而加以肯定。

在认为其是戏剧一方,纳杰日金认为该剧是浪漫主义悲剧的新体裁,反对给它“套上坚硬的诗歌规范”。尼·波列沃伊也认为,这是浪漫主义悲剧,但这虽是大胆的尝试,却又是既有古典戏剧的残余,又偏离古典戏剧的“奇怪”体裁;在浪漫主义时代写古典戏剧,是时空错乱。瓦·德·科莫夫斯基则指责该剧违反了戏剧的概念,不符合戏剧的合理性,当然他这里是指古典戏剧规范。梅尔古诺夫则认为,它是对古典戏剧的革新,是“供阅读的戏剧”,广义的“小说”,一种新的艺术体系。韦涅维季诺夫认为,该剧忽视关于形式的武断要求,却更忠实于诗学的规律;它具有的散文性,足以与莎士比亚和歌德媲美。这里说的“散文性”和提到莎士比亚,与梅尔古诺夫互为呼应;而且韦涅维季诺夫认为,这是诗人完全独创的新阶段,该剧具有标志性意义。基里耶夫斯基认为,该剧在结构上属于古希腊悲剧,这为它在世界悲剧体系中找到了位置;同时认为普希金给俄国悲剧概念及其特点作出了文本诠释,定义了俄国戏剧;这也是普希金“渴望独特性”的标志作品,是给诗歌以戏剧类型的注脚。这里在关于该剧的“独创性”上,基里耶夫斯基呼应了韦涅维季诺夫;不过基里耶夫斯基似乎抱怨普希金没有考虑通俗性和读

者的接受性。舍维廖夫的评论则从内容上为普希金辩护,针对有人指责诗人没有“塑造道德上纯洁的人”的奇怪要求,他认为,诗人不是道德的宣讲师,而是要反映“生活中一切强烈的感受”,反映一切独特的个性。

别林斯基的评述最为矛盾,他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了“对话体形式的叙事长诗”“戏剧形式的长诗”“叙事戏剧”“传奇剧”来论述《鲍里斯·戈都诺夫》。他意在说,这是诗歌,是对话形式的长诗,既具有叙事功能,又具有戏剧对话的特点,不过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失败的尝试;他又认为,该剧中“没有任何戏剧性”,却又说这是“传奇剧”式的“惩罚戏剧”。别林斯基这种混乱、矛盾的说法,应和了波列沃伊戏谑地说的——诗人称它既不是悲剧,也不是戏剧,也不是历史剧;他自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是的,普希金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该剧的杂糅性,他自己讲道:“这部悲剧的风格是混合的。”^{[4]170}他放弃了“三一律”中的“两律”(时间和地点一致),文体上六音步抑扬格改成五音步自由体诗,场景上散文化,悲剧不分幕次。他说:“我自愿放弃了为经验所证明、习惯所肯定的艺术体系提供的便利,尽力忠实刻画人物性格和合乎历史发展的时代事件……一句话,我写的是一部真正浪漫主义的悲剧。”^{[4]72}可是他又清楚地知道,他所说的“真正浪漫主义的悲剧”,与公众眼里的浪漫主义悲剧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他预感到:“对其失败这一点,我几乎已经深信无疑了。”^{[4]173}然而,他所说的“失败”,究竟是真正艺术上的失败呢,还是吻合不了大众口味的失败呢?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仔细阅读了杂志中刊登的批评文章”^{[4]72},发现了匪夷所思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划分,自嘲地说道:“这一切大大动摇了我作为作家的信心。我开始怀疑我的悲剧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4]72}

实际上,这场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只是多场关于普希金论争中的一环:1820年代,有围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南方长诗和《奥涅金》的争论;1830年代,即是本文这场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1840年代,是十一卷《普希金文集》最后三卷出版(1841)后引发的“普希金时期”与“果戈理时期”的论争;1850年代,是由“普希金时期”与“果戈理时期”演变而来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1860、1870年代,是皮萨列夫们要把普希金扔出时代大船的抛弃;直到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才确立了普希金作为真正俄国文学之父的地位。

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阐明了普希金对于俄国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偶然。

我们认为,这场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多数批评家都是站在自己固有的美学趣味或政治立场上,自说自话,很少有人从普希金面对当时俄国戏剧舞台充斥了“法国伪古典主义的装腔作势”^{[4]73}、“轻松喜剧”、外来的消遣性的“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局面,力图要变革俄国舞台的角度,来审视他潜在的真正价值。我们认为,从现代戏剧的角度来看,《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杂糅性”正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它既是对诗歌格律的革新,又是对戏剧形式的改造,同时,对话的形式、幕次的大胆安排(全剧不分幕次,而是由33个场景构成),雅俗语言的混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亦即艺术的真实)的和谐,以及以戏剧形式处理俄国历史题材(事件和人物),都是他(以及俄国戏剧)首次的、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试验。更重要的是,他在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推动上的潜在用心:悲剧里的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内心状态极为矛盾复杂,备受各种悲剧性事件的痛苦折磨。他首先是一个有聪明才智和治国魄力的沙皇,又是一个权欲很重、残酷多疑的统治者。普希金极为精心地一步步揭示德米特里被杀后鲍里斯的形象及其精神发展:首先是“怀着惶恐和谦虚接受大权”(复杂的心理初步流露);其次是“预感到雷霆之威和悲哀”(感觉弑君篡位的罪行必将得到惩罚);最后则由于“百姓总是偷偷地倾向骚乱”,加剧了灵魂的痛苦而薨逝(内心矛盾上升至沸点,悲剧突然结束)。纳杰日金说普希金转向了更高的“历史哲学”的思考,这还仅仅是说普希金对“历史是怎样”的追问。我们要进一步说,他是转向了对“人”的全部内在精神层面的发掘,而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都与普希金——他的这位伟大的精神之父——契合;并且在怎样发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希金也极为相似。批评家们的“惩罚戏剧”的说法,就要接近普希金创作手法的本质了,然而不是否定这一点,就是止步于此了。正是鲍里斯·戈都诺夫对“惩罚”的恐惧,以及“百姓总是倾向骚乱”的思想,推动了整个戏剧向前的发展,这正是基里耶夫斯基所认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悲剧的主要推动因素不是情感,不是事件,不是意志,而是思想!笔者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不是命运、性格、情感带来的悲剧,而是思想的悲剧”^{[14]144},梅列日科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界定也正是如此:“未来的悲剧艺术正是这种思想的激情和激情的思想之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最

先走近了这种悲剧。”^{[14]145}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小说最先完美地创造了这种悲剧,那么普希金就是揭开了这种“思想悲剧”的序幕,然而,这种悲剧的创造纯然不能在僵化的古典悲剧的“三一律”中创造出来,只有在全剧各种因素杂糅的形式中,才能揭示历史全部的复杂性与冲突,也才能揭示于这种复杂之中的“人”的全部复杂与深度。鲍里斯的“恐惧惩罚”与“百姓总是倾向骚乱”的思想,与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无意识地“恐惧上帝的惩罚”以及“超人”思想,两者对情节的推动是何其相似。而且普希金戏剧中的“小说性”(或曰叙事性,或曰散文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戏剧性”构成了遥相呼应,也就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适宜改编为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精深地理解他的精神之父的全部才能与思想走向呀,那么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阐明了普希金对于整个俄国文学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还有奇怪吗?从另一面讲,虽超出当代观众对戏剧的认识也不愿为迎合而放弃新戏剧形式探索的普希金,作为其坚决而清醒的革新古典戏剧、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体系的意识、实践及其成果的代表《鲍里斯·戈都诺夫》,何止是他说的“浪漫主义戏剧的实践”,是否也是他正走向现代戏剧(或现代文学)的脚步呢?!是否也是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方向的先声呢?!也许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努力地要往一个突破的方向前行),我们也不苛责他的同时代批评家了。

注释:

①当时多人以“鲍·戈都诺夫”为题材进行创作。鲍·米·费多罗夫(Б. М. Федоров, 1794—1875, 俄国诗人, 戏剧家, 新闻人, 作家)创作了同名作品。

参考文献:

- [1]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4) [M]. 满涛, 辛未艾,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 [2] С. Т. Акса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ксакова в 4 - х томах (Т. 3) [M]. М., 1956.
- [3] П. И. Лебедев - Полян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16/18) [С]. М., 1934.
- [4] 谢·普希金. 普希金全集(6) [M]. 邓学禹, 孙蕾,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5] С. Шевырёв. Обзорение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за 1827 год [ЕВ/ОЛ]. 见: <https://www.proza.ru/2016-07-17>.
- [6] Е. О. Ларионова.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31 - 1833 [С]. СПб., 2003.
- [7] Н. А. Полевой, Кс. А. Поле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825—1842) [M]. Ленинград,

1990.

[8] Е. О. Ларионова. Пушкинвприжизненнойкритике: 1828—1830[С]. СПб. , 2001.

[9] В. И. Синюков.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Т. II) [М]. М. , 1987.

[10]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ом 10)[М]. М. , 1962.

[11] П. И. Лебедев – Полян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J]. Т. 19/20. М. , 1935.

[12]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选[C]. 满涛, 辛未艾,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3]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13томах(Том 1)[М]. М. , 1953.

[14] 耿海英.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s It a Pioneer of Modern Drama?

—The Debate before an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Boris Godunov*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ragments of *Boris Godunov* in 1827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hole drama in 1830, the drama provoked a fierce debate in Russian critical world. The main point of the controversy is the genre and style of work: Poetry or drama? Romantic or classical? If it is the poetry, it does not rhyme; if it is drama, it violates the criterion of classical drama, thus generat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views among many critics. And Pushkin himself realized that it was the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drama, and a practice of romantic drama. Although it overstepped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drama at that time, he was also unwilling to give up the exploration of new art system in order to cater to audiences. And this exploration is the exact footsteps towards modern drama or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Pushkin; *Boris Godunov*; genre; debate; modern drama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征稿启事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决定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围绕坚持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科学把握百年变局下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公开征集论文,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稿应为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篇幅不少于8000字为宜,立论谨严,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具有创新性和学理性。本刊秉持优稿优酬。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在中国之技术转向

刘芳兵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对艺术生产领域的介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在中国展开了新的问题域即艺术生产论研究的技术转向。技术问题域的艺术生产论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技术与艺术生产关系的宏观思考与阐释;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进行技术向度的理论构建;三是立足于当下具体的艺术生产实践,分析数字时代艺术生产的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展现出鲜明的实践指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技术转向;宏观阐释;理论构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11-07

新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的技术问题域在中国某种程度上是被忽视的。^①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问题;二是考察市场机制对于艺术生产的影响问题。虽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对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但总的来说,技术与艺术生产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作为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这里所说的技术转向指的是中国学者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的技术问题域进行充分挖掘,并能够结合当下中国具体实践进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就是说开始具有了理论自觉与创新意识。而这种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与当下新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当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艺领域的全方位介入,使得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技术不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对艺术生产领域产生影响,更深入艺术生产领域自身,与艺术生产融为一体,甚至成为艺术生产主体而对艺术种类、艺术观念、艺术体验等方面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侧重强调资本与市场的传统艺术生产论研究对艺术生产的影响,显然已无法充分

阐释当下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新技术对于艺术生产的变革性影响这一现实。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核心要点强调的就是将艺术生产纳入一般生产的规律中进行考察,探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复杂性关系。新技术对于艺术生产的影响,更加证实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中强调物质力量对于艺术生产影响的理论正确性。

一、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宏观思考

技术对艺术领域的持续介入,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视域下,如何看待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大体说来,承认技术对艺术生产有重要影响是学者们的理论共识。但这种影响究竟是积极正面的,还是消极悲观的,还有待商榷,这涉及对技术进行价值层面的考量。具体而言,学者们的观点大致有三个派别:第一种相对乐观,更为看重技术变革对于艺术生产的积极影响,他们多采取一种动态的历史考察方式,将艺术生产置于技术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认为技术发展与艺术生产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第二种较为辩证,认为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辩证复杂的,应结

收稿日期:2022-11-1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国化进程研究”(IFYT19014)

作者简介:刘芳兵(1989—),女,河南郑州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种相对悲观,担心技术的发展会加速艺术生产沦为资本的奴役进程。

新技术对艺术生产的影响力使学者们意识到艺术生产工具对于艺术生产的重要性,将艺术生产置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侧重分析媒介技术对于艺术生产影响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即艺术媒介对于艺术生产的影响遵循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存在方式”的一系列转变。有的学者梳理了由媒介技术演变引发的人类艺术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结构转变的一系列过程;^[1]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文学生产工具的变革对于文学生产关系的调整等。^[2]这种考察思路把媒介技术作为艺术生产力的表现,而生产力的变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而改变艺术的存在方式。还有学者对艺术生产工具的发展史及其对应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总结。马克思曾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有学者抓住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核心,他将艺术生产工具史梳理为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电子资本主义时代以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而每一个阶段的技术突破都加速了文艺大众化和民主化的进程。^[4]

以上对于艺术生产工具发展史梳理的研究方法,倡导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这种研究思路遵循的是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这种对于艺术生产工具发展史的梳理,使得艺术生产工具的变革性意义凸显出来。同时,技术与艺术发展的相互影响显现出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中不平衡理论命题的一种呼应,加深了我们对艺术生产唯物论基础的进一步理解。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技术之于艺术生产的变革性作用,应进行综合的考量与辩证的思考。

谭好哲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对艺术影响的两种态度为例进行了反思与探讨,他认为媒介技术本身并无倾向性,是不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不同的理论生成语境造成了对技术的不同态度。^[5]谭好哲对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研究抓住了马克思强调的艺术生产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6]296}这也是我们研究技术时代艺术生产的方法论基础;还有学者将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置于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辩证关系中进行考察。王东昌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既存在一致性又具有不平衡性的观点出发,认为现

代科技与艺术生产在局部、短期、表面上存在不平衡性,但从长远、整体、根本上看,现代科技对艺术生产“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7]117}。

此外,还有多数学者明确指出新技术的发展对于艺术生产具有双重影响。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一方面,技术发展使得艺术生产被纳入社会生产的总系统中,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大提高了艺术的生产力与表现力;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对于当代艺术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加重了当代艺术生产的物化趋势。^[8]另有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媒介技术之于文学生产的双重影响,认为媒介技术对于文学生产是一个解构与建构并存的过程。^[9]李庆本则从大众与公共空间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对于文学生产的双重影响,认为其既造就了一个民主化的“公共领域”,同时又隐秘地破坏了这种“公共领域”。^[10]胡亚敏也看到了高科技对于文学创作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是对传统文学表达方式等的瓦解,但另一方面高科技又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是对文学观念的重构等。^[11]可以看出,技术对于艺术生产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这也是中国学者看待技术与艺术关系的主流观点。

总之,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辩证复杂的,要结合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性质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马克思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等的限制,艺术生产活动的很多方面难以被物化,因此艺术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做出了可以“置之不理”的判断。^{[12]417}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之前很多难以被物化的艺术生产类型逐渐突破技术的瓶颈,资本和商业的力量依托技术发展能够更轻松地介入艺术生产领域中。由此,学者们开始思考新技术催生的新艺术类型沦为资本奴隶的可能后果。

一些学者在面对技术发展对艺术生产带来的巨大变革的同时,指出了新艺术种类将会引发的审美挑战,认为技术发展虽然可以“扫除神圣和崇高”,但是也会使人类面临“被压抑、限制和操控的风险”,有可能“落入工具理性的牢笼”;^{[13]185}还有学者指出一旦写作成为一种可以批量生产的“新技术”,那么其“神圣感和仪式氛围”便被剥夺了,艺术生产将会沦为一种“商业表演”的技术工种。^{[14]24}这种对技术之于艺术生产的负面影响的思考很有必要,它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之技术向度增加了反

思的维度。不得不承认,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技术进步有利于艺术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了艺术生产的进一步提高,将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

二、基础理论建设

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进行技术向度的理论建构,是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之技术问题域下取得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开始突破以往比较保守的文本阐释阶段,而进入理论自主创新的阶段。总的来说,这种理论建构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路径:一是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高度对艺术生产论进行工艺学的理论重构;二是从媒介生产角度推动新媒介文艺生产论的理论建构;三是基于新技术时代产生的艺术生产新类型,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为指导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与艺术生产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者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新路径。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在新世纪以前的艺术生产论研究中,可以说是被忽视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技术置于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经济关系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其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维度来考察技术问题,具有一定的辩证性与批判性。而刘方喜正是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进行了工艺学的重构,形成了其艺术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具体说来,他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考察机器体系的“生产工艺学”理论,运用到对当代人工智能艺术的考察与分析中,并尝试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进行工艺学的重构。马克思把工艺学和社会方式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考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动能自动化革命对物质生产领域产生的影响,刘方喜则以此研究思路为参照,考察了当今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对于艺术生产领域的重大影响。他将马克思对机器的态度运用到对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价上,认为应该把机器与机器之应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之应用是不同的。^[15]这种“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兼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维度,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辩证性。

此外,他还开创了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生产的“机械原创”等理论新命题,可以说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的一种延伸。本雅明在对机械复制时

代的艺术生产进行考察时,创造出了“机械复制”“灵韵”“震惊”等关键词,而刘方喜则围绕着“机械原创”“创客”“分享”等关键词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生产的特点。^[16]总之,刘方喜对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生产论的工艺学重构,廓清了艺术生产论技术问题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工艺学批判思想应用于艺术生产领域,形成了艺术生产的工艺学批判理论,是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之技术问题域下取得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探讨媒介技术之于艺术生产的影响是当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陈定家、欧阳友权、金惠敏、方维规等多位学者在这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从基础理论建构的角度对艺术生产论进行媒介论建构的学者并不多,因此单小曦、张利群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尤显可贵。张利群以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为指导,把媒介生产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他把媒介生产与文学生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着力建构文学媒介生产论的理论体系。他从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理论系统、生产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来论述文学媒介生产论的理论构成。^[17]其理论贡献在于,初步构建了文学媒介生产论的理论体系,突出了媒介的生产功能,使得媒介在艺术生产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可惜的是,张利群的理论建构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暂时没有看到他在其他文章中具体展开。而单小曦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他在媒介生产的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详细而又系统的研究。

单小曦的新媒介艺术生产论,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的媒介理论与新媒介文艺发展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进行的理论构建。他在《新媒介文艺生产论》中,从基础理论、创作实践、批评话语建设三大视角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新媒介文艺生产论体系。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生产媒介理论资源进行了挖掘与汇总,这为其建构新媒介文艺生产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理论构建的具体展开过程中,他具体分析了当代媒介的艺术生产力、新媒介文艺生产方式、文本特征,以及不同时代审美经验范式变革的媒介学成因等。除对新媒介文艺生产进行基础理论的建构外,单小曦还聚焦于新媒介文艺生产的具体创作实践,分析了人工智能文艺、数字交互艺术等新媒介文艺现象所体现出的新媒介文艺生产之智能化、场景化等特征。最后他还试图建构新媒介文艺的合作式批评模式等。^[18]

单小曦对新媒介文艺生产论的理论建构与系统

研究,激活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新媒介时代的理论生命力,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代媒介技术条件下的新拓展,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可以说,当下许多艺术生产新种类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无论是人工智能艺术还是新媒介艺术都可以说是数字艺术,这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艺术类型概括。一些学者已经在数字艺术领域取得了研究成果,而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与数字艺术结合的角度进行理论创新的学者不多。马立新的《数字艺术哲学》一书,对数字艺术这一新型艺术生产现象的全面考察涉及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尤其是书中第三章“数字艺术生产论”涉及数字艺术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机制、数字艺术生产与创意产业等重要的理论命题。^[19]此外,马立新等还分析了艺术传播、艺术消费、数字艺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建构等,涉及数字艺术生产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今数字时代的理论新进展。

此外,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置于当代视觉艺术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视觉艺术生产的理论构想。视觉艺术是基于技术媒介发展而形成的当代艺术新景观。张伟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与现代视觉艺术的生产机制进行了观照:从艺术生产论的“物基”意识与视觉艺术的技术导向、视觉消费、艺术生产的主客体关系与视觉生产的主体身份、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与视觉艺术的权力架构等方面,具体分析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对于当代视觉艺术生产依然具有的理论阐释效力;同时,他也指出了现代视觉艺术语境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域,如日常生活审美性问题、生产主体问题、生产与消费问题、虚拟消费问题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进行创新的理论诉求,是对原有问题域的超越。^[20]

以上从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新媒介艺术、数字艺术、视觉艺术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进行的理论建构,都是基于技术维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理论创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今技术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实践探索

除了宏观上的理论思考与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以外,还有一些在具体实践层面展开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关注实证方面的问

题,对个案进行分析,深入数字时代艺术生产的现场,具体考察作为物质层面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和内化到艺术家具体的艺术生产活动中的。这里,我们仅选取近几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且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成果进行分析。当下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对艺术生产产生了哪些影响,数字时代的艺术生产有什么特征,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侧重于从技术一端分析其介入艺术生产领域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有的学者侧重于分析技术对于艺术生产机制的改变;有的学者侧重于分析技术介入艺术生产领域后对大众群体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新的审美体验。

传统的艺术生产论研究重视分析市场经济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艺术生产活动,技术问题域下的艺术生产论研究则更为关注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艺术生产领域。分析技术介入艺术生产领域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对技术发展的极端范例之人工智能艺术的考察与分析。一些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生产领域的优势及其美学限度。张登峰认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手段的限制,目前人工智能艺术只能应用于绘画、诗歌、音乐等叙事性弱和编码性强的艺术领域,而在叙事性强的艺术领域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21]张伟分析了人工智能超越一般物质媒介的技术优势,认为其缩短了媒介模仿机制的实践间距,实现了人类媒介实践的“自足”效应,但人工智能在审美意向性、经验意识与人类非常态的思维特征等方面无法超越人类智能,由此保证了人类在艺术生产场域的主导性。^[22]

分析数字技术的书写特点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龚举善、陈小妹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作为一种修辞方式进入艺术文本结构,数字技术带来的“先进的输入方式”重构了“艺术生产的书写机制”,并为艺术家带来虚拟化与自由化的艺术创作体验。^[23]白亮重点探讨了人工智能写作的创作模式,认为其操作性强,而传统写作的“人学”范式在人工智能写作时代已不再完全适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学写作的介入将是“一次突围和进步”^[24]。

还有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技术发展与新艺术种类的关系。与马克思侧重考察技术发展对希腊神话等艺术种类的消亡不同,中国学者大多考察技术发展催生新艺术种类的出现。如人工智能技术之于人工智能艺术、AR/VR/MR技术之于沉浸艺术、区块链技术之于加密艺术等的分析。以上都是从技术分

析的角度,考察其对艺术创作的整体影响。那么,技术发展对艺术生产的各个环节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侧重点。杨会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从文本生产、传播、接受三个视角,考察了以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介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具体影响。从文本生产角度看,这种新媒介载体催生了两极化的文本:“长篇巨制”的大文本与“微文学”小文本;而从传播渠道上看,文学生产表现为多渠道的产业化加工生产方式;最后从读者接受角度看,自媒体提供的交流平台为自由即时的交流对话提供了方便,但同时读者群体也表现出非理性的“粉丝”倾向。^[25]

类似这样的考察还有很多:有的以网络文学为个案,探讨网络时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以陈奇佳、陈定家、欧阳友权等为代表;有的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分析媒介对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具体影响,以胡友峰、张邦卫等为代表;还有的聚焦于“微时代”的艺术生产问题,具体分析了“微时代”艺术生产机制的革新,从“微时代”艺术生产主体、艺术创作、艺术传播与接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以李雷、张玉能、张弓、王德胜、胡智锋等为代表。我们不再一一解读,但并不代表这些成果不重要。

探讨技术发展对于艺术生产各个环节的具体影响,这种考察模式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研究引入艺术生产活动内部,使得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更为丰富与全面,也更彰显出技术对于艺术生产内部机制的全方位渗入式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研究的一个贡献,在于强调技术发展对于艺术与大众关系的变革性影响。中国学者受其启发,围绕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文艺大众化趋向及其审美经验的变革等一系列现象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当下新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文艺大众化的进程,学者们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但他们的研究没有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文艺大众化带来的新的文化生态及其新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形成。

有的学者就具体分析了技术发展之于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形成的新的“共享”价值理念。刘方喜认为,智能软件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催生了“大众”范式的新转型,即大众由生产者变为“产销者”,大众参与的文化对文化领域的“等级制”有一定的冲击与瓦解,从而形成“去区隔化”的文化生态。^[26]王德胜考察了“微时代”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于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的生成现象:文化生产与消费呈现“去历史化”现象,进而带动社会

“日常生活审美性”的回归;文化风格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引导人们“将日常生活感受的审美功能绝对化”;文化民主的“草根性”带来的文化共享价值,支持了当下集体娱乐的审美经验。^[27]

还有一些学者侧重分析了技术发展对于大众审美经验的变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之技术范式取得的一大成果,就是以电影艺术为例分析了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震惊”这种审美体验,那么,新媒介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审美体验?一些学者将新技术时代的审美经验总结为“融入”。单小曦以“静观”“震惊”“融入”三个关键词分别代表手工制作时代、机械复制时代和当今数字媒介生产时代的审美经验,并进行了对比分析。^[28]别君华则侧重分析了当下新媒介文艺的审美体验,认为新媒介文艺使得“融入”式的“瞬间体验”占据当代人审美经验的中心,“瞬间”体现为一种“加速”从而清除了连续性,因此个体应保持“沉思”与“减速”的能力。^[29]

以上是对艺术生产的微观层面展开的研究,聚焦于艺术生产的技术手段及其对艺术生产过程的影响,并深入大众的审美感知方式等方面。这种对数字时代艺术生产的一些具体实践进行的分析与考察,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与当下中国具体的艺术生产实践的对话,理论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与中国特色。

四、研究价值及其反思

总的来说,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的技术转向主要采取了一种“工艺学”的考察方式。与市场经济语境中艺术生产论研究的“经济学”考察方式不同,技术语境中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工艺学”考察方式更为关注艺术生产工具对于艺术生产的影响,遵循的是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框架:“工艺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存在方式”的理论考察模式。这种“工艺学”的艺术生产论研究模式,强调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如何发挥其对于艺术生产的支配性力量,进而引发艺术生产机制的一系列变革。这种“工艺学”的考察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论和西方流行文论等有着明显地超越,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30]总的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之技术问题域的展开,具有以下理论价值:

一是“工艺学”的考察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技术维度得到重视,一些曾被忽视的理论命题被挖掘出来。如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技术

的论述得到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技术维度以及艺术生产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得以展开。“工艺学”的理论研究更为重视艺术生产论中人与物的关系模式,这是艺术生产论研究的问题域之转变。

二是增强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下技术语境中的理论阐释效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下的生命力。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对数字时代的艺术生产论进行理论建构,他们从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新媒介艺术生产、数字艺术生产、视觉艺术生产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进行理论重构与拓展。

三是新技术发展为中国当代文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时代的艺术生产论研究更为关注当下中国的艺术生产实践,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具有中国特色,摆脱了传统艺术生产论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模仿阶段。

当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之技术问题域的开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创新。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

一是虽然已有一些理论创新的成果出现,但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解读文章偏多,理论高度有待提升。这尤其体现在对当下新技术催生的艺术生产新类型的分析上,多数学者看到了新艺术种类的特点,并进行了分析与解读,但理论深度不够,停留于现象描述。还有,对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思考,受传统思维模式中价值判断的限制,多注重分析技术对于艺术生产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样的考察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不免流于空泛。如何破除理论研究中传统思维的限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二是应注意吸收当下其他理论形态的优秀成果,注重理论间的借鉴与融会。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在中国的理论借鉴资源一般局限于经典艺术生产论本身,一些学者开始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等其他方面吸取营养并对艺术生产论进行改造,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路径。但是面临当今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现实已超出马克思当年的理论研究问题域,因此,借鉴与融会当下的一些理论新成果尤显重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艺术生产的范围将会扩大,因此概念的拓展与借鉴能更深刻地理解数字时代的艺术生产。如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概念,对于当下的艺术生产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下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对艺术生

产领域的介入,显然已超出了传统艺术生产论的研究视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思考显然必须具有跨学科素养,仅人文学科的思维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这种新技术催生的艺术形态。一些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国外学者的理论资源都应被借鉴。总之,如何将这些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视域及当下中国具体的艺术生产实践,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与实践议题。

三是技术问题域下的艺术生产论研究还应坚守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核心命题,警惕理论泛化最终消解理论的后果。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与创新,不能无限扩大化,尤其是技术问题域的展开,使学者们开始对媒介、传播、技术、社会生产等投入大量的关注,那么,一篇基于传媒技术与艺术生产问题的思考到底是属于传播学、媒介学还是艺术学,们应对此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如一味强调技术对于艺术生产论的变革性作用,就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命题中的批判性维度,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负面影响应始终成为学者们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侧重点;再如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旨归,在于探讨如何实现自由的精神生产,那么技术问题域的展开也应加入这一维度,如何利用技术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始终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的目的所在。总之,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既要扩展边界,也要守住底线。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内涵,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与创新。

注释:

①当然这样说也有一定的冒险,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本雅明和布萊希特等学者的艺术生产论就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技术问题域的展开,他们的理论确实多次被中国学者拿来研究,但这种研究仅限于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进行文本阐释,没有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 [1]袁牧华.艺术生产方式的历史建构与艺术价值取向的多维嬗变[J].湘南学院学报,2012(4).
- [2]张利群.论文学在艺术生产语境中的变革和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4(4).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刘方喜.当机器成为艺术生产主体:人工智能引发文论生产工艺学转向[J].江海学刊,2019(3).
- [5]谭好哲.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 (2).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王东昌.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4).
- [8] 王汶成. 传播技术的进步与艺术生产的变迁[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 [9] 欧阳友权. 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与技术建构[J]. 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 [10] 李庆本. 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J]. 湖南社会科学,2013(6).
- [11] 胡亚敏. 高科技与文学创作的新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文学与科技关系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周臻. 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挑战与反思[J]. 山东社会科学,2019(10).
- [14] 杨庆祥. 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J]. 南方文坛,2019(3).
- [15] 刘方喜. 超越“鲁德谬误”:人工智能文艺影响之生产工艺术学批判[J]. 学术研究,2019(5).
- [16] 刘方喜. 马克思与物联网分享时代: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
- [17] 张利群. 文学媒介生产论的理论构建[J]. 当代文坛,2016(1).
- [18] 单小曦. 新媒体文艺生产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19] 马立新. 数字艺术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20] 张伟. 艺术生产论与当代视觉美学的话语生产:兼及建构马克思视觉文艺观之可能[J]. 山东社会科学,2021(9).
- [21] 张登峰. 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限度及其可能的未来[J]. 江汉学术,2019(1).
- [22] 张伟. 物性、智性与情性: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J]. 中州学刊,2021(10).
- [23] 龚举善,陈小妹. 数字时代艺术生产的技术修辞[J]. 人文杂志,2009(1).
- [24] 白亮. 技术生产、审美创造与未来写作:基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思考[J]. 南方文坛,2019(6).
- [25] 杨会.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机制[J]. 扬子江评论,2016(5).
- [26] 刘方喜. 文化生态去区隔化:短视频平台之生产工艺术学批判[J]. 文艺争鸣,2020(8).
- [27] 王德胜. “微时代”的美学[J]. 社会科学辑刊,2014(5).
- [28] 单小曦. 静观·震惊·融入:新媒体生产论视野中审美经验的范式变革[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5).
- [29] 别君华. 瞬间体验的生产及其悖论:从机械复制艺术到新媒体文艺[J]. 山东社会科学,2020(12).
- [30] 刘方喜. 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时代[J]. 中国文艺评论,2019(1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chnological Tur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LIU Fangbing

(Center for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art production, the study of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has opened up a new area in China, that is, the technological turn in the study of artistic production theory. The study of artistic production theor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macroscopic view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rt production; the second i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istic production; the third is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ts specific style based on the specific art production practice at present, and to show a distinct practical direction.

Key words: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technology turn; macro interpret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编者按:先锋小说家刘恪,同时也是先锋文学理论的拓荒者,评论家王一川称他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位双魂式文学家”;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刘恪的文本在整个先锋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写道,“他对词语的高度敏感给过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作家墨白认为,“刘恪的理论著作校正了中国当代文坛评判的标准”,其先锋的文学梦想与真诚的人格力量,撼动着同时代及其后的文学同仁。为纪念刘恪先生为文学的一生,本刊特约两位深入了解刘恪先生的青年评论家撰写该专栏文章,以传承他的文学精神。

创造者的心迹:刘恪作品中的自我

张新赞

(北京工商大学 传媒与设计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自我”是文学中的重要话题,作家刘恪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里有不同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形象。他的早期作品展现的是积极的行动的主体;先锋写作时期是孤独的抒情者的自我形象。从外而内的自我的嬗变充满偶然,也有必然原因,既是他的主动选择,也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刘恪的精神肖像在其作品中隐现,也将成为文学史里的界碑。

关键词:刘恪;先锋写作;自我嬗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18-08

一、刘恪的文学王国

2023年1月8日,著名作家刘恪先生去世,享年70岁。1980年大学毕业后刘恪从养育他的巴山楚水走出,漂泊一生,终得安息。他走了,留下一个巨大的文学王国,目前已经出版的小说、散文、评论、理论专著就达700余万字。

刘恪15岁就开始了严肃的思考和写作。1968年春雨连绵中,少年刘恪梦见山区水库的茶厂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中,据他自述,这是他第一次提笔写作,写水库、茶厂和采茶的女人,两万字,未完成。^[1]1982年发表散文《乌江晨曲》(《乌江》第3期),这可以看作刘恪的处女作。2020年《青年作家》第12期《重金属》栏目,发表刘恪的小说《民间消息》及创作谈《小说是一种潜能的勘探》《我们卑微的生活》。2021年《青年作家》第9期发表作家沈念专访《我是注定孤独的行者——刘恪访谈录》。终其一生,刘

恪的写作生涯长达40年。斯人已去,阅读他的作品,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纵观刘恪40年的写作生涯,有几个时期是非常突出和鲜明的:

第一个是“红帆船”时期(1987—1992年),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红帆船》《山鬼》《砂金》《寡妇船》四部。

第二个是“蓝色雨季”时期(1993—2000年),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梦中情人》(1993年)、《蓝色雨季》(1994年)、《城与市》(1998年完成,2004年出版)、《梦与诗》(2000年完成);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刘恪走向了他的“先锋写作”之路。“蓝色雨季”的酝酿则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

第三个是先锋归来后的短篇小说集中写作期(2001—2004年),有《制度》《民族志》《生物史》等小说。2001年5月,他开始昆德拉研究,与高兴合作译著《欲望玫瑰》,2002年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第四个时期是理论与评论写作的高产期

收稿日期:2023-01-25

作者简介:张新赞(1980—),男,河南虞城人,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5—2023年),2004年11月刘恪去开封河南大学报到,开始了他人人生十年的高校教书生涯。2005年完成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同时开始写作另一本理论著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2008年出版三部理论著作:《词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耳镜》(理论为主);50万字的理论专著《中国现代小说美学》,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出版三部高质量的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尤其是两部“小说技巧讲堂”多次重印,又出了修订版,其中修订后的《现代小说技巧》达60万字,202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还不算他不间断地写的外中作家的评论文章,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上。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刘恪理论写作的大总结、大爆发时期,一点都不为过。

刘恪的文学王国留下的文本类型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文章(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理论专著。小说的类型更为复杂,因为在1993年之后,他进入先锋实验写作,对他的小说文本做具体类型的辨析更加困难,总体呈现一种“跨文体”的多文体综合的文本特征。

迄今为止,批评界对于刘恪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作品有如下概括:①早期的“新浪漫主义”和寻根写作;②先锋实验作品的诗意现代主义,后巴洛克式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尤利西斯”(《城与市》);③2000年以后浸透先锋精神的短篇写作的高峰;④现代小说理论和先锋小说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小说语言史与小说美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者。评论界的解读和研究推动了刘恪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但还远远不够。尽管刘恪曾告诫评论者说很多先锋文本是一种“拒绝批评的文本,它是一种可写的文本,你只能在理论上扩大其神话与梦境,从语源和创作本体上来探讨其方法,千万别指向目的论的总结”^[2]。先锋文本的确有拒绝批评和阐释的一面,却不是“无缝可击”的:首先,在文体特征上就可以进行归类和概括,如其“跨文体”特征;其次,先锋作品的语言美学研究也是可行的,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都有专章讨论先锋作品“自为语言”问题;再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先锋作品不仅能从形式上进行总结和阐释,同样也能从内容和意义上进行解读,正如二十多年前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刘恪的《蓝色雨季》《城与市》等作品在形式上将小说、诗、散文、日记、法律文件、图表、地方志等多种文体汇聚一体,其目的是“共同服务于一种特殊需要:表现生活于都市的知识分子的浓烈

世纪末忧郁。小说中回荡着这个时段特有的诗情、哲理、理性、欲望、幻想和想象,显示了在种种异质的文化和文体碎片中寻求生活中的诗及其韵味的努力”^[3]。这说明意义问题依然是理解先锋写作的重要路径。

先锋文学炫目的形式实验的确刺激评论者的眼球,很多评论也侧重讨论先锋文学的文体形式,而对先锋文本隐在意义的阐释显得不足。本文拟从“自我”这一带有强烈主体意味的视角讨论刘恪的作品,尤其是前两个时期作品中自我的言说方式、自我的形象的嬗变等,以追寻写作者的心灵史。

二、文学中的“自我”

我(I),或者自我(self),也可以称为主体(subject),带有强烈主观色彩。“我是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个问题,自我是哲学命题,也是文学命题,文学和哲学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同样的问题。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通过历史性的深度透视,考察了“现代自我”的各种精神来源,他认为:思想性文本和创造性想象的文本,共同为现代人自我的形成提供了道德和审美来源。^[4]小说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明确指出:“任何时代的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5]²⁹自我的形成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现实中的自我是文学中的自我形成的精神本源之一,这就是我们探究文艺作品中自我的根本意义。

文学中的自我当然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学体裁、不同的写作者对自我的想象都会不同,构筑的自我形象也千姿百态。神话和史诗时代是神和英雄形象自我,小说兴起后,凡人的自我形象取代了神和英雄的自我成为主流。抒情诗从古典时代就突出“我”,“我思”,“我爱”,自浪漫主义思潮开始,“一个孤独者的漫游”——个体的自我形象弥散在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也包括哲学作品中,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有一个“超越自我的自我”即超人。鲁迅作品(小说和杂文)中有一个激愤呐喊者的声音,散文诗《野草》则是一个“秋夜忧郁的抒情者”低低倾诉的自我形象。郁达夫《沉沦》中有一个沉沦下坠的自我形象,而郭沫若《女神》中则是一个亢奋叫喊的自我。钱钟书《围城》里的主调是“讽世的笑声”。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十日谈》里的男女都是自然情欲的自我形象。卡夫卡的小说中,处处是

一个谨小慎微充满恐惧的自我。也有学者在解读诗人于坚《作品 67 号》时,发现了一个“平民自我的快活表白”的自我形象^[6]。相比于诗歌,小说的解读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解读要复杂得多,更何况写作者在不同阶段、不同的文本类型中变换身份,粉墨登场在文字中表演。

“言为心声”,这一古老的遗训依然有效,本文所说的“自我”主要是作品呈现出的总体上的话语调式、语气、声音。文学自我的几个层次:

①当然是作家本人,即写作者本人的自我思想、自我意识,这常常是分析作品中自我的起点;②作家在作品中创造的一个个自我的形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通过人或物发声,表达自己;③作家本人与他创造的人物的关系,可能是远的,松的;也可能是近的,紧密的,甚至带有自传色彩的“私人生活写作”^[7]¹⁷⁷。前者如博尔赫斯,刘恪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散文也“写得很漂亮”,但是他的小说“是与社会历史及个人生活没有关系的幻想制造者,是一个知识图书馆的守望者”;^[8]后者如浪漫主义诗歌的作者和诗中的自我,常常高度统一,难分彼此。即使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大师毕加索,我们能鲜明地看到,他的个人生活与其美术风格的流变过程:古典主义的毕加索、蓝色时期的毕加索、粉色时期的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毕加索、超现实主义时期的毕加索、田园时期的毕加索……那么刘恪的作品呢?如上所言的几个时期的文本类型差异很大,先锋实验写作更是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通过反复阅读,纵览刘恪不同时期的作品,本文有如下认识:①刘恪本人是一位诗人小说家^[9],对诗意追求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他一生从未放弃的。他的小说和散文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红帆船”中的楚地浪漫,“蓝雨徘徊”时期的诗意现代主义,散文写作,甚至更偏重理性沉思的《词语诗学》也是沉浸在浓郁的自我感觉之中进行的;②他早期作品浓郁的楚地浪漫主义色彩,先锋实验“诗意现代主义”中几乎切断和社会历史的联系,却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私人写作”的性质;③他在先锋文本中不断建构诗意,又不断摧毁诗意,因而他的浪漫主义又是经过后现代精神洗礼的。

“自我”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学上的浪漫主义,目前至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说法:“(在)象征性和内在化的浪漫情境中发现了一种探索自我、自我与他人及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认为想象作为一种能力比理性更为高级且更具包容性。浪漫主义主张在自然世界中寻求慰藉或与之建立和

谐的关系;认为上帝或神明内在于自然或灵魂之中,否定了宗教的超自然性,并用隐喻和情感取代了神学教义。它将诗歌和一切艺术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创造;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成规,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及政治规范,更强调个人、内心和情感的价值。”^[10]这段描述性的定义,实际上是对浪漫主义美学精神的一个“家族类似”的说明,一个总的坐标参照,因为不同时期、不同艺术门类的浪漫者具有高度的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追求自我心灵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偏重抒情性的文本是很容易在其中找到那个自我的,诗歌就是典型。刘恪先锋小说多变的形式实验掩盖了其内在意义的抒情性^①,结合写作者本人的心理事实,以及他在作品中展开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形象的角度观察刘恪,本文认为刘恪的作品可以视作他的心灵史和精神自传,刘恪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更为高级的自我存在,他自己的精神肖像在文字中显现。本文尝试分析刘恪几个时期作品中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形象问题,尤其是“红帆船时期”“蓝色雨季时期”和“理论爆发期”。精选小说、散文、评论、理论文本,挑出典型和范例,对作品进行分析,观察写作者在不同时期创造的自我,以及这些自我与写作者本人的隐秘关联,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艺术家的创造性心灵,丰富并加强我们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接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阅读者通过阅读文学文本,引起自我意识的改变,意识的改变就是内在心灵的改变,内在心灵的改变就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三、刘恪作品中自我的嬗变

刘恪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各有差异,但是也有连贯和持续的不变因素。文学中的自我形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创造性,足以代表整部作品的调性。本文重点分析“红帆船”时期和“蓝色雨季”时期的自我形象,并就这种自我嬗变的原因做一个探讨。

(一)“红帆船”时期:荆楚之地浑身英雄气的浪漫自我

这一时期的刘恪还在经验写作或者说主题性写作的道路上激扬文字。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大潮中,刘恪的写作难免受到诸如“寻根思潮”的影响。离开故乡巴山楚水多年,刘恪在文字中时时回望故乡的山山水水,尤其是他更多展现湖湘之地的带有原始自然的一面。在刘恪的成名作《红帆船》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语句和段落:

章驮子浑身都在躁动中,胸壁的血潮

涌得他四肢抖索……

血样的人,血样的长江,还有,还有血样的红帆船!

……

只有在与江浪搏斗和暗礁争生存的时候人才瞬间爆发出卓越的智慧与聪颖,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用全部的心智与力量去征服那冷漠的流水和顽固的石头,只凭借那闪电般的灵感领悟那些连伟人也无法破译的妙谛真言,他们便无法求得生存。但他们又绝对天才地感悟人生……在广袤的天空和深邃的思想库房也许他寻找不到伟人的坐标,可他一定意识到自身生命本体所拥有的特殊价值。于是,那强健伟岸的肌体总恢宏廓大一种思想,热情洋溢地激荡着一种不可穷尽的鲜活生命力。

(《红帆船》)

《红帆船》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初发表于1990年《十月》第2期^②,《砂金》在《十月》第4期发表。那时的刘恪正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读书。刘恪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共同的地域和文化景观设置:荆楚之地,自然景观雄奇浪漫,激流危滩,人在其中也有相同的色彩,无论男人女人都是十足的行动者,他们血性十足,快意恩仇,《红帆船》包括《寡妇船》甚至带有浓烈的武侠小说的色彩,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也带有鲜明的卡里斯玛特质,覃驼子、龙海江、柳蛮子、柳少爷、松崽、夏愣子、碧妹、大姨、张红莲、宝英、玉芳等,敢爱敢恨,侠骨柔情。刘恪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学者称之为“新浪漫主义”,也有从荆楚神秘文化出发分析作品^[11],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地方性是造成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从作品展现的自我形象和主体人格上分析,或许能获得新的审美认知。

“红帆船”时期的作品中刘恪展示的自我形象,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是充沛的原始生存本能的勇力和智力。上面提到的江湖儿女,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这最基本的愿望,其实消耗了自我的大部分精力,“我”需要“用全部的心智与力量”才能求得生存。水路断绝,食盐、粮油匮乏,蛰龙镇的人们就要闹饥荒。生存的压力也成为小说叙事的第一推动力。小说中自我言说的调子是高亢激昂的,冲出去杀出一条生路来。无论是斗江鲨鱼、杀大鱼、猎野牛,还是鲤鱼滩围歼日本人等场景的设置,无不是为了凸显一个强悍的英

雄气概的自我形象。第二是充沛的情欲表达。“红帆船”时期作品中的男性、女性,都是情欲饱满乃至过剩的形象。礼教和世俗的网络完全无法束缚这些生命力旺盛、到处寻求情欲表达的人物。这里面除了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兽之间也可以有情欲关联。第三是自我不仅通过人物言说,也通过对自然之物的描写来表达内在的浪漫精神。比如,句式上喜欢用气贯长虹的长句:“从江滩一直撻上去的石级青黛的暗光混杂着脚下鞋板哧溜出来的各种声音也许只有秋虫解得,黑褐色的夜尘封了小镇白昼那些盲目自尊骄横势利或者是麻木愁苦奴颜婢膝还有凶残狡诈带来的繁荣与虚伪下流堆起来的热闹……”这样的句子像一组组长镜头,呈现了一个激情满怀的自我,刘恪沉浸在一个充满酒神迷狂的自我世界里。这也让我们想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特别是拍成电影的《红高粱》总体基调。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朱西甯,就曾写过《铁浆》等带有悲剧色彩的强悍的自我形象。如果再补充一点,当代文学中“强悍”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形象,刘恪以《红帆船》为代表的作品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二)“蓝色雨季”时期的刘恪:孤独的抒情者

刘恪选择先锋写作的道路,自有他的主动选择的决心,也有内心孤独的心理因素和对表达的渴望——在文字中寻求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

我呢?每临深夜便不知所措。思考?回忆?幻想?文字突然掠过视野,于是有了写字的欲望,拿着笔,想说话,可是寻遍半生也不知道找谁写信。

我真不知道该向谁倾诉自己的隐私!因而便把灵魂的欲望点滴洒在方格纸上,于是乎便有了二三年的创作。^[12]

上文提到1993年是刘恪文学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刘恪抛弃了主题经验写作的路数,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先锋实验写作上。“倾诉自己的隐私”的心理动因,算不算刘恪走向先锋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带有“私人写作”的性质。

如果说“红帆船”时期的刘恪在作品中展现了一个逆流而上酒神式的迷狂的自我的话,那么到了“蓝色雨季”时期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形象便转向了一个顺流而下的日神式的自我,沉静、孤独又痛苦、理性又诗意。前期血脉贲张的红色浪漫情绪几乎消失殆尽,那些强悍的容易类型化的人物再也不见了,灌注力量的长句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短句,不断分行的散句,甚至几百行的诗,作品的声音和调式完

全变了,“我在年轻时候写的《红帆船》和《山鬼》有一股冲腾而起的力量,叙述动力饱满而强烈,但进入中年,叙述力量便蛰入沉厚,有一种隐在的回环曲致”^{[7]202}。“由红而蓝”也说明了这种转变。红色被认为是一种“原型”色彩,有原始主义的色彩,小说《红帆船》中处处可见有关湘楚之地“红色崇拜”的直接和间接描写^③;“蓝色”则是一种忧郁的色彩,所谓“蓝调”艺术。刘恪说蓝色“作为审美,作为思想之物,都让我迷恋”,“让蓝字沉下去,积淀,而兰色浮上来,飘动着灵气,宁静悠远,只有兰色才能带着灵魂去漫游”^[13]。这是多年之后刘恪在一篇专门研究色彩的文中的沉思,在这篇文章中,刘恪还认为“色彩是一个召唤结构”。《蓝色雨季》等系列先锋作品都可以看作这种召唤结构的展开:

六年前一个忧郁的下午,我去了南方。

……

河流也许是蓝色,它却载不动白帆的虚伪,无边无际的河岸,绿色低垂着,省略语丝的湿润,废弃某块礁石的典故,阳光书写寓言,是船尾告别的碎片。

阅读刘恪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蓝色雨季》《梦中情人》《城与市》),非常明显地能感受到几种风格不同又交融在一起的碎片拼图式的自我。《蓝色雨季》整体呈现出一种低声的诉说,与上一个时期的高亢形成截然的反差。叙述者和人物都没有了向外奋力地进取的姿态,他们不再是强悍的激越高歌者和行动者,而是转向了自我的内在世界,一种“隐在的回环曲致”,他们变得缓慢、宁静,甚至软弱。“她(玉儿)很少上排船,虽然喜欢水的清凌与温柔,却害怕浪的不测和水的残忍。她不是因为个性的柔弱才感到这个世界的强大,而是生活得太艰难才感到人生需要软弱。她惧怕一切强大的,包括眼前这个男人。”而在这部作品的另一处,叙述者这样自陈:“这次《蓝色雨季》我想做一次大胆的革命,首先让人物依次在作品中退位,弱化(极个别主体形象是强化的),然后把故事切割成碎片,过程浓缩简洁到最低程度。”^[14]应该说,先锋实验写作的“元叙事”本身处处凸显自我意识,行文时自我不断“反身自顾”。

现代性的自我,自波德莱尔以来,在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出疏离主流的孤独忧郁的形象。刘恪在“蓝色雨季”时期的作品中,其调色是“孤独与抒情”,因为孤独,自我回到内在的各种感觉,梦回故乡和童年,凝视自然,审视都市和情感生活。这一时期,他完全断绝了“红帆船”时期的外在

经验和主题写作的路径,走向了内在和虚构的先锋实验写作。

肯定人的内在经验,孤独的个体在一个同样深不可测的内心中“追忆逝水年华”,痛苦、孤独、忧郁、抒情——这些几乎成为理解现代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关键词。打开作品,我们不时能听到一个忧郁又痛苦的诉说者:

近些年,我常常被内心里一种极隐秘的东西震撼,折磨如水藻一般地缠绕,每每陷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像一种水质从一汪古井里渗出,心壁的缝隙也缀满了湿漉漉的痛苦水滴。每临半夜,四周灯光都消失了,孤独从静穆的树丛泌出来,一丝丝地从窗口爬进来包围着我。那时,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古墓苍月下一具沉沦的尸体。我觉得已在惊涛骇浪的海洋里漂泊多年,刚爬上信仰的岸沿,在沙滩便陷入了丛林般的礁石。我已经走到了命运的悬崖绝壁。本来,我已克服了无数来自生活的痛苦,以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战胜贫穷与饥饿,然而,她还要剥除我最后一件衬衫。我常常因自己的无能没法解除家族的痛苦,制造了妻儿的苦难而忏悔而自责,自身生命的冲突在努力追求信仰与事业达到理性与意志的和谐中被钉在绞刑的轮椅上。我试图绕过痛苦的小径去一座幸福的花园,没想到世界交叉经由每个十字路口都是沼泽荒漠,绝壁死海。痛苦的真实,让你无法回避幽灵的召唤,现实破碎了,我只好重建幻想的家园,重回梦境的灌木丛,寻找童年插入我灵魂的净地。

(《孤独的鸽子》)

这一段是一个“我”在低声地倾诉,阅读时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细细体味。一个痛苦、孤独、忏悔自责、挣扎的心灵在文字中寻找倾听者,极度渴望一个对话者。被现实粉碎,深陷绝望。^{[5]52}然而,这里的自我依然“试图绕过痛苦的小径”去寻找“一座幸福的花园”:

我是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自己。

一个游荡在这都市里的灵魂,他在寻找,满怀期待与梦想。我闯入了我不该闯入的楼群……白天与黑夜的循环展示大地的变幻莫测,一位异乡者,离开故乡,在远行中迷路。他赤足在大地上,可找不到落

脚和安居的地方,大地不再是为他(灵魂)的大地。所以,灵魂只有去漂泊流浪,他毫无方向地走向某地。

……

流浪者静静地跨进,痛苦把门槛变成石头,漫游者企图进入家园的曲径。(《孤独的鸽子》)

没想到我真正的流浪就是从乡村离开的那天起。直到今天还在流浪的途中……

(《一往情深》)

丧失家园的漂泊者试图“重建梦幻的家园”,他的心路要走向何方?他的情可移到何处?刘恪在作品中展示的自我常常有如下的路径:或者流浪于都市的街头,注视着的一幕一幕的都市景观;或者沉湎于情欲不能自拔,这些都有论者有所分析。还有一类自我形象应该引起注意,书斋里的遁世者形象,他们热爱书籍,迷恋着阅读,沉思于哲理,执着于诗意和梦幻。阅读“红帆船”时期之后的刘恪,会发现他的小说里时时闪现出谈论读书生活和读书体悟的精彩段落:

读书是排除有形文字的障碍以后,你进入作家的内心与灵魂对话……我进入了万事万物的内部结构,顿悟事物给予的启示。这时读书已不再是读书,你在阅读一个异者的灵魂,你与他人相遇,是以你的灵魂感悟他的灵魂并完成一种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才是真正的读书。

近两年,我只读两类书:理论与诗。在纯理论与纯艺术中感悟,就像我常常摇摆于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间,用带血的灵魂感悟带血的人生。……用你所热爱生命去触摸它的生命,在那里,泥土的芬芳里正沉睡着昨日的春天。

(《孤独的鸽子》)

书才是刘恪真正的情人,现实生活中他嗜书如命。他的阅读量惊人,记忆力更惊人,他能清楚地记起几十年前一本书封面的颜色和-content 细节。大量的读书笔记、读书思考在《城与市》《梦与诗》等作品中出现,这是一个博学者的自我,一位书斋里的隐者。

诗意与梦幻也是理解这一阶段自我的关键词,诗意就是梦幻,梦幻充满诗意。刘恪写“飞翔的梦”“死亡的梦”“窘迫的梦”“饮食的梦”,写梦见“兄弟三人在长堤上散漫地行走”的“亲人的梦”;《蓝色雨季》的后面,长达几百行的诗,《城与市》《梦与诗》中也是大量插入诗作,如果把这些诗全部单独摘引出

来,应是一本厚厚的诗集。比如这样凄美苍凉的诗句:

落叶/守护墓园。空地/女人凋零的花片。
/装点,回忆的墓碑/碎一林芳叶/夜半秋雨,飘走/细雨和暮雾,曾去过/想象的湖岸。
唯有心愿/是一支纯蓝色的夜曲。

(《梦中情人》)

再比如:

自我从陷阱里汲取生命 或目光 一心一意
结构诗意 拦截最初的道路 词语在书本里
睡去 给物质一个姓名 鸟儿和叶子一同
飘下 从梦想中度过危机 记忆剪掉会飞的
翅膀 天空坠下语言的碎片 ……

(《梦与诗》)

诗歌中的自我往往不像小说通过人物言说,诗歌表达自我意识多通过“物象”开口,小说中更多通过他重视的“描写”,让物在词中显露本真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刘恪在作品中不断构筑诗意的时候,又同时在不断摧毁诗意,《梦与诗》B部写一位美丽的折纸鹤的小女孩,“那个女孩儿在草坪边玩纸鹤,一件浅红色的衣服在跳动”,随后的“我”却觉得小姑娘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一种暴风雨袭来之前的感觉”。原来这是一位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的小姑娘,“她的脸在我的眼里有些恍惚,一下子成了美丽的少女,可瞬间剥下华丽的装束后,仅是一幅骷髅架”,这样的自我感觉,美丽又残忍,带有卡夫卡式的恐惧。刘恪完全没有沉溺于柔弱的浪漫主义的抒情和诗意,他是坚硬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交融。

四、自我之谜

这里尝试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刘恪作品中的自我为何呈现如此面目,根源何处?第二个是刘恪从“红帆船”时期转向“蓝色雨季”时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某种必然性?作家本人和作品中的自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复杂的,却不是不可理解的。本文不是想提供一份标准答案,而是就所接触到的刘恪先生本人和他的作品,浅谈一点线索性的东西,希望能对刘恪研究有所推动。对于自我,刘恪有非常成熟的思考:“自我不可能脱离一些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而存在,否则也不可能有什么基本经验的表述。基本的要素和关系无疑是后天的,是构造性的,也就是说人是文化环境中的自我。自我是在区别于他人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构造性的存在,是在与他者区别中自我反思化的结果。

我被对象化,指主体在被认识的过程中,自我被看成一个对象化主体,即指自我也是一个行为主体。自我被意识时自我为一个能动过程,因为是由我去认识自我,这个活动是双重的,也包括我的主体对象化后作为客体,这也叫主客体的同一性。”^{[15]320}十分清楚了,自我之谜是可以尝试去解读的,因为自我都是在一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自我,朴素一点说作家在先,作品在后,前因而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缘果索因”,互相印证,以达到更好理解作者和作品的目的。刘恪的先锋写作一方面形式上呈现碎片化,一方面又具有“互文”的内在通约性。在碎片化文本的同时,作者刘恪却主张:“同一性是世界非常重要的基本属性。在逻辑上的同一性是解决思维的问题,世界之所以被言说,是因为有同一性的基石,否则世界就会变成不可表述和无法交流。心理学中的同一性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标识人与他自身保持同一。它既表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致属性,也指各个体内部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确认。”^{[15]320}晚年的刘恪在《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后记》里表示,“我是一个一元论者。正如斯宾诺莎认为的一样,世界是总体的存在,是一个实体”^[7]。或许你很难想象,一个追求跨文体多元表达的先锋作家,骨子里却是个“一元论”者。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窥刘恪的美学思想来回答。文学之外的刘恪,艺术素养可以说是相当全面的。1996年元旦,刘恪在一部作品的跋中写道:“回观过去,少年习音乐,还是个不错的演奏员;为人师表的岁月,是技术主义的那种;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古文,企图做点国学;后来看好理论,包括绘画与诗学,还着迷过一阵科学史。”^[12]刘恪自学过笛子、二胡,对音乐有精妙的鉴赏力,笔者多次听他点评“中国好声音”歌手的特色,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作品中的人物注意聆听,格外重视语言的“声音”之美,其大型散文《一滴水的传说》就是一部“听水”的美文。美术方面,刘恪长期沉迷于超现实主义画派的艺术家,如达利、保罗·德尔沃、吉奥·契里河等,专门写过专论《色彩的声音》(色彩美学专论)、《画布上的情人》(论毕加索)、《推圆环的女孩》(论契里河)、《阳光下的棕榈书》(论霍克尼)、《达利绘画中的语言》《发光的女性》(论德尔沃)。刘恪还钻研过印象派绘画大师的作品,尤其喜欢保罗·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据他本人说,第一次看这幅作品,他泪流满面。作家墨白曾说:“不知为什么,读刘恪的小说,让我想到了德尔沃,想起他的《林中的苏醒》《宁静

的安详》《夜之使者》,想起了他的《夜之庭园》,想起他的《乡村的道路》。我知道,在刘恪和德尔沃之间,在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和比利时人之间,肯定有一种相通的东西。”^[16]小说的绘画品质,成为刘恪作品追求的一个美学目标。“磨损原义和装饰喻义成了今天的汉语中一对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汉语的视觉性艺术几乎被工具性取代,拯救汉语已是个艰巨任务。”^[12]刘恪的写作格外强调语言的“装饰性”,他深受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的影响,他的《词语的植物园》一文就是专论“新小说派”代表性作家之一西蒙小说的视觉性特征。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刘恪的这一转变有作为写作者主动的选择、时代环境的影响、评论家们的肯定等或然因素,也有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写作中的内在必然性。按照昆德拉的说法,现代小说家发现:“自我在行动中无法把握,那么在哪里,又以何种方式,可以把握它?于是下面的时刻就到了: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调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5]30-31}作为熟悉现代性理论和研究过米兰·昆德拉的写作者(与高兴合作译著《欲望玫瑰》),刘恪当然明白后工业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人自我的丧失,主体的消解,意义消弭,强烈的碎片感等。^[17]还有,刘恪对历史的态度,即一位小说家的历史观,很少有人谈及。如果说“红帆船”时期还有“宣统三年”这样明确的历史标识的话,到了“蓝色雨季”先锋文本时期,历史几乎完全在文本中隐匿,就像人物退化为一个符号,一个字母意义,甚至连提示的意义都丧失了。这和刘恪对历史的认知分不开,在《历史的幻象》这篇论文中,刘恪讨论历史的本体意义,以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对所谓的“纯客观”充满怀疑,认为历史和文学一样都是某种“幻象”,带有重构甚至虚构的色彩,这是深受文学影响的后现代史学的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学。纵观刘恪的写作生涯,他也完全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没有兴趣,在此意义上,他的笔触专注于内心的开掘是必然的。一百年前诗人里尔克也在吟唱一首内心的歌谣:“我们想表明,最明显的幸福即使向我们显示/我们首先也得将其化入内心/才能辨认/爱人啊,除去内心,世界将不复存在。”^[18]

作家刘恪的精神肖像在其作品中隐现,也正在被刻进文学史的界碑。

注释:

①虽然也有论者讨论过刘恪先锋写作中的意义问题,如王一

川《破碎世界的隐秘诗意:读刘恪“诗意现代主义”小说系列》(《文学自由谈》,1995(1));吴义勤论及刘恪作品如《城与市》的“意义景观”问题(参见吴义勤给《城与市》写的序言《无限性的文本》相关内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本文认为还远远不够。

②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1990年小说年选》《九十年代文学主潮》等共八家杂志选刊、选载。

③如《红帆船》第五章叙述者直接补充道:“楚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崇尚红色,汉婚女嫁的陪房家具是红的,对联窗花是红的,请客送礼帖子是红的,甚至江上一带的奇俗,棺材也是红的。”

参考文献:

- [1] 刘恪. 写作记忆[J]. 青年文学,2000(6).
- [2] 刘恪. 中国小说语言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422.
- [3] 王一川. 我看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新趋势[J]. 当代作家评论,2001(5).
- [4] 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J]. 韩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727.
- [5]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6] 王一川. 平民的快活的自我表白:于坚诗〈作品67号〉中的自我形象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 [7] 刘恪.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8] 刘恪. 纸上寓言[C]//耳镜.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02.

[9] 王一川. 破碎世界的隐秘诗意:读刘恪“诗意现代主义”小说系列[J]. 文学自由谈,1995(1).

[10] 迈克尔·费伯. 浪漫主义[M]. 翟红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2.

[11] 童庆炳,李树峰. 试论刘恪长江楚风系列小说的新浪漫主义特色[M]//刘恪. 寡妇船.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何西来. 神秘的荆楚艺术世界:评刘恪的长江楚风系列中篇[J]. 当代作家评论,1991(4).

[12] 刘恪. 梦中情人·跋[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13] 刘恪. 色彩的声音[C]//耳镜.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48. (文中他认为“蓝”代表了凝重,而“兰”则意味着透明和诗意)

[14] 刘恪. 蓝色雨季[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15] 刘恪. 阅读的危机[C]//耳镜.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20. (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6] 墨白. 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J]. 莽原,2019(3).

[17] 刘恪. 国际超文本小说研究[C]//耳镜.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8] 哀歌与十四行诗[C]//里尔克. 杜伊诺哀歌. 张德明,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3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iu Ke's Literary Kingdom and Self – Spiritual Portrait in His Works

ZHANG Xinzan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Self – spiritual portra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literature. Liu Ke's 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different self – imaginations and self – images. His early works show the theme of active action, and the avant – garde writing period demonstrates the self – image of solitary poet. The evolution of the self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is full of accidents and inevitable reasons. It is not only Liu Ke's active choice, but also the resul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His spiritual portrait looms large in his works and will become a landmark in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Liu Ke; pioneer writing; self – transformation

先锋,作为虚构的文学梦想

——关于刘恪及其理论专著的贡献

李海英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当代小说家刘恪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深耕现代小说理论研究,先是从小说技巧入手探究现代小说与先锋小说的秘密,继而沿着心理→语言→艺术→法则→境界的诗学秩序,对文学关键词进行具有个体色彩的诗学阐释,进而从美学角度讨论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多年来不断实践着前瞻性的理论建构,为当下小说理论与文学理论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刘恪;小说技巧;词语诗学;语言美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26-05

一、两部小说技巧讲堂:教学作为一种新写作

刘恪先生是2004年到河南大学工作的,2013年退休,不到十年时间,写了《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词语诗学》(二卷)、《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7部理论著作,约有350万字,另有20多万字的课堂讲义“文学理论关键词”未出版。热爱理论是其长久以来的兴趣,但著书立说却多与教学有关,仅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一位罕见的好老师,以至于他的邻居、诗人萧开愚老师总是劝他该写小说了,他总说等退休了就写一部大小说,初步计划50万字,怎奈世事弄人,这一壮志最终未能实现。

刘恪刚到河南大学文学院时,给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主讲小说理论,他养成了写好讲稿再去上课的习惯,讲稿一方面用来给学生听课用,一方面在《芙蓉》杂志上连载,没有想到一学期下来就写了30万字,应众多朋友与青年小说家的强烈要求,就结集为《现代小说技巧讲堂》,于2006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技巧讲堂》的主要贡献,一是选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作为实例——可以让青

年学生、青年作家见识到真正优秀的小说文本,这些实例主要是从美国大学的教材《世界小说一百篇·美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与新批评的小说权威选本《小说鉴赏》中所选;二是对“小说”文体的诸种构成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故事学、人物学、环境学、叙述学、结构学、语言学、主题学七个分支系统展开,具体设定为“故事与情节”“角色与身体”“场面与背景”“谁在说与怎么说”“切分与组合”“语言与言语”“意图与理念”等,修订版又增加了“时间与空间”“描写与抒情”“经验与虚构”“文体与风格”四个章节。从这些看似熟悉的路径进入,能够让青年读者(包括青年学生)较为容易地进入小说基本理论的学习中。简言之,实例选得丰富,理论用得恰当,阐发时注重新语境下的新含义,为读者提供可借鉴的技术参考,同时不断启发读者自己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正如刘恪自己所言,一本书的命运真是很不好说,《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版仅三个月就售空了,2006年初版,2012年再版,2020年又在作家出版社再版一次。《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完成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总编王

收稿日期:2023-01-20

作者简介:李海英(1977—),女,河南尉氏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俊石先生督促他再去写一写“先锋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的续篇，而“先锋小说”也正是刘恪二十多年来都持之以恒坚守的写作方向，于是在2007年便有了《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如果说《现代小说技巧讲堂》是针对初学者的初阶本，那么《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则是针对有一定写作基础又要求提升功力的高阶本。那时，关于先锋小说的研究多如牛毛，但关于先锋小说技巧的理论专著却是罕见，关于先锋手段，诸如“意识流”“荒诞”“元叙述”“碎片与拼贴”“戏仿与反讽”“变形与魔幻”“迷宫与含混”“互文性与陌生性”等，杰出的先锋小说家们看似都能用得得心应手，读者或评论家也似乎都能说上三言两语，而一旦细说便会左支右绌。

当然，这其中的难度与先锋的追求有关，永不停息地“激进变化”，对谁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刘恪坚持要做的，不仅是要研究先锋小说的一切技术元素，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变化、特征、作用，还要给予一个可能性的评估。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想要指出先锋的特征、说清楚它在具体写作中的方法，就必须揭示它在思维中的方法、指出如何运用思维，才能说清它的核心是什么、有无可利用的辅助手段，以及与其他技术方法的区别，从文本分析到理论抽象，系统地进行学理性研究。

在这两部类似教材的小说技巧讲堂中，刘恪对现代小说或者整个小说文体的研究，可以说是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二、两部词语诗学：作为想象的盛大乌托邦

写完小说技巧，刘恪随即就转向了词语诗学的写作，于2008年完成了皇皇巨著60多万字的《词语诗学》（两卷本）。这两本书以“词语”作为关键词去探索文学理论或诗学问题，但又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学与社会的词汇》、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辞典》或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等著作，也不同于萨特的《词语》或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这类著作，前者或侧重于追溯关键性词语的意义、流变及文化与社会渊源，或对西方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术语进行精辟阐释，后者或以自传体小说的方式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或是执着于探究词语背后人的本体问题，两类著作都传播广泛、影响深远。

“词语”于刘恪而言，首先就是诗意本身与最亲密的伴侣：“词语首先是感性化的，像鸟一样会飞，像鱼一样能游，像花一样地散发香气。它是一个精

灵，你必须用心血喂养，让它染上血的红色，让它葆有青春，让它携带体温，你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它、亲吻它，在阳光下把它放在手心里细细地长久地凝视，是那种X射线透视，又把它置于黑箱内用耳朵去听，感受词语的秘密如何从每根羽毛的绒线里传感出来。词语从黑暗处飞出来，在空中划出了弧形，落在你的手指尖，用拇指碾一下，斗箕与斗筲会摩擦出词语的纹路，从词语的纹线里会散发气味：酸甜苦辣辛都有，用指尖弹一弹，那里有词语金属般的声音，每一个弹性会有重量、压力。把词语紧紧地贴在脉管上，让血液的涌动渗出词语内在的灵性。”^[15]正是这种与词语建立亲密关系的强烈渴望，他用了两个词“空声”“复眼”来隐喻他对词语的乌托邦想象，“复眼”的特点是由数万只单眼组成，可以提供广阔的眼界、有效计算自身与他者的位置与距离、有利于做出更快更准的判断与反应，“空声”可能就是空声之本意“虚名”，也可能转义于“空谷传声”。

《词语诗学》共选词条30个，这30个词条分为五大系列：第一系列为“幻象·内心的谎言”，涉及的词语有“记忆、感觉、忧郁、孤独、想象、梦境”等，乃是代表人的心理世界的词语；第二系列是“飞鸟·河流·文化树”，纳入的词语是“文化、形象、神话、人性、情爱、符号”等，重视的是语言符号的重要性；第三系列是“言与说·花园的智慧”，包括六个大词“存在、认识、神秘、真实、隐喻、灵魂”，焦点在于语言构成的艺术世界之奇妙；第四系列是“世界·脉络·时空图景”，包括“时间、空间、自然、生命、物质、寂静”等词，揭示艺术世界的构成法则；第五系列是“通过·密谋的真理”，包括“自由、争议、平等、身体、地缘、权力”等，探索的是文艺的位置。

王一川在《词语诗学》的《序》里写，刘恪这样的写作“首先起因于内心对于世界的体验，其次这种体验需要形诸语言符号，再次这种语言符号构成艺术世界，随后这一世界有其独特的构成法则，最后这一世界有其不同于现实的最高追求”^[15]。总体上讲，《词语诗学》的选词与安排是沿着“心理→语言→艺术→法则→境界”的诗学秩序，动态而循环地把对词语的历史溯源与现实的疑难辨析结合起来，即可作为文学关键词的诗学阐释，也可理解为对词语的诗意化运思，刘恪力图通过一个个“词语”织成一张关于个体、社会、文化、历史以及生活的大网，让人不断地感受到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化合而生的奇特效应。高兴认为，从词语的“日常状态”到“生命体验”再到“专业的学术考古”，刘恪把每一个词语集中在知识、审美和考古这三个维度，从而从词语的

本质追问走向人生诗意的审美。^[2]胡继华也认为,刘恪的《词语诗学》显示出了精彩的“体验之维”“思辨之维”“叙事之维”:首先,重体验是先锋诗学的重中之重,刘恪生命体验的幅度和诗学追问的强度正是体现在他对“先锋”的持守中,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城与市》使先锋实验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其次,从技巧转向词语,从先锋转向诗学,是一场美学退隐运动,这是刘恪作为作家的一种自律诗学;再次,其词语诗学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的叙事形态,给我们演示词语之动象,讲述词语之血缘。质言之,刘恪“持守文学精神,更兼具怀疑意识,一路从词语诗学、小说语言美学、小说语言历史探究下来,以审美的静观建构出词语诗学系统”^[3]。

在写作词语诗学的同一时间,刘恪还出版了关于“创作与理论”的自选集《耳镜》(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作者以通感的手法,以耳为镜像之意,第一部分收录10篇短篇小说,第二部分收录16篇散文,重点是作为理论研究的第三部分——谈理论阅读(波德里亚、波伏娃、福柯、利奥塔、杰姆逊等)、谈文学阅读(博尔赫斯、格里耶、西蒙、史蒂文斯等)、谈现代绘画艺术(吉奥·契里河、毕加索、霍克尼、达利、德尔沃等),也谈国际超文本写作、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问题等,是他多年来理论阅读之后的重要思考。之后,刘恪便全身心投入小说美学的写作中。期间,他曾在2011—2012年为研究生课程写过一本讲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包括悖论、象征、隐喻、经验、身份等十多个词条,部分内容曾在他的博客上刊登过。

三、两部语言研究:从“语言美学”到“语言史”,建构前瞻性理论

刘恪在完成《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词语诗学》等研究之后,便开始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了系统研究。《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从美学角度来讨论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这既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个人探究;也可以说,既是语言本体论的研究,也是语言分析方法论的研究,贺绍俊称之为“前瞻性的理论建构”。

这并不是说在刘恪之前没有人做文学的语言研究,20世纪西方学术界在小说语言研究方面是卓有成效的:1961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从叙事语气与叙事语调着手提出叙事语言,揭开了西方现代小说语言理论研究的大幕;1977年英

国语言学家罗杰·福勒的《语言学与小说》,引入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指出文本是由一系列的单句构成的,由此提出“所谓小说的技巧就是语言的技巧”这样一个观点;1981年美国文艺理论家费兰的《来自语词的世界》,从文本学角度研究小说语言,分析了五种小说语言理论对不同文本的影响与效果,以及语言对小说的多元作用;1998年南非语言文学教授布林克在《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中提出,小说叙事即语言的表现,其主要观点是语言本质上就有一种叙事化倾向,他用这个观点对欧美15部经典文本进行了分析,创造了一种精准独特的小说语言研究方式。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在小说语言研究领域是有很大进展的。但国内对文学语言做本体研究的起步则比较晚,大约是从19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倡导文学的言语研究,其中较早的是鲁枢元的《超越语言》,王一川的《语言乌托邦》《汉语形象美学引论》;稍后有唐跃、谭学纯的《小说语言美学》对小说语言的审美风格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其重点研究的是小说语言的呈现形式、情感表达方式、语言形象特点等问题,同一时期还有吴篮玲的《小说语言美学》探讨了小说形式的表述特征,并从小说的诸元素讨论语言具有的风格与审美。在世纪之交的20年里,小说语言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似乎达到一个小高潮,涌现了一批专著和论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研究、文学语言美学研究、小说语言研究三个方面,在文学语言特征上也达成了某些共识。

贺绍俊认为,刘恪是把文学语言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来研究的,既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构,也要试图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的文学语言系统。^[4]也可以说,刘恪想要做的是全面的系统的本体研究,同时融入自己创作与阅读的个体经验。^[5]《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开篇以隐喻的方式诗意地道出语言的本质,用“镜像”“契约”两个词语指认语言的存在方式与功能:①语言是事物的镜像,即“语言即事物”;②语言作为主体,它和世界万物守约,即“契约是语言本身”;③在镜像与契约之间,语言不属于任何东西,它靠自身的特征显示美丽——“语言是一个精灵,它会飞翔,永远都会自由地追踪目标,它只要发现了美,便会驻足下来,语言和美的事物一同绽放光芒,这才有了语言的美学。”^[6]²³三种断言看似悖论又深度自洽,这是刘恪心仪的写作实践,随即产生或精心设置的美学效果,呈现或揭秘语言自身的美。

《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共十章,可分为两大版块。前三章为第一个版块,前三章讨论的是语言的

“性质”“形式”与“建构”。语言的“性质”关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状况。20世纪以来,现代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与整个时代的语言学理论、哲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文学理论、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真正透彻地认识和理解诸种新的小说形态(如精神分析小说、荒诞小说、元小说、神话原型小说、后现代小说等)在中国现代时期之所以会产生的根本因由,就必须郑重思考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究竟有何特点,这是对语言美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必然基点。语言的“形式”一章,是介绍语言形式特征的诸要素,包括语音形象、语法形象、修辞形象、文体形象,目的在于通过语言形象的形式因素来探讨语言的发生机制、构成原则及形象的意义来源,为的是深入词语内部查看文学语言形式是如何变化的,即语言在无意识、意识、思维、文化上是如何发生的,也是为了寻找后设性语言、元语言、生成转换语法和言语行为理论对当下写作具有的可能性作用。语言的“建构”一章,是从语言与大脑的关系、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生成一转换语法、社会文化的建构、无意识建构等方面来探讨语言形象的构成,就是从生物学角度、语言哲学、语言的深层结构、个体心理学等更深阔的学理基础上,梳理构成现代文学语言的复杂机制的各种复杂元素。其目的是用更广阔的视角多侧面地透射语言的内核,以捕捉那些有可能一直被忽视或无视的(并非无足轻重的)话语活动以及它们可能蕴含的力量。关于此问题,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多是把重心放在西方小说语言、文言小说语言或话本语言的影响上,偶尔也会有些文章涉及对语言哲学、个体心理学等方面进行文本语言的分析,但几乎无人像刘恪这样深入生物学及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去探寻各类小说语言现象中秘藏的玄妙。这三章内容具有通识性,为后学者提供进入专业或职业领域的准入知识体系,让我们既能依此为基石建造自己学术的知识体系,亦可用其作为基本工具去实践任一文学文本的解析。

第二个版块共有七章,是用专题方式对语言美学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分别是“语感”“语式”“语象”“语调”“语体”“情感”“文化”。前五种是对语言因素进行切分式研究,后两种属于语言的隐在要素。前者不易操作,后者容易引发争议。刘恪深谙此研究的艰难,但仍要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他自己的说法是受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启发,本维尼斯特提出一种文学语言的主体观:“人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主体。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在

其作为存在的现实中,奠定了‘自我’的概念。”^{[7]293}也就是说,主体性是在语言的比照中才强烈地显现,每个人说话都会无意识地自立一个“我”的主体位置。后来,这个观点在西方形成了一条形式主义批评的河流,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无一例外地都将文学语言置于本体论位置,国内创作界和学术界也一再表明:语言是文学的生命,然而一旦进入实践,很多研究者便陷入意识形态的主导中,把目光聚焦在内容、材料、思想上,而把语言形式的问题撇置一边。刘恪想要扭转一下这种风气,就从语言形式进行细化研究,在他看来,形式不单单是一个容器、框架、一个装载的工具,形式也是一种内容、一种意义。对于艺术来讲,形式是艺术本身的显示,甚至可以说形式就是艺术本身,因为当我们承认一个事物是艺术品时,首先是从形式上对它进行判断的。刘恪坚信,文学是通过语言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文学的首要形式是语言的形式,是语言生产形象的形式,是语言构成结构的形式,文学形式是语言形式的具体化。既然文学是一种语言形式的生产,那么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其实就是对语言形式的分析,自然就应该从语言的语式、语调、语感、语象、语体等构成因素进行分析。他坚信,研究只应立足于此。

在这本书的章节设计中,原本最后还有一章“现代小说语言史”,写到五万多字时,刘恪发现要写的内容还有很多,于是就重起炉灶写了一部语言史,即《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把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分成了四大类: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与文化语言。他个人最得意的地方是: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特征、抒情特征、社会革命特征等常见的语言现象外,发现还有一种更值得深入研究的“自主语言”,他发现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早期,就有很多作家有自觉追求语言主体性的意识,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的言语形式,实现了语言风格化的追求。如郁达夫、滕固、章克标、叶鼎洛、倪贴德、胡山源、林如稷、陈翔鹤、徐舒、白尘、邵洵美、陶晶孙、张资平、叶灵凤、黑婴、琦君、林徽因、芳信、袁犀、爵青、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徐霞村等人都在写作中自觉地进行过语言本体的探索,他们用文本构成了多样的自主语言现象:唯美语言、新感觉语言、元语言、碎片语言、戏仿语言、互文语言、间离语言、荒诞语言、象征隐喻语言、超现实语言、意识流语言、幻觉语言、悖论语言等等。甚至可以说,正是大家在创作中抱有自觉追求语言主体性的意识,才使

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本质上的主观主义与抒情主义的特点。此外,这些背离公共社会语言的言语,通过对日常传统语言的背离完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先锋性。

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中,刘恪提出“自主语言”并对其脉络及样态进行美学勘探,他把先锋实验语言也归结到其中,形成历史的小说语言链条,进而用来激发思考各种语言类型在当下小说写作中的意义与可能性。这样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实属首创,他激发了我们从更本质的层面去思考文学史中的一些现象。比如,在跟随理解现代作家对语言自主性追求的过程中,或从现代作家探索语言的方式和取得的结果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先锋写作应该说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第一个有明确标志的是新感觉派,然后是唯美主义,《绿》杂志的文本也是一个标记;到了1930—1940年代,爵青的小说《遗书》《废墟之书》,徐訏的《彼岸》,施蛰存的不少心理小说……就当时的语境来讲都是先锋的。以此为准绳,我们可以找寻到很多具有探索性质的文本,然后梳理出一条现代小说先锋写作史。

阅读《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这部论著,我个人更在意的是,作者以语言史来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与国内主流文学史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首先是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中的乡土语言、社会革

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诸种语言类型进行细致的发生学机制上的探源,同时尽情地引用诸多小说文本对各种语言现象的样态进行见微知著的分析,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小说家所袒露出的真诚,不管是赞许还是批判、哀叹或失落,都是那样的真切。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从未放弃对任一语言现象在当今写作现场所可能居于的位置进行测量,该种研究方式——“留给过去的地位同样是一种给未来让出地位的方式。”^{[8]78}

参考文献:

- [1]刘恪.词语诗学·复眼[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2]先锋的姿态:刘恪诗学论著与当前诗学走向研讨会纪要[J].山花,2009(3).
- [3]胡继华.崇高的秘密:刘恪的词语诗学三维探测[J].中州大学学报,2014(1).
- [4]贺绍俊.前瞻性的理论建构[J].云梦学刊,2014(2).
- [5]李海英.把文学的还给文学[J].云梦学刊,2014(2).
- [6]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7]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M].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8]米歇尔·德·塞尔多.论史学研究活动[C]//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Pioneer, as a Fictional Literary Dream

——On Liu K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his Theoretical Monograph

LI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 China)

Abstract: While carrying out literary creation, Liu Ke, a contemporary novelist, was deeply engaged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odern fiction. First, he explored the secrets of modern fiction and avant-garde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vel techniques. And then following the poetic order of psychology, language, art, law and realm, he made a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key words with individual experience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esthetics, he discussed the emergency, progress, phenomenon,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ese novel in the past 100 year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current fiction. For years he had been practicing forward-look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had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Liu Ke; novel technique; poetics of words; language aesthetics

沿黄城市群绿色发展问题研究:效率测度及空间演化

赵健¹, 卓奇昕²

(1. 河南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基于绿色发展内涵, 构架了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并借助 Super-SBM 模型测度了沿黄城市群 2010—2020 年绿色发展效率, 研究了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化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 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是有效率的, 后期在波动中有所回升, 低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 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在大部分年份是显著相关的, 整体变化趋势为“LL”集聚空间分布。黄河流域应当重视核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发挥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和辐射周边城市, 以促进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

关键词:绿色发展; 效率测度; 空间演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5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31-07

“黄河宁, 天下平”,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先后对宁夏、甘肃、河南、山西等地提出了黄河流域治理的目标战略。党的十九大又提出我国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为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10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黄河保护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 流域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数量占比一半以上, 长期以来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加工加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粗放型发展导致流域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越来越突出。因此, 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黄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环节, 也是新时代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21年10月颁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了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黄河流域城市群, 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龙头和关键环节, 核心城市则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带动辐射作用。而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作用重要。黄河流域城市群主要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因此, 构建七大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格局, 对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和转变发展方式问题的考虑, 本文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问题, 通过对黄河流域相关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分析七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化及空间分布特征, 以期可以较为全面把握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黄河流域

收稿日期:2022-12-1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精准扶贫视阈下河南省普惠金融的供求机理、耦合效应与绩效评估研究”(2020-YYZD-09); 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绩效评价及模式创新研究”(2020BJJ048)

作者简介:赵健(1977—), 女, 河南新野人, 经济学博士, 河南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绿色经济与农村金融。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绿色发展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文献看,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绿色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绿色发展效率问题。

其一,关于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凸显和环境问题的出现,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相较于传统发展观,绿色发展充分协调物质文明和生态建设的关系,是对过度消耗环境的发展方式的变革。在研究方面,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衔接,发展形式主要体现在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的概念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 1966 年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该学者提出循环经济、避免单纯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1972 年《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起人们关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传统发展伦理的反思。1987 年联合国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产生威胁”,体现了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而绿色经济作为术语出现在英国环境经济学家 David Pierce^[1]《绿色经济的蓝图》(1989)一书中,在随后不同国家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绿色发展围绕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以及低碳经济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绿色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评价以及政策评估。2005 年,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提出“绿色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增长。2011 年 OPEC 将绿色发展定义为协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关键。此后,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不断形成共识,不同国家付诸实践。王玲玲、张艳国^[2](2012)将绿色发展分解为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四大子系统。绿色发展的内涵虽然较为广泛,但都强调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契合。

其二,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李大奎、陆迁、高建中^[3](2023)利用陕西省和河南省 8 个县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区域品牌生态系统对特色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唐一帆、吴波^[4](2022)构建了 PVAR 模型,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强度较低。马海涛、王柯文^[5](2022)利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研究了城市技

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两者呈“U”形关系。吴传清、孟晓倩^[6](2022)则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实施有差异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刘继兵、田韦仑、张驰等^[7](2021)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视角研究了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基本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借助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其三,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效率测度、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上。者彩虹、韩燕^[8](2022)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了黄河流域 96 个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时空差异特征,并用 GMR 模型剖析了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绿色发展效率区域间不平衡特征显著,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安梦天、何爱平^[9](2022)同样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了中国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了政府经济发展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过度追逐经济增长,对绿色效率提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睢党臣、张扬^[10]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了沿黄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以空间误差模型(SEM)实证研究了城市经济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研究认为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U”形特征,且目前大部分城市经济集聚并未过拐点。付金朋^[11](2022)以江苏省和辽宁省 27 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三阶段 DEA 模型测度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特征。田亚鹏、柳晓艺^[12](2021)以陕西省为样本,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其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并利用 Global - Malmquist 指数对历年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在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大部分文献研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魏和清、李颖(2018)^[13]运用 ESDA 的方法对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等指数呈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并呈现“高一高”“低—低”空间集聚态势。王婧、杜广杰^[14](2020)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发现样本期内高水平城市能带动其邻近地区使得空间分异呈现集聚分布模式。陈闻君、徐阳、张旭东^[15](2021)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 2012—2018 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发现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格局分化明显,高值区域从散点到呈“U”形分布再到连片分布。从这些研究看,一般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 DEA 对绿色

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在考虑空间分布特征时,则采用ESDA方法。

综上所述,有关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多基于全国省域层面和全国城市层面,而对黄河流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相对较少。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样本,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并借助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研究绿色发展效率空间自相关分布特征。

二、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借鉴现有文献,本文界定绿色发展的内涵为:在一定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下,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共赢的发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本文选择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来衡量效率值。在考虑劳动、资本、技术、资源传统经济发展要素的基础上,将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全面分析绿色发展水平。

(一)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方法

本文假设生产规模报酬可变,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非角度非径向的Super-SBM模型。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 m 种投入、 p 种期望产出和 q 种非期望产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的分式规划形式如式(1)所示。

$$\rho = \min \frac{1 + \frac{1}{m} \sum_{i=1}^m \frac{s_i^-}{x_{ik}}}{1 - \frac{1}{p+q} \left(\sum_{r=1}^p \frac{s_r^+}{y_{rk}} + \sum_{t=1}^q \frac{s_t^{b-}}{b_{rk}} \right)} \quad (1)$$

$$\text{s.t. } x_{ik} \geq \sum_{j=1, j \neq k}^n x_{ij} \lambda_j - s_i^-$$

$$y_{rk} \leq \sum_{j=1, j \neq k}^n y_{rj} \lambda_j + s_r^+$$

$$b_{tk} \geq \sum_{j=1, j \neq k}^n b_{tj} \lambda_j - s_t^{b-}$$

$$1 - \frac{1}{p+q} \left(\sum_{r=1}^p \frac{s_r^+}{y_{rk}} + \sum_{t=1}^q \frac{s_t^{b-}}{b_{rk}} \right) > 0$$

$$\lambda_j \geq 0, s_i^- \geq 0, s_r^+ \geq 0$$

$$i = 1, 2, \dots, m; r = 1, 2, \dots, p+q;$$

$$j = 1, 2, \dots, n (j \neq k)$$

λ_j 是权重向量, i 表示投入变量的个数,取值区间 $[1, m]$, r 表示期望产出变量的个数,取值区间为 $[1, p]$, t 表示非期望产出变量的个数,取值区间为 $[1, q]$ 。 s_i^- 、 s_r^+ 、 s_t^{b-}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 ρ 是目标效率值, $\rho \geq 1$ 时,表明该地绿色发展效率相对有效。

(二)样本选择

根据我国“十三五”规划发展纲要,黄河流域城市群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因此本文选取以上7个城市群进行研究。

在不同城市群内部确定上,本文借鉴王家明、余志林^[16](2021)研究成果,基于数据可得性,并考虑城市和黄河的关系和城市自身发展水平,选取34个沿黄城市,并将其划分为7个城市群,分别为:兰西城市群,包括兰州、西宁、白银和定西;呼包鄂榆城市群,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和榆林;宁夏沿黄城市群,包括银川、固原、石嘴山、中卫和吴忠;关中平原城市群,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和天水;晋中城市群,包括太原、吕梁、晋中、忻州和阳泉;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和晋城;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济南、聊城、淄博、东营和滨州。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公报,部分缺失值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三)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内涵,将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四大技术要素纳入投入指标体系,二级指标为全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用电量和供水总量、科学技术财政投入。考虑本研究对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为经济与生态实现协调共赢,本文选择各市的实际GDP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期望产出,实际GDP根据不同年份的GDP指数,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以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工业烟尘(粉)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

指标	变量	变量含义	单位
投入指标	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劳动力	全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	万人
	技术	科学技术财政投入	万元
	资源	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期望产出	GDP	以2010为基期计算实际GDP	亿元
	绿化覆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吨

来源: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

(四)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结果

利用DEA-SOLVER软件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群2010—202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具体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黄河流域城市群 2010—2020 年绿色发展效率

城市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	晋中城市群	兰西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	宁夏沿黄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2010	1.047	1.043	1.031	1.039	1.029	1.039	1.026
2011	1.073	1.074	1.064	1.130	1.078	1.178	1.111
2012	1.246	1.170	1.026	1.023	1.019	1.068	0.922
2013	1.031	1.022	1.064	1.035	1.031	1.037	1.007
2014	1.210	1.158	1.098	1.058	1.098	0.951	1.048
2015	1.064	1.078	1.069	1.017	1.052	0.983	1.051
2016	1.052	1.062	1.115	1.067	1.054	1.044	1.015
2017	1.023	1.070	0.992	1.036	1.041	1.054	1.016
2018	1.127	1.108	1.178	1.113	1.059	1.057	1.040
2019	1.210	1.158	1.098	1.058	0.988	0.951	1.048
2020	1.127	1.108	1.178	0.988	1.059	1.057	1.039
均值	1.110	1.096	1.083	1.051	1.046	1.038	1.029
排名	1	2	3	4	5	6	7

三、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一) 静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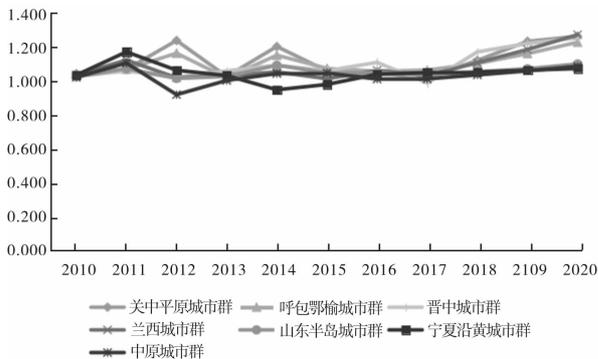


图1 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 2010—2020 年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值变化趋势

从区域角度看,2010—2020 年间绿色发展效率的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最高的是关中平原城市群,均值为 1.126,效率值最低的是中原城市群,均值为 1.036。

从整体水平来看 2010—2020 年间,7 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波动较大,其中 2010—2015 年绿色发展效率值持续波动,2015—2020 年在波动中上升。2010—2018 年期间,均值最高值 1.101 出现于 2011 年,最低值 1.032 出现于 2013 年,绿色发展的效率均值为 1.065。说明 2010—2018 年绿色发展效率偏低,2019 和 2020 才有较大幅度提升。近几年国家从全流域和整体生态系统谋划黄河流域科学布局,坚持系统治理,大大提升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比如晋中城市群是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区域,这两年持续将 90% 的林草项目倾向于黄河流域,稳步推进生态建设。更多城市对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专门部署,积极探索资源型城市发展机制。

按照经验解释,绿色发展效率值大于 1 可视为

有效率,小于 1 视为无效率,说明研究期间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整体处于有效率的水平。2010—2015 年持续波动效率值不稳定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域本身资源型城市较多,“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仍然以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的重工业为主。“十三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各个城市群也开展积极有效的探索。例如宁夏准确把握发展定位,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积极构建清洁能源、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现代产业体系;河南“四水同治”战略取得成效;山西省加快推进传统重工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山东省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因此,黄河流域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值开始波动上升。

(二) 空间演化分析

1. 演化指标

为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演化特征,本文选择莫兰指数来衡量,该指标是最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指标,反映研究区域内空间临近单元整体相似程度。莫兰指数 Moran's I 取值范围为 $[-1, 1]$,大于 0 表示正相关,取值越大,空间自相关特征越显著;小于 0 表示负相关,取值越大,空间差异越大;等于 0 表示不相关。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I = \frac{n}{S_0}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z_i z_j}{\sum_{i=1}^n z_i^2} \quad (2)$$

其中 z_i 是要素 i 的属性与其平均值 $(x_i - \bar{x})$ 的偏差, $w_{i,j}$ 是要素 i 和 j 之间的空间权重, n 等于要素总数, S_0 是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 $S_0 = \sum_{i=1}^n \sum_{j=1}^n w_{i,j}$

对于 Moran's I 用统计量 Z 来检验区域整体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Z = \frac{1 - E[I]}{\sqrt{V[I]}}$$

其中: $E[I] = -\frac{1}{(n-1)}$, $V[I] = E[I^2] - E[I]^2$

局部莫兰指数描述了区域局部与邻近单位之间的联系,借助 Moran 散点图表现,局部 Moran's I 指数公式如式(3)所示:

$$I_i = \frac{(x_i - \bar{x}) \sum_{j=1}^n w_{i,j} (x_j - \bar{x})}{S^2} \quad (3)$$

2. 全局空间演化分析

有关莫兰指数的计算全部在 Stata 中运行,黄河流域城市群 2010—2020 年绿色发展效率的全局 Moran's I 值,如表 3 所示。在正态分布假设下,95% 的置信区间双侧检验值临界值为 ± 1.96 ,结果显示,2010、2011、2012、2014、2015 年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的临界值分别为 2.843、3.205、4.138、-3.027、3.962,全局 Moran's I 值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年份未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大部分年份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空间自相关。2010—2012 年、2015、2019—2020 年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向聚集效应,即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临近其他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临近其他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2013 和 2014 年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负向聚集效应,即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临近其他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低

的城市临近其他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

表 3 莫兰指数计算结果

年份	全局莫兰指数 Moran's	标准差 $Sd(I)$	Z 值	P-value
2010	0.241	0.095	2.843	0.002
2011	0.278	0.096	3.205	0.001
2012	0.345	0.091	4.138	0.000
2013	-0.251	0.102	-2.157	0.016
2014	-0.314	0.094	-3.027	0.001
2015	0.349	0.096	3.962	0.000
2016	0.054	0.110	0.769	0.221
2017	0.022	0.047	1.131	0.129
2018	-0.012	0.108	0.166	0.434
2019	0.239	0.124	2.896	0.007
2020	0.311	0.099	3.117	0.015

3. 局部空间演化分析

由于全局莫兰指数无法对不同城市绿色发展与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因此在计算全局莫兰指数的基础上,分别计算 2010、2011、2012、2014、2015 年的局部莫兰指数,并绘制 2010—2018 年 34 个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散点图。^①局部莫兰散点图的四个象限归为四种空间分布模式:(1)第一象限 H-H 型,即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被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包围;(2)第二象限 L-H 型,即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被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包围;(4)第三象限 L-L 型,即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被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包围;(3)第四象限 H-L 型,即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被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包围。根据散点图,可看出部分年份沿黄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莫兰散点图变化特征,如表 4 所示。

表 4 部分年份沿黄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莫兰散点图变化

集聚类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5 年
HH	固原、白银、开封、焦作、郑州、东营、济南(7 个)	阳泉、忻州、榆林(3 个)	忻州、滨州(2 个)	银川、中卫、太原、新乡、焦作、渭南、咸阳(7 个)	吕梁、呼和浩特、包头、焦作、开封、郑州、固原、中卫、石嘴山、西安、渭南、白银、西宁、东营、洛阳、天水(16 个)
LL	晋城、滨州、新乡、宝鸡、咸阳、渭南、榆林、兰州、西宁、吴忠、中卫(11 个)	太原、晋中、鄂尔多斯、呼和浩特、淄博、聊城、滨州、东营、郑州、开封、新乡、焦作、西安、宝鸡、咸阳、白银、银川、中卫、固原、石嘴山、渭南(21 个)	太原、晋城、济南、聊城、东营、洛阳、新乡、焦作、西安、宝鸡、咸阳、渭南、榆林、白银、天水、西宁、石嘴山、吴忠、固原(19 个)	包头、兰州、淄博、石嘴山、东营、聊城、晋城、滨州(8 个)	晋城、淄博、聊城、新乡、榆林、兰州(6 个)
HL	阳泉、呼和浩特、包头、淄博、石嘴山(5 个)	包头、兰州(2 个)	郑州、银川、中卫、吕梁、开封、定西、呼和浩特(7 个)	呼和浩特、定西(2 个)	晋中、咸阳、阳泉、吴忠(4 个)
LH	太原、忻州、晋中、吕梁、鄂尔多斯、聊城、洛阳、西安、天水、定西、银川(11 个)	晋城、吕梁、济南、洛阳、天水、定西、西宁、吴忠(8 个)	阳泉、淄博、鄂尔多斯、晋中、包头、兰州(6 个)	阳泉、晋中、忻州、吕梁、鄂尔多斯、济南、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宝鸡、榆林、白银、天水、西宁、吴忠、固原(17 个)	鄂尔多斯、宝鸡、忻州、太原、济南、银川、滨州、定西(8 个)

由表 4 显示,2010 年位于 HH 象限有 7 个城市,其中 3 个城市位于中原城市群,2 个城市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位于 LL 和 LH 象限的城市各有 11 个,表明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被低值或高值包围。其

中晋中城市群包含 4 个城市,宁夏沿黄城市群包括 3 个城市,关中平原城市群包括 5 个城市,呼包鄂榆城市群包括 2 个城市,兰西城市群包括 4 个城市,呈现出绿色发展效率值低的地区多分布在西部城市群

的特征。尤其西部城市群在 LL 集聚的特征明显。

2011 年 HH 象限城市缩减为 3 个,相较于 2010 年 LL 象限的城市大幅增长,达到 21 个,依然集中在西部城市群,并呈现部分高绿色发展效率地区变成低绿色发展效率地区的现象,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转为低绿色发展效率地区。HL 和 LH 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可以看出在空间溢出效应扩散效应的影响下,城市之间绿色发展效率差距缩减。

2012 年 HH 象限的城市继续缩减,位于 LL 象限的城市有 19 个,与 2011 年基本持平。LL 集聚出现在呼包鄂榆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但相较于 2011 年,原有的 LL 象限的城市如晋中、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银川、中卫、淄博变动至高低集聚的象限,滨州变动至高高集聚象限,说明在空间溢出效应下,这些城市所在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格局有所优化。

2014 年全球莫兰指数为负,呈现出负的空间相关性。其中 19 个城市位于 LH 象限和 HL 象限,表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分布极化现象严重。原因可能在于各城市政府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尤其西部城市群的城市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and 生态保护,由原来的低绿色发展效率向高绿色发展效率的转变,更多城市被高绿色发展效率城市包围。

2015 年最明显的变化是 HH 象限城市增加,呼包鄂榆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内部呈现出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地区聚集分布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城市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增加;另一方面,受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城市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空间分布格局有所改善。

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HH 象限的城市数量减少后增加,沿黄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逐渐优化向 HH 分布优化,说明城市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区域趋于均衡,最终实现高绿色发展效率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存在的问题是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格局不稳定,即城市在不同象限内波动,说明在研究期间城市绿色发展极化效应较弱,扩散效应使得要素在不同城市之间调整。总体而言,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格局较好,西部城市群空间分布格局较差,但受扩散效应的影响,西部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得到提升,空间分布得到优化。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内涵,构建了包括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四大技术要素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测度了黄河流域城市群 2010—2020 年绿色发展

效率,并借助空间自相关研究了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是有效率的,后期在波动中有所回升,低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

(2)通过对莫兰指数的测度,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 2010—2020 年中有 8 年呈现出空间相关关系,并在 2010—2015 年间逐渐向高效率集聚优化。

为提升黄河流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重视资源投入优化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对于黄河流域而言,要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加强全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学合理分配生活和生产用水,推广形成循环利用节约用水的生活方式;要加大工业污染协同治理和城市生活污染治理,强化环境管制,提升工业节能标准,加大对污染的监测力度,促进企业向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发展模式转变。不同城市群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依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上中下游有不同的战略布局,上游城市群在水源涵养方面有重要作用,在绿色发展上要尽量降低人为干预;中游有水土保持的主要任务,要将其贯穿在城市建设之中;下游在建设绿色生态走廊上发挥重要作用,强化环境污染系统性治理,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降低“两高一剩”行业的比重。

其二,提高城市群区域绿色发展效率,重视技术创新和应用在节能减排的作用。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要把增强生态保护的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解决水土保持、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工业污染治理等技术难题。对于各个城市群而言,上游兰西城市群要在落实生态保护的同时,发展绿色导向、创新导向的新兴产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中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等中游城市在发展的同时要将资源约束贯穿始终,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新兴产业,防治污染。下游山东半岛城市群要建设下游生态走廊,加大农业工业节水力度。

其三,重视区域协同和均衡发展。绿色发展有空间溢出效应,并能够带动和辐射周边城市,从而促进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效率值较低的城市,应当把握绿色发展问题所在,并加强对产业升级的引导,重视对污染物的处理和排放。在因地制宜制定地区绿色发展模式的同时,借鉴高效率地区发展经验。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当发挥带动作用,加强与低效率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将区域战略合作作为整体目标,推动产业转移。因而,对于各城市群而言,要做好产业结构优化,强化节能减排,

积极引入先进科技和管理模式发展循环和低碳经济,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对于中西部城市群,要在主体功能区的定位下,制定符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项目,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由于黄河流域高效率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辐射作用不明显,且中西部城市群多呈现出低绿色发展效率聚集的特征,黄河流域城市群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移的契机,根据地区状况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黄河流域整体绿色发展。

注释:

①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出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若有需要,请联系作者,备案。

参考文献:

- [1] 大卫·皮尔斯. 绿色经济的蓝图 [M]. 何晓军,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7.
- [2] 王玲玲, 张艳国. “绿色发展”内涵探微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2(5): 143 - 146.
- [3] 李大垒, 陆迁, 高建中. 区域品牌生态系统对特色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 - 11.
- [4] 唐一帆, 吴波. 财政支农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吗: 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6): 46 - 54.
- [5] 马海涛, 王柯文.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2, 41(12): 3287 - 3304.

- [6] 吴传清, 孟晓倩. 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研究 [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6): 37 - 47.
- [7] 刘继兵, 田韦仑, 张驰, 等.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 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J]. 技术经济, 2022, 41(9): 95 - 108.
- [8] 者彩虹, 韩燕.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1): 87 - 92.
- [9] 安梦天, 何爱平. 欲速则不达: 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10): 50 - 64.
- [10] 睢党臣, 张扬.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5): 217 - 227.
- [11] 付金朋. 空间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基于辽宁省与江苏省的经验分析 [J]. 城市问题, 2022(8): 62 - 72.
- [12] 田亚鹏, 柳晓艺. 基于超效率 SBM - DEA 和空间分析的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1, 36(8): 56 - 65.
- [13] 魏和清, 李颖. 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及地区差异探析: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J]. 当代财经, 2018(10): 3 - 13.
- [14] 王婧, 杜广杰.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0, 41(12): 11 - 27.
- [15] 陈闻君, 徐阳, 张旭东.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J]. 生态经济, 2021, 37(2): 41 - 47, 75.
- [16] 王家明, 余志林. 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10): 47 - 5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long the Yellow River: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Evolution

ZHAO Jian¹, ZHOU Qixi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measur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long the Yellow River from 2010 to 2020 with the help of Super - SBM model, and studi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idering the undesired output, the overall gree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effici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it picks up in the later period due to fluctuations. The inefficient cit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in most years, with an overall trend of “LL” cluster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riving and radiating role of core cities, and exer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green development to drive and radiate surrounding c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egion.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measurement; spatial evolution

基于 DEMATEL - ISM 的自贸区 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杨雪, 姚雨佳, 宋爱峰*, 潘朗暄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与因素间关系探究对自贸区深化开放至关重要。基于文献分析和实际访谈,通过德尔菲法确定了28个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采用 DEMATEL - ISM 选取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然后借助解释结构模型对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进行划分,构建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多层次递阶模型。结果表明: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是直接因素、中间因素与根本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制度创新、产业协同集聚、地区经济水平、创新能力、金融便利化是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DEMATEL - ISM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6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38-06

一、引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和谋划自贸区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在全国部署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验点分布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优化及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节点,自贸区的设立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产业开放,自贸区的产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地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单纯取决于资源禀赋和技术状况,而更多取决于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对本国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2]。

近年来学者们对自贸区的研究热点涉及自贸区的顶层设计、自贸区的发展现状及困境以及对自贸区的经济效应研究。邓伟等通过梳理各自贸区总体

方案认为“原则上可再试点”具有特殊的法律价值与重要意义,但存在政策范围不确定、法律效力认定不便利、税收政策体系不协调的问题^[3]。郭若楠采用文本分析对自贸区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制度创新协同发展、产业发展协同机制、深化市场效率管理机制、风险防范机制均有待构建和加强^[4]。刘婷从营商环境、产业基础、创新活力、制度创新四个方面对江苏省自贸区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5]。田云华等从对标国际高水平自贸区差距、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服务业开放、金融领域服务开放、原产地规则与自贸区的适用性五个方面分析RCEP背景下我国自贸区发展现状及建设前景^[6]。关于自贸区的经济效应研究,学者们对自贸区的发展对企业绩效^[7]、制造业创新投入^[8]、城市创业活跃度^[9]、经济增长质量^[10]、城市全要素生产率^[11]的影响效应进行探究,研究方法多采用实证研究、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广义矩阵评估等。目前学者

收稿日期:2022-12-07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商务厅资助项目:“河南自贸区实验区2.0版背景下深化产业开放发展和制度创新研究A”(2022-ZM-T06-01);河南省水资源安全与清洁能源协同管理创新型科技团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杨雪(1966—),女,河南光山人,河南省特聘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通信作者:宋爱峰(1988—),女,河北威县人,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低碳经济等。

们对自贸区的研究主要关注自贸区的发展影响效应,对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前因变量的研究较少,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探究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对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识别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采用 DEMATEL - ISM 方法构建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及中心度并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借助 Matlab2018b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建立多层次递阶解释结构模型,明确各因素的层级关系以及重要程度,并根据结果提出建议,为更好地促进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提供指导。

二、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识别是研究的第一步,目前学者关于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张华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产业提升、税收政策、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对自贸区发展的影响^[12]。陈晓莹识别出影响福建自贸区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有利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因素,不利因素包括片区经济发展不协同、自贸区竞争压力^[13]。刘丹采用 DEMATEL 方法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自然环境四个方面探究对福建自贸区港口物流中心发展的影响^[14]。曾婷采用熵权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地区的税收情况、空间结构、地区生产水平、政府规模、区域物流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会影响经济开放程度^[15]。张应武等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从开放基础、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开放潜力四个方面构建开放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16]。高增安认为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保障、国际开放度、服务环境等影响自贸区的设立^[17],后又运用归纳法与多案例对比研究法确定区位特点、管理模式、功能定位是内陆自贸区发展的影响因素^[18]。倪外认为自贸区的经济本质是服务经济,以实现全球或区域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从目标指向、开放程度、功能培养和环境塑造四个方面构建自贸区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19]。张绍乐构建了包括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公共政策环境、辐射带动效应的自贸区综合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指标评价体系^[20]。

通过梳理自贸区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相关文献,学者们仅探究各因素对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影响,缺乏对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识别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是分析中部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平台,以

“自贸区”“自贸区发展影响因素”“产业开放”“产业发展”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根据自贸区发展的过程结合文献综述研究,在层次分明的原则下,从区位特点、开放程度、经济基础、政策基础、环境基础、技术基础六个方面,选取 28 个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因素,建立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见表 1。

三、基于 DEMATEL - ISM 的模型构建

本文将 DEMATEL 与 ISM 相结合,通过 DEMATEL 获得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并确定关键因素,再借助 ISM 厘清关键影响因素间的层级关系,绘制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多层递阶结构图。

(一) 建立直接影响矩阵 A

根据表 1 构建的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邀请 8 名从事自贸区发展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其中 4 名专家来自高校、4 名来自自贸区企业管理层。对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程度,按没有影响(0 分)、轻微影响(1 分)、一般影响(2 分)、较强影响(3 分)、强烈影响(4 分)等 5 个级别进行打分以表示因素间的影响程度,得到 8 个初始直接影响矩阵。为了减小专家打分的个体差异,将 8 个初始直接矩阵取平均值后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构建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A,见表 2。

$A = [x_{ij}]_{n \times n}$,其中 $x_{ij}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i \neq j)$ 表示因素 x_i 对 x_j 的影响程度;若 $i = j$,则 $x_{ij} = 0$ 。

(二) 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B

对直接影响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规范直接影响矩阵 B。本文采用行和最大值法进行归一化,即通过计算直接影响矩阵中各行的和,找到其中的最大值,直接影响矩阵中的各元素除以该值得到归一化后的规范直接影响矩阵 B,计算公式如下。

$$B = \frac{x_{ij}}{\max(\sum_{j=1}^n x_{ij})} \quad (1)$$

(三)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中心度和原因度

综合影响矩阵反映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各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累计效果, I 为单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中各行之和为影响度 f_i ,各列之和为被影响度 e_i ,中心度 M_i 反映影响因素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原因度 N_i 表示因素在指标体系中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T = B(I - B)^{-1} \quad (2)$$

表 1 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

维度	影响因素	定义
开放程度	贸易便利化	为促进开放而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流通
	投资便利化	为扩大对外开放而简化并协调国际直接投资程序,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成本的方式
	金融便利化	促进对外开放而采取的跨境资源的融合与涉外金融业务管理方式改革
经济基础	政府规模和能力	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范围以及在产业开放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
	地区经济水平	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和能够达到的水准
	外资成果	利用来自国外的货币资金和表现为物资、技术、专利的国外资本
	就业成果	地区法定年龄内的务工劳动人员数量
	产业结构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环境基础	基础设施	能够为产业开放发展提供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
	运营管理	负责自贸区产业发展或提供服务的职能部门的管理
	产业协同集聚	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或生产同类产品企业在适当的空间集聚
	物流服务能力	从接受客户需求、处理订单、分拣货物、运输到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中,在响应速度、物流成本、订单完成准时性和订单交付可靠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技术服务平台	包括云服务平台、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等服务于自贸区发展的技术平台
	商务成本	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
	国际环境	国家与世界各有关国家、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
政策基础	制度创新	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有效激励产业开放的制度、规范体系来促进自贸区产业的变革
	监管及风险防控	政府对不确定因素形成的潜在风险进行监督以及就风险事项采取防范措施
	金融政策	为促进自贸区产业开放而出台的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税收政策	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手段,对各种税的税率、税目、减免、课征环节等税制要素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开放
	人才服务政策	为产业开放吸引人才前来发展而出台的相关落户、购房优惠、经济补贴等政策
	市场准入	国家允许外国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国内市场的程度
技术基础	法治保障	该区域的法律法规对自贸区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及法律问题所提供的保障
	研发人员专业化	根据产业开放过程中的运行方式选择合适的专业人员,人才结构与产业开放发展相匹配的程度
	创新能力	能够系统地完成与发展创新活动有关的各项活动的的能力
区位特点	创新投入	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方式生产和经营所投入的人力、资金、物资等所耗费的资源
	自然资源	该区域所拥有的天然存在、对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有使用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
	交通条件	与外界进行人员来往(客运)和物质交流(货运)的方便程度。可用交通线路、交通工具和港站的设备状况来反映
	地理位置	考虑经济地理位置,通常与周围地区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协作、产品市场、客货运输、金融信贷、科技信息交流有联系

表 2 直接影响矩阵

因素	x_1	x_2	x_3	x_4	x_5	x_6	x_7	x_8	x_9	x_{10}	x_{11}	x_{12}	x_{13}	x_{14}	x_{15}	x_{16}	x_{17}	x_{18}	x_{19}	x_{20}	x_{21}	x_{22}	x_{23}	x_{24}	x_{25}	x_{26}	x_{27}	x_{28}
x_1	0	1	4	2	0	0	1	4	0	1	3	1	0	0	1	0	0	2	1	2	1	0	1	0	0	1	2	
x_2	1	0	4	3	1	0	2	4	2	3	2	1	0	1	0	0	2	0	4	0	3	4	0	2	0	0	1	1
x_3	1	3	0	2	3	1	2	3	1	3	2	0	0	3	0	1	1	0	2	0	4	2	1	2	0	0	2	3
x_4	1	1	2	0	4	1	1	3	2	1	3	4	0	3	1	0	3	1	0	1	3	1	0	3	1	1	3	0
x_5	0	1	2	1	0	3	1	3	4	2	3	2	0	3	1	0	3	1	0	1	3	1	2	3	1	2	0	0
x_6	0	0	1	3	3	0	1	2	3	1	3	2	0	2	0	2	1	0	1	1	1	1	2	1	0	0	1	
x_7	0	3	1	1	2	1	0	2	4	1	1	4	2	1	3	1	3	3	2	3	1	0	4	2	0	1	2	3
x_8	0	3	1	1	2	1	4	0	1	3	2	1	0	2	0	0	1	2	3	1	3	3	2	0	0	2	3	4
x_9	0	1	1	1	3	2	2	4	0	1	2	0	2	1	0	2	1	0	0	0	2	1	2	0	0	2	2	0
x_{10}	0	2	1	0	0	0	3	4	2	0	1	0	4	0	0	3	1	0	0	1	2	2	0	3	0	4	2	2
x_{11}	1	1	0	3	2	1	2	4	1	3	0	0	0	2	3	2	0	0	2	1	3	2	3	1	3	4	2	2
x_{12}	0	0	1	4	4	4	2	2	3	1	0	0	2	3	3	2	3	0	2	2	0	0	2	1	2	3	2	2
x_{13}	0	0	0	2	3	3	0	1	1	0	0	1	0	3	3	1	4	2	0	2	0	0	0	2	0	0	0	0
x_{14}	0	0	1	1	2	4	1	2	3	0	0	2	4	0	3	0	3	1	0	1	1	0	1	3	2	0	0	1
x_{15}	0	0	1	3	4	3	3	1	1	0	1	1	2	1	0	0	3	1	0	0	4	0	0	1	2	0	0	0
x_{16}	0	0	1	0	0	0	1	1	1	4	0	0	1	0	0	0	1	4	0	2	3	1	2	3	1	4	3	2
x_{17}	0	1	2	4	4	4	1	2	3	1	1	2	0	2	2	1	0	0	0	0	1	0	0	2	3	0	1	2
x_{18}	0	0	0	3	3	3	1	0	1	0	0	4	3	2	2	1	3	0	0	3	1	0	0	1	0	1	0	1
x_{19}	1	2	3	1	0	0	3	2	2	1	3	0	0	0	0	0	1	0	0	1	4	3	3	2	0	1	3	1
x_{20}	0	0	0	0	0	0	1	0	2	1	0	0	2	0	0	4	0	0	1	0	2	1	3	4	0	2	1	2
x_{21}	1	0	2	1	1	3	4	3	1	2	3	1	0	0	1	3	1	0	3	2	0	1	1	2	0	4	3	2
x_{22}	0	0	2	2	1	1	0	2	1	0	3	0	0	0	0	0	1	0	2	3	4	0	1	1	0	1	1	1
x_{23}	0	0	0	3	3	3	0	0	0	0	1	3	1	0	0	0	0	0	1	4	2	2	0	3	0	3	2	1
x_{24}	0	0	1	2	1	1	0	0	2	0	0	0	2	0	0	0	1	2	0	3	3	0	0	0	0	0	0	0
x_{25}	0	0	0	3	3	3	0	1	3	0	2	4	3	4	1	2	4	2	0	0	1	0	0	1	0	2	1	2
x_{26}	0	0	0	1	0	0	0	3	3	2	4	0	0	0	0	1	3	0	0	2	3	0	3	0	1	0	4	2
x_{27}	0	2	1	2	2	1	3	4	0	1	3	0	1	0	0	4	1	0	0	1	4	2	4	1	3	4	0	4
x_{28}	0	0	0	0	0	0	3	3	0	0	1	1	0	0	0	0	0	1	0	2	3	1	3	0	1	4	4	0

$$f_i = \sum_{j=1}^n t_{ij}, (j = 1, 2, \dots, n) \quad (3)$$

$$e_i = \sum_{i=1}^m t_{ji}, (i = 1, 2, \dots, m) \quad (4)$$

$$M_i = f_i + e_i \quad (5)$$

$$N_i = f_i - e_i \quad (6)$$

表3 DEMATEL 计算结果

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原因度	中心度	属性
x ₁	2.214	0.451	1.763	2.665	原因因素
x ₂	3.151	1.638	1.513	4.789	原因因素
x ₃	3.187	2.207	0.980	5.393	原因因素
x ₄	3.410	3.427	-0.017	6.836	结果因素
x ₅	3.190	3.755	-0.565	6.944	结果因素
x ₆	2.443	3.204	-0.761	5.648	结果因素
x ₇	3.697	3.248	0.450	6.945	原因因素
x ₈	3.416	4.433	-1.017	7.849	结果因素
x ₉	2.491	3.526	-1.035	6.017	结果因素
x ₁₀	2.665	2.502	0.163	5.166	原因因素
x ₁₁	3.570	3.333	0.236	6.903	原因因素
x ₁₂	3.734	2.472	1.262	6.206	原因因素
x ₁₃	1.997	1.996	0.001	3.993	原因因素
x ₁₄	2.564	2.409	0.155	4.974	原因因素
x ₁₅	2.524	1.703	0.822	4.227	原因因素
x ₁₆	2.455	2.306	0.149	4.761	原因因素
x ₁₇	2.985	3.212	-0.227	6.196	结果因素
x ₁₈	2.416	1.780	0.636	4.196	原因因素
x ₁₉	2.822	1.659	1.163	4.482	原因因素
x ₂₀	1.717	2.869	-1.152	4.587	结果因素
x ₂₁	3.362	4.732	-1.370	8.094	结果因素
x ₂₂	2.056	2.157	-0.101	4.213	结果因素
x ₂₃	2.295	2.921	-0.626	5.216	结果因素
x ₂₄	1.288	3.404	-2.116	4.691	结果因素
x ₂₅	3.137	1.568	1.569	4.705	原因因素
x ₂₆	2.477	3.528	-1.051	6.005	结果因素
x ₂₇	3.600	3.431	0.168	7.031	原因因素
x ₂₈	2.117	3.109	-0.992	5.225	结果因素

根据表3 计算各个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的值,绘制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原因—结果图,如图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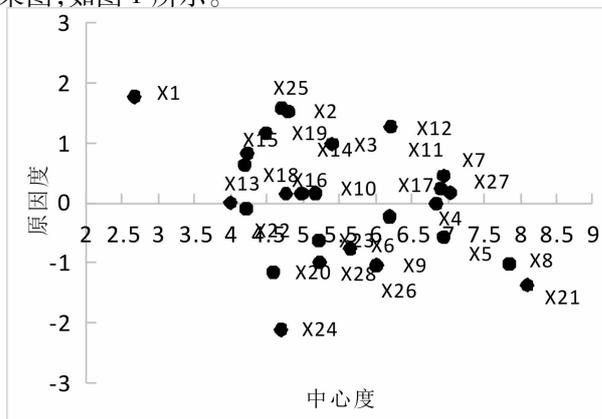


图1 原因—结果图

(四) 计算整体影响矩阵和可达矩阵

整体影响矩阵 K 计算公式:

$$K = I + T \quad (7)$$

由于包含影响程度较小的指标,因此需要引入阈值去除冗杂信息。传统的阈值是根据专家经验确定,该方法客观性较差,而基于统计分布均值加样本差计算可降低主观性,因此本文首先根据统计分布计算出样本均值与样本标准差之和数值为 0.15 作为阈值,但各影响因素的节点度仍然较高,因此结合专家经验判断最后确定 $\lambda = 0.171$ 。根据 λ 值简化整体影响矩阵,结合公式可得到邻接关系矩阵 P ,经过计算得到可达矩阵 H ,计算公式如下。

$$P = K + 1 \quad (8)$$

$$P_{ij} = \begin{cases} 1, & k_{ij} \geq \lambda (i, j = 1, 2, \dots, n) \\ 0, & k_{ij} < \lambda (i, j = 1, 2, \dots, n) \end{cases} \quad (9)$$

$$(P + I)^{n-1} \neq (P + I)^n = (P + I)^{n+1} = H \quad (10)$$

根据可达矩阵可以获得每个影响因素的可达集 $R(x_i)$ 与先行集 $A(x_i)$,经验证当 $i = 6, 13, 14, 16, 18, 20, 23, 24, 28$ 时满足 $R(x_i) \cap A(x_i) = R(x_i)$, $X_6, X_{13}, X_{14}, X_{16}, X_{18}, X_{20}, X_{23}, X_{24}, X_{28}$ 为第 1 层直接影响因素;在可达矩阵中划去这些影响因素对应的行和列,重复计算上述步骤,可得第 2 层中间影响因素 $X_5, X_7, X_8, X_9, X_{11}, X_{21}, X_{26}, X_{27}$;第 3 层中间影响因素 $X_1, X_2, X_3, X_4, X_{10}, X_{15}, X_{19}, X_{22}$;第 4 层根本因素 X_{12}, X_{17}, X_{25} 。因此,将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分为四个层级,如图 2 所示。

四、结果分析

(一) 原因度分析

原因度大于 0 的因素为原因因素,小于 0 则为结果因素,原因因素为自然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政府规模和能力、就业成果、产业结构、制度创新、监管及风险防控、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人才服务政策、法治保障、基础设施、国际环境、创新能力。结果因素为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便利化、地区经济水平、外资成果、市场准入、运营管理、产业协同集聚、物流服务能力、技术服务平台、研发人员专业化、创新投入。结果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对结果因素进行调控对促进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 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是指标体系中影响与被影响的程度之和,并能反映出因素重要性。中心度值前 3 的分别是产业协同集聚、地区经济水平与创新能力。在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中,创新能力和投入以及研发人

员专业化是技术因素的体现,创新在产业开放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带动与促进作用。创新能力能够提升自贸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模式由低

端向高端转变,促进产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带动全产业链企业发展继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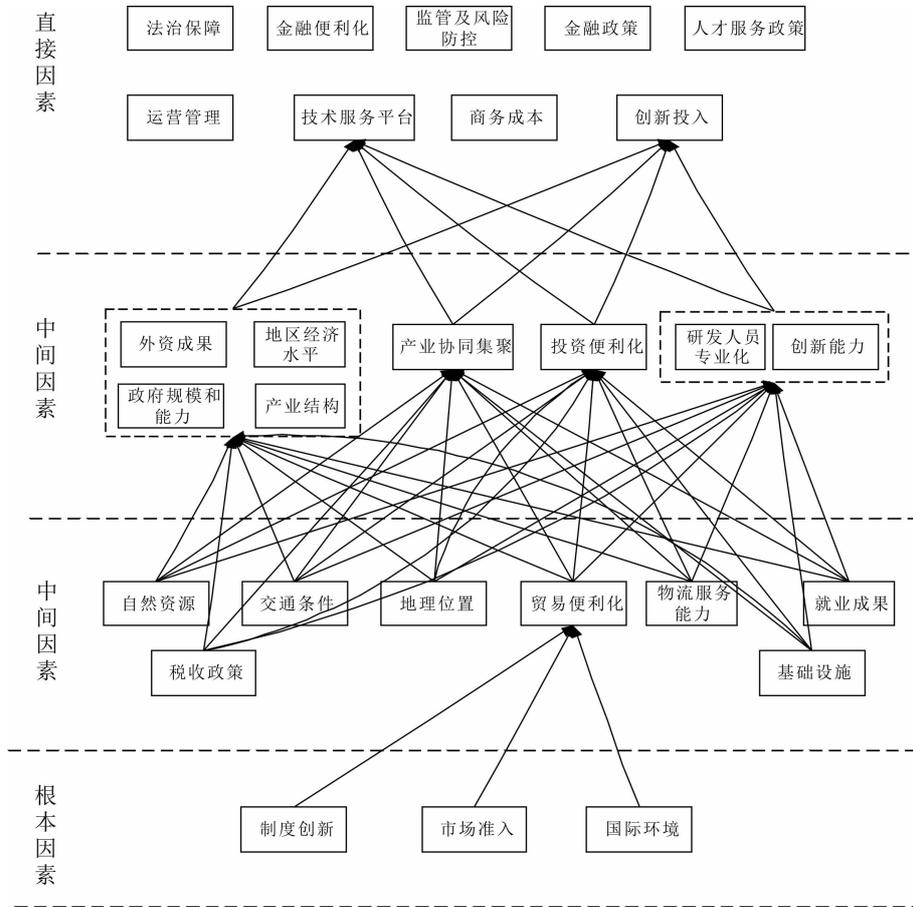


图2 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三) 多级递阶结构层次结果分析

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根据多级递阶层级图可知,金融便利化、监管及风险防控、金融政策、人才服务政策、法治保障、运营管理、技术服务平台、商务成本、创新投入是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表层因素,包括与政府相关的政策因素、监管与风险防控、法律法规等因素,与发展过程相关成本和技术服务的因素以及重要的创新投入,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中间因素分为两层,包括外资成果、地区经济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政府规模和能力、产业结构、投资便利化、研发人员专业化、创新能力、自然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税收政策、贸易便利化、物流服务能力、就业成果、基础设施,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间接对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起作用,此类因素的影响过程不如直接因素明显,往往容易被忽略,但中间因素对自贸区产业开放的作用不可忽视。不仅如此,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显示,制度创新、市场准入与国际环境是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的根本因素。产业开放即

产业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技术链、人才链与资本链,产业开放从外部环境来看,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从内部看受国内市场准入的影响,进而细化到地区受该地区制度创新程度的影响,制度创新影响开放程度,开放程度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政策、程序以及发展环境,国际环境、市场准入以及制度创新这三个因素都与产业开放相关,不会直接影响自贸区产业发展,但是能够通过影响政策、开放程度、环境基础间接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对自贸区产业开放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用 DEMATEL - ISM 方法探讨了自贸区开放发展过程中影响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 DEMATEL 模型分析各因素的原因度和中心度来判断因素的重要程度,并运用 ISM 模型将影响自贸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层级,得到影响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的直接因素、中间因素与根本因素,并得出以下管理启示。

1. 制度创新赋能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制度创

新是促进自贸区产业开放根本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的因素。制度创新一直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自贸区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过程监督以及多式联运等领域积极开展探索,并且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政策上仍需突破,并且需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区域特点与交通枢纽优势,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体系。一方面,制度创新要落地,要关注企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困境,结合发展特点与现实困境创设新的制度与规范,实实在在解决产业开放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借鉴先进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经验,梳理先进自贸区优势产业发展历程、总结先进自贸区发展特点与发展经验,建立先进自贸区产业发展案例库,借鉴其他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措施,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规范。

2. 产业协同集聚助力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中间影响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的是产业协同集聚,中间影响因素虽然对自贸区产业开放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影响直接影响因素而间接影响产业开放发展。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形成对外贸易优势。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发展,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目标,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力量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加强培育生产制造多功能一体化的产业集聚地。强化地方政府产业协同集聚意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物流服务业、生产制造业等产业协同集聚,降低出口产品生产、物流的成本,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经济价值。

3. 金融开放加速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金融便利化是自贸区产业开放发展直接影响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的因素。金融便利化是金融开放的首要体现。为了方便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河南自贸区创设了企业跨境结算“秒”到账,加速金融开放发展。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政府相关部门实现多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深入金融领域调研和跟踪研究,清晰划定每个部门在金融便利化中的责任与权力,结合自身实际和自贸区战略定位,统筹谋划、统一行动;另一方面要注重金融创新,为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精准对接自贸区建设的金融需求,推动建设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借助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开展贸易融资,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参考文献:

[1]林小倩. 内陆型自贸区设立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22(19):3.

- [2]孔令丞.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开放的结构升级效应[J]. 江汉论坛,2005(2):3.
- [3]邓伟,赵尧锋. 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政策构建的“原则上可再试点”路径研究[J]. 国际税收,2022(10):4.
- [4]郭若楠. 自贸试验区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实现路径研究[J]. 齐鲁学刊,2022(5):119-129.
- [5]刘婷. 江苏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 科技经济市场,2022(9):1-3.
- [6]田云华,黄港裕,罗美君,等. RCEP背景下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挑战与展望[J]. 全国流通经济,2022(22):4.
- [7]刘军,史学睿. 自贸试验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J]. 软科学,2022,36(12):1-14.
- [8]邢会,杨子嘉,张金慧. 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准自然实验[J]. 工业技术经济,2022,41(6):71-77.
- [9]任福耀,徐苗,张亚楠.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来自企业注册数据的证据[J]. 中国流通经济,2022,36(11):82-91.
- [10]杨栋旭.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HCW方法的实证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2022(5):60-66.
- [11]王亚飞,张毅. 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兼论资本错配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J]. 软科学,2021,35(11):6.
- [12]张华强. 中国自贸区发展水平比较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22.
- [13]陈晓莹. 福建自贸区服务业发展研究[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1,42(3):25-28.
- [14]刘丹,陈珊珊,欧世明. 福建自贸区港口物流中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8,35(2):58-60.
- [15]曾婷.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度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特区经济,2021(5):3.
- [16]张应武,李董林. 基于动态因子分析法的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7(3):8.
- [17]高增安,陈娇娇. 成都申创内陆自贸区的因素影响评价研究:基于内陆副省级城市的比较[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
- [18]高增安,廖民超,金虹敏. 内陆自贸区建设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7.
- [19]倪外. 国际先进自贸区核心竞争力构成及其启示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5(3):8.
- [20]张绍乐. 自贸区综合发展水平影响因素评价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2017(6):112-12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75页)

非正式组织视角下组织创造力的研究

——基于跨部门协作的中介作用

李 晨, 台玉红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从非正式组织视角出发, 引入跨部门协作作为中介变量, 探究其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发现: 非正式组织对组织创造力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且跨部门协作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 企业应支持非正式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鼓励跨部门协作, 从而最终提升组织创造力。

关键词: 非正式组织; 跨部门协作; 组织创造力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7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3)01-0044-05

一、引言

在物质生活逐渐提升的情形下, 人们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顾客的购买意愿不再是单一为了满足基本需求, 开始有独特性、差异性、创意性等方面的追求。企业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维护其自身的竞争优势, 不得不提供更加有新意、有独特性的产品和服务, 不断提升其创新能力。组织作为企业的核心, 其整体的协作效率和创造力水平的提高因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企业通过跨部门协作形成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信息互通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提高员工技术技能及其之间的知识共享率, 从而达到组织整体创造力提升的效果。

非正式组织总是伴随着组织的存在而诞生, 是对正式组织的补充。非正式组织可以完全存在于一个部门当中, 也可以跨越部门自由形成, 其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 是知识传播、信息交流和跨部门协作的有效途径。有研究表明, 有效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方式往往和同伴的可用性和分享意愿紧密相关, 而非正式组织具有这些特点。非正式组织中的成员共同分享知识和经验, 讨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进而激发创造性的思维。

学者们对于创造力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个体和团

体层面, 聚焦于组织的文章相对较少, 只有极少数学者将非正式组织和组织创造力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孙永磊等人通过开放式访谈、半结构性访谈和数据调研得到: 知识获取与组织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新知识的涌入, 能够使企业摆脱创新困境, 为企业解决问题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和想法, 是创造力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该调研还得到组织沟通并不一定促进组织创造力这一结论, 主要是因为过多的沟通、大量无效的会议会占用员工的工作时间, 员工无法专心地工作, 从而不利于创新^[1]。本研究从非正式组织视角出发, 探讨其与组织创造力的关系。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非正式组织与组织创造力

关于非正式组织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做出不同的定义, 但大多认为, 非正式组织不是由正式组织建立的, 是人们根据心理、感情等方面的需要自发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 具有自发性、情感性和隐含性的特征。

对组织创造力的界定, 尽管说法不一, 但至少都包含四个部分: 创造环境、创造主体、创造过程、创造产品。它是组织成员在面对不断增长的顾客需求等

收稿日期: 2022-12-10

作者简介: 李晨(2000—), 女, 河南开封人,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复杂社会情形下,产生的对于产品、服务或流程的新想法、新的解决方案^[2]。

在非正式组织中,成员间的交流不是任务而是需要,这种成员间的交流就是该群体的存在方式。由于不受正式制度的制约,所以成员之间的沟通氛围更加轻松愉悦,频率更高,而且深度也不是普通的职工会议、领导谈心所能达到的,范围甚至扩展到彼此家庭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从而提高组织创造力水平。吴士健等人提出:员工通过非正式网络可获得更多需要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合和提取,有利于有创意思法的产生,对员工创造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

周国红、陆立军通过收集 1184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企业要想提高其创新水平,提升员工的创造力,只靠企业的研发投入等资金支持以及人才引进是行不通的,非正式组织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带来的知识的共享、新思想的碰撞是必不可少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非正式组织对创造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4]。韩炜等在探讨高管团队内部的非正式网络是否会影响创新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关系时发现:基于相似的教育背景、行业相关经验等而在高管团队内部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对创造能力和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信息的交换、成员间的合作以及集体决策三个方面进行影响的。高管团队内部的非正式网络因其成员间具有背景等的相似性促进他们更愿意与对方共享信息,提高了信息交换的质量,这样同时也有助于降低决策者收集信息的成本。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黄同飞、彭灿认为,非正式网络对团队创造力存在倒 U 形函数关系,并以 BSH 冰箱的研发为实例进行论证说明。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当非正式组织成员互动强度过高时,会出现“同质化”现象,反而不利于新想法、新思想的产生,妨碍了组织创造力水平的提升。当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信任度极高时,会出现“封闭性”“排他性”的情形,成员过度依赖和信任他人的说法,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缚,自身主见性变弱,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5]。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

H1: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对组织创造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二)跨部门协作的中介作用

跨部门协作,是指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交流与合作,以提升组织整体的创新能力,从而向顾客提供更有价值、更高水平的产品或服务。

1. 非正式组织与跨部门协作

知识具有黏性难以传播,其分布往往不均匀具有分散性,不同部门成员掌握着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但由于正式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沟通的有限性和分享意愿的强烈不如非正式组织,所以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的跨部门协作成为知识获取的一个重要渠道。

非正式组织是差序格局的产物而不是基于工作关系形成的,具有情感性、社会性和跨部门性等特征,因此可以提高知识交流的频率以及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是基于人际情感,相比正式组织下的人际关系成员更容易信任彼此,宋晨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非正式组织中信息传递的效率要高于正式组织^[6]。成员间在专业技术技能方面存在差异性,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目的,这些特点为他们互相学习、跨部门协作奠定基础。倘若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学习任务,那么员工可能具有排斥和拒绝的心理,但是在非正式组织中,成员之间基于情感的维系,甚至领头羊发挥核心作用,内部成员交流的氛围更加轻松愉悦,这种氛围更加有利于员工去了解其他部门的业务,形成全局意识,对自身部门业务水平的提升和跨部门之间的合作都有利,并且企业创新是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协作整合的。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可能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但他们具有相同的情感归宿需要,因此内部成员知识共享效率高,有利于促进组织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

H2: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会提升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效率。

2. 跨部门协作与组织创造力

跨部门协作是员工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重要途径,是组织整体创新水平提升的解决途径。每个员工的认知水平和技术技能都是有限的,不同部门之间掌握的知识技能等具有差异化,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以离散的状态存在于每个部门内部,但是组织整体创造力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单靠一个部门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部门间协作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整合,特别是不同产品领域和职能领域知识的跨边界流通才能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利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员工进行跨部门的知识分享使得企业每个部门的专属知识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跨边界的流动和整合。这种跨部门协作产生的知识分享对企业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市场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的跨部门知识交流合作,可以使研发部门获取市场的最新变化和动态,以生产满足顾客需要的

产品和服务,会大幅度提升新产品开发的效率和成功率,有助于创新水平的提升,帮助企业获得市场的竞争优势。

王奕丹在研究跨部门动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现,跨部门动态两个维度当中的跨部门联系对产品的创新发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7]。学者沈斌对此感到认同,员工越是比较频繁地与其他部门的同事分享知识与经验也越容易获得别人分享的知识,在跨部门协作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的吸收还是传递,都能在提升员工人际关系的同时促进组织创造力的提升。知识分享不仅能够促进员工的个人绩效,还对提高组织的竞争力、改善组织绩效至关重要。组织中员工之间知识共享和学习行为的发生会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充分的知识分享使得新知识更容易在组织内发生^[8]。

跨部门协作使得不同部门之间知识共享技术技能得以支持。跨部门协作水平越高,意味着组织内各个部门之间共同互动越多,部门之间越愿意分享知识、资源以及技能。跨部门合作对创造力的提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支持:

(1)跨部门协作水平较低情形下,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孤立,缺乏沟通交流,对其他部门拥有的信息不清晰。

(2)跨部门协作可以拓宽各个部门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因为各个部门工作分工清晰,工作性质可能不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方式和渠道,如若跨部门协作水平较低,则研发部门可能无法获取销售部门从顾客等外部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单一渠道的信息获取方式,阻碍了该部门以及整个组织创造力水平的提高。而在跨部门协作高水平的组织内部,员工之间更愿意分享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和途径。

(3)在跨部门合作水平较高时,各个部门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独特的优势和资源,在面临不同的工作任务时不仅能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而且能够利用其他部门的独特资源,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相反,在跨部门协作水平较低的组织中,由于各个部门其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有限性,在面对一些较新的非程序化的工作任务时,很可能因为该组织有限的信息资源无法获得更好的收益,导致企业整体的低绩效。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

H3:跨部门协作对组织创造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所有理论,本文提出:

H4:跨部门协作在非正式组织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的作用,即非正式组织通过跨部门协作正向影响组织创造力。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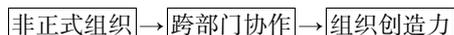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发放问卷共计260份,其中包含服务业、制造业等,既有基层员工也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回收得到有效问卷207份,回收率为79.6%。

(二)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问卷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对于非正式组织的测量,借鉴应洪斌、沈瑶、王燕夷和彭灿等人的量表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本土研究进行调整。包括非正式组织信任、非正式组织沟通、非正式组织规模、非正式组织集体感四个维度,共计12个题项^[3]。

跨部门协作采用徐瑜莉的量表进行测量,包含协同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知识共享、共同解决问题四个维度,共计14个题项。

组织创造力的测量采用经典的Lee和Choi(2003)开发的量表,该量表从创造动机、创造环境、创造过程和创造结果四个方面进行测量,共计5个题项^[2]。

四、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STATA、SPSS和AMO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本文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

应用STATA软件进行问卷信效度检验,非正式组织的Cronbach's α 值为0.80,跨部门协作的Cronbach's α 值为0.86,组织创造力的Cronbach's α 值0.73,由此可见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样本的效度方面,利用AMOS和SPSS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和AVE均大于0.40,CR值均大于0.7,Std.值均大于0.6,GFI、AGFI、CFI、TLI值均大于0.8。且KMO值为0.812,大于0.6,并且 $p=0.00$ 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具备了进一步检验的基础。

表1 模型拟合指标(验证性因子分析)

指标	模型指标值	标准	结论
CMID	129.455	越小越好	
DF	51	越小越好	
CMID/DF	2.538	<3 优秀, <5 可接受	拟合良好
GFI	0.904	>0.8 可接受, >0.9 拟合良好	拟合良好
AGFI	0.854	>0.8 可接受, >0.9 拟合良好	可接受
CFI	0.93	>0.8 可接受, >0.9 拟合良好	拟合良好
TLI	0.91	>0.8 可接受, >0.9 拟合良好	拟合良好
RMSEA	0.086	<0.08 优秀, <0.1 可接受	可接受

表2 收敛效度表

维度		显著性估计				题目信度		收敛效度	组成信度
		Unstd.	S. E.	z-value	p	Std.	SMC	AVE	CR
信任	← 非正式组织	1.000	0.793	0.629					
沟通	← 非正式组织	0.944	0.092	10.279	***	0.781	0.610	0.512	0.806
规模	← 非正式组织	0.838	0.095	8.822	***	0.657	0.432		
集体感	← 非正式组织	0.727	0.089	8.146	***	0.614	0.377		
过程	← 组织创造力	1.000	0.684	0.468					
主体	← 组织创造力	0.995	0.134	7.435	***	0.604	0.365	0.419	0.742
产品	← 组织创造力	0.968	0.137	7.077	***	0.680	0.462		
环境	← 组织创造力	0.934	0.152	6.145	***	0.616	0.379		
协同	← 跨部门协作	1.000				0.765	0.585		
资源获取	← 跨部门协作	1.266	0.084	15.078	***	0.948	0.899	0.678	0.891
知识共享	← 跨部门协作	1.262	0.087	14.443	***	0.924	0.854		
共同解决问题	← 跨部门协作	1.129	0.126	8.990	***	0.612	0.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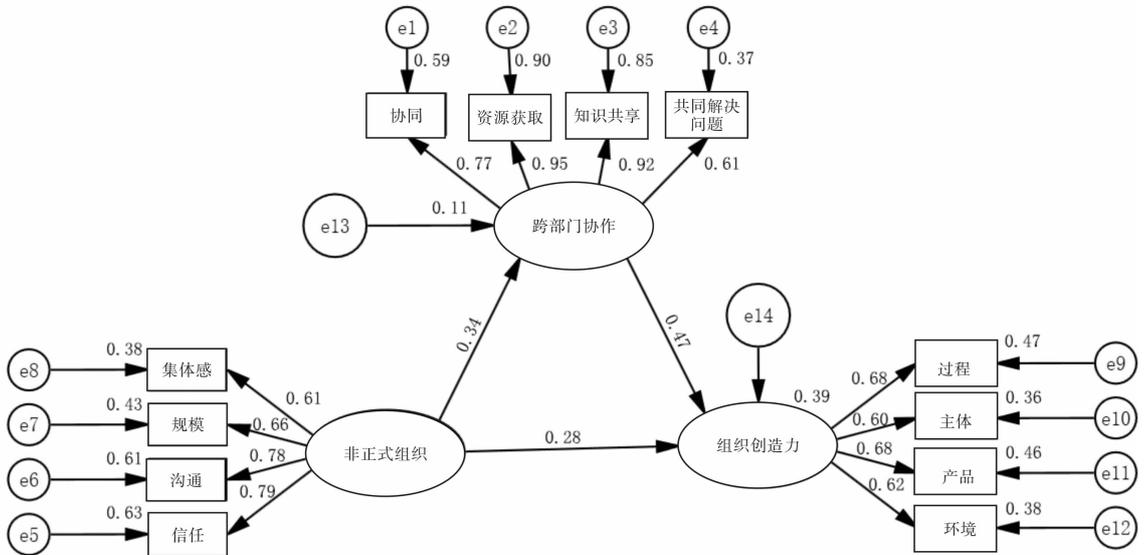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图

五、结果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均得到了实证支持,研究结论如下:

1. 非正式组织对组织创造力的提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非正式组织为成员提供了一个无压力、无障碍的沟通环境,知识传播效率更高,专业技能互补,成员之间传播“最佳实践”,更利于新想法的产生,对组织整体创造力的提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从图2 结构方程模型图可以看出,非正式组织对组织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系数为0.28且显著,即H1通过检验。此外,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对跨部门协作水平也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34, H2通过了验证。跨部门协作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系数为0.47, H3通过了检验。最后,非正式组织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系数小于通过跨部门协作间接作用的系数,即跨部门协作在非正式组织创造力的影响中发挥正向部分中介作用, H4通过检验。

2. 非正式组织对跨部门协作水平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对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明显会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即促进了跨部门协作。

3. 跨部门协作对组织创造力的提升有正向影响。任何有创意的想法,单靠单个部门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不同部门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是独特的,创新需要他们的合作,因此,跨部门协作会促进组织创造力的提升。

4. 跨部门协作在非正式组织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中发挥正向部分中介作用。非正式组织的成员既可能来自同一部门,也可能来自不同部门,所以跨部门协作只是在非正式组织对组织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

(二)管理启示

1. 企业应赋予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一样重要的地位,不可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作用。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有利于维系正式组织的凝聚力、有效弥补正式组织的刚性,使组织具有柔性。另外,正式组织结构较复杂,决策的执行和管理指示的下达成本较高,非正式组织对领导决策也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同时,其在组织创造力的提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为非正式组织腾出时间和空间,充分发挥其正向作用,引导其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可以通过定期团建等活动,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和空间拉近成员之间的距离,为非正式组织的成立创造条件,促进其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在组织管理方面,尽力把非正式组织融入正式组织中,充分利用这一渠道为正式组织提供帮助,提升组织整体创造力。

第三,密切关注非正式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即领头羊,他是非正式组织的掌舵人,往往是信息的掌控者、集合者,观察其行为、关注其趋势,若发现有负面行为或影响,及时给予指导,防止负面信息和情绪的传播。

2. 鼓励和支持跨部门协作。在组织内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目标存在差异,“部门墙”的存在使得部门之

间的沟通存在障碍,鼓励和支持跨部门协作,在促进跨部门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各部门共赢的同时,还有利于非正式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非正式组织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跨部门之间的协作,从而最终有效地提升企业整体组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 [1] 孙永磊,宋晶,陈劲.组织创造力形成的影响因素探索及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39(8):40-52.
- [2] 马喜芳.组织激励与领导风格协同对组织创造力及组织绩效影响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 [3] 吴士健,李籽儒,权英.非正式网络、知识共享方式及其交互作用对员工个体创造力的影响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3):58-67.
- [4] 周国红,陆陆军.非正式网络学习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基于1184家集群企业问卷调查与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0(2):74-77.
- [5] 黄同飞,彭灿.非正式网络对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以共享心智模型为中介变量[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7):57-69.
- [6] 宋晨.中国情境下非正式组织的管理路径[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8):4-5.
- [7] 王奕丹.跨部门动态对产品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6.
- [8] 沈斌.跨部门知识分享行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7(2):21-2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LI Chen, TAI Hongyu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9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o explore its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informal organization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cross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plays part of mediating role.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suppor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encourage cross sectorial collaboration, and ultimately enhance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Key words: informal organization;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风险视角下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要求与发展路径

周在娟

(郑州师范学院 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都将十分严峻,而养老服务产业却处在起步阶段,未能搭建起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因此,有必要提升审计工作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作用,提高养老行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了实现这一点,既要构建高效的审计系统和优化审计流程,也要革新审计方法,强化审计队伍建设,在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增强审计实效性,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此,本文从风险视角出发,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要求和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在制度保障、经济来源、行业规范等方面,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风险;审计要求;发展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8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49-04

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全面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重点解决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先后提出了与“养老服务”有关的战略部署,号召各地结合养老问题和当地实际,全面推进医养结合,加快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以最大限度缓解“养老瓶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和扶持措施,在制度制定上,也倾斜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希望借此部分地消解难题,破除中国社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和风险^[1]。同样是在这一问题上,为了破解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难题,部分学者在多个视角上,对养老模式、养老服务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究^[2-5]。曹璞(2018)以管理审计为视角,探讨了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策略问题,主张在国家层面继续出台、发布与社会保障资金审计、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管理、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管理等相关的文件,以此明确审计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要求;黄耀樟(2019)对政府审计在养老服务产业的实践进行了探索,提出了针对养老保险基金应该加大监管力度的意见,认

为缓解养老压力、扩大社会发展空间,需要对养老服务产业予以政策和资金扶持,改善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现状,提升养老服务产业的运行效率;王彪华(2020)对大数据审计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综述,认为应该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的浪费,按照现行政策和统计数据资料,明确审计结果公报,以此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张庆龙等(2020)针对新一代内部审计——数字化与智能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包括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为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政策体系,构建全方位、全社会的养老服务框架,提供了必要依据。基于已有文献,本文从风险视角出发,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要求和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在制度保障、经济来源、行业规范等方面,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及风险分析

(一)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时至今日,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依旧停留在起步

收稿日期:2022-09-2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家政学专业产教融合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022YB0278);郑州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家政产业学院资助

作者简介:周在娟(1980—),女,河南辉县人,博士,郑州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家政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阶段,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出炉”,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避无可避”的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养老服务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起步较晚,对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估计不足,导致很多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暴露了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养老服务政策的指导性和前瞻性。(2)产业整体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以目前情况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从业人员(以护理人员为主)整体素质偏低,性别、学历、技能结构等都不合理,其中很多人员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且自身教育能力有限,加之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不稳定且处于较低水平,加剧了人员的流动性,也导致该产业发展相对迟缓。(3)养老服务产业的供需失衡。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产业规范性较差,行业标准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产业的供需矛盾长期存在,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二)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风险分析

据预测,至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 4.87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多,养老服务作为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依托,需要确保相关政策和资金的安全性、合法性,否则极易将养老服务产业引入风险之中,对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1)财产风险。在养老服务产业中,从业机构需要提供动产和不动产等财产,用以支撑产业的发展和运营,其中就包括养老场所固定资产、医养康复设施,以及入住个人财产等。如果从业机构无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有效管理,势必会提升机构的财产风险,对产业整体发展也会产生较大影响。(2)法律风险。在养老服务产业运行体系中,法律风险是各类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目前,虽然我国在养老机构管理和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总体而言,产业的日常运营还是无法回避法律风险,而一旦引发法律诉讼,不但会对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造成经济损失,更会严重影响产业整体进步。(3)投资风险。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老龄化大国”来说,养老服务产业的运营需要巨大的投资,但该产业的回报期长、风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警示。值得注意的是,截止到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普适性”的养老服务管理政策,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较低,许多企业(以民企为主)为此投入了很多资金、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在短

时间内难以完成资金回笼,投资风险系数将长期在高位运行。

二、审计在养老服务产业的作用和瓶颈

(一)审计在养老服务产业的作用

对养老服务产业进行有效监管,是应对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转变的客观需要,也是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现实要求。尤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提高和发挥审计监督的效用,通过挖掘养老服务产业服务人员的潜能,提升护理专业人员的知识储备和服务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健康发展:(1)推动养老服务产业政策落实到位。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先后出台了有关养老服务的政策措施,为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发挥审计的约束性、权威性作用,能够“敦促”相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让投入养老服务产业内的每一笔资金,均可以在既定时间内,发挥出最大效应。(2)优化养老服务产业的整体发展环境。审计具有约束力也具有权威性,将其“介入”到养老服务产业中,不但可以优化其投资环境,让注入养老服务产业各类资源得到规范、高效的利用,也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审计方案,让国家审计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最大限度降低产业风险。(3)助力养老服务产业的投资成果转换。审计能够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及时发现和准确把握阻碍产业发展的因素,在逐渐清除负面影响后,推动养老服务项目成果的转化,以此体现养老服务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前瞻性,以及以审计防范产业风险的可行性。

(二)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瓶颈

在前文中指出,虽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上,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以应对养老问题,也在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产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蕴含其中的风险因素却难以剔除,而这便直接加大了审计监管难度,让养老服务业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1)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政策、审计标准、审计指标等,还存在一定不足,在审计内容方面,也无法全面体现工作的前瞻性,这对国家审计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少阻力,审计职能也难以得到有效、充分的发挥。与此同时,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在自身管理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如果无法进行自我完善、自我管控,就无法让审计工作落实到位,也难以收到实效。(2)为了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监督功能,提高审计工作的准确性,既需要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的特点,制定统一的审计标准和相应准则,也要分别在软硬件建设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但现实情况是,部分审计机构在审计

工作中出现了监管不到位、审计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计质量。(3)为了防范产业风险,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同步最大化,就需要通过国家审计的介入,规范产业秩序,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健康发展。但实际情况是,针对养老服务产业开展的国家审计,在内容上不全面、在目标上不准确,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无法得到全面极致,影响了审计效果和产业发展绩效的提升。(4)在对养老服务产业进行国家审计时,审计机关、审计人员需要和地方政府、上一级审计机关等进行协调,以明确审计工作指向,防止在不同主体间易产生矛盾。但是,受到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及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国家审计操作并不规范,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风险。比如,审计机构对产业数据的保护不到位,不同部门间无法共享数据和进行更高阶的数据处理,导致审计数据更新难以实现,影响了国家审计工作连续性、持续性。

三、审计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策略

(一) 强化审计工作队伍能力提升

人才强国,人才战略不管在哪一个方面都是备受关注的。在审计事项方面,需要采用与时代共进步的手段,在养老基金审计方面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1)采用云计算审计和大数据审计,让审计工作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让养老审计注重信息化技术。(2)增强面向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人员的综合素养,以此增强审计工作的实效。期间,既要求审计人员掌握扎实的审计知识和技能,也要对养老服务产业的特点、内容、要求等“了如指掌”,才能进入这一领域开展审计工作。(3)审计人员要对国家政策、方针等进行正确解读,以敏锐的洞察力去识别养老服务产业中潜藏的风险,最大限度发挥出国家审计之于养老服务产业的功能和价值。

(二) 明确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重点

审计是促进养老产业运行计划有效实施的关键依据,也是充分保障家庭养老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市场运行与资金安全的重要前提,需要明确其审计重点。第一,注重提升审计机构的专业能力。通过设置专业从事家庭养老金融产品开发、资产运营及政策持续跟踪的审计机构,构建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的全面协同机制,推进金融服务家庭养老领域实现全方位审计。尽可能对金融服务家庭养老机构进行审计全覆盖,通过对相关机构的资产配置、产品开发、业务体系及政策实施状况进行全面监督,切实满足金融服务家庭养老需求。第二,制定促进家庭养老金融服务良性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及方案。通

过完善政策跟踪审计体系,充分保障家庭养老金融服务政策实现理想成效。第三,要求审计机构准确研判养老服务产业所处的阶段,对产业投入和产出进行整体分析,以便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确定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内容。比如,审计机构要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掌握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进程,从战略高度对养老服务产业进行整体分析。期间,要结合从中央到地方有关政策方针,重点对养老服务产业政策的落实情况,养老服务项目的审批情况等,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确保其合法合规且得到贯彻执行。

(三) 在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政府审计+智慧养老”数据平台

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优势,促进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审计工作与养老服务有序融合的重要诉求。第一,为真正化解利害冲突,充分做好风险防控,确保金融服务家庭养老质量,需要以科学、合理的审计监督机制为基础,通过打破传统审计监督的“结论”定式,将审计结论与问题整改、家庭金融养老产品开发、设计有机融合,为养老活动有序发展营造良好保障,实现审计成果、问题监督与助老养老需求的良性协同。第二,对养老产业的权益方向进行细分,通过将市场风险与家庭养老金融产品相融合,防范家庭养老金融服务的“泛福利化”倾向,制定切合实际的审计监督建议,合理把控家庭养老金融产品的实际风险,推动金融服务家庭养老产品实现良性发展。第三,在政府审计方面,审计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养老服务产业运营中,可能出现和面临的各类风险,以便在政府层面对养老服务产业,从业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审查,确保产业流程标准化、规模化、规范化。而在智慧养老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开发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养老”系统,政府审计可以和智慧养老系统相结合,通过共享数据,提升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四) 开发顺应养老服务产业政策变化、动态优化的审计方法

为更好发挥养老产业的助老优势,鼓励和促进各类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完善养老产业链发展,需要通过制定科学完善的审计方案,创新养老审计方法,全面提升审计效能。第一,在促进养老产业良性发展进程中,要以风险控制为基础,以养老产业链为审计对象,充分发挥审计在金融风险识别、审计监督与服务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应用优势,构建基于风险识别、预警及控制的风险管理审计模式,实现养老产业风险的有效控制与合理规避。第二,要将风险

导向审计、绩效审计等全新审计模式融入养老金融审计,通过科学借鉴其他相对成熟的金融审计经验,发掘相关金融风险及潜在问题,推动养老产业活动有序开展。期间,要积极引入智慧审计技术,搭建金融服务家庭养老智能审计平台,对养老产业产品进行多维度、全方位审计监督及评价,最大程度保障养老资金的利用价值。第三,充分结合养老服务产业的特征与政策措施,确定科学、合理的审计方法。期间,应将风险分析方法和大数据技术等,融入养老服务产业审计中;同时,要按照国家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政策方针及其导向作用,不断改善或者完善审计方法,在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同时,能够鉴别显性和隐性风险,并予以合理规避。

四、结语

在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党和国家相继颁发了多个政策文件进行积极引领,也为这一产业指明了方向,希望使更多人享受到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红利。但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风险,因此,在当前和以后,需要从我国现阶段养老服务产业审计工作的实际出发,结合积累起的经验和解决养老服务产业中得到的教训,继续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养老服务产业审计环节的优化,认清养老服务产业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细化审计部门的职责、功能和作用,提升审计部门对养老服务产业重大事件决策中的参与度。第二,要求养老服务产业审计人员,同时兼顾监督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严格遵守审计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切实维护利

益主体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关切,并在构建全方位养老服务产业审计机制的过程中,重点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基金筹措、基金管理和基金使用等方面,制定和优化审计流程。第三,尽量发挥养老服务产业审计和法制管理的互交效应,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产业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不断提升审计执行力度,通过法律手段,为养老服务产业审计提供理论依据,让审计工作的强制性、规范性得到显著提升。第四,综合各主体的经济利益诉求,对养老服务产业收支流程予以监管,以此提升审计质量。期间,审计部门要注重提升养老服务产业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针对审计实践中涉及的经济、财务等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充分理解并进行实践应用,为构建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产业审计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 [2] 曹璞. 管理审计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8(26):7-8.
- [3] 黄耀樟. 政府审计在养老服务产业的实践探索[J]. 财政监督,2019(18):75-78.
- [4] 王彪华. 大数据审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J]. 审计研究,2020(2):52-56.
- [5] 张庆龙,邢春玉,芮柏松,等. 新一代内部审计:数字化与智能化[J]. 审计研究,2020(5):113-12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udit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ZHOU Zaijuan

(School of Social Service and Development,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and eve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will be very severe, but the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without a relatively perfect risk management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ole of audit work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o achieve this, we should not only build an efficient audit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audit process, but also innovate the audit method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team, enhance the audit effectiveness of the risk, and esc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udit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hoping to make valuable research results i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conomic sources, industry norms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risk; audit requirement; development path

国际对比视野下比较法造法功能之研究

闫 璟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要:纵观比较法之发展历史,其功能是多样的,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比较法对世界各国法律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比较法之诸多功能中,造法功能作为其最为突出的重要功能之一,也彰显着现今世界两大法系在造法方面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倾向的立法者造法和英美法系国家偏爱的司法者造法均在其各自领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今天,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大法系也呈现出互相交融、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如何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原有造法模式的基础上,使司法者造法在我国得到成功地引入和适用,从而真正全面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并最终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工作,成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难题。

关键词:比较法;造法功能;立法者;司法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09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53-05

一、造法功能之概说

(一)创造法律与发现法律

在法治社会理念发光发热的今天,法律是国际社会行动交往的重要底线保障。但在早期,人类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公共秩序的维护往往要依靠通过长期经验累积形成的习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社会行为不仅在量上逐步增大,也在质上日益复杂,出于应对繁杂事务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针对不同领域、不同情况开始制定颁布相关法律、规范和制度等,就此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开始崭露头角。

对于法到底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这一问题,不同学派的学者各执己见。早期的自然法学派认为,在实定法之上,还有自然法的存在,这种法更为抽象且存在“应然”性。历史法学派坚持立法者和成文法之间没有生产与被生产的必然关系,法律总是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也即法律的产生不受意识的指挥而是以习惯的方式在多次运作中累积生成,这意味着法是被发现的且不能被任意改变。同时,庞德(Roscoe Pound)作为著名的社会法学派学者,在此问题上也持有与历史法学派相

近的观点,即认为法是来自于发现而非创造。^[1]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看待事物的方式应当避免“以偏概全”的情况,全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才是更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方式。就此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同时关注法的创造和法的发现两部分。一方面,从法的展现形式角度考虑,其是被创造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法的存在又有其内在的客观性与自然性。因此,可以说创造和发现都在为法的产生而服务,都在为法律的出现和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立法者造法与司法者造法

既然法律可以被创造而来,那么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也就有了其存在和分析的基础。回顾世界法律发展史,有权造法的主体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及其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等具体情况而各有差异。一般认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体现为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等形式。从造法主体角度出发究其本质,不同法律渊源是由不同造法主体以各自的方式创造而来。就现行法律而言,最主要的两种造法主体即立法者与司法者。立法者,通常也就是立法机关,其造

收稿日期:2022-12-03

作者简介:闫璟(1995—),女,陕西延安人,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民商法。

制的法律被称为制定法,通常是由一国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所制定的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而司法者造法则通常是指司法机关以遵循先例原则为基础,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根据以往对具体案件的判决经验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概括归纳出的规则或原则,其所制造的法律被称为判例法。

如前所述,造法主要包括立法者造法和司法者造法两部分,在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是否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这一问题上可能存在不一样的声音。立法者造法和司法者造法的主体不同,是两种主体在不同程序下的产物。比较法在立法方面当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有声音认为其不可与造法功能混为一谈。所谓的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应仅指比较法在司法者造法这一方面所展现的积极作用。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目光较为狭隘,尽管立法者造法和司法者造法的主体及其程序确实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创造和发展法律的过程,共同为法律的制造发挥积极作用,是同属于一个大范畴下的两个不同面。

1. 立法者造法

比较法之造法功能在立法方面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源远流长,早在法学理论的研究应用之前,比较法就已先在实践中展现出其对法律建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中在立法者造法也即立法方面尤为突出。^[2]⁴⁷古罗马法的重大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方各国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古罗马法作为其法律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共同源泉,可以说古罗马法不仅对欧洲大陆法律体系的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甚至在世界法律的发展前进史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近代社会,比较法同样在立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19世纪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地设立了比较法相关组织,其目的是在利用比较方法对学术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国立法的观察分析,在本国立法时提供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总结。例如,1881年瑞士《民法典》对于一般人格权侵害的救济方式提出了精神抚慰金的观点,而这一规定被德国借鉴并纳入其《民法典》之中以解决相关问题。^[3]再如,以我国为例,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国法律渊源的主要形式为成文法,因此比较法学研究在立法方面对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几乎各个部门法领域的立法都经过了比较法研究的学习和选择。例如,1983年在对《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进行审议时,其中有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主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这意味着实施行政处罚的是国家机关

故其不应成为被告,当事人不能就此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后来在查阅美国、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后,发现在他们的相关法规和实践中当事人可以就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向法院起诉,于是后来出台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便在采纳外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规定该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开启了“民告官”制度的发生发展。^[4]

2. 司法者造法

比较法之造法功能在司法者造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深刻的,其以一种更为灵活、更具现实意义的形式出现,以司法者实则也就是实践中的法官进行法律的制造,形成英美法系国家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即判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法院的主要职能是进行裁决,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实践中法院确实还履行着法律修订和调整的职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发挥的造法功能对法律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是否存在法官造法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只有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才可造法,法官没有创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的权限。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大陆法系国家以国家立法机关作为造法主体,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的立法权已经开始逐渐得到认可。在笔者看来,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两大法系彼此渗透,英美法系国家愈发关注成文法的重要性,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出现判例法。诚然,大陆法系从根本意义上还不存在与英美法系一样完整、可行、高效的判例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判例法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国法律在近现代发展中同时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但总的来说我国归属于大陆法系并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就比较法的造法功能而言,其在立法者造法方面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而言更鲜明。但随着判例法在大陆法系愈发展现出其重要性,而我们在这个领域又缺乏经验,故造法功能的法官造法方面在我国的适用和发展等相关领域的问题亟待深入分析研究,值得我们展开讨论。

二、法官造法的国际对比观察

(一)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其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作为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判例法是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通过类比推理的方法,从已经发生的同类案件判决上归纳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或原则。其中,遵循先例原则作为英美法系最为核心的基础

性原则,一方面要求法官要向过去看即分析过去的先例和决定,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官需要将目光向前展望即注重新的案件实际情况。从而在发扬判例法灵活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法官的随意性,以求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公平正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可以将判例分为有约束力和有说服力的两种类型,对于有约束力的判例,无论法官是否持有不同观点都必须遵守;而对于有说服力的判例,法官则可以仅用作参考。

近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英美法系国家渐渐开始注重制定法的力量,并在不同领域颁布出台相关成文法,立法机关开始突出其在造法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人质疑英美法系国家惯用的判例法的地位开始被动摇,其实在现今发展阶段,这种质疑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制定法的出现是为了适应不断革新发展的国际社会新情况,其与判例法共同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保障作用,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其次,事实上许多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定法从其内容本质来看,是对之前已经形成的判例法的系统化汇编,其体现的依旧是判例法精神。因此,尽管制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重要性的提升不可忽视,但英美法系国家依旧以判例法为其最核心、最基础的传统法律渊源。

(二)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只有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才有造法的权限,其颁发的成文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正式渊源。当然,判例也一直实际存在于大陆法系,但传统观点认为其是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并且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权开始受到重视,在司法审判中法官裁量权自由度的逐步增加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20世纪以后,法官造法开始在大陆法系国家发挥作用。以法国为例,除了法国《民法典》的颁布与适用,在司法的过程中法官根据其实实践经验对该法典作出诸多补充和解释,共同规范协调相关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在德国,对于《民法典》无法解决或没有涉及的情况,判例也开始发挥补充替代的作用来规范相关问题。与此同时,将案例汇编成册,集中体现各地区、各级别法院处理案件的方式方法和经验习惯,从而对法律规范起到辅助作用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参考,这种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已较为普遍。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造法确实已经在现实层面存在,并且其可行性和合理性逐渐得到认可。尽管如此,大陆法系仍然以成文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法

在大陆法系仅有辅助性的地位和作用。^{[2]177}并且,大陆法系缺乏英美法系对判例法形成和适用的成熟体系,还需要长远的理论完善和实践付诸。

(三)中国大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情况

在中国,我们奉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人民拥有立法权,但立法权的具体落实并非由个人直接完成而是由各级人民代表代为行使。与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尽管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法官造法这个问题争议不断,但在实践层面法官造法确实已经出现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在现实层面的法官造法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即司法解释和判例制度。

1.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通常是指,由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法律规范的适用等相关问题所作出的指导和解释,司法解释根据其作出的司法机关不同而拥有不同强度的效力。近现代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但当时只是在实践中有相关工作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系统的文件对司法解释制度作以规范。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正式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打开大门,随后在一系列相关法规、决议的出台下,司法解释制度在我国被逐步完善,成为我国法官造法的主要形式之一。

比较法在司法解释制度的建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不乏对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形成和适用经验的借鉴和学习。究其本质,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法规适用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这种逻辑与英美法系从先例中归纳出一般性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判例法精神。司法解释制度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运作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其填补法律漏洞和清晰法律模糊部分的作用。成文法必然有其优势,比如具备确定性、逻辑性、清晰性和统一性等特点。但其同时也存在劣势,其一便是法典化的法律规范容易出现不全面、言辞模糊的情况,而司法解释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之方。

2. 判例制度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我国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法,但在现实层面存在类似制度的运行,即判例制度。我国判例制度在实践中一般不被直接叫做判例,而是被称为案例,包括参考案例、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等类型,其以被公布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判例就已经逐渐成为法院总结

经验、辅助法律适用的重要方式,但我国判例制度的真正建立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典型案例的刊登才开始正式得到发展。尽管这些案例在我国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普遍约束力。但就我国法院运作体系来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通常情况下下级法院并不会轻易违反上级法院所作出的判例。在这种模式下,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拘束力的。也就是说,通常这些公布的案例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判决对后续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故其实质上发挥着先例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如果说司法解释的内在逻辑体现着判例法精神,那么我国判例制度则是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非常相似,是比较法研究基础上对判例法核心要义的学习和移植。我国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共同为填补法律漏洞、清晰法律模糊和协调法律矛盾起着积极作用。

三、比较法造法功能在我国的积极发挥

(一)完善立法者造法体系

比较法造法功能在立法方面所展现出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国际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手段让比较法研究的可行性和效率不断提升。我们应当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在贯彻我国现有立法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比较法在立法者造法方面的积极作用。

加快立法步伐,改善无法可依的法律空白领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形态不断革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亟待解决。比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其已经从单纯的信息承载和通信工具转变成了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多功能工具。^{[5]43}网络法的制定已然展现出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应包括“网络法律关系的确认”“网络及其系统本身的建设、维护、运行、管理等活动和行为的规范”“网络环境中各个平台上的各种活动和行为的规范”以及“与网络及其系统有关的其他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5]44}再如,娱乐产业近年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使其相关产业涉及的收益额度之大、活动类型之广、法律关系之复杂等问题日益显现,专门针对娱乐产业进行系统性规范的娱乐法之创制需要提上日程。

此外,注重立法质量,革新现有立法中不完善的部分。不能片面地只追求出台法律规范,同时也应当注重其质量与可实施度的问题。除了对本国人民群众意志的了解和对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事物受规制情况的调查以外,还可以通过比较法研究对其他

国家、地区相关领域的法规政策和实践效果加以分析观察,从而出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法律规范。

同时,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应对现有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德国、美国等立法体制相对更成熟的国家为研究对象,提炼其成功经验,同时从我国本土实际情况出发,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立法程序法,解决现行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如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立法主体较多、监督不力等诸多问题。

(二)建立司法者造法机制

法官造法在我国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在现实层面我国已存在相关的制度,但法官造法在我国并没有真正拥有一个完善的、高效的运作体系。作为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造法在我国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其影响力远不如成文法。可以说,在法官造法方面,我国在理论和实践经验上都比较匮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在法官造法方面将会展现出更大的积极作用。毕竟在我们对这个领域还属于“新人”的时候,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拥有完善成熟的判例法体系,其成功经验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对象。

首先,清晰法官造法的目的和范围。不论是为了填补法律漏洞,还是解释法律模糊之处,抑或是解决法律冲突,开始法官造法之前,其目的清晰是首要重点。为什么要造法、在该种情况下可否造法、在该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造法、此处造法的价值指引何在,这都是需要贯彻的问题。避免出现法官滥用造法权限或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造法权的情况出现,从法官造法的开端就进行引导和规制。

其次,明确法官造法的主体。随着法官造法在实践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其愈发关系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安稳,故有必要对法官造法的主体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毕竟,实践中的法官业务能力和法律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出于对公平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必要对法官造法的主体进行多层次的权限划分。

再次,规范判例制度。在我国,判例制度一般以案例指导的方式出现,判例制度的规范对我国法官造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我国的判例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首要问题是法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法律轻案例”的情况,其次是只顾编写却忽略运用所导致的“写得多用得少”的问题,最后是原则比技术更重要的思想倾向等。故而,指导性案例的运用率并不高,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如何参考指导案例的具体方式方法也缺乏技术层面的认知。因此,应当完善我国的判例制度,也即规范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和监督确有必要。一方面,通过司法改革

推动指导案例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并设立专门的专家委员会解决相关问题,从制度和规范的角度出发保障判例制度的运行;另一方面,大力发挥公众力量,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其中相关领域学者的讨论和社会舆论的加入尤为重要,丰富指导性案例的发现源泉,从更贴合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提升判例制度的运作效率与质量。

最后,加强监督制度。法官造法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放大,为了避免腐败,权力制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环节。在法官造法的过程中,如果法官不能本着公平正义去创制法律,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超过不公正的裁判,甚至可能危害社会秩序和法律尊严。因此,在完善法官造法相关制度的过程中,也有必要设置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从而制约其权力,保证法官造法在监督之下发挥其积极一面的效力。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官造法工作的监督职责,保证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进行有效监督,同时督促作为专门的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承担起对同级或下级人民法院法官造法工作的监督责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且意义重大的,随着网络通信的快速发展,现今我们有条件对法官造法进行监督。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发表言论,及时提供建议,正向的社会舆论不仅可以对法官造法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官造法的质量。

四、总结

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增强,全球化已然成为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世界两大

法系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愈发呈现出互相融合的发展特点,英美法系越来越关注制定法的重要性,大陆法系也开始出现判例法。而比较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都起着重要作用。就比较法的造法功能而言,其包括立法者造法和司法者造法两个方面。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应当在持续发扬比较法造法功能在我国立法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法官造法方面比较法所能带给我们的推动作用,多角度、多层次促进我国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比较法的视野下,我们要把握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国的优势,在关注本土实际情况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从而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助力我国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 [1] 罗斯科·庞德. 普通法的精神[M]. 唐前宏, 廖湘文, 高雪原,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106.
- [2] 高祥. 比较法学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 [3] K·茨威格特, H·克茨. 比较法总论[M]. 潘汉典, 米健, 高鸿钧, 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28.
- [4] 王萌, 彭训文. 改革与立法的故事[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12-24(5).
- [5] 刘承魁. “互联网+法律”的机遇与挑战[J]. 中国律师, 2016(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Law – Making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YAN Jing

(College of Comparative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Beijing)

Abstract: Among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comparative law, the function of law making, as one of its most prominent and significant functions,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egal systems in law making. The legislator – made law preferred by civil law countries and the judiciary – made law preferred by common law countries occupy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However, in today’s increasingly fierc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most countries’ economy in the world are closely linked, and the two legal systems also show a development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gradual convergence.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riginal law making mode of our country and make the judiciary – made law b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successfully in China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worthy of our in – depth discussion. Thus, the law making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aw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law; law making function; legislator; judiciary

基因编辑行为对宪法的挑战及宪法规制

张宇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崛起为人类健康、医学进步、社会发展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逐步突破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及法律、法规对基因编辑行为及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后果并未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基因编辑行为对宪法的基本自由与秩序价值带来挑战,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冲突。我国目前存在对基因编辑行为核心价值理念和新型基因权利保护的缺位、立法层次较低等问题。对此,我国应树立起人的尊严为宪法核心理念,专门立法,提高立法层次,强调基因权利保护入宪,从而规范基因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基因编辑;宪法;人的尊严;基因权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0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58-05

2018年11月26日,某高校贺建奎副教授宣布一对经过基因(CCR5)修改天然抵抗艾滋病毒 HIV 的双胞胎女婴在中国平安诞生,2019年12月30日,该“基因编辑婴儿”案落下帷幕,以贺建奎为首的实验主要负责人被判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万元。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波,在引起国内外对该事件热烈讨论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基因编辑行为的法律思考。

当今时代是生命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生命科技大放异彩。基因编辑技术,又被称之为基因组工程。该技术能够让人类对目标基因点对点进行特定的“编辑”,从而实现对DNA片段的修饰。基因编辑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至今,历经三代发展,形成被生物学界和医学界称为“魔术剪刀”的CRISPR/Cas9技术,这使得“上帝之手”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词语在现实中得以映现。根据被编辑细胞的不同,基因编辑可以分为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由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具有遗传性,其意义重大,若被大规模滥用,这样的“试管核武器”将会危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我国法律目前尚未对基因编辑技术作出严密的规定,以贺建奎团队为典型的基因编辑行为挑

战了宪法的威严,反映出我国基因编辑专门法的缺位,目前为止与基因编辑有关的监管措施尚不到位。

一、基因编辑行为对宪法的挑战

(一)对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挑战

自由与秩序是宪法的基本价值。人类并非单纯的个体,而是具有群居动物共同体的属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类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对安全、实现自我价值等方面的需求。人类对于国家根本规范的需求体现在宪法的基本价值当中,自由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自由是公民权利的完美体现,因此自由是宪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保障自由,无秩序将会使得个人自由受到能力的限制。在统一的秩序之下,个人自由得到充分行使而不受他人的任意干涉。因此,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相互依存,彼此均衡,构成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忽视其中一方将会使得宪法正义难以得到实现。

基因编辑行为违反了公民自由的宪法基本价值。通过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公民的权利是公民自由的具体体现。人类的生命可以追溯到基因,没有了基因人类也就失去了生命^[1],因此公民生而便对基因享有天然的权利,公民基因不受他人随意侵害的权利便

收稿日期:2022-11-28

作者简介:张宇(1996—),女,河南汝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在此范围之内。基因,储存着人类的隐私以及海量遗传特征,由于人身与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基因便可定位到确定的人类个体,因此对基因的编辑为那些想通过高新生命技术手段来改变自身或他人基因的人们提供了条件。贺建奎团队募集的8对夫妇便是基于自己的意愿,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胚胎基因,虽然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这种随意改造子女基因的行为侵犯了子女个体对于自由的权利。对胚胎基因一旦进行编辑,将会发生无法逆转的后果,其遗传物质会跟随被编辑个体一生。因此,基因编辑的行为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对宪法自由价值的挑战。

基因编辑行为违反了国家秩序的宪法基本价值。秩序作为自由的保障,国家秩序遭受破坏,公民自由将得不到充分行使。一方面,国家秩序涉及国家安全的维护、国际事务的处理等;另一方面,国家秩序也体现为社会的安定,各行各业具体的规范。基因编辑技术是对人类自然繁殖孕育生命飞跃式突破,世界对这项高新技术都保持着积极研究的态度,发达国家对人类基因资源进行积极的管理,在此基础之上企图掌握更多种类的生物基因资源。因此,基因编辑技术在促进国家科技发展的同时,这项“试管核武器”技术可能沦为个别发达国家实行“基因殖民主义”的工具,破坏国家安全。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对于治疗遗传性疾病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与此同时,对于生殖细胞基因进行编辑的任意滥用,也有可能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基因分化阶级、基因歧视等不安定现象也会日渐显现出来,社会的稳定性难以得到维护。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基因编辑的行为要进行严格的审批程序,而贺建奎团队在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之时却存在伪造伦理审查文件、刻意规避行政规章等违法行为,扰乱了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秩序,进而破坏了国家秩序这一基本宪法价值。

(二) 对人权保障原则与法治原则的挑战

人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公民将自身的权利让渡出来由国家代为行使,国家负责保障公民的权利得以实现。^[1]2004年,我国宪法正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同时还专门设立章节对公民的基本人权进行翔实的规定。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均是重要的权利,如人格尊严权、生命权、健康权、平等权等。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行为以及所带来的后果从基因层面开始就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权、生命权和平等权。首先,贺建奎团队进行的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的属性,威胁了人的主体地位,侵犯了公民

的人格尊严权利,与宪法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其次,研究表明,贺建奎团队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尚不成熟,具有较高的医学安全风险,该团队在此情况下展开基因编辑实验不仅仅违反了医学伦理,也是置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于不顾。最后,该团队实验中所诞生的天然抵抗艾滋病毒HIV双胞胎女婴,因其特殊的基因序列是否会被社会所接纳等问题仍是未知,由此衍生出来的基因歧视等问题是对公民平等权的侵犯。因此,基因编辑行为违反了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原则。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原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体现在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基因编辑技术要遵循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国家对人的权利的保障体现在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两个方面。形式意义上的法治要求国家明确规定出详细具体的人的权利,从科学立法的角度保障人的权利。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要求国家不仅有明确的关于人的权利的规定,还要在今后实践过程中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贯彻落实人的权利,使人权切实得到保障。因此,在当今社会中法治应当满足良法善治的要求:首先,国家应当遵循宪法制定出一部符合宪法正义的法,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与前提;其次,在实践中对该法严格执行并自觉遵守。目前我国对于基因科技并未制定专门法,在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案之前,我国有相关行政规章对涉及人体的基因医学实验进行相关的规定。《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要求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应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伦理,不得侵害他人的权益。该案件不仅侵犯了参与实验的8对夫妇以及胚胎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医学伦理,同时也违反了行政规章的相关规定,从形式和实质上违背了宪法的法治原则。

(三) 对宪法基本权利的挑战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一方面,人体基因编辑技术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冲击。人体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传统生命概念赋予了新的思考内涵。人在何时具备了生命?众所周知,人类自然孕育后代的过程是精卵结合发育为受精卵在母体子宫内着床发育成胎儿成功分娩的过程,以往从顺利降生的婴儿开始赋予人生命的权利,而通过生殖技术手段孕育后代、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下的胚胎等是否具有生命成了焦点。有学者认为受精卵是人成长的不同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都是同一个主体^[2],在此

基础上无论是受精卵还是胚胎,都具备发展成严格意义上具备生命权的人的可能性,都应当享有生命权,受到生命权的保护。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贸然进行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是对于生命权的蔑视与侵犯。另一方面,公民享有平等权。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讲究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使得人类基因发生改变,“基因编辑婴儿”案中降生的双胞胎女婴势必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被动地成为检测对象,其生命权与人格尊严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因此基因编辑技术是对形式意义上平等的侵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强调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强调事实上的平等。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当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变基因缺陷造就完美人生时,势必会导致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被广泛应用,基因经过编辑所诞生的人比未经过编辑的自然人有天然的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基因歧视从而导致新的不平等,基因编辑技术显然也是对实质意义上平等的侵犯。

二、我国在基因编辑行为方面的立法检视

1993年《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出台,我国开始进行基因科技法律规制建设。随后又陆续出台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等十几部与基因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范人工生殖的应用。2002年,原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出台《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为我国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了一份伦理指导框架。2003年又颁布《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规定我国基因治疗仅适用于体细胞,不得在人体上开展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但没有说明是否可以进行临床前基因治疗动物实验。2015年颁布《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用于规制干细胞的科学研究。2016年出台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确固定了伦理委员会的职权。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要求生物研究要符合伦理规范,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中进行临床应用。2020年1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条对非法行医罪进行补充,其中增加了与基因编辑相关的规定。2021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8条、1009条则从侧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行为设定了禁止性的规定。

(一) 人性尊严核心理念的缺位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格尊严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但并不能将人格尊严视为我国宪法上的最高价值。

首先,根据康德的论述,人性尊严的核心即认为人本身是目的,不应沦落为客体,也并非手段与工具。人性尊严具有主体性与独特性。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生命科技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这对人本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带来巨大的挑战,人性尊严的内涵将被重新定义。在基因科技发展中人变得更加客体化,赋予人性尊严主观权利性格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基因编辑婴儿”案中,胚胎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但当人们共同承认胚胎与人一样具有不被侮辱的权利时,胚胎就像有了人性尊严,便可解决基因编辑引发的伦理、法律争议。因此,人性尊严的内涵不仅具有传统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还应强调其主观权利。其次,在基因编辑的情形下,作为毫无争议的“人”的主体范围也会随之发生扩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可能受到基因科技的干预,在此情形下,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人”从而衍生出不一样的法律问题。若人的主体范围固定不变,那么在与基因科技有关的情形中,人的主体地位会受到质疑,人性尊严荡然无存,本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将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在基因编辑技术中,胚胎也应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人性尊严主体地位,分阶段进行保护,而非将胚胎是否为人作为争议焦点,这样更具有现实意义。

人的尊严是现代国家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也是现代宪政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基因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加凸显了人性尊严价值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3]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案件中,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隐私权等各项基本权利的侵犯,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各项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应当从人的尊严那里寻求依据。法律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需要人的尊严作为支持基础,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规范无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

(二) 宪法依据与新兴权利保护的缺位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尊重并保障人权,公民享有自由与权利。但未对基因科技有明确具体的规制条文,这意味着宪法对于公民涉及基因科技相关研究的保护依据是缺失的。例如,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中当然地包括了生育的自由与权利。根据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原则,自然孕育后代的自由与权利、利用生殖科技手段孕育后代的自由与权利均属于生育的自由与权利。由于现行宪法对于基因科技的相关权利保护的缺失,通过生殖技术享有的生育权是否符合宪法所保护的生育权尚不明确。^[4]其次,无论是宪法还是我国涉及基因科技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

基因科技相关的新型权利的保护是笼统的、模糊的。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人的基本权利有着明确的规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等,这些不足以应对新兴基因科技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与基因科技相关的新型权利主要包括:知情同意权、隐私权等,但规定都比较简略。如《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8条规定,进行与人胚胎干细胞相关实验研究时,应秉持知情同意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保护受试者的隐私。随着现代基因科技的迅速发展,基因编辑技术、基因检测技术、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多项热点技术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4],从方方面面深入影响人们生活,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新型权利如基因数据权利、基因隐私权利、基因专利权利等,进而产生复杂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我国,许多新型权益处于争议状态,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规定涉及不多,或者完全处于空白,极不利于对公民相关权益的充分保障与实现。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新型基因权利,将基因权利赋予公民享有,同时规定对应的国家义务,充分应对基因科技所带来的难题。

(三)基因编辑行为的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涉及基因编辑技术的法规将近几十部,多属于法规、规章,法律层次较低,法律效力等级也不高,提高基因科技法律位阶迫在眉睫。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从宏观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作出规范,该法对具有针对性的特殊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基因编辑技术作为新型的生命科技,其操作难度之大,技术风险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若采用上述法律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规制恐难达到真正的规制效果。胚胎干细胞研究是目前基因研究的热点,对于克隆技术而言,治疗性克隆被法律所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其所涉及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较少。而生殖性克隆却被法律明令禁止,也是伦理与法律争论的焦点,因此仅仅以一部《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规章来调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针对基因工程活动进行规制,适用于一切与基因工程有关的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属于基因工程活动,但由于该办法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因此无法满足基因编辑技术飞速发展的现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仅对基因编辑技术过程中涉及遗传资源的部分进行规制与保护,范围过于狭窄。^[5]

综上所述,我国基因科技正在迅速发展,而相应的立法却远远落后,仅部门规章可以规制,大部分法律法规并非可以直接采用,直接规制基因编辑技术行为的法律法规更是无处可寻。因此,需要提高立法层次,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专门立法从而达到对

该技术进行规范的目的。

三、我国基因编辑行为宪法规制构思

(一)明确人性尊严为核心价值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格尊严是人主体地位的凸显,具有主体性和独特性,同时基因科技又赋予其主观权利的性质。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权利和自由,科研自由虽无宪法明文规定,但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了科学研究自由。科研的自由是通过科研秩序来予以保障的。基因编辑科技的发展,在给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对人性尊严发起了挑战,我们首当其冲要考虑处理好基因科研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应当形成将人性尊严作为宪法核心价值的共识。只有将人性尊严的尊重与保护上升为宪法义务,才能充分反映出人性尊严作为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目前我国宪法中人格尊严条款并未被作为宪法核心价值,不利于对人格尊严权利以及其他各项权利的行使与保护。我国宪法应当增设保护人性尊严的原则,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尊严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护,国家、社会 and 他人不得随意侵犯。当科研自由与人权发生冲突时,从人性尊严出发寻求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新型基因权利入宪

面对人体基因科技迅速发展的冲击,宪法中所列举的诸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隐私权等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许多权利在宪法中并无明确的依据,与基本权利的冲突使得人体基因科技相关的科学研究处于被动局面。如在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时,胚胎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成为受试群体?胚胎提供者的利益应该如何进行保护?胚胎是否具有人格尊严?宪法中应当明确增加与基因科技相关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促进社会的稳定,更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完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一方面,在宪法中再次强调对已有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等;另一方面,在宪法中合理增设新型基因权利如基因数据权、基因隐私权、基因专利权、身世完整权、知情同意权等,并对其内涵、主体、功能、保护、限制等方面作出规定并给予一定的解释空间,以此扩展法学对人体基因科技规制视野,回应人体基因科技发展需要。

(三)制定基因科技专门法

1993年我国出台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与基因有关的立法。随后我国又陆续出台了几十部涉及基因科技规制的法律法规。以基因科技为代表的新兴生命科学研究在我国已经进入快车道,崛起之迅速已然得到世界的广泛

认可。然而这背后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行为的规制、义务的规定、权益的保护等亟需专门的立法加以规范。目前我国已颁行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在涉及人体基因科技研究等方面虽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基因科技研究之发展,对人所涉及的基因权益保障之规定较为模糊,且该法未将动植物、食品与人体基因科技的研究分而论之,人体基因科技的法律规制未有系统且全面的规定。基因科技的发展与人类基因权利的保护并不是完全对立关系,立法应从二者间如何平衡出发,在充分保障人体健康需求的同时追求基因科技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然而,我国在基因科技立法中,更加倾向于关注生物安全,对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欠缺,没有制定单独的基因科技立法,也没有相应的专项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如前所述,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依然对宪法所追求与保护的人的尊严、生命健康权益、信息隐私权益等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因此,无论是从平衡促进基因科技良性发展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角度,还是从科技法律本身维护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目标,制定出一部人类基因科技基本法规定总纲性原则是亟需的。在此基础上,再陆续出台专门调节基因科技具体领域的单项人体基因科技法,如《基因检测法》《基因科技法》等。其他部门法也应作出响应:由于基因编辑技术“上帝之手”般的存在,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沦为如贺建奎等人非法行医、制造基因武器等犯罪的工具,严重侵犯人们的法益,同时也给国家、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在刑法中应对人体基因科技进行预防性质的规定,如增设与基因科技有关的罪名,规定处罚方式等;如前所述,人体基因科技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新型基因权利,除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以外,民法应当增设

基因权利,与宪法相呼应,在民事范围内对基因权利加以保障;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一案中,经过“合法”审批的伦理程序被证实系伪造,揭示出伦理审查监管程序未能取得实效。因此,在行政法方面,应制定严格的行政审批规章、条例来对人体基因科技进行规制与指导。

四、结语

“基因编辑婴儿”案落下了帷幕,该实验的主要负责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案件的讨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散,但是该案件中已降生的双胞胎婴儿及发育好的胚胎依然存在,基因编辑技术对宪法的冲击依然存在,技术背后所衍生出的新型法益仍需要得到保护。因此,要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核心宪法价值,以此为基础制定基因科技专门法,提高立法层次,明确新型基因权利,为基因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权益的保护树立起坚强屏障。

参考文献:

- [1] 牟瑞瑾,石佳佳,张允佳.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与宪法的冲突[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5(1):83-88.
- [2] 朱振.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25(4):167-184.
- [3] 沈秀芹.基因科技对人性尊严的挑战及宪法应对[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6-21.
- [4] 汪丽青.人类辅助生殖私法调整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8-19.
- [5] 沈秀芹.论我国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的构建[J].东岳论丛,2012,33(2):163-16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Challenge and Regulation of Gene Editing

ZHANG Yu

(law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rise of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has brought benefits to human health, medical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gradually breaks through the bottom line of ethics and law. In China's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not made specific and clear provisions on gene editing behavior and a series of derived consequences. Gene editing brings the challenge to the basic freedom and order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lso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lso conflicts with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At present, China is struggling with a lack of fundamental values, new genetic rights, and its weak legislating class.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a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Constitution, create specialized legislation,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class, emphasize the protection of genetic rights into the Constitution,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tic technology.

Key words: gene editing;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human dignity; genetic rights

从孤独的作者到狂欢的公众

——评《版权战争：跨越大西洋三个世纪的争斗》

张永坤, 蔡斐

(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 重庆 401120)

摘要:自18世纪以来,作者优先还是受众优先这两种知识产权观点之间的基本争议持续存在,并在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讨论热潮。《版权战争:跨越大西洋三个世纪的争斗》一书正是对这一争议的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中版权斗争的内容变化,可以知所从来,厘清权利内涵,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版权体系的版图构建;通过分析版权斗争背后的利益冲突以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策略,可以明其理念,更加深刻地阐明不同版权观点中所蕴含的政治判断。析版权之机理,明争斗之本质,正是本书对正确认识版权观点争议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版权战争;作者权利;公共利益;意识形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1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63-06

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当今时代已经成为信息高速传播的信息化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受到这一技术进步的深刻影响。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更充分的利用,这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版权纠纷。近年来,无论是文字作品、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等文化产业内容,还是数字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等知识资源的获取领域均产生过引发公众热议的版权争议事件,一次次将版权问题引入社会公众关注的视野之中。实际上,版权争端并不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事物,而是一场已经持续了近三个世纪的权利斗争史。由于版权制度是在西方法哲学理念中发展壮大,而中国是从清末才开始进行相应的法律移植^[1],因此要想深入了解版权的理念及制度变迁,就必然要在西方过去的法权斗争过程中进行探寻。这正是《版权战争:跨越大西洋三个世纪的争斗》一书中所详细梳理并深入论证的内容。本书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纽约大学全球

杰出教授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译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志刚。作者通过全面分析时代背景,引述众多案例事件,旁征博引理论学说,详细描述了18世纪以来英美世界以及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版权发展过程,并且深入剖析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斗争,可谓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从而为理解当今版权和国际贸易斗争提供了一份翔实且深刻的指南,堪称版权问题领域的“资治通鉴”。

一、叙事逻辑与问题意识

本书包含导论、结论部分在内共有十个章节的内容,总体上采用以时间为主线的行文结构。作者将18世纪以来英美世界以及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版权发展过程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18世纪版权制度的共同开端阶段,19世纪版权和作者权的分离阶段,世纪之交欧洲版权从财产转变到人格的大陆漂移阶段,精神权利在法西斯欧洲的诞生阶段,战后作者权利的崛起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书商

收稿日期:2022-08-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媒介融合中的版权理论与应用研究”(2019ZD331)

作者简介:张永坤(1996—),男,山东日照人,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版权法等。蔡斐(1982—),男,江苏东台人,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法、新闻史等。

复仇阶段以及新千年的数字公众兴起阶段。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这一过程的划分是非常细致的,而对其中每一个时期版权斗争的概括性判断,体现出作者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斗争背景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首先,在导论部分,作者通过引述主张作者精神权利的四个案例,引出版权斗争的核心争议亦即知识产权的基本困境——“智慧作品既是创作者的财产也是社会文化的遗产,如何解决这个固有的紧张局势?”^{[2]5}并进一步形象地将这一争议具化为“作者、受众以及传播者之间的‘三人舞’关系”,将争议的制度目标概括为“在奖励作者保持生产力和让受众参与文化活动之间找到平衡”。同时,作者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出版权斗争史发展的两个趋势特点:一是作者和版权所有人对其知识财产的所有权大大扩张,知识产权和其他非实体产权已经成为现代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二是虽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各国态度存在差异,欧洲大陆作者权利体系比英美版权更加坚持强调作者对其作品的知识产权控制。本书的问题意识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详细追问,即探究“知识产权拥有者是如

何在过去三个世纪大大加强自己权利的”以及“作者的作品主张权利以及受众要求获取文化遗产权利的跨大西洋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作者权利的不断扩大正是在跨大西洋的不同制度间的不断角力与相互妥协之中实现的,具体表现为作者、受众以及传播者之间的利益角逐。在引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后,作者对英美版权和欧洲作者权之争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介绍,并从意识形态与基本假设的冲突以及法律和法学中的表达差异等方面对两者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详见表1)。在释明了版权之争的基本历史主线和主要内容差异后,作者又通过引述诸多的案例,重点探讨了精神权利思想和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并指出了两种权利体系的差异在于每种制度所捍卫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一种是艺术品质和作者真实意图,另一种是公共启蒙运动和民主准入。相应地,公共利益的界定也就存在着两种目标导向:是忠实地坚持作者的愿景以产生高质量的文化,还是追求成本低廉通用性强的多样化文化。这些对差异比较和核心问题的探讨无疑是读者接下来跟随作者游历这一版权斗争之历史长廊的重要参考信息和指南。

表1 英美版权与欧洲作者权的差异比较

内容制度	英美版权	欧洲作者权	
意识形态与基本假设	1. 社会价值观	公共启蒙和民主准入	
	2. 传播倾向	鼓励创新、促进传播	
	3. 保护对象侧重	公共利益	通过保护作者权利间接保护公共利益
	4. 制度目标	扩张公共领域	培育优质文化
	5. 理论渊源	功利主义	自然权利理论
法律与法学表达	1. 保护期限	较短	长期
	2. 保护手续	作品自动属于公共领域	作品为私人财产自动保护
	3. 权力让与	转让后作者与作品分离	作品不与创作者彻底分离
	4. 合同	较自由	允许转让的细节规定较多
	5. 作者身份和雇佣作品	公司实体、赞助实体	血肉创造者、实际作者
	6. 作者专有权例外	更加广泛	相对吝啬
	7. 强制许可	采用较早	违反了作者专有权原则
	8. 独创性(反差不显著)	“额头流汗”理论、最低限度创意水平	作者自己的知识创造
9. 精神权利	作用较小、偶然出现	保护作者人格的重要权利	

二、两种制度的共同开端与分离转变

18世纪从皇家特权到文学产权这一演变是版权制度的共同开端。针对这一时期的版权制度发展情况,作者从立法实践以及理论渊源两个层面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分析说明。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版权法的两个要点为:一是通过授予所有权刺激作者提高生产力,二是确保迅速和有效地将作品转移到公共领域。这两个立法要点正是各国版权制度初步发展阶段所体现的共同目标,亦即不同制度间所具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一共同意识形态来源于当时各

国普遍存在的出版商和作者主张自然权利以对抗皇家特权的历史实践。作者在分析这一历史实践时不仅阐明了不同身份主体即书商与作者之间的权利来源差异,也进一步沿着这一事实差异所对应的理论需要展开了脉络梳理。针对文学财产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三个贯穿三个世纪以来版权战争的根本争议问题,分别为:①文学财产是否具有某种自然和内在的东西,②文学财产是否可以像不动产权利一样要求永久的权利或广泛的保护,③文学财产是不是一种取决于社会对作者的应得判断的暂时垄断。这正

是对文学财产的法理依据和请求权基础及权能的追问。从18世纪开始,在英美版权的功利主义渊源这一理论指导下,先是产生了著名的立法成果《安妮法》。对于《安妮法》在美国的进一步影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所有形式的财产,特别是文学,都是人为的社会创造,而不是绝对的自然主张,这是美国的财产观。在法国社会中,所有者构成了社会的支柱。在德国,康德冒着超越时代的风险,预示了后来被称为归属权和完整权的精神权利的到来——作者被承认为创造者并拥有控制作品变化的权利。

19世纪版权和作者权开始产生分离。这一分离之路的开端是作品财产与传统财产的内在矛盾的逐渐显露,即作品不能完全让与的这一事实。在英国,麦考利与塔尔福德之间产生了关于版权期限的长短以及文学作品权利来源的辩论。这是反对欧洲作者权利最大化的体现。而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提出了基于人格而非财产的作者权利新观点。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版权讨论则更为激烈,高举促进科学发展与公众启蒙的意识形态大旗,以“窃书为雅”的姿态公然成为国际社会的版权盗贼。本书作者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考查分析,既指出了这一版权选择对于培育美国新公民的作用,也指出了这一模式带来的弊端:既让美国成为文明世界的文学社会公敌,也使得美国民族性格难以真正独立,以及当美国成为文化出口国时遭遇盗版却难以维权而被迫自食苦果。通过介绍法国、德国公众事业的支持者和改革者的理论争鸣及实践尝试情况,作者从欧洲的回应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两种版权模式在公众生活中的各自利弊。贯穿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世纪之交的变化是欧洲版权从财产到人格权的转变。在作者权利扩大的同时,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作为平衡作者控制、保护公众的技术也开始出现了。

三、精神权利的崛起之路

在20世纪,精神权利这一版权和作者权利之间分歧的顶点才出现。精神权利产生于德国法律理论和法国判例法:在理论层面,作者指出了法国二元论和德国一元论的区别,分析了精神权利概念的提出过程;在实践层面,作者考查了一系列代表性的精神权利诉讼案件。随着欧洲大陆作者权利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伯尔尼联盟开始广泛倡导这一传统。作者细致地分析了德、法、英、美各国对于伯尔尼联盟的态度以及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这一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展示了联盟内部作家权利与版权之间的斗争情况。

在作者看来,将某些事情追溯到信誉不佳的政权并不一定会削弱其固有的品质,对精神权利在德国纳粹时期的历史也应当予以考查。这体现了作者在回顾梳理版权斗争史时所采取的中立性、严谨性与完整性的研究原则。对这一时期的考查不仅有利于全面把握版权斗争的历史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全面认识纳粹的意识形态。以更集体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精神权利是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作者肯定了法西斯主义政权在受众利益扩张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一调和理念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冲突。纳粹政权各时期不同的政治需要导致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中存在着精英主义、美学、贵族主义的原则与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冲突。作者进一步考查了法西斯主义在文学领域、音乐领域、电影领域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得出如下结论: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发明精神权利,而只是其发展的催化剂,其中的平衡作者主张和受众需要的关注对战后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结论正是作者对于“国际上这种首次的精神权利表达方式可能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这一吹嘘极权主义论调的有力反驳。

在精神权利的具体内容层面,作者通过一系列案例探讨了披露权、归属权、完整权和撤销权这四个主要精神权利的内容,并考查了与之相关的版权保护期限、继承权利以及正式手续的相关争论与变迁。在完成了对精神权利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和权能内容剖析后,作者从权利内容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对精神权利在版权演变史中的历史意义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在权利内容维度,作者指出精神权利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并且构成了对自然权利的超越。精神以人格权为基础,以审美控制为核心功能,与市场逻辑相悖。从版权的整体视角来看,这是对过去将作品视为文学财产观点的重要补充,它有助于解决作品如何既能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可转让的这一核心矛盾。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作品表达了作者个性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一事实既不能被财产权所涵盖,又不具有可转移性,因此必然需要一个新的权能来与传统的财产权划出界线,以此使版权的不同内容能够分别承载作者个性与财产属性。因此精神权利并不是作品不可转移的原因,而是其解决之道。在意识形态维度,20世纪80年代与伯尔尼的和解迫使英语国家将版权对公众的传统关注转移到作者及其受让人身上。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是被迫但深刻的,它使得版权的哲学基础从成文法向自然权利转变。

四、数字革命与知识产权全球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内容的创造、复制和传播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引发了诸多新的合法性问题。首先,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复制和传播环节。拷贝的作品现在变得与原版无法区分,边际成本下降到零。其次,在内容的创造环节,数字化的技术可能性则与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假设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意味着数字化可以成为作品创造的手段,因此作品所承载的作者独创性因素在降低,而作为社会和时代产物的集体创造因素在提高。这一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无疑是对作者精神权利的釜底抽薪。那么是应该顺应技术的发展直接放弃精神权利还是要防止技术对精神权利的侵蚀而相应地加强立法保护,这一问题就是作者权利的新一轮斗争之中的核心问题,贯穿于数字革命和知识产权全球化的交织互动过程之中,包含了不同层面的斗争历史。首先,从微观视角来看,对精神权利的争夺不再仅仅是对财神的反抗,它现在也加入了孤独、单一作者的创造性视野,以及新的本质上是合作的独特的数字精英写作。本书作者在此敏锐地发现,数字技术在内容的创作环节对作者群体产生了创作方式上的分化。作者群体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目标一致的共同行动群体,这相较于过去无疑增加了版权斗争的复杂程度。其次,从中观视角即作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层面来看,尽管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使得三者之间的角色界限有所模糊,但总体而言三者间利益诉求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立场差异。除了在争取法律保护上的博弈之外,各方也将对技术的支持和运用纳入了斗争范围。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各方利益群体的划分更加细化,权力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最后,从宏观视角来看,这一场跨大西洋的战争,是版权和作者权利之间长期斗争的又一次重复。知识产权全球化的趋势是这一层面斗争的集中体现。硅谷的计算机和软件行业、电子工业产业与好莱坞的电影、音乐产业以及研究机构和消费者等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结果,决定了美国对版权制度具体内容的偏好。因此,数字时代的知识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的立场又决定于国内不同行业和群体之间的利益角逐,亦即本书作者所称的“加州内战”。作者将欧洲大陆在数字时代的这一立场总结为增强作者的财产权、保护知识和艺术创造力等一系列主张。至此,数字化的技术发展给版权斗争所带来的核心问题已经十分明了,即精神权利是否符合现代文化趋势?正是因为

作者权利的这一争议存在,版权可能比作者权利更适合数字、企业、合作文化产品。在考查了数字革命带来的新一轮的版权斗争形势后,作者对于斗争局面进行了富有洞见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作者和传播者在美国和欧盟赢得的胜利是大陆意识形态的胜利,但这一胜利主要是理论上的,而其在实践中的权益则可能已经被挖空了,因为实际上通过网络连接的快速二进制数据流执行财产权十分困难。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版权的法律保护与技术保护存在了脱节,甚至立法目标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已经背道而驰了。

五、数字公众的兴起与版权精神的重塑

在数字时代,版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与数字技术自身发展方向的背道而驰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是公众参与度。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互联网下载的普及,不仅成为公众直接获取知识资源的武器,而且还使公众群体自身成为数字时代直接的文化生产力。这就使得公众在知识产权立法中不再只是被安排的弱势角色,而是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参与者,因此,以对作者权利保护为核心的大陆意识形态下的立法目的必然是不合时宜的。版权强化了人为的稀缺,为作者创造价值,但公众渴望廉价、便捷的访问。而数字技术恰恰又能够实现公众的廉价与便捷访问。在美国,数字无政府主义者、图书管理员、研究人员、法律教授和硅谷巨头都是强版权保护的抵制者;在欧洲,盗版党成为一种潜入政治的亚文化,他们是数字化、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化的流氓资产阶级,美学上的先锋派、都市派和贵族派。即使是坚持捍卫大陆意识形态的法国也认为,现代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挑战,作者权利是社会给予的一部分。可见在数字技术的赋能背景下,公共利益在以后的版权立法中必然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2004年谷歌提出了通过数字化世界图书从而在现代规模上重新创建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一计划,由此所引发的各国争议是新一轮的版权斗争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在摧枯拉朽的技术变革面前,欧洲政府当局与内容产业结盟以共同保护作者权利也无异于冲向风车的堂吉珂德,充其量只能阻挡谷歌一家独大,迫使其放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数字化的雄心,而对于数字化技术本身的发展浪潮则是无力抵抗的。公众的文化需要与数字技术的拥抱使得公众利益从一个被保护者变成了一个不同国家间文化影响力的竞争市场,这使得公众在版权斗争中掌握了以往不曾有过的主动权和积极性。

与之相应地,在知识产权治理中也应当更加重视传播的作用,对作品价值的理解不能再只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同时也要充分考量传播因素对作品价值的影响。

在梳理完上述持续了三个世纪的版权斗争进程后,本书作者在结论部分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总结分析。伯尔尼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精神权利和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财产形式,而这一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已经开始瓦解。当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公众利益在版权斗争中的话语权较之以往有了极大的提升时,版权体系就再次面临着激烈的争论与博弈,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回归其基本原则可能会引导我们通过数字革命的浅滩。^{[2]410} 版权和作者权利的改革遵循着法律体系自身的完善逻辑,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故而,作者对此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层层剖析。

为此,作者探讨了跨大西洋文化对抗中的两种版权制度的差异原因,即版权和作者权利的争议体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议程。作者的这一探讨实际上是以一种饼状图的方式展示出了大西洋两岸版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力量对比,而在这个饼状图里面每一股政治力量又是由具体的行动者组成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在这场斗争中,不是理由的力量,而是对立势力的权力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3] 这体现在版权斗争中,就是作者、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三人舞”。从版权斗争的具体行动者的层面能够更加直观地分析这一斗争过程中的各方力量的博弈轨迹。

虽然过去的跨大西洋文化对抗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差异在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知识产权规制的全球化背景下有所缓和,但版权和作者权之间的对抗仍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远远超出了狭隘的技术范畴。作者既注意到了版权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其适用过程中存在内部发展,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制度改革也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中立的技术调整,并且深刻地指出,左翼和右翼的分裂并不是其意识形态差异的终点,而是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比。本书甚至对这一结论在传统财产这一更大的主题中进行了更加彻底的追根溯源,论证了欧洲大陆和英美法律传统在各自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影响与体现。

最后,本书作者将研究视角回归于作者和财产,提出了两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赞助时代,因此应当区分商业营销内容以及大学及研究机构生产的内容。^{[2]428} 其中的区分关键在于文化或

者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公众是否已经支付了创造这一内容所需的成本。对于商业营销内容而言,由于这部分内容的生产主体是在经济市场上通过经营活动进行逐利的主体,遵循的是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因此由其所产出的内容也应当是属于该主体的私有财产;而对于大学及公立研究机构而言,其研究项目和课题往往都是由政府进行拨款或补贴的,而这部分资金正是来自社会公众的纳税,因此这一类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社会公有属性(当然这并不妨碍研究者享有其作为作者的精神权利)。

本书作者关于版权财产属性的观点为:财产是一种临时的、由社会创造的权利,受当时立法者决定的束缚。他认为知识产权不是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这表明了本书作者在版权理念上所秉持的是坚定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并且,他进一步深刻地指出:“虽然是用法律术语表述,但法律决定的是一种政治判断,最终的关键问题是政治与意识形态。”^{[2]429} 这是作者对版权斗争本质的深刻洞见。

六、结语

本书作者已经指出,版权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子集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按照法律制度适用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正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言,法之规则体系必须是“开放”且“可变”的,是一个永远不能圆满完成而一再被质疑的体系,才能清楚指出法秩序“内在的理性”、其主导性的价值及原则。^[4] 然而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才是解释制度合理性的深层次原因。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文化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获取环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塑和分化了作者、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诉求,改变了不同主体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与作品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已不再完全是一个闭门造车、匠心独运的孤独的文化创造者,知识的开放性和易获取性使得作者更容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雕刻文明的金字塔,而纳税人的资金支持也使得研究者的工作并不是脱离于社会公众而存在的。作品价值部分地来源于广泛的传播也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共识,而受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作品内容的诠释者,“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交互式创作使得作者与公众作为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沿着数字技术的信息高速路,文化和知识从作者的藏书阁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and 每一个网络端口的连接处,并在这里继续演变出新的内容。观察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我们会发现,

群体力量在迅速增长。^[5]作者已然不再孤独,而公众开始迎来狂欢。然而科学技术本身没有伦理道德,而对其如何运用则涉及权利义务的分配,因此必然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考量去思考数字时代究竟应当重塑什么样的版权精神。这就需要结合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再次探讨作者的权利界限以及公众的利益范围,思考社会应当培育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什么样的公众。科技的发展促使新通信技术在混合媒体中迅速传播并重塑了政治环境。^[6]在合理表达公众利益的同时也要谨防版权制度中渗入乃至助长数字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要避免新的数字一代对于剽窃行为的道德麻木。我们需要跟同质性带来的破坏性副作用斗争,借助更好的连通性来改善集体智慧和生产率,而不是让社会更加分裂。^[7]

在知识产权治理全球化的层面,本书所揭示出来的版权斗争历史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价值。在过去,虽然盗版是美、英、法、德、日、韩等国家走向经济成熟的必经之路,然而随着美国从文化进口国向出口国转变,美国就成了知识产权的坚定捍卫者。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规则的不断完善的确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个客观的游戏规则需要,对于后发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确实让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盗版发展之路的捷径,或者至少让这一条路没有那么好走了,似乎这存在着先后顺序上的不公平,但这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发展差异。然而如果像美国这类利益既得者打着知识产权保护

的幌子大行文化霸权主义,则就是利用优势地位制造更加不平等的知识产权贸易条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应当加以抵制的。故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也唯有在顺应时代浪潮的前提下不断追赶差距,并为更加公平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规则和环境而进行斗争。

参考文献:

- [1] 夏扬. 法律移植、法律工具主义与制度异化:以近代著作权立法为背景[J]. 政法论坛,2013(4):176.
- [2] [美]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 版权战争:跨越大西洋三个世纪的争斗[M]. 王志刚,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5-429.
- [3] [德]鲁道夫·冯·耶林. 为权利而斗争[M]. 郑永流,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
- [4] [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0.
- [5]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赵志卓,译.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5.
- [6] 高奇琦,张鹏. 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5.
- [7] [美]马修·杰克逊. 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M]. 余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4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From Lonely Authors to the Carnival Public: Comment on *The Copyright Wars: Three Centuries of Trans – Atlantic Battle*

ZHANG Yongkun, CAI Fei

(Rule – of – law New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basic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view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uthor priority or audience priority, has continued to exist, and has triggered a new upsurge of discuss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pyright Wars: Three Centuries of Trans – Atlantic Battle* 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 – depth discussion of this controversy. By sorting out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the copyright struggl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e can understand this evolution process,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rights, and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layout of the current copyright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ategies behind the copyright struggle, we can clarify its ideas and more profoundly clarify the political judgments contained in different copyright views.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copyright and the nature of dispute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is book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pute over copyright.

Key words: trans – Atlantic battle; author right; public interest; ideology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路径

钱东晓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同是民族向心力和国家凝聚力的力量之源,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前者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血脉,后者是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在坚定中国式道路的过程中,在新时代国家政治安全建设中,二者的相融相济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要在历史回望与经验总结中秉持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在二者的辩证融合中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实际难题,探索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安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2

中图分类号:G122;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69-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必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脉,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依托。

一、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起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核心构架

(一)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贯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始终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探索前进的百年历程中,巧妙地将意识形态的建设与优秀文化相融合,以优秀文化引领意识形态的建设。在深植民族灵魂根基,赓续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史,能够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各时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运用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意识形态话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获得显著成效与丰富经验。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基因与历史文化积淀,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保障国家繁荣和民族延续的内生动力,始终是凝聚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与传承,强调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在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传统与时代、历史与现实、民心与党心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我们党历来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源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时代,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诉求和战略要求,我们党总结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百年经验,遵循科学性、创新性原则,思考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提升文化自信的战略要求,也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要求。党的十

收稿日期:2022-10-2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项目(2022-XXJH-340);校级项目“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创新”(2022MKS008)

作者简介:钱东晓(1994—),男,河南郑州人,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

九届五中全会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2]作为目标导向,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同时,把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运用于新时代的“中国之治”,锻造国家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二)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基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努力做到不割断历史,“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毛泽东总结了继承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的重要性,充分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从优秀文化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渊源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思想,借鉴“合纵连横”的统一战线思想等,都是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智慧结晶。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巧妙地将革命战争中的意识形态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意识形态建设,开创性地将文化建设的人民性与政治性相连接,广泛地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强调人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独特价值。毛泽东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1944)上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党在边区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4]101},要求创新发展革命文化,始终把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目标指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历史文化的价值创新,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战略方针,开发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守正创新的内在特性;推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有意识地培育民族精神,引导各族人民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毛泽东强调,“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4]109-110},在经济困境面前,正确地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倡导在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滋养。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团结人民搞建设、汇聚民心传精神的重要法宝。

(三)围绕优秀传统文化调谐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多种问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对优秀传统文化中反映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内容进行发挥,赋予其新

的话语特征。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很多话语,都是对传统文化地再表达:“革新”来源“革故鼎新”的典故;“小康”源于“民亦劳止,汙可小康”的诉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和开放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是优秀文化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要求和体现。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历史底蕴,对内革除旧体制建立新制度反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弊革新的自觉性;对外交流与合作是世界发展大势,是国家发展需要,也与中华民族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分不开。

同样的情形和道理,在我们国家“一国两制”国策上,再一次得到验证。“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源自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是“和”“合”核心理念的最好诠释。“一国两制”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要求,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政策的提出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统一的伟大胜利。

正是有了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积极进取、兼容并包”精神的心理基础,改革开放才能被全体中国人民所接纳并走向成功;正是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的群众基础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基础和力量源泉。借由优秀传统文化所供给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带来了让世人惊羡的“两大奇迹”。

二、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价值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生命力,把中华气魄和中华风格与时代精神融合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中。

“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优秀传统文化是使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5]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文化自信,都更加重视民族精神的价值追求,更加强调血脉与“基因”的哺育和滋养,更加注重转化和创新的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6]无论是在治国理政还是对外交往中,习近平总书记都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运用,在极大地提高了文化实力的同时,使中华民族文明和谐的伟大形象在全世界范围深入人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人民是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人民也是革命事业的

目的,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优秀传统文化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是广泛的群众基础凝聚了民心,凝聚了民力。由此可见,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定要把握人民性的主题,创新运用好文化这张牌,把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作为重要突破口。

(一)为建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涵育文化沃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重视优秀文化的应用与创新,始终强调在新时代要重视优秀文化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作用,重视优秀文化对抵御各种敌对思潮影响的独特价值,倡导通过优秀文化引导舆论方向,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创设充满优秀文化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的良好社会氛围,掌舵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保证社会主流思想占据舆论主阵地。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相融性,造就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普遍的社会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是庇佑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肥沃土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提供了新境遇。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基石,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被重视。于此,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时代价值得到科学的和智慧的发挥,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世界的青睐。在新时代,我们党更加强调,要把人民性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出发点,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强调要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坚持以民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实际工作中;提倡认知和运用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其“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并将这些思想精华运用到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科学地传承文化基因,以优秀传统文化广泛的群众基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时代策略。

在意识形态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深挖优秀文化引领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和主题,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优势,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育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沃土:在国内凝聚人民力量,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弘扬;在国际上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一方面,随着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一些地区贫富差距扩大、有些

领域利益分配不均、某些官员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等,影响着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外,打破平均主义等体制机制改革,必然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些矛盾不及时解决就很容易被激化。

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借助于各种媒介以各种方式传播复杂信息的网络文化,为西方的“话语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严重干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腐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冲击,小部分人群中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另外,生活和工作节奏加速,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社会心理疏导的需求增加,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环境,需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成为起到“定海神针”的稳定作用,成为庇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金色盾牌。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国人以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首先,从政治信仰安全角度来看,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武装人们的理想信念,唤起人们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爱党和爱国的统一,达到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塑造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从而保障政治信仰安全,最终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其次,从公民道德角度来看,社会道德水准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舆论、社会风气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道德水准的起伏,而优秀传统文化富含提升道德品质的精神内容。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运用,不仅能够培育国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又能促成社会舆论与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进而提升国家的道德安全。最后,意识形态建设反过来有助于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这不仅为国家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也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利用,必然会丰富国民的理想信念,提升认同感,同时增强国民的道德意识,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准,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以坚决抵制错误思潮。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最为稳定的基石和后盾。

(二)为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构筑国家文化发展的根基

进入新时代,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遭遇更加困难的国际环境。事实上,早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建设遭遇重大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趁势自我鼓吹,打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在事实上的失败,更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打击社会主义的口实。一时间,“社会主义灭亡论”甚嚣尘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粉墨登场、潮流汹涌,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环境遭受严重危机。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呼唤坚强有力的话语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就充满理性自觉和文化自信,堪当支撑话语建设的大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民依靠高度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凝聚起磅礴伟力,在民族复兴伟业的道路上韬光养晦、团结奋进,用扎实的“内功”抗击西方文化的渗透。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文化信仰是抵御敌对思潮渗透的金色盾牌,筑牢思想防线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生命线。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要求我们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形象为世界人民所认可,中国文化为世界人民谋福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给世界人民实质性帮助的同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智慧;“一带一路”、“亚投行”、各类区域合作组织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世界人民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磅礴精神伟力。新冠疫情期间,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极其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向世界人民施以援手,显示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中国人民用自身实力和奉献精神逐步树立起国家的形象和威望,显示出东方文明古国在新时代的伟大胸襟和坚韧品格,显示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不断提升和强化了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三)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精神信仰的文化认同

优秀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三个方面的价值体系相容、内容交合、功能同向,三者可以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这是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行性的根本原因。人们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意识形态之根。^[8]

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支撑作用。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以优秀文化为底蕴,能够有效地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使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接地气;能够有助于吸收文化精华,融进时代精神,助力文化自

信升华为文化自觉,使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有底气。这种自觉性表现在文化赓续中,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思想主导地位一脉相承,不曾断层,具有极强的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的顽强生命力。这种自觉性使得优秀文化融入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接中国人民精神信仰的桥梁和枢纽的同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与目标指向就具有了明确的人民性,意识形态建设就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优秀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正是价值转化和内容创新的过程,这不仅能够夯实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能广泛而扎实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者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助力打造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和价值认同。

从相互融合的核心内容看,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三者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人民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思想向导和灵魂;是指导体系和支撑,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十四个坚持”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有重要位置,关系着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文化强国提供了厚重基础。从国家层面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社会主义美好风尚的沃土和根源;从社会层面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条件下民族精神的升华、社会风气的保障;从个人层面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是个人行为最高准则和个人精神风貌的价值追求。从中国梦的目标实现来看,其路径和实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想和信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升华,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中国梦”的提出正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从《诗经》的“小康梦”,到《道德经》的“圣人梦”,再到《礼记》的“大同梦”,到不同时代仁人志士们的“富强梦”“天国梦”“宪政梦”“共和梦”等,无不贯穿着团结奋斗的主题。新时代的“中国梦”,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又集成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奋斗目标。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优秀传统文化统一于国人“四个自信”的筑造中,统一于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

三、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践进路

(一)方向引领:以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

首先,始终坚定党的领导是根本原则。我们党

正确运用优秀文化的同时,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9]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仅是永葆主流意识形态青春活力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同时,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因此,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中,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为引领,始终坚定党的领导。与此同时,曾有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借用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思想,兜售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也曾有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极少数人在错误社会思潮面前卑躬屈膝。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加强引导有效监管,发挥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作用。

其次,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多次发表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在治国理政中善于运用文化典故,亲民而平易,丰富而厚重。于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传统文化在融入意识形态话语的进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行政到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了更为科学的价值导向与方法路径,各地方政府在制定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和保障策略的过程中,有了更为明确的、更为统一的原则遵循。这不仅推动了系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也助力文化自信的全面提升。唤起国人礼敬、凝聚中国力量,让文化传统焕发崭新生命力的同时,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另一方面,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过程中,要考虑广大人民的需要,并注意保持灵活思维、批判思维,传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品格,既赓续精神命脉又赋予时代新意,吸取其精华的同时提升其价值,从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新时代的实践证明,灵活性地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优秀文化的创新转化,能够很好地促进了中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永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

最后,可以借鉴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用的原则和方法。包括因材施教原则、启发诱导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等教育教学的原则体系,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同样适用。包括榜样法、实践法、理论法、咨询法等教育教学的方法体系,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同样

有效。把准优秀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与方法,追求隐性方法而尽量减少显性方法、多重实效而避免形式主义。过多的形式化会让人生厌,产生抵触心理,要认识到好东西并不需要过度的推销。显性方法常常不经过宣传教育者的缜密设计而直接呈现,因此,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往往缺乏足够的需求感,容易产生疲劳。打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影响的合力作用,优秀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国家政策的优化设计,需要各种舆论传媒的共同努力。只有早日实现优秀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的多种途径的合力作用,教育效果才能持久,融入效果才能真正地提高。

(二)经验借鉴:以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助推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借鉴各国的文化传承成功经验十分重要。

西方社会在运用历史文化助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美国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梅尔文·德弗勒的“文化规范论”、斯图尔德等人的文化生态论、法国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日本柳田国男的“方言圆圈论”等,从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文化传承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倡导运用文化成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虽然研究者来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东西方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各国的文化传播理论彰显各国的国家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关联性,揭示了文化发展与国家政治建设的一般性规律,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其中,文化资本论(Cultural Capital)强调文化积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本。以关系主义为视角来分析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资本”,把文化与人的后期发展联系起来,体现出文化关怀与追求,把文化的积累作为进步的基础。文化模因论(Cultural Gene)指出了“文化基因”也是“民族基因”,把“模因”作为文化信息的最小单位,对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承进行分析,剖析影响文化信息发展中的模因复制的主要因素,主张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环境建设入手,对社会意识进行舆论宣传和价值引导。另外,还有学者借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文化生态论,把生态学方法引入文化研究,倡导在动态的交流互动中维护人类文化的完整性。

在国外借助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意识形态安全网的实践中,因时因地地进行文化创新是意识形态建

设的成功密码。例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两国在儒家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中,将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互融合,致力于民族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统一;借助文化基因打造意识形态安全网,将文化创新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目标,构建国家文化发展顶层设计。从《国民教育宪章》到《创意韩国》再到《内容韩国蓝图21》,韩国国家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文化立国”战略表达得淋漓尽致。日本借助《教育敕语》和《文化产业振兴法》《设立文化地区特别法》,加上教育部门的“知识财富大纲”,以“新文化立国”完成国家文化产业机构体系的整合,把国家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体现在政治和文化长期的政策规划中,进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系统而稳定地服务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

由此可见,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在借鉴和批判中,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提取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来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进而实现文化创新与政治生态优化的融合,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国力和民心的功能价值,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提高国内和国际的话语权。

(三)战略保障:以顶层设计擘画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蓝图

党和国家始终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为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相互融合、良性循环的精神文明建设大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能否切实以顶层设计为依托,扎实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信仰,关乎对民族性格的呵护,也是培育健康民族心理的需要。在我们党开创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大好局面下,我们不再喊口号,而是以国家制度、国家法律的形式进行科学规划和保障设计,并由各级各类国家机构开展组织与贯彻实施。具体而言,要结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建立我国创新文化的长效机制,逐步设立专门的法制体系、运行体制、保障机构和评价反馈体系,把文化建设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潮,打造完整的服务于文化发展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同时,要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普及规划,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教育机制,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等宣传媒介等社会教育手段的纳入。按照党和国家擘画的文化强国的宏图伟略稳步前行,形成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的重要战略保障。

其次,在贯彻与落实制度规划的过程中,促进新时代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协同发展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问题。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全党全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也是促进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的逻辑前提。^[10]文化来源于生活,贴近生活,设计和思考文化融入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要贴近人民生活,优秀文化要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大众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是使普通民众没有障碍地接受优秀文化的有效路径,也是借由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广大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的重要策略。一方面,要创新运用中华传统节日,开拓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深度挖掘有益的文化价值,运用新时代赋予的新鲜含义形成新的节日习俗,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不同地方的行政部门要积极开发本地的企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等,让优秀传统文化散发魅力的同时,为意识形态建设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在对外交流中,也要主动出击,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同时扩展文化传播渠道,推动中医、书法、民乐、国画、戏曲、武术、烹饪等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彰显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

最后,以文化实用性功效助力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不断提升。发挥优秀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先进理论与生产实践辩证关系的有机统一,也是优秀文化实用性功效的重要体现。实践表明,文化创新完全可以实现“越界融合”,即推动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部门中各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的同时,“为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提供价值导向”^[11],包括旅游业、现代农业甚至电信和金融业等。放大文化产业在城市化进程和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功效,以现代价值导向加强文化产业对全社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通过发挥优秀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运用国家强大的调控功能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生态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向嫁接,并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国家管理的大文化,是国家进步的大艺术,是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0-11-4(00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8.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5.
 [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1-22.
 [8]赵剑英.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7):72-77.
 [9]王永贵.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5.
 [10]杨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4(003).
 [11]刘开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21(00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QIAN Dongxi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are both the source of national centripetal force and national cohesion, and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The former is the enduring spiritual blood,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unswerving political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steadying the Chinese – style road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leading power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is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uphold the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In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alist ideology; national security

(上接第 43 页)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DEMATEL – ISM Pilot Free Trade Zone

YANG Xue, YAO Yujia, SONG Aifeng*, PAN Langx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openness in free trade zone (FTZ)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are crucial to the deepening of openness in FTZ.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actual interviews, the text identifies 28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in FTZ by Delphi method; and select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in FTZ by DEMATEL – ISM, then divides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he help of explanatory structural model to construct a multi – layer recursiv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in FTZ.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of FTZ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lex action of direct factors, intermediate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ynergy and agglome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financial facilitation are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of FTZ.

Key words: free trade zone; industrial open development; DEMATEL – ISM

试析媒介赋权于具体社会事件的在场

——以“陈春秀事件”为例

王啟泽^{1,3}, 陈 燕²

(1.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3. 西安市半朵文化馆 文艺创作研究室, 陕西 西安 710016)

摘要: 新媒介技术的兴起和渗透, 不仅给赋权理论带来新的研究热潮和拓展空间, 也让媒介赋权理论在具体研究中获得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和更深厚的理论基础。新媒介生态下, 权力关系是变动的, “为弱者的传播”随时可能转变为“弱者的传播”, “弱者”自身的属性在传播和赋权的过程中受到关注, 赋权的基础、对象、路径也处于更新的过程中, 需要对其进行新的讨论与研究。文章以2020年高考前夕在网络上迅速升温发酵并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陈春秀事件”为案例, 试图对新媒介生态下媒介赋权的实际生成路径进行分析讨论, 理解媒介赋权在具体社会事件中的在场, 为大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和权力部门的监管与引导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关键词: 媒介赋权; “陈春秀事件”; 权力关系; 在场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3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3)01-0076-07

深圳大学丁未教授提示我们: 赋权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性假设, 它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涉及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关于过程和结果的研究, 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1]“媒介赋权”理论虽以媒介为载体, 引入了媒介的观点和研究方法, 但仍属赋权理论之一端, 在进行相关研究时, 我们同样需注意该理论的社会实践基础, 把握理论与所涉及具体事件、人物的密切关联。本文选取的“陈春秀事件”, 是一个由媒介使用问题诱发, 经媒介途径受到广泛关注, 在媒介环境下完整展现了失权者得到赋权之全过程的典型事件。2020年5月, 高中毕业十六年, 经历过打工、餐厅服务员生活, 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又重拾大学梦的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人陈春秀, 在参加完成人高考,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自己的学籍信息时, 发现“自己”已经取得了高考当年所报考的山东理工大学的

专科学位。次月, 关于“陈春秀事件”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使其成为轰动全国, 并被多家国外官方媒体关注的社会事件。在令该事件逐渐演变为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影响力强的重大事件的诸多因素中, 媒介赋权始终在发挥着隐形推手的作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事件发展走向, 影响政府决策。

广义的媒介, 泛指为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产生关系提供条件的所有物质形态。在对媒介的范围进行划定时, 众多学者都关注到媒介概念的交互性、连接性。传播学上, 媒介指所有能够用以存储和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传播学对媒介的研究基于人的社会活动, 在真实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展开, 由于具有差异性的国情, 各国学者的具体研究视角也不尽相同, 其中麦克卢汉和施拉姆的观点为我国学者熟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分别把人这一媒介研究主

收稿日期: 2022-11-20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陕西乡村直播带货的营销类型与传播模式研究”(2021M014);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舆情引导”(2016M006)

作者简介: 王啟泽(1993—), 陕西汉中人, 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安市半朵文化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与媒介; 陈燕(1978—), 女, 陕西汉中人,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大众传媒与区域发展。

体的感受性放大,强调媒介承载的内容本身,让媒介研究跳出对具体媒介之物质形态的过度关注,为媒介理论拓宽了道路。在施拉姆看来,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2]¹⁴⁴,这是他在界定了广义的媒介范围之后,为具体研究中的媒介概念再界定提供一种方法,也是他对媒介在传播中具有的特殊“扩大权”“选择权”“传递权”的发现。关于媒介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拥有什么样的赋权主体性,为什么样的对象赋权,以及如何实现赋权,我们能够从“陈春秀事件”中得见一斑。

一、媒介何权之有:信息的占有与选择

在处于知识鸿沟两端的主体仍有极大的认识差异,以及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被拉大的状况下,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因其对多种社会信息的充分占有,对信息报道、事件呈现的独立选择,而对社会现实产生重要影响。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对大众传播的性质有这样的概括:“大众传播就是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递大批量的信息的过程,如果说人际传播属于点对点的传播,那么大众传播就属于点对面的传播。”^[3]¹⁶⁵大众传播媒介由于其极大的传播范围,极广的受众群体,极高的传播效率,以及在对信息的占有与选择的基础上,会因向失权者提供媒介关注、舆论关注、维权途径等实际帮助,和对社会权力占有部门、事件相关人物的具体信息拥有近乎无限的知情权、获得解释权,而产生了赋权的可能。

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处于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对媒介赋权过程的考察中我们不能忽略对权力与人、权力与权力的关系的探讨。对权力关系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媒介赋权之权力何来问题,为其后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系型权力的获得

“关系型权力”由福柯首先提出,他认为权力是去中心化、去疆域化的,以网状的节点式存在,如毛细血管般存在于社会的细枝末节之中。在理性接受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黄月琴教授也对网络赋权中权力关系的移动问题有以下看法:“网络赋权的核心问题是关系型‘权力’对社会结构的解构作用及其影响。从‘权力转移’层面看,网络赋权是一个伴随着权力改造和再分配的过程,它打破了赋权作为一种行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由强到弱的阶级性,激发出一种关系特征,它不仅是一种由他者被动赋予到自我主动获取的能动性力量,而且能够形成一种把各种微小力量聚合起来的能力。”^[4]这里提到的网络赋权属于媒介赋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其理论阐述过

程不仅点出了以“陈春秀事件”为代表通过自我能动性力量而获得关系型权力的社会事件的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媒介赋权的在场及其影响。

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媒介赋权之所以“有权可赋”且具体赋权事实能够被广泛认可,首先在于其所赋之权是失权者本身合理拥有、合法占有、合情维护的。失权者在失权的情况下要求获得相应权利,在维权过程中借助媒介手段,这于失权者本人而言合情合理,于期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国家权力机关而言也在保护和鼓励的范围之中。在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赋权由于处在相对中立的位置而具有交互性、连接性,在相应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关系型的权力。

其次,媒介赋权所拥有的权力还来源于媒介对社会力量的聚集与放大作用。作为客观实在的媒介本身无法实现对社会力量的聚集或放大,只有当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在媒介的影响下将自己占有的信息、力量、权利等投向媒介赋权,使之服务于失权者的维权行为,媒介赋权的这种聚集与放大功能才能实现。在此过程中,以网状节点式存在的社会权力被连接,原本并没有指向性的信息、社会力量被聚集,失权者的状况被关注,社会关注度、权力监管、媒介空间等社会资源集中涌向焦点事件,从而产生“媒介赋权”的社会现象与现实效果。

关注正在发生的陈春秀事件(就事件本身而言)的大众通过媒介手段参与到事件进程中时,他们虽然不是原事件相关人,但却成为推动该案例发展为典型事件的参与主体,具有了在场性。复旦大学邓建国教授在研究中将“在场”概念区分为“强调技术逼真度的‘媒介在场’(media presence)和依赖身体和空间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5]。在“陈春秀事件”中,大众以“社会在场”的身份彰显了媒介的在场,反映了媒介赋权的存在,也体现了媒介对社会力量的聚集与放大在赋权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权力关系不对等所产生的“权力势能”倾斜是权力监管部门努力避免的现象,然而权力监管的实施生效需要一定的周期,权力纠偏效率未必总是能够满足高度关注相应社会事件的广大社会群体的反馈期待。此时,无论是权力使用机关还是权力监管部门都需要通过媒介这一便捷、高效的途径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为民众的期待提供导向,以保证事件发展的态势与方向处于可控范围中,以维系相对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情感期待,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媒介赋权最直接的权力来源仍是国家

权力机关与权力监管部门对社会事件发展趋势的调控,对社会整体和谐的维护,以及从中体现的对特定权力的下放或回收,对有关规约的强令或宽宥。

福柯指出,权力的中心点“应该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直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6]¹⁹⁷。这里谈及的权力的“汇聚点”特征,正是关系型权力所表现出的聚集与放大的特点,体现了媒介赋权对特定事件信息的占有与选择所带来的特殊权力,也成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能够依循的一条路径。

(二) 互动性的赋权模式

北京大学师曾志教授强调:“新媒介赋权的今天,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不占有主导地位的组织和人,有了获得权力、权威、机会、资源的可能。”^[7]¹²新媒介时代的公民参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大众与社会之间的权力互动,媒介赋权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转移任务。“在新媒介赋权视阈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国家—弱社会)将发生改变,并且将会协同演进”^[4],按照黄月琴教授的解读,这种演进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互动性赋权。互动性赋权是媒介研究学者认识到社会群体或民众在媒介活动中对国家的权力运行带来的主动影响,经过理论探究得到的新提法。虽然媒介本身只是一种起中介作用的载体,一种传播手段,一定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的存在,但其以对广大受众注意力的占有而对事件信息拥有极大甚至无限的知情权,以及由于具有选择、加工、评价社会事件,并进行传播的权力,具有对受众的直接影响。能够对权力进行监督,对社会风气进行引导的新媒介环境,具有横跨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效果。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个人与媒介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新媒介环境在与广泛社会领域的互动中,获得了属于权力机构和公民个人的社会权力。

对信息的极大占有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新媒介形态处于一定程度上由其自身创设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呈现出无孔不入的状态。在对“陈春秀事件”的早期报道中,小型的、地方性的、自媒体化的媒体形态在发挥作用。我们注意到陈春秀本人的媒介使用经验并不丰富,以至于她在参加完高考16年后才首次通过网络查询自己的学籍信息。维权过程要求个人与一系列的社会机构,亦即与社会本身进行互动。维权之初陈春秀并没有求助媒体,在她看来自己被侵权的事件清晰明了,能

够很快被查实。实际情况在2020年6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关于陈春秀事件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的通报”中有所反映,关于录取通知书被冒领、学籍档案的伪造、户籍的造假、入学资格的审查、参加工作的资格审核,以及招办、派出所的工作程序等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失权与失职等问题。这些反映出处心积虑的阴谋、猖獗的权钱交易的恶劣人际互动在媒介赋权的直视下被揭露和惩处,体现了媒介赋权之在场对于具体社会事件的透明、公正、高效处理具有的独特意义。

由新媒介生态与媒介赋权环境影响的多维度、多领域、透明化、公开化的互动模式,能够为失权者的维权增加成功概率,推动“为弱者的传播”向“弱者的传播”转换,对权力的运行产生良好的互动监督,推进权力关系的和谐发展。无论是作为互动的手段,还是在利益的表达与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新媒介生态下具体社会事件的社会化、事件化都伴随着媒介赋权的在场,这是新的媒介环境中人际沟通、信息交流、舆论关注、管理监督在互动方式上发生深刻改变的结果,也是由媒介塑造的媒介使用者主动参与并创造的新型互动方式。互动性的赋权模式和关系型的权力获得共同构成了媒介赋权的可能,这在“陈春秀事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崭露无遗。为了解媒介赋权于该事件中持续在场的深层原因,我们还需要对被赋权者的身份和作为加以关照。

二、媒介赋权于谁:陈春秀的身份与反抗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媒介赋权所赋权者是失权者。失权的“弱者”只要处在追求公正的社会中,就会获得一种被赋权的趋势。媒介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有权可赋者”,由于其中立的、交互性、连接性的特征在帮助失权者维权、复权的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权力的协调更高效、更公开、更透明,因而表现出对失权者复权,对侵权者曝光的“赋权”效果。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仅满足“失权者”这一身份的社会个体并不足以成为媒介赋权的对象。就本文讨论的“陈春秀事件”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媒介赋权的对象至少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被赋权者需要有面对大众传播的准备,以及对媒介中立性、公正性的信心。按照福柯对社会关系与权力的理解,“弱者”是权力关系不对称不平衡的产物,但“弱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具体的情境和具体的关系中发生变动,从而突破当前处于被支配、从属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文化地位。^[8]笔者以为,让“弱者”能最终实现对“被支配”

“从属性”地位的突破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敢于接受大众传播多层面、多角度的报道,相信媒介的中立性、正义性,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能够为自己的维权行为负责到底的“弱者”。

与这样自信的弱者相对应的,是“炒作式求助”中不自信的弱者。从相关研究中我们认识到,“炒作式求助”这种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现象,是体制性救助不足或失败、社会救助缺失时,个体为求得生存发展、保障自己基本权利的一种异常态反应,媒体系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社交媒体交错的系统)往往成为关键的信息传播渠道及为个体“赋权”的媒介。这种不自信的“弱者”通过各种出位行为、自我陈述凸显自己,使之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通过媒体的采访报道、交互传播使自己求助的故事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激发道德认同,从而获得实际社会救助。^[9]对于“炒作式求助”中的弱者,虽然媒介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赋权”,但这种“赋权”只能局限在小范围、低关注度、单一层面、时效短暂的情景中。一旦相关不良动机被揭露,相关不实情况被曝光,对“弱者”的“赋权”就会变为对“劣迹”的拷问,当事人也必将遭受舆论的谴责,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可见,媒介对赋权对象具有选择性,对已经做出赋权的事件、人物有持久的关注、反馈、验证等职能。由此,只有真正自信的,敢于面对大众传播的“弱者”,才是媒介真正的赋权对象。

其次,被赋权者需要主动作为,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合理合法地为自己维权。在赋权理论中,对“弱者”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层面上:其一,弱者或者弱势群体是由于能力缺陷和不利资源处境而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人、组织或者群体。在常识意义上,弱者的目标是争取社会经济权力的改善和地位提升。其二,随着对权力的网络关系属性的重视,对弱者的理解应该突破主体——客体、施动——受动的二元藩篱,弱者不应被视为等待介入、帮助和改造的被动且消极的客体,而是具有自身意愿、实践能力、主体性的能动的个人和群体。^[4]从第二个层面所强调的赋权理论中的新型“弱者”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被赋权主体的社会交往、对话、传播等行动,让个体的力量为自身构建起一个互助的系统,也让自身成为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变革采取主动行为的“强者”形象。从社会身份、经济状况、社会处境等方面来说,陈春秀具有典型的弱者属性,而她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的不辞辛劳、主动追求、积极作为的特质,是媒介这一外在的社会存在能够介入,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达到赋权的效果的另一必要条件。

在对“增权”和“去权”的相关研究中也会有这样的观点:新媒介具有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双向互动参与等特性,随着新媒介传播工具的普及,公民参与社会表达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互联网媒体平台成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主体,“弱者”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强者”的救助。^[8]“弱者”借助媒介赋权发挥自身能动性的这种抗争,构成了一种对侵权者“去权”,为自身“增权”的社会实践,实现了“为弱者的传播”向“弱者的传播”的转变,让自身的属性在传播和赋权过程中受到社会关注,让依赖“强者”帮助的被动求助模式转变为成为“强者”以自救的主动作为。一方面,这样的改变能够让权力部门、社会群体对媒介赋权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知,改善权力使用的路径、效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励失权者投身权力关系的抗争,促进公众和社会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为和谐权力关系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被赋权者还需要有健全与健康的人格,坚定的立场,能够抵制社会不良现象对自己的腐蚀。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陈春秀的配偶说了出侵权方通过中间人表达的态度:“保证你们满意”。而陈春秀夫妇没有被诱惑,不愿选择“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陈春秀夫妇没能抵制侵权者的拉拢腐蚀,媒介赋权同样无法介入,进一步的社会关注,更深入的社会调查,更全面的社会反思也无从展开。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陈春秀用个人的行为选择让自己成了媒介赋权的被赋权者;作为独立和能动的个体,陈春秀本人是“陈春秀事件”最完整的在场者。范斌教授将赋权理论的价值总结为:“引导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参与决策并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公正。”^[10]具体到“陈春秀事件”中媒介赋权的在场和实现上来说,这种价值得以实现具有双重主体要求:一方面,被赋权者需要怀有对社会公正的坚信,即使在媒介介入之前,被赋权者也需要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主动作为维护自身权利;另一方面,媒介赋权既需要扩大对被赋权者的关照范围,也需要深入对权力部门的了解和报道,只有两方面同时具备,媒介赋权才能保持自己在社会实际中的在场,更多的“弱者”才能在媒介赋权中以自己的在场彰显媒介赋权的在场,实现赋权效能。相关研究也认为:“赋权的中心是指为弱者增权加能,在当今网络时代互联网凸显技术、价值及自由,它强调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及共同体的趋同性。”^[11]媒介赋权之所以强调对个体主体性的尊重,是对其赋权对象的一种保护与限定,也是

引导社会公正的一种内在机制。

三、媒介如何赋权：舆论的介入与国家的调控

媒介关照下的赋权之最终实现既是媒介赋权在场的印证，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具体事件发生环境的社会治理程度。对媒介赋权路径的认识至少可以从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国家层面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作为公民行动的抗争

公民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具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利用一定的方式，采取相应的行动进行维权，是其正当的权利。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由手机、电脑等电子接收端连接与搭建的媒介信息平台以其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信息传播特点，成为广泛人群了解社会事件、获取实时消息、参与社会讨论的空间。这种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公民在使用这一资源进行维权的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加以利用，是由公民采取的主动行动决定的。媒介有自身的判断和选择，且在参与到相应事件之后往往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作用是在具有被赋权特征的“弱者”主动发起具体社会诉求之后才能够产生的。

就个人层面而言，我们可以把媒介的赋权现象理解为具体的抗争行动。媒介赋权是特定行动中的持续关注者，其诞生与存在对社会公正具有一种维护与保障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媒介赋权基于被赋权者的失权事实，而对具体社会事件的发展产生的隐形助手的作用上。赋权的结果一方面是中立的媒介在社会现实之下进行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失权的社会公民个人通过实际的抗争行动所主动追求的结果，且后者的存在先于前者，是前者发生的必要条件。可见，媒介赋权在中立与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下，是由带有明确而强烈的情感倾向的个人追求所引发的，赋权的过程也是在获得数量可观的媒介使用者的情感共鸣，并在其主动声援与实际帮助之下进行的。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失权者的被赋权者本人，还是在赋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每一位具体的声援者、帮助者，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2]陈春秀并不是一个熟练的媒介使用者，但在付出了一系列线下的努力并发现收效甚微的时候，她能够勇敢的选择媒介方式继续为自己进行抗争，这表明她的媒介认识是积极的、健康的；她对媒介的评估是正面的、向上的。或许我们不

能因此而判定她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但只有具有这样的媒介认识的被赋权者，才能让媒介赋权的过程有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最终促成媒介赋权的生成。

（二）作为媒介群体的赋权

除了失权者本人的抗争之外，与失权者在社会属性、生活经历、情感认同等方面具有相似性，通过媒介进行评论与表达的特定社会群体，也在媒介赋权过程，尤其是特定事件处于流传速度最快、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力度最强的阶段，发挥着意义非凡的作用。“新媒介赋权所提供的另外一种空间，为社会行动提供了可能，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动员与治理方式。网络公共空间重塑人们的观念与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中心化、组织化的连接方式向情感、价值观等身份认同方式转变，其背后实现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着人的回归。”^{[7]14}媒介使用者作为人的回归是媒介赋权可能实现的最大社会价值，作为媒介群体在具体社会事件中的主动赋权，从身份认同出发的同情之理解和求善的价值观选择，则是媒介群体实现这种价值的必由之路。

在新媒介生态已经系统化、成熟化的媒介环境中，网络平台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阵地。社会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监督手段，已经在众多领域彰显出其重要的社会价值。新媒介生态下的媒介赋权正是在网络平台所提供的便捷而高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下，给社会舆论中呼声最高的观点最大的空间资源，为随着事件发展而实时更新的社会舆论进行最及时的表达、最广泛的传播，进而给权力的使用带来强有力的纠偏，为权力的运行提供透明化的监督，最终实现对失权者的赋权，对社会公正的维护。

当然，我们从各类媒介途径得到的各种信息并不总是真实的。尽管媒介赋权以其对社会关注的高度占有而对媒介报道的可靠性产生了社会、舆论、法律等层面的保障，但也不能完全避免人们在虚拟环境中产生偏激举动的隐患。李普曼对虚拟环境的影响力有这样的表述：“偶然的事实，创造性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13]11}可见媒介赋权在通过带动社会群体的参与来产生社会影响的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社会舆论如果被偏激者引导，民众的客观态度，理性追求就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为主观的、非理性的追求。此时，从更高层面对较广泛社会群体的舆论倾向进行正确引导和及时调控，就成了媒介赋权在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条最终路径和保障手段。

(三)作为国家调控的引导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存在本身就体现着社会的阶级属性。同时,国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公民享有权利的保证,履行义务的监督与制约。一个国家的运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这就需要意识形态的稳定与统一。路易·阿尔图塞认为,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通过内容的巧妙安排使受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从而维护这种制度的正常运转”^[14]⁶⁴⁵。

作为现存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我国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相关研究指出:“我国的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职能性质,决定了媒体必须服从政府意志而设置一元化的理论语境。”^[15] 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认为:“传媒作为一种权力,可以被媒体组织使用,也可以被个体或国家使用。作为国家赋权的传媒是权力统治、国家发展的工具,作为个体赋权的传媒是个体现代化、个体参与政治的工具。”^[16] 可见,在个体、媒体、国家都能够对传媒(这里与“媒介”概念范畴相同)进行使用的情况下,在媒介赋权已经介入具体的社会事件发展过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了赋权的实际效用的情况下,国家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与管控、对权力的下放与收回、对权力使用的具体指导,都是迫切需要的实际手段。

在“陈春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事件的舆论导向、权力使用、社会影响等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其通报中提及的六个主要环节不仅涉及非常细致的调查,需要多部门开展大量的工作,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给出了对舆论特别关注的涉事人员(如陈春秀在查证过程中遇到的冠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和冠县公安局万善派出所民警)的处理情况,这在以往同类事件中是绝无仅有的。从通报发布后的社会反响来看,社会舆论朝着更加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全国范围内相关制度环节中的权力运行监督明显加强,该事件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的影响,对建立健全法制社会产生的压力明显降低。其后,因疫情而延期举行的2020年高考、中考没有再受到该事件的影响,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等相关国家战略继续稳步实施。

由此我们认为,媒介赋权只有落脚到国家的主动调控、正确引导,才能最终完成赋权赋能,达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如果对媒介进行使用的国家不能用依法依规的程序、维稳保障的夙愿、为国为民的初心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提供正确而长远的

引导,那么媒介不仅无法发挥其赋权的特殊职能,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保障,甚至还会被别有用心个人、唯利是图的群体、玩忽职守的媒体等力量所利用,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四、结语

媒介赋权研究针对的是具体的社会事件,借助的是赋权理论、媒介研究的相关学理基础和媒介技术的载体,面对的是广阔的社会发展现实,追求的是社会权力的合理运行和对普遍公正的维护。“陈春秀事件”的典型性决定了该事件在媒介赋权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发掘空间,值得继续深入,同时,如何在更多的具体社会场景中发挥媒介赋权应有的社会价值、理论贡献,也需要更多学者继续探究。在日趋丰富的新媒介环境下,媒介赋权作为第三者的在场能够为具体社会事件的良好发展提供反馈,同时也能够为大众媒介素养提升、权力运行与监管制度建立健全提供帮助。

从赋权历程来看,媒介赋权的持续在场是其区别于赋权理论中其他多种方式的重要特征;从最终的效能而言,“媒介赋权的结果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变化”^[7]⁶³。从媒介赋权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地位出发,对其表现出的特殊“权力”进行考察,能够帮助我们客观评价媒介赋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枉正关系;对媒介赋权对象的特殊属性、赋权效果的生成路径加以关照,能够促进媒介赋权理论自身以及更宏观的赋权理论的发展;对更多不同领域和范畴的社会事件进行媒介赋权研究,能够为类似社会事件的协同处理,权力监管部门的决策处置等环节带来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丁未. 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0):76-81.
- [2] 波特. 传播学概论[M]. 陈亮,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 [3] 李彬. 传播学引论[M]. 增补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4] 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 新闻记者,2015(7):28-35.
- [5] 邓建国. 我们何以身临其境:人机传播中社会在场感的建构与挑战[J]. 新闻与写作,2022(10):17-28.
-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7] 师曾志,金锦萍. 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8] 尹金凤,胡文昭.“增权”抑或“去权”:新媒介赋权视域下舆论引导的角色转换[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 科学版),2018(1):148-152.
- [9]李京丽.弱者的武器:对“炒作式求助”的一种解读[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2-18.
- [10]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14(12):73-78.
- [11]袁爱清,严佳慧.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理想化与现实困境[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95.
- [12]张玲.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亟待研究与发展的领域[J].现代传播,2004(4):101-102.
- [13]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M].闫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4]路易·阿尔图赛.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15]刘晓伟.媒体的话语统治与传播效益[J].当代传播,2003(6):21-23.
- [16]骆正林.传媒技术赋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自强之路[J].新闻爱好者,2019(6):44-5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Media Empowerment in the Presence of Specific Social Events

—Taking “The Case of Chen Chunxiu” as an Example

WANG Qize^{1,3}, CHEN Yan²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1, China; 3. Literary Creation Research Office, Xi'an Half-flower Cultural Museum, Xi'an, Shaanxi 7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penetr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not only brings new research fever and space for expansion of empowerment theory, but also gives the theory of “media empowerment” a richer interpretation space and a deep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specific research. Under the new media ecology, power relations are changing, and “communication for the weak” may change to “communication of the weak” at any time, and the attributes of the “weak” themselves are concern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attributes of the “weak” themselves are under attention, and the basis, objects, and paths of empowerment are in the process of renewal, which requires new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case of Chen Chunxiu’s case”, rapidly heated up on the Internet and aroused widespread social concern on the eve of the 2020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ctual path of “media empowerment” in the new media ecology, and to get to know how “media empowerment” is actually generated in the new media ecology. The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ctual path of “media empowerment” in the new media ecology,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ce of “media empowerment” in specific social events, and to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media literacy of the public and the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authorities.

Key words: media empowerment; “The case of Chen Chunxiu”; power relations; presence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探微

陈元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是一个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信息向大学生的传递过程、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关信息的接受过程和反馈过程的统一体。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的基础上,可建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模式,这种影响模式有简单影响模式和复杂影响模式之分。根据其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和环节,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进行分段控制。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大学生;影响过程;影响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4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83-05

当前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多是对其影响现状、影响原因及相应对策的研究,那么这股思潮究竟是如何逐步影响大学生的呢?这就关涉其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的问题,而当前学界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其实,分析这股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探索其影响模式是寻求有效对策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我们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进行深入探讨。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是指该思潮对大学生的思想逐步实现影响的整个过程。准确把握其影响过程是正确认识该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各个阶段和环节,进而化解其影响的重要条件。根据传播学的传播过程理论,可将这个影响过程分解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向大学生的传递过程、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接受过程和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反馈过程等三个子过程^{[1]158},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正是这三个子过程的统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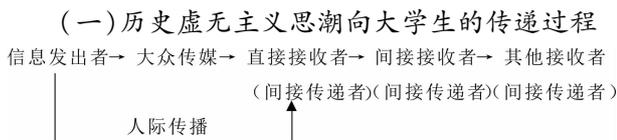


图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向大学生的传递过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信息传递过程是按照图1所示的路径进行的。在这个传递过程中,信息发出者是主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发出者一般是具有较高身份、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既有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员,也有网络名人、民间学者及其他社会名流等。因此,在各色各样“名人效应”推动下,历史虚无主义各类思想观点的传递易于获得大学生的认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向大学生传递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运用大众传媒,并且包装得更加生活化、时尚化,往往通过网络、影视、讲座、访谈、书籍、报刊等多样化的方式把该思潮的信息传递给大学生群体。历史虚无主义者极为重视大众传媒的“把关人”作用,千方百计地以他们的思想观念影响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其领导者和组织者,使其制定有利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媒

收稿日期:2022-11-17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及对策研究”(20BDJ023)

作者简介:陈元明(1980—),男,河南周口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体规范,设置有利于该思潮传播的媒体“议程”,以各种形式突出强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信息,而有意对大众屏蔽一些有力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力图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该思潮的相关话题中去,以促使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得到最大化的传播。一些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从大众传媒中获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成为直接接收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发出者也可以不通过大众传媒而通过人际传播将该思潮的信息直接传递给部分大学生,从而使他们也成为直接接收者。

一些直接接收者在有意无意间作为间接传递者将该思潮的信息传给另一些大学生,如此一来,这些直接接收者就成了间接传递者,另一些大学生就成为间接接收者。这些间接接收者在接收这些信息后,也可能作为间接传递者又通过多种方式传给其他大学生。其他大学生又可能成为该思潮的间接传递者把信息传给更多的大学生,从而实现多级传递。如此循环往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得以不断向大学生群体传递。其间,要特别重视社团干部、班级干部、党团干部或其他学生骨干等“意见领袖”的作用。因为一般而言,普通大学生的历史知识不是很丰富,历史辨别力也不是很高,而“意见领袖”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其人生阅历和经验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所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借助“意见领袖”作为中介给普通大学生以解释和引导。^[2]此时,“意见领袖”的作用就非常关键,如果“意见领袖”本身认同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那么将加速该思潮对普通大学生的传递,反之,将延缓或阻碍这种传递。

(二)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接受过程

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接受过程其实就是大学生逐步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信息并内化为自我价值观的过程。^[3]一般而言,大学生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经历了从“兴趣→感性接受→理性认同→自我价值观”的步步深入的多级发展过程。第一是兴趣。人们对任何事物,只有有了兴趣,才有进一步了解、接受的欲望。大学生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是从兴趣开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者善于针对大学生群体制造一些热点事件并推出一些新奇观点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引起他们的兴趣。第二,感性接受。在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某些思想观点产生初步兴趣后,这股思潮的传播者就进一步通过一些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引发某种质疑官方史学观点和历史

评价的情绪性心理倾向,形成一些零散的想法,以此加深与初步接受该思潮的大学生群体的联系。在这一阶段,大学生接受的往往是一些情绪感染,还只是一种感性的接受。第三,理性认同。这是感性接受进一步升华的产物。大学生把前一阶段通过感性接受获得的有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某些心理倾向和零散的想法逐步凝聚成逻辑化、系统化的知识和理论。此时,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某些思想观点已经有了一定的理性认同。第四,形成自我价值观。这一阶段,大学生在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将其已经接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某些思想观点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自我价值观。在这一阶段,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接受是各个阶段中最稳定、最深入的。但总体而言,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接受过程的这四个阶段是紧密联系、逐级递进的。

(三)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反馈过程

现代信息传播是由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是信息双向传递的过程。信息的反馈过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的反馈,是指传播者将有关该思潮的信息传播出去后,该思潮的信息作用的效果或反应返回其自身的过程。经过反馈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会影响该思潮地再传播过程: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信息的大学生通过反馈把受该思潮的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效果等信息输送回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者对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分析,找出优缺点,总结经验教训,并根据分析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然后带着调整后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传播内容或形式进入新一轮的传播过程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产生的反馈并非仅仅在传播过程的最后阶段才会出现,而是在其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发生,亦即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反馈过程都可能发生。因此,反馈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思潮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必然要求。

总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递、接受、反馈这三个子过程构成一个前后相继、递进发展的比较完整的传播过程。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模式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能否对这些复杂的现象、过程和环节进行总结、凝练和抽象并进行图示化处理,从而比较直观地显示该思潮对大学生的

影响过程呢？这就关系到影响模式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模式是指该思潮对大学生的思想逐步实现影响的方式，这种影响模式根据简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简单影响模式和复杂影响模式。

(一) 简单影响模式

根据以上关于该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的分析，借鉴传播学中拉斯韦尔的“5W”模式，并引入控制论的反馈机制，可初步总结出该思潮对大学生的简单影响模式。如图2所示。



图2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简单影响模式

在这种简单影响模式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首先通过部分专家、学者制造专业学术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是把

这些专业学术信息转化为普通大学生能够理解的大众通俗信息，再次是把大众通俗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媒介传递给大学生，最后部分大学生接受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后，把自身对这些信息的态度、感受等反馈给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媒介，直至制造该信息的专家、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模式中各环节的信息和动向都可以反馈回来，相应的环节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改进后，进入下一轮的传播。

(二) 复杂影响模式

在上述简单影响模式的基础上，借鉴传播学中韦斯特利——麦克莱恩的大众传播模式^{[1]167-168}，考虑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各个环节的复杂性，我们设计出其复杂影响模式。详见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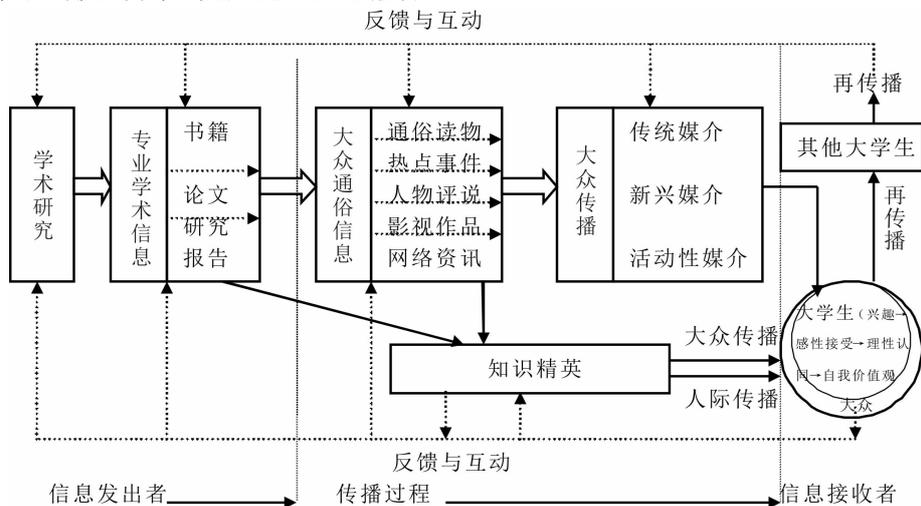


图3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复杂影响模式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复杂影响模式包括信息传播（传递、接受、反馈）、信息内化（兴趣、感性接受、理性认同、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及信息再传播（接受者主动将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再传播给其他大学生）三个环节的作用过程。

在信息传播环节，首先由信息发出者即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适合大众解读的方式制造出相应的信息源；然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这些信息源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多样化的方式和渠道传递给大学生，接收到信息的大学生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决定是否接受这些信息和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信息；最后，接受这些信息的大学生再把加工处理后的信息通过多种途径反馈给信息发出者。

信息传播环节是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系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向大学生的传播过程可分为两个层次。其第一个层次由专业学术信息、大众通俗信息、

大众传播三个步骤组成，其中专业学术信息是指专家、学者以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的形式在知识界形成的具有较强专业性的比较系统的信息，这些信息所用的语言比较学术化，主要在学术界进行传播，往往不易被大众所理解，此类信息的传播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大众通俗信息是指专业学术信息借助通俗读物、热点事件、人物评说、影视作品和网络资讯等多样化的形式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传播信息，这类信息直接面向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大众，往往易为大学生群体理解和接受。

在当今信息社会，大众传播的媒介可分为传统媒介、新兴媒介和活动性媒介三种。传统媒介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面，如《河殇》《走向共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等电视片或书籍都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但传统媒介的传播比较显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

是一种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社会思潮,这种传播易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和控制,其传播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因此传统媒介难以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主要载体。新兴媒介主要是指在网络和数字化等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介形式,包括网络、手机短信、微信、微博、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数字影视等,这类媒介隐蔽性强、互动性好且方便、快捷,能通过电脑、手机、iPad等各种电子产品快速传播,因此受到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青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主要载体。活动性媒介主要包括讲座、报告、会议、论坛及其他群体性活动等,这类媒介虽然受活动场所的限制而参与人数有限,但因其针对性强,往往能收到“一传十,十传百”的发散性效果。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的快速推进,近年来传统媒介、新兴媒介和活动性媒介出现了合流的趋势^[4],便利了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大众通俗信息就是通过上述三类媒介传递给大学生的。

其第二个层次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以知识精英为中介传递给大学生,因为知识精英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影响力,所以他们能够同时吸收专业学术信息和大众通俗信息这两类信息,而后这些知识精英再把自己加工处理过的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方式传递给大学生。该影响模式中信息传播环节的开放性体现在信息的制造者和发送者可以借助这些渠道和方式连续不断地多次传递信息,而各环节的信息和动向又可以由目标信息接收者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反馈回来。

在信息内化环节,一般而言,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相关信息的接受遵循着“兴趣→感性接受→理性认同→自我价值观”的内化过程。该思潮一般是先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发出相关信息,再通过某些有关历史的热点、疑点问题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和兴趣;然后以对具体历史问题重新解读的方式进行情绪感染,从而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赢得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共鸣,实现这些大学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感性接受;接着放大促使大学生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种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施加影响,使这些大学生对该思潮进行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所谓的“理性分析”,逐渐使这些大学生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性认同;最后促使大学生通过自身知识结构的整合形成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比较稳定的自我价值观,并对其他大学生进行再传播。

这里的信息内化环节具体分为如下五个步骤:第一,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传播者通过书籍、论文、研究报告形成相对稳定的专业学术信息。第二,专业学术信息借助某些通俗读物、热点事件、人物评说、影视作品和网络资讯转化为易为普通大学生理解的大众通俗信息。第三,借助多样化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方式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使部分大学生感性接受。第四,借助对有关历史的某些热点、疑点问题的解读,并进一步利用那些主客观因素,使已经感性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部分大学生加深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观点的认可度,使之实现理性认同。第五,通过多种媒介轮番进行“信息轰炸”,步步深入,将历史虚无主义的某些思想观点经过同化或顺应过程巩固或改变大学生原有的认知图式,从而在大学生头脑中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自我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其真实目的受到官方的某些限制而难以完全公开宣传的情况下,以其“学术创新”“解放思想”的伪装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大学生的媒介接触习惯及其心理特征,常常采取“逐级价值引导”的隐性传播模式。

在信息再传播环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目标信息接收者(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大众)根据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对所接收到的该思潮信息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完善,并在这一过程中与该思潮的核心群体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一定的反馈和互动;然后将这些经过修改和完善后的信息再传播给大学生群体中的次级接收者,这些次级接收者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接受或部分接受这些信息,再把进一步加工后的信息再传播给以下多级接收者,从而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进行“滚雪球”似的逐级扩散,使该思潮在更大范围内的大学生群体中实现广泛的影响,被其中的部分大学生所接受,逐渐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大学生接受群体。

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模式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效果看,其实现有效传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一些专家、学者、网络名人等社会名流“哗众取宠”的个性化语言风格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心理共鸣。二是在具体传播方式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善于对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运用。三是专家、学者的专业学术信息在正式出版前已经对该思潮观点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整理,在向普通大学生传播时,又根据大学生的特点进行了通俗化和生动化的改造。四是从路径、手段

方面来看,其明确的策略性——现实化(用现实熔铸历史)、名人化(借助名人效应引领思想)、精英化(通过知识精英影响大学生)。五是阶段性反馈和再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是通过连续不断地阶段性反馈和再传播,使其不断有新内容、新观点、新视角、新目标,从而这股思潮得以延续其较长时段的生命力。

三、启示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的分析,对化解该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要根据这种影响过程和影响模式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行分段控制。

在传递阶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往往借助知名学者、网络大V等“名人效应”和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体向社会大众发出信息,这就提示我们对一些热衷于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名人的言行、对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都要加强监控和引导,将其限制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依法惩处其中触犯法律的责任人。此外,大众传媒的主编、编辑、记者在传递阶段往往扮演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因此应尽力把这些“把关人”的价值观引导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提高其政治辨别力,尽可能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信息过滤在大众传媒的关口之外。

在接受阶段,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往往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既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受影响者,又是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传播者,因此必须重视对“意见领袖”的引导,从而尽可能减少该思潮信息向其他大学生传播的渠道。另外,因为大学生

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理性认同前,对其情感附着尚浅,此时大学生的思想较易转化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所以要抢在大学生对该思潮产生理性认同前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易于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在反馈阶段,由于大学生受众的反馈信息会影响该思潮对大学生的再传播,反馈利于该思潮经调整后进行更有效的再传播,导致更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要对该思潮的大学生受众加强教育和引导,使其减少对该思潮信息传播的反馈,减少间接传播,从而减少历史虚无主义传播者的“耳目”,竭力减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总之,只有认真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过程,探索其影响模式,在此基础上,对这股思潮的影响进行分段控制,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环节,才能逐步有效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肖沛雄.新编传播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2]王敬红.“意见领袖”观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及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12).
- [3]阮博.爱国主义视域下青年“精日”现象论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5).
- [4]陈旭鑫.媒介融合语境下大学生的新媒介依赖状况局域调查[J].电视研究,2013(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Influence Process and Mode of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on College Students

CHEN Yu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casting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is a unity including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o college students, their acceptance process and the feedback process. Based on this process, we can construct the mode of historical nihilism's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simple influence mode and complex influence mode. These analyses enlighten u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on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its influencing process and mode, considering various factors and links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college students; influence process; influence model

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及其价值探析

张 文¹, 陈旭辉¹, 张晖宇²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毛泽东诗词是20世纪中国诗词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精神,具体可以表现为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从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可以吸取治国理政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而采用全媒体传播毛泽东诗词,对于其价值意蕴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中国精神;价值意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5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88-06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弘扬红色文化,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命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诗词是20世纪中国诗词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更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不竭动力之源和强大精神指引。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就有“以诗咏志”的悠久传统,其诗词作品中既有对眼前之实物的描绘,更有对心中之精神的刻画。毛泽东诗词也继承了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不仅向人们展现了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恢宏历史画卷,而且也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中国精神,其中就蕴含着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些伟大的精神具有穿透时空的磅礴之力,即使到了今天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价值意蕴,需要人们积极采取像全媒体这样更加与时俱进的传播手段去发扬光大。

一、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2]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智慧、深刻的历史洞察对中国精神作出的极为凝练的概括。而中国精神正是毛泽东诗词的灵魂,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3]毛泽东诗词素有“诗史”之称。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毛岸青、邵华夫妇曾为新版的《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作序,其中就有写道:“‘诗言志’,父亲诗中的一题、一景、一人、一事,无不记述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连贯起来,可谓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4]毛泽东诗词描摹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诗词蕴含的爱国精神

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收稿日期:2022-12-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开新研究”(20BKJ138)

作者简介:张文(1965—),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同时,也是一位极具艺术细胞的爱国诗人、词人。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历代文人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传统,同时也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毛泽东诗词蕴含的爱国精神在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绘与赞美中、在其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万丈豪情的抒发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1925年,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这一不朽名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点明了时间、景色和地点。一个“看”字总领七句,万山、层林、漫江、百舸、鹰鱼,既有动景也有静景,既有远景也有近景,尽现词人广阔视角里的一幅壮美的长沙秋日山水大观。其中“万山红遍”,既是词人眼前枫林鲜艳如火的实景,也是青年毛泽东心中火热的革命热情的化身,更是一代伟人“星火燎原”思想萌芽时期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前途与祖国命运的乐观主义憧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十分自然地引起了对过往似水年华的回忆。一个“恰”字同样统领七句,“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形象地概括了青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弄潮儿们的使命意识和大丈夫胸怀。自1911年开始,毛泽东在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度过了长达7年的学生时代,而且他的早期社会活动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在这座城里,一代伟人完成了他早期的思想巨变和人生巨变。咏长沙,既是咏景,也是咏青春诗史与爱国情怀。

毛泽东的另一首《沁园春·雪》更是大气磅礴。1936年初,长征胜利之后的毛泽东抵达延安。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开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由近及远,层次分明。“望”字以下十余句,借“长城内外”的山景和“大河上下”的水景以描绘“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雪景。随即转入“红装素裹”的妖娆景色,对比之下,凸现出祖国的“江山如此多娇”,表现出词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诗人最后发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慨。今朝的风流人物,是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更杰出才能更伟大抱负的人,他是人民群众,也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诗人的自况。这是诗人的自信和自励,是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登上历史舞台的威武雄壮的宣言。柳亚子先生因此词赞誉毛泽东:“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盛赞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激励后进的佳句”。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更是盛赞毛泽东《沁园春·雪》“气势磅礴,气吞山河,乃诗词之精品也”。

与前面两首“沁园春”不同,《七律·登庐山》中更添“登高气韵”。“一山飞峙大江边”极言山势陡峭,如同天外飞来,对庐山突兀凌空之雄姿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所描绘之景,庐山之上是看不见的,均是诗人的想象之景。这更加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睥睨天下的“登高气韵”和万里河山皆在我心的澎湃爱国精神。这不仅是对眼前之景、想象之景的由衷赞美,而且是对新中国成立近十年百废俱兴、蓬勃发展的向荣景象的深刻肯定。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了他所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而不断奔走、不断奋斗。纵观毛泽东诗词,里面有许多这样气壮山河的诗句、词句,蕴含着丰富的爱国精神,使人对祖国大好河山心生无限向往之意,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二)毛泽东诗词蕴含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诗词除了表现出磅礴的爱国情怀之外,还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敢于创新的万丈豪情。毛泽东本人就极富创新精神,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4]。正是这样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引领下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扭转了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走向了前程似锦的伟大复兴。

《西江月·井冈山》是毛泽东第一首直接描写战争的词作,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也是保卫井冈山的第一次战斗。毛泽东以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战前受挫、敌众我寡的逆境中,仍然创造了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旌旗在望”“鼓角相闻”“山上”“山下”都摆开了阵势,一场大战即将打响。虽然有着“万千重”的敌人,但红军“岿然不动”。之所以“岿然不动”,就在于罗霄山脉井冈山地区的独特地理优势,也在于“军民鱼水一家人”的良好群众基础,更在于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高度辩证统一。红军“森严壁垒”“众志成城”,在“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激烈战斗之后,敌人只好“宵遁”,乘着月黑风高夜,抱头鼠窜、狼狈而逃。自此以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一代伟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这是世界无产阶级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条革命道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贡献,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饱满的创新精神,推动中国革命大步向前。

毛泽东诗词蕴含的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革命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所展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提到的现代工程建筑。毛泽东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了这描绘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的名篇《水调歌头·游泳》,赞扬了全国人民积极支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和广大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以及敢于斗争、敢于创造的伟大精神,这正是中国使得“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志气所在。这样的志气在另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泽东创作这首词时已七十有三,仍然不减一个革命家的磅礴气魄,表达了中国人民勇于创新、勇于挑战的凌云壮志。其实,革命导师毛泽东早在少年时期,就胸怀远大志向和抱负,他在17岁那年第一次走出韶山冲,临行前他用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借自月性和尚用以自勉的一首诗略加修改而成的《七绝·改诗赠父亲》,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豪言壮志。时至今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登月完成了月壤采集的艰巨任务,可谓“九天揽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也顺利入海创造了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真乃“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求索和开拓创新精神,是当代中国实现大踏步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

二、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的价值

毛泽东诗词是描绘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可歌可泣英雄事业的伟大诗史,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更是党带领人民为追求独立、解放、幸福而奋斗数十年过程的精神缩影。虽然毛泽东诗词是伟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感而发的抒情产物,却拥有着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意蕴,具体表现在不仅可以从中吸取治国理政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

(一)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援引妙用。在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之中,援引毛泽东诗词或是摘选其中的灵动词汇随处可见,足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的毛泽东话语体系情有独钟,为我们学习毛泽东高超精湛的语言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营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智慧”作出了光辉示范。^[5]这既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思想的诸多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发扬光

大了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援引妙用毛泽东诗词,就是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之时。他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如炬的历史眼光、深厚的文学造诣,用短短的三句诗就极为凝练地概括了中华民族曾经走过的昨天、正在走的今天和将要走向的明天。其中就有两句出自毛泽东诗词,且这两句诗中都有一个“道”,前者是中华民族过去之“雄关漫道”,后者是中华民族如今之“人间正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说的是虽然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经磨难,但党带领人民始终坚持不懈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原意是为了说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用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党带领人民已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人间正道”。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用李白在《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来预言中华民族将有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三句诗,概括了他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通过援引妙用毛泽东诗词,强调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个要点。一是要坚持道路自信。2013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风景这边独好”来形容已载入史册的辉煌成就,这是坚持道路自信的底气所在。^[6]二是要增强战略定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才能顺利实现我们已经确立的奋斗目标。^[7]三是要发扬无畏气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句来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大无畏气概。^[8]只有继续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续写五千年民族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原创性、开拓性的描述界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治疗精神贫乏的一剂良药。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诗词也是如此,它充分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表现为毛泽东诗词中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种经典元素。感悟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体裁来看,毛泽东诗词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词中的多种诗体,体现了古朴典雅的中国风格。从先秦的四言、杂言,再到汉代的乐府诗,再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中国传统诗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毛泽东诗词就继承了这一极具特色的传统,运用多种形式去描绘现实、表达思想。从毛泽东的诗来看,七律是毛泽东最喜爱也最擅长的形式,毛泽东诗词中七律诗也最为常见,比如脍炙人口《七律·长征》《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其他的五律、七绝、杂言等形式也在毛泽东诗词中有所呈现。从毛泽东的词来看,毛泽东运用的形式更是种类繁多,共计有二十余种词牌名,常见的有“沁园春”“西江月”“水调歌头”等。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多样的形式既有利于表达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思想,也更能承载宏大的精神。

从素材来看,毛泽东诗词使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并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词用典的传统,蕴含了浓郁醇厚的中国味道。毛泽东诗词中使用最多的三个意象是“寥廓”“鲲鹏”和“逝川”,分别出自《楚辞》《庄子》《论语》,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世经典名篇。其中的《论语》《庄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座对立的高峰——儒家和道家的代表作。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诗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此外,毛泽东诗词中还运用了许多典故。毛泽东诗词中的用典体现了人民性的文化立场,所用典故浅显易懂而又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就引用了楚汉之争中项羽沽名钓誉放刘邦一马,最后战败乌江自刎的典故,表达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从文风来看,毛泽东诗词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结合,将豪放词风与婉约词风熔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丝毫不落窠臼,丰富了中国美学乃至东方美学。毛泽东诗词极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风貌,更运用夸张、想象等奔放的手法,表现了一代伟人的革命胸襟与精神气质。“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从“十万”“百万”到“千百万”,纵横万里、持续数十年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都展现在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画卷中。虽然毛泽东诗词多数以雄浑大气的豪放为主,但时常也会有蕴藉绮丽的婉约词风。如《贺新郎·别友》中“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一句,就表达了词人离家妻子相送时两人的断肠难舍之情。

毛泽东诗词还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经常“反其意而用之”。在《卜算子·咏梅》中,毛泽东一改陆游咏梅词中的“孤芳自赏,孤傲独立”,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一句表现了一个大公无私、功成不居的无产阶级斗士的光辉形象。此外,毛泽东还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来描写梅花丝毫不畏惧生存环境的恶劣,依旧独立傲然绽放,以对梅花高尚情操的赞美,表达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道路上敢于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的高度评价。^[9]这正是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的光辉写照。

(三) 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10]。毛泽东诗词作为红色经典诗词,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敢于斗争、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精神,它与反动、腐朽、落后的文化相比,具有鲜明的先进性特征,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则具有重要意义。^[9]毛泽东诗词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承载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镌刻了革命与建设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蕴含着伟大的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的丰富精神养料。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就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高屋建瓴、一针见

血地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该《讲话》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诗词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绝佳典范。毛泽东在创作的过程中,将“分田分地”“国际悲歌”“环球”等活泼生动的现代词汇与中国传统诗词的体裁、素材以及风格巧妙融合,这是在以往的诗词中从未出现过的,是对中国传统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醇厚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美学,弘扬了中国精神,展现了中国气派。“分田分地”等村言俗语更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诗词最根本的精神支点——人民性的文化立场。这样的文化立场具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深邃的理论渊源、强大的实践伟力。毛泽东诗词里浓郁的文化自信和宏大的美学精神,就是根植于这样的文化立场。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中所诞生的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浓缩,刻画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生动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英勇事迹。“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诗词承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岿然不动”的底气所在、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最强音的底气所在。

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不仅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而且对于坚定历史自觉而言也大有裨益。历史自觉的产生离不开历史使命的驱动。时代不仅呼唤理论,而且呼唤人物、呼唤领袖。年轻时的毛泽东就在奔流不息的湘江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不为个人名利,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意识,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而奔走,“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支撑他走过千难万险的正是这样强烈的历史使命。此外,只有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地做到历史自觉。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仅1930年2月到1931年春,毛泽东就有三首词展现了工农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磅礴力量,生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发动人民群众的历史自觉。

三、传播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

毛泽东诗词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和人民性的立场,创造了鲜活生动的语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

乐见,是20世纪中国诗词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开辟了中国诗词的新境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播毛泽东诗词,尤其是传播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有利于人们持续地传颂毛泽东诗词,在常读常新的基础上常悟常新,提升个人修养。

一直以来,毛泽东诗词就以歌曲、书法、绘画等形式广为传播。从歌曲的形式来看,毛泽东诗词被大规模改编为歌曲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有许多作品流传甚广,例如劫夫谱写的《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以及彦克、吕远谱写的《七律·长征》等。从书法的形式来看,不仅毛泽东本人的手迹因艺术价值极高而广为流传,而且众多书法名家都对毛泽东诗词情有独钟,在许多书法展览中都出现了毛泽东诗词的踪迹。从绘画的形式来看,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傅抱石就把毛泽东诗词的诗意与国画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包括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在内的一众国画,都惊艳了20世纪的中国画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毛泽东诗词是不朽的传世经典,在如今新媒体化、网络化的背景下,更要采用“全媒体”,使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所谓“全媒体”,最关键的是要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综合起来运用,以符合当下新兴媒体出现和传统媒体更新两种现象同时发生并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总体趋势。全媒体改变了以往文化传播形态传统单一的局面,极大丰富了传播的种类与形式,更加具有针对性、指意性、时效性,不仅有利于提升毛泽东诗词的感化效果,而且可以再现毛泽东诗词这一传世经典,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要充分利用纸质媒体、电视广播媒体、手机移动传媒、互联网媒体等多种路径,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11]此外,还要在以上路径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一是要利用电视广播媒体打造红色品牌。例如策划一档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题的文化电视节目,海选选手比赛答题,邀请专家现场点评,引导电视观众诵读毛泽东诗词,让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形式更为直观、传播过程更具活力、传播效果更加显著。二是要利用“微”媒体增强传播效率。微媒体可以让受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相关信息,采用微博、微小说、微视频、微电影等形式可以极大提升传播毛泽东诗词的效率,而且可以结合广受青年欢迎的弹幕形式,让人们在与内容创作者和其他观众的互动中更有参与感。三是要利用校园作为传播的重

要阵地。学生群体既是媒体内容的重要受众,也是媒体内容的重要制作者和传播者。一方面,要利用毛泽东诗词为底蕴制作媒体内容,用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去教育和感化学生。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创造性思维,以传统节日或校园活动为契机,积极主动地利用社会实践的形式传颂毛泽东诗词,感悟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

四、结语

毛泽东诗词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拥有着穿透时空的磅礴伟力,是不朽的革命史诗。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是中华儿女守正创新、团结奋斗、砥砺前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所在、不竭动力之源和强大精神指引,如今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之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庄严宣告之际,更需要我们顺应社会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浪潮,以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传播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更需要人们常读常悟、大力弘扬、薪火相传,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 - 10 - 26(001).

[2]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 - 03 - 18(001).

[3] 汪建新.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精神[J]. 党史文苑,2017 (23):35 - 36.

[4]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武文豪,周向军. 习近平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要论述的真谛要义论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5):109 - 113,183.

[6]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 - 01 - 02(002).

[7]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 - 12 - 27(002).

[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 - 07 - 02(002).

[9] 林洁,张晖宇,张文. 红色经典诗词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价值与路径探析[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2(3):39 - 43.

[10]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 人民日报,2022 - 05 - 29(001).

[11] 张文,全军桦. 全媒体传播“红色文化”的路径探析[J]. 湖南社会科学,2014(4):257 - 26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and Value Contained in Mao Zedong's Poems

ZHANG Wen¹, CHEN Xuhui¹, ZHANG Huiyu²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Poems are rare cultural masterpieces among Chinese poem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re rich in Chinese spirit, specifically patriotism and innovation. People may absorb wisdom on state governance,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olidat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Chinese spirit contained in those poems. Thus, the use of all media to propagate his poem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it their value.

Key words: Mao Zedong's poems; Chinese spirit; value

中国话语译介叙事的文化寻根及阐释指数 ——基于中国经验的外宣翻译实践

章彩云

(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外宣话语及其翻译是“中国话语”的一部分,其叙事体制的阐释:从表象看,是中国话语翻译传播的中国视角及中国关键词外译中国特色化的语言符号系统;从深层看,是反映自我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翻译思想阐释体系。而要趋近外宣翻译中国话语的意义本质,译介叙事之文本内力的聚成是关键:一是在翻译叙事的回应中,应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凝练中国思想,揭示外宣翻译实践的文化基因;二是在翻译叙事的话语权意识协调中,选择代表中国经验本质的正能量话语,用中国表达来讲述原创性中国叙事,体现“正向传达”的价值取向,从而提升把控国际话语及其舆论导向的言说权。

关键词:外宣翻译;中国话语;叙事;阐释特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6

中图分类号:H059;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094-06

新时代为外宣话语翻译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目标,即要把中国话语放置于世界视野中,去研究诸如“中国思想文化话语的翻译与传播、政治话语译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差异性、涉华重要议题的话语创新与翻译、翻译政策与话语传播、中译外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1]32}等问题。一方面,在这种翻译与传播、研究与建设中体现出文化的历史觉悟,明确面向世界、坚守中国文化的立场态度,应成为中国文明特色实践及其成果系统化、精准化译传的价值观念实现的思辨引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外宣译介叙事的本质及其核心阐释指数的揭示,当是外宣翻译理论与话语体系构建研究之用及其可能出路的主旨元素。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话语等概念的剖析,揭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叙事体制的阐释特质和译介叙事之内力强化的关键因素。

一、“中国话语”从个性到概念范畴的揭示

因为外宣话语及其翻译是中国话语(discourse

of China)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话语的本质是什么,是外宣译者应厘清的首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话语概念出现于文学界的研究视野,当时少数学者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对中国文化理论“失语症”现象进行讨论,并发出了构建自我文化中国话语体系的倡议^{[2]34}。其中,以曹顺庆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在对待中国话语的本质,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中国文化话语必定是拥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言说的”^{[3]2}。这里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中国特色,而中国话语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话语。但如何界定“中国特色”的概念范围,看法有些不一,是指现在之中国特色,抑或还包括以往之中国特色?^[4]其实,中国特色之本质,应该从时间与空间的持续整体视角来观察,去审视它的传统延续及当下发展,简单僵化地说“过去”或“现在”,只会给人以曲学多辨之嫌。由是讲,对于中国特色话语中的“特色”二字,应将其视为一个过程、一种理念方式、一种哲学笃实的载体。

收稿日期:2022-11-19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BYY029)

作者简介:章彩云(1968—),女,河南正阳人,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汇学、翻译学和语用学。

一是“特色”，基于“个性”基础之上而建立起来的。中国话语（包括外宣话语）的个性就是汉民族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华夏民族历史源远流长，长期积淀的汉文化中国味浓厚；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凝成具有中国自我创新性的独特理论与实践风格。那么，反映这一民族文化和特色实践的中国个性词汇也就成为外宣文本里不可或缺的内容，主要包括“官方背景的时政话语、社会公共词汇和中国特色文化词等”，如“trigram（八卦）、confucianism（儒学）、qipao（旗袍）、acupuncture（针灸）及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理路开阔去，中国特色之话语就必然是扎根于民族本土文化土壤里的系列言说。

二是“特色”，也是根植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知识与概念体系之中的。中国话语是对中国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最坦真、最可靠、最灵活描述的言说，如“core socialist values（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上海合作组织）、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等，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及与国际社会开展交流合作的最坦真、最可靠的概括，它发出了中国的声音，自然为拥有中国叙事特色的话语。一方面，它体现于中国经验之中，如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用“大海论”向世界解读我国社会经济的一段话：“To use a metaphor,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t a pond but an ocean. The ocean may have its calm days, but big winds and storms are only to be expected. Without them, the ocean wouldn't be what it is. Big winds and storms may upset a pond, but never an ocean. Having experienced numerous winds and storms, the ocean will still be there. It is the same for China. After going through 5,000 years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China is still here. Looking ahead, China will always be here to stay.”（“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5]这里，习近平以大海为喻，纵论中国经济，精妙的比喻，深刻的哲理，提气的宣示，赢得国际社会高分贝的掌声。中国经济“大海论”是话语中国语境之首创，彰显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

慧和话语胆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于中国实践之中，如2019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以及中国商务部颁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是我国对美国霸凌的理性回击，为“霸凌”所立的规矩。这些言说正是建立在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国叙事、中国论断和中国自信基础之上的个性叙说，同样是拥有中国特色的话语。

据上分析，可以这样给“中国话语”下一个定义：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民族本位、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体现社会公正和世界公正的思维方向、真实反映中国人生存发展经验并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诊断力和阐释力的语言系统”^{[3][3]}。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二为创新。就传承层面来看，历史悠久、绵延深厚的中华文化已先后构建了一系列诸如“春节、对联、书法、京剧、风水、五行”等承载着汉文化特有信息的话语，这些话语内涵异常丰实，是民族文化沉淀的标签与柬帖，是中国叙事之活化石，更是中国话语形成、构建、更新与进步的根亲之脉，为我们必得秉承与发展的。另一方面，也应在弘扬延续之中有创新，既有的，在革新中传承；空位的，在原本既有的基础上，打造熔铸着文化自我观点、问题、理念、思想、价值观等的范畴、概念、术语等言说体系。这样，凭此来生动阐释中国过去与当下的伟大实践，最终促使最具合法性、可信度和权威性的译介表述与叙事方案的达成。

二、外宣翻译中国话语叙事体制的阐释实质

基于以上认识，“外宣翻译中国话语”这一概念的实质自然明朗起来：是以“中国话语”为文本基础的、反映着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意蕴的、体现着中国国家进步与人类发展方向的外宣翻译实践与理论阐释的话语总和。就当今中国社会现实来说，它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承载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表象上来看，外宣翻译中国话语是作为我国在与世界进行交流时，由交际主体双方或多方在体现“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4]等多重认知关系沟通过程中所构建的语言符号系统。它包括有关反映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状况、国家大政方针、自然风光、市井风情、精神面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宣传资料的翻译剖判与描述形式，是含蕴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的独特精神标识。

它与西方话语体制相比较，呈现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中国话语翻译传播的中国视角与中国化，二是

中国关键词对外译介表达的中国特色化。这种特色化的翻译构语,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学界所说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是葛传棻于1980年在论文《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并对之做了形象性地描述,认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s)、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翰林院(Hanlinyuan)等词语,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China English”^{[6]2}。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概念表达,是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在长期经验积淀之基础上,于运用英语来传述中国话语叙事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本土化改造而被打进鲜明汉语言表达思维特征的一种英语语言结构样式。其文本贡献在于,它率先肯定了英语运用于中国话语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言异域改造现象。那么,通过形成具有中国特征的英语表达和话语样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也就成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语用特征。

其次,从深层次来看,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也是反映着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思想理论”意识穿透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思维能量与话语自觉,是在理性哲思与感性明辨之基础上所构建起来的自我翻译理论阐释体系。一直以来,我们不乏这样的翻译理论,早期的佛经翻译理论、唐代罗什的“意译表现论”、清末马建忠的“善译论”、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以及现代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翻译标准、鲁迅的“直译”观、钱钟书的“化境”说、郭沫若的翻译“再创造论”、傅雷的翻译“神似论”等中国学派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实践及研究史上呈现出较高的指导意义,至今对翻译学术探索还产生着巨大影响。它们是翻译理论中国话语体系的真实写照,与西方优秀翻译理论一起,其真知灼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用“伯仲”来武断之。其实,当今也不乏自我文化、自我传统的觉悟者,如许渊冲、王宁、黄友义、蔡新乐等,他们始终站位于自我意识之中,坚持“穿合自己脚的鞋”,“走合自己道的路”^[7],善于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自我化、民族化,在完全理解别人的东西之后,用自己的、中国的、民族的东西表述出来,在他们的文章里是看不到这样或那样的西学“补丁”的。这种用自己的、中国的、民族的东西表述出来的外宣中国式话语,就是“外宣翻译理论中国话语”的核心标格,而对这种话语的深层剖析就是对我理论建设的贡献。

综上所述,依靠自己的言说而言说外宣翻译时,

应有彼此维系的文本同理心:一是既要强调特色,也不能丢失“普遍话语”;二是既不能放弃自我,也要有利他关怀之情怀;三是既讲究话语的实用,也要注重永恒诉求;四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注重“译什么”的问题,即遴选什么样的外宣作品将其翻译出去才能更好地代表和传递中国文化。如上文习近平那段中国经济“大海论”译语,就充分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话语特征,中华文化的内涵创新、形式转化及语境重构等的使命意识浸染其中。如此,极而大之地将中国思想的话语作为思想来源,含蕴民族文化的真意,又有体贴“他者”文明的世界情怀,那么,翻译叙事之价值就会在我们这里深入下去,而非浮于文本表面,最终促使译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题事实及诠释模式的良性达成。

三、外宣翻译话语叙事内力强化的阐释指数

(一)外宣话语译解的文化基因揭示

“阐释总是与其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仅从西方的窗口来看中国文本的翻译阐释,并不能看尽其中的阐释学风景”^{[8]105},由此说,翻译话语内力的聚成必然要立足中华本土文化的思想视野。而文化基因个性的突出载体是语言与价值元素:一方面,要以中国式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特色的实践,譬如汉语言表述注重形象思维,讲究在整齐的表达中寻求对情感的渲染;汉语还看重话语表达的语义值,言外意的形式和内涵异常丰富。基于此,外宣译语的诠释自然要对这些因素有诚心的回应。另一方面,要用汉文化的价值元素来揭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的价值内涵,这种价值内涵不是与传统文化的简单拼接,而是要“通过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换来实现”^[9],这种转换会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阐释提供表达、沟通和解读上的思想观念力量。因此,外宣话语的译解,理所当然地需从中华文化视角开始,在打通文化交流的双向视野的基础上,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凝练中国底色,形成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道路,与世界平等对话。这样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才具有中国性,之后具有世界性。

由此来说,只有对汉文化的深刻感受和自觉意识,体现原语的文化价值观,让汉文化元素及其表达风格在外宣译语中很好地被选择出来,才能凝聚成具有民族历史文化内力的外宣翻译叙事体制与模式。中国人自创了许多英文词及表达方式来描述独具中国特色的事物,例如“paper-tiger”(纸老虎)、“gelivable”(给力)、“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严三实)等,这些译语明显带有汉语的惯习特点,尤其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译出了汉语七言律诗节奏,“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保留了汉文数字化形式和反复的手法。虽然有人认为这种翻译样式是“英语里十分离奇的组合形式”^{[10]82},对之持怀疑态度。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外域语言及文化在与汉语言相碰撞中可能被汉语言文化再改造而中国化,已是必然,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历史定律。何自然说,这种译出了我们自己“表述方式、话语风格”的翻译思维,不仅“为英语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一扇窗,并将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化元素注入世界多元文化之中”^{[11]25}。这说明,外宣话语的译解不能不对文化主体意识自觉给予一个诚心的迎见、随从及回应。

同时,由于理论范式、观点命题、概念判断等的理解上,中西方存在差异,西方话语里常出现有意歧视、错解、拆读中国话语文化内涵的蛮横无理的现象,导致中西之间话语阐释的不平衡,这是译者必须加以明辨的。例如,作为对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回应,我国政府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概念,外交部采信“peaceful rise”这一译法。当该译语一出,国际社会又对“和平崛起”与否产生怀疑。为了严正视听,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官方又把“和平崛起”改述为“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后来,为更好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起全面发展的大国关系,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发展的新形象,作为对“和平发展”这一概念的延伸,我国政府又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理念。起初,外交部用“two major countries”来翻译“新型大国”,但是,美国却别有用心地将其译成“two great powers”,把中国表述为一个强国,词语内含偏向强权义,显然与我国领导人寄寓“新型大国关系”一语中的文化寓意与发展期待相背离,足见美国某些政客的险恶用意。

这说明,一方面,选用什么样的英文来叙说反映中国发展观点、理念与方式的言说,会直接影响我国国际交往的健康发展及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形成。另一方面,在西方话语界,仍存在着对中国现实认识上的极端的、简单化的、扭曲的偏见,曾当过德国歌德学院莫斯科和北京分院院长的阿克曼(Ackermann)说:“中国文学及中国译者如今在欧洲还会遇到不少的阻力,当向这里的出版社推荐中国文学作品时,被问及的首个问题往往是:作家是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当听到否定答复时,原本喜悦的出版商会立即展现一脸失望。”^[12]这种深度偏见显然制约了中国外宣叙事的成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

国在中国实践关键信息上对国际话语之影响力的单薄与无力的境况,是外宣翻译话语走出去所应面对和克服的一个瓶颈。

(二)外宣翻译叙事的话语权意识协调

话语权是外宣翻译中国话语叙事的一个关键要素。简单地说,“话语权”即为说话权,是调控国际舆论的权柄与力量,是影响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掌握话语权与否,决定了自我话语在国际舆论舞台上走向的如何,它有两个译介功效指数:一是话语站位够不够显眼,别人能不能看到;二是传播的声音大不大,别人能不能听得清。就目前的现实看,我国外宣翻译话语在国际话语舞台上仍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传了声音弱”的尴尬境地。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很多,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就客观原因,总有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总想通过各种舆论途径制造与渲染“中国威胁论”,因此它们极力地把控国际话语及其舆论导向的言说权,中国声音常处于被动的应对局面;从主观原因来看,我国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话语权建设的内力还不够。那么,突破以上话语困境,积极构建和提升外宣翻译的国际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站位于中国精神为首发意指:一是要选择正能量的话语;二是要更多地采用中国话语。

1. 选择代表中国经验本质的正能量话语

在探讨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时,应有对翻译中价值取向问题的原则性思考,并以此为恪守的译介总纲。这样,传播出去的社会文化和科技文化才有意义,才能使中国叙事译介覆载着满满的正向影响力。而不是不加思量、毫无选择、不论青红皂白地胡乱译介,更不是求量不求质,把“热情”变质为“急切”的草率。否则,只能落得欲速则不达的结果,最终可能造成中国话语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中译外不断扩大的翻译大潮背景下,很多人不甘示弱地将“fans”(粉丝)、“shanzhai”(山寨)、“diao-si”(屌丝)、“fangnu”(房奴)、“tuhao”(土豪)等音译词推广外译,其外宣的“责任与担当”值得怀疑。因为这些词语意指的精神内涵境界格调不高,不能代表中国话语的实质;而那些能反映中国实践标志性成果的词语,如“和谐号”“复兴号”“嫦娥四号”“玉兔二号”等话语反而少有问津。还有一种情况,少数中国关键词的外文表达不是源自国内的原创,例如,能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宇航员”的英文(taikonaut)却是“马来西亚人赵里昱帮我们创造的”^{[13]48}。这是值得外宣译者深思的。

首先,译者应该对译介话语有一个诚意而精确

的选择,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7],还有对中国实践叙说成果外译的忠实责任与担当,“使翻译成为一种目的性、选择性的活动”^{[14]88}。诸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共商共建共享”(“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等,以及展示中国科技发展成果、具有“中国标识”的新科技名词“天宫、蛟龙、天眼、墨子、悟空”(“Tiangong-2 space lab, the deep-sea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 the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FAST) Tianyan, the 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Wukong and the 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Mozi”)等话语,它们皆体现着中国文化元素与政治理念语汇、社会习惯表达、科技话语形式等相结合的述说特征,特别是像“Tiangong-2 space lab”这样的新科技名词的音译样式,以英语表达原创概念助推着外宣话语体系能级建设,是汉语拼音在国际科技话语舞台上的“前沿概念”和“精英词汇”,强化了中国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升的战略理念修养。

其次,翻译话语还需体现“正向传达”价值取向的情感与风格基调。因为,外宣文本自身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15]135},其宗旨就是为宣传中国服务的,即塑造端正的国家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这亦外宣的根本目的和内在遵循。译语要站位于正向的意识观念与立场,在捕捉原文的意象与风格中把握正确的导向,体现正面传播忠实,这是译者在翻译中应自觉恒守的一条语用原则。也只有于“心志”上对此的异常专注,视其为一个默认的基底内核,去体认原文内容所承载的国家意志及其背后的语境因素,才能做出科学的译语选择。例如,李肇星于2009年12月13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时曾提到某文本中的一句话,即“法轮功不同于其他的宗教”。他说,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它隐含着“法轮功也是一种宗教”的意思,这或许是撰稿人因政治意识不强所带来的笔误。译者在碰到这类表达时,就决不能照搬原文之意了,必须做出必要的语义筛选与过滤,进行话语重组,改正原语中的错误。李肇星建议译为“Fa Lun Gong is not a religion but an evil cult”(法轮功不是宗教,是邪教),此时,译者“不再是对原文意义的单纯解读者,而是把自己看做翻译活动中的一个能动执行者”^{[14]89}。这一灵活的翻译调整,就把外宣翻译正向传达之要旨很好地

体现出来,避免了传播中的负面影响。

2. 采用文本外译民族阐释性的“中国话语”

在外宣翻译中,对于原创性的中国叙事,译者要学会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的而又有阅读可接受性的表达方式、手段来译介外宣文本。比如“中国英语”(不是“中式英语”)已得到国外更多读者和官方的认可,对此,有学者呼吁,“我们迫切需要的莫过于全面梳理中国译者文本外译史料,深入翻译文本内部,展开类似话语细读,整理出这些翻译家文字生涯中散落的翻译表述”^{[16]20},其中许多译语必将值得在外宣译文中去应用和推广,而不一定皆从英文里硬套或照搬。例如:

“猕猴桃”原产于我国,欧洲人早已用“中国英语”将其表述为“Chinese gooseberry”,而国人却没能去珍惜,不去呵护,如在《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惠宇主编)中竟无此词语,《汉英大词典》(吴光华主编)里也不见收入。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里居然把“猕猴桃”的又一译文“kiwi fruit”也收入进去,还另取个名字,叫“奇异果”,着实给国人不适之感。许渊冲在讨论文学翻译时曾指出:“有些人,好像不是英文样式,我们就患‘失语症’,成哑巴似的。”^{[17]85}这种现象导致了学界对“Chinese gooseberry”的采用率偏低。笔者凭借中国知网对该词不同译语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结果显示:“kiwi fruit(862次)、kiwifruit(862次)、kiwi(284次)、Chinese gooseberry(40次)、Chinese kiwifruit(6次)、mihoutao(4次)”^{[18]10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中国已有的英语名字却被贴上了“kiwi”的标记。在这个方面上,也许日本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腊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乡植物,其英文为“wintersweet”,但当它传至日本时,被日本人冠上自己国家名,即“Japanese allspice”,印上了自己的痕迹。因此,似乎应该呼吁“在翻译中国特有或原产地为中国的植物名称时,可以大胆地为其烙上中国印”^{[18]101}。由此看来,理性审视中国关键词的翻译,突出文化自省与自信,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话语再创译法,让“‘中国选择’与‘中国阐释’成为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15]135},应是当今翻译界思考的又一个深刻课题。

其实,“翻译就是民族之间关于生存的对话”^{[15]135},这种对话的内生共情性与解释力当源自话语最力量的加入。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正能量的且体现中国精神特质的话语,才可助益翻译思想内力的盈满及其着力方向的正确性,让话语交流体现出双向视野的互信、共赢的跨文化功效。从

“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念革新脉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外宣话语译介中的这一精神力量。不过，在这一思想与精神力量的聚成中，基于恰切措辞的“元叙事”能力非常关键，因为“强大的叙事能力是一种权力资源”^{[19]5}。否则，偏颇或不准确的翻译就会授人口实，给西方总怂所谓“中国威胁论”以把柄。由是说，外宣翻译话语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角度来述写好译语，树立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形象，让外国朋友真正从中国话语里感受到中国人民爱和平、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是提升中国文化话语表述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本语用支柱与哲学基石。

参考文献：

- [1] 黄友义, 黄长奇. 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 以中国外文局为例[J]. 中国翻译, 2021(3): 28-35.
- [2] 曹顺庆. 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J]. 文艺研究, 1999(4): 33-35.
- [3] 章彩云. 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思考[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1-6.
- [4] 王莉. 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N]. 光明日报, 2017-09-25(11).
- [5] 习近平.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双语)[EB/OL]. 2018, <https://www.en84.com/6058.html>, 2018-12-06.
- [6] 葛传棻.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 中国翻译, 1980(2): 1-8.

- [7] 习近平. “鞋子合脚论”通俗又深刻[EB/OL]. <http://news.china.com/xjpsf/11138018/20130324/17743563.html>, 2019-02-09.
- [8] 宋晓春.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释[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04-109.
- [9] 谭培文. 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N]. 光明日报, 2015-01-15(16).
- [10] 蔡力坚. 政府公文英译浅析[J]. 中国翻译, 2015(6): 81-87.
- [11] 何自然. 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J]. 中国外语, 2013(5): 19-27.
- [12] 王怀成. 跨文化交流的意义[N]. 光明日报, 2017-03-28(7).
- [13] 陆建非. “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原义及英译[J]. 咬文嚼字, 2018(7): 48-49.
- [14] 周怡珂, 周领顺. 葛浩文“忠实”原则下的“直译”和“意译”[J]. 外语研究, 2018(3): 87-91.
- [15] 许多, 许钧. 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 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5): 130-137.
- [16] 辛红娟. 杨宪益翻译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7] 许渊冲. 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2012(4): 83-90.
- [18] 任开兴. 取法乎上, 方得正译: 为“茉莉”和 jasmine 的译名正名[J]. 中国翻译, 2018(3): 96-100.
- [19] 杨明星, 赵玉倩. 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百年演进与历史经验[J]. 国际观察, 2021(6): 1-2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the Core Elements of Its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in China

ZHANG Cai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its translation is an ingredi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paper explores it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language expressions, and the other is content transmission. In language expression, 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form of native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truct a translate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nt transmission, 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mbine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wo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here. For one thing, in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 text, translators should tap into the native culture and Chinese thought contained in it, highlighting cultural elements of China. For an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author takes the view that positive discourse which represents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selected, using Chinese discourse to express Chinese story, embodying positive-oriented valu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Chinese discourse; narration; interpretation

负面评价构式“V都VC了”话语功能及成因解析

张 力,金胜昔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文章在共时层面考察了构式“V都VC了”各构件的语法特征,将其构式义总结为:“(说话人)对事态结果的负面评价”,构式内又能进一步分为已然义与低概实现义。消极情感语境是“V都VC了”赖以生存的优势语境。日常会话交际中,该构式能够彰显主观性,表现言者的强调和反预期,具有丰富的语篇意义。该构式形成的动因源于突显与聚焦、构式压制、交互主观性与礼貌原则以及语言的经济性。

关键词:构式;“V都VC了”;话语功能;负面评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7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00-07

一、引言

在日常交流和工作学习中,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表达:

(1)不行,不行,买都买来了,不贴白不贴。(微博语料)

(2)小岚说,“我怎么敢,我怕都怕死了。”(《情幻》)

这类表达式内部存在一个副词“都”和两个分布在其左右的谓词性成分,为了方便论述,将其分别记作“V1”和“V2”,后者往往能携带补语“C”构成述补短语“VC”,句末跟随助词“了”。我们将这种结构紧凑、意义凝固的结构编码为“V都VC了”。

截至目前,该结构并未广泛引起学界的关注,而与该构式的上位层级结构“V都VP了”学者们则时有论及。刘丹青、徐烈炯(1998)较早关注到上海方言和普通话中的“V都VP了”现象,称之为“拷贝式话题结构”,认为该结构有某种肯定和强调的作用。王亚凤(2008)研究到现代汉语中的“X都X了”中的“X”为动结式结构时,构式表示强调动作的结果。王圣博(2008)依据内部语义关系将“V也/都VP了”分成了让步式、假设式、无条件式以及焦点式和话题式。邢晓文(2011)认为构式“V都VP了”的基

本意义是强调动作行为或状态已经实现。梁皓宇(2020)认为构式“V都VP了”可以强调“既成事实”以及强调“程度之深”。

总的来说,学界对“V都VC了”的关注并不多,对于其构件特征和构式义的提炼、语用功能以及生成机制等方面阐释得也不够全面和充分。

二、“V都VC了”的构式义界定与分类

判断某个表达式是否符合构式的定义,是开展构式研究的基础。Goldberg(1995)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构式当中任何一个成分的缺失,其整体意义都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部件在构式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作用,都会对整个构式的意义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一)构式界定

从形式上看,“V都VC了”是一个完型,形成了一个相对凝固化的结构整体。在实际使用中,“V都VC了”还具备“构式义”,即整体语义,其整体意义并不是各个成分简单相加之和,对构式义的概括需要借助语境,如下所示:

(3)丢都丢完了,还上什么保密课。
(微博语料)

例(3)的字面意思只是“已经全部失去”,但细

收稿日期:2022-12-11

作者简介:张力(1988—),男,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

细揣摩,能感受到其实说话人是想表达“(东西)已经全部失去,没有再找回的必要”。根据 Goldberg (1995)对构式的定义,“V 都 VC 了”已经成了规约化的语言单位,其整体语义无法仅从部分的语义相加推算得出,因此是一个构式,构式义概括为:(说话人)对事态结果的负面评价。

(二) 构式类别

施春宏(2022)认为,构式的多义现象是基于用法理论模型的逻辑必然。司卫国、文旭(2022)等学者也有相似看法,认为构式并非只有一个恒定、抽象的意义,而是包括很多密切联系的意义。

关于“V 都 VC 了”的构式义,王亚凤(2008)认为该构式旨在强调动作的结果。邢晓文(2011)认为“V 都 VP 了”强调动作行为或状态已经实现。梁皓宇(2020)认为“V 都 VP 了”强调“S 已经 V 了”是一个既成事实,以及某种情况程度之深。本文通过对语料的收集和整理,将构式概括为“已然义”以及“低概实现义”。

1. 已然义

构式“V 都 VC 了”具有已然义,强调“事态 V 已然结束”,如下例所示:

(4) 被同学拖着来看《失恋三十三天》,看都看过了,但是这效果也太差了嘛。你至少放个高清版嘛。(微博语料)

(5) 认识都认识了一年了马上,还说我们不熟呢。(哔哩哔哩语料)

例(4)中,说话人强调“看”的状态已经结束,“看完”是进度的终点,此时“VC 了”是小句内的自然焦点和句子语义的重心,也是句内被赋予信息强度最高的部分。同时,已然义往往引申为 V 的状态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在例(5)的命题当中,“一年”的时间长度早已超出说话人认为关系熟络的标准,表示一种“主观大量”的特点。可见,构式“V 都 VC 了”关注说话人的态度与立场,这种程度是基于言者当下的情感体验。

2. 低概实现义

“V 都 VC 了”除了可以表达“事态 V 已然结束”的已然义以外,还能够表示“低概实现义”,意思是“V 是达成 VC 最不可能/低概率的方式,但这个很难发生的事件却实现了”,如下例所示:

(6) 我看都看不耐烦了,人家做得一点都不烦,差距啊有没有。(搜狐语料)

(7) 人们见吴秀英动作很不熟练,都说:石柱嫂看都看会了,康三保和康有富把住手都没教会。(《吕梁英雄传》)

例(6)中,说话人的内心其实存在一个主观上的常态值,也就是基值(baseline)。在说话人看来,“做”要比“看”更容易导致厌烦心理,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量级高点的“做”还没有实现“不耐烦”的时候,处在量级低位的“看”就已经到达了“不耐烦”的程度。例(7)中的“把住手教”应该比“看”更容易学会,可现实却正好相反,吴秀英被两个人手把手指导也没学会,石柱嫂只是通过“看”就已差不多成功习得。

两种程度义都能彰显说话人对一事件态的负面评价,不过在焦点类型、共现成分等方面亦有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表义侧重的“V 都 VC 了”

构式义	类别	焦点/重音	共现成分
负面评价	已然义	VC 了	前后一般不能出现“连”“光”等焦点敏感标记或口语标记词。
	低概实现义	V1	V1 前面可以出现“连”“光”,后面常伴随“甚至”等副词。

此外,通过检索 BCC 语料库,本文得到了 189 条有效构例(construct),据此来考察两种不同表义侧重“V 都 VC 了”的分布情况。总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种表义侧重“V 都 VC 了”出现频率

类型	类频		例频	
	(type frequency)	比例(%)	(token frequency)	比例(%)
已然义	75	76.50	189	74.29
低概实现义	22	23.50	65	25.71

通过以上数据表明,“V 都 VC 了”在表达已然义时最为典型,占比达到 76.5%;而低概实现义“V 都 VC 了”在语料库中总体使用频率不高,仅有 23.5%。分布的情况反映了人们日常使用频率的不同,由此看来,在各种社会交际场景之中,已然义“V 都 VC 了”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低概实现义“V 都 VC 了”构式。

三、构件特征解析

构式“V 都 VC 了”由定项“都”“了”,常项“V1”“V2”“C”组成,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解析。

(一) “V1”槽位的语法属性

王圣博(2008)认为“V1”作为多是光杆动词。邢晓文(2011)认为充当“V1”的动词多为口语性较强的单音节动词。梁皓宇(2020)认为“V1”可以由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和心理动词充当。

(8) “看(书)都看完了,休息休息。”

(9) 朋友这样说,“就是在外边啊,热都热死了”,该怎么回她?(微博语料)

(10) 也害叶行远认错了主人,但眼看叶行远爱都爱上了,后来他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九州》)

(11) 老家伙死心眼,出都出去了,还要这个东西干嘛。(微博语料)

从形式上看,“V1”以及物动词为主,如例(8)的“看”可以支配宾语“书”,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谓词性事件。少部分不及物动词也能进入“V1”,比如例(9)中的“热”。“V1”槽位有时还可以允许进入复合词的前一个语素,如例(11)中的“出”。

从意义上看,“V1”以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为主,如例(8)(9),也多由心理动词组成,如例(10),多是“活动”(activity)类或“达成”(achievement)类情状,一般具有一定[+持续]的特征,能够在时间轴上占据一定长度,或者其发生和结束在转瞬之间,在时间轴上的起点和终点几乎重合,但重合后形成的状态得到延续,比如“放假”“死”等。此外,“V1”槽位排斥具有[+静态]特征的动词,如“姓、好像、是、等于、知道、嫌”等。

从韵律上看,“V1”以单音节为主,只有少部分是双音节的动词,但出现频率不高,例如:

(12) 休息都休息好了。

此外,未发现大于两个音节的“V1”存在的情况。

(二) 定项“都”的语法属性

“都”字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副词,许多学者着眼于“都”的义项,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下称《八百词》)为代表,认为:
a. 表总括全部,所总括的对象须放在“都”前;
b. 语气副词,相当于“甚至”;
c. 时间副词,表示“已经”,句末常用“了”,学者们讨论的时候,往往基于《八百词》中对“都”的义项划分,将其分别命名为“都1”“都2”和“都3”。

关于构式“V都VP了”中“都”的语义,多数学者认为,“都”总体倾向于表达主观语气或情绪,但仍然保留部分“都1”的客观总括义,如梁皓宇(2020)指出,“都”处在范围副词向语气副词虚化的过程中。王圣博(2008)也提到,“都”除在无条件式中表总括范围外,已经完全虚化为评注副词。也有少部分学者,如邢晓文(2011)认为“V都VP了”的“都”已经完全虚化成为语气副词。

(13) 踢都踢完了,你还过来干啥。

(微博语料)

(14) 旅游的事情,我们商量都商量好了,你可不能轻易变卦啊。

我们并不认同“V都VC了”中的“都”表示“总括”或“全称量化”,理由是若想从“都”那里获得总括解读,那么“V1”就应该是个复数性事件。在我们看来,例(13)中的“踢球”不像是一个复数性事件。

尽管郭锐(2022)和梁皓宇(2020)都有一种“V1”是对动作时间和动作内容的总括的语感,但其实若把例(14)中“旅游的事情”省略掉,句子依然符合语感,倘若省略后一分句“你可不能轻易变卦啊”,则一定不合法,从这点上来说,“都”和“旅游的事情”的关联不是必然的。

那么,“都”在“V都VC了”中的究竟表达什么?本文总体认可周韧(2019)对“都”的概括,并中和了郭锐(2022)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看法,在此基础上认为“都”的语义二分是一个比较好的概括方式,即“V都VC了”中的“都”本质上是表达“概率”和“主观性高程度”。“概率”表示事件发生的次数在参照系中的比例,与“频率”不同的是,频率强调某个单位时间里,事件发生的次数;概率则更倾向基于人们的认知,表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于说话人心目中的标准值。根据以上分析,“V都VC了”中的“都”义项的核心义位可以阐释如下:

/概率/:[量级性低概率]:说话人心中低概率事件的发生。

/主观性高程度/:事件已经主观上到达了说话人心中很深的地步。

(符号说明://:义位^①;[]:义位变体^②;[[]]:义位变体的变体)

(15) 走都走过来了,还开什么车呢?

例(15)中,开车之于说话人,就是到达目的地的最低概率方式,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当“都”表示“量级性低概率”时,往往隐含着对比的意味,也就是原本小量级事件就能造成一定影响/结果,却出现了说话人认为本应该出现而未出现的结果,因此感到震惊与诧异。

(三) “VC”槽位的语法属性

“VC”也是该构式的变项,通过搜集语料发现,“VC”多由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组成,有时还由趋向补语和数量补语充当,如:

(16) “怎么死的!不是早告诉你们是在广东被炸死的吗?死都死过了,你们还来要人,有个屁用!”王方吆喝。(《战争和人》)

(17) 看个电视剧,累都累死了。(微博语料)

(18) 反正自己来都来到了,不管是否出自本意,事实便是事实。

(19) 我等都等三天了,着急也没用。

(20) 吃(饱)都吃饱了。

(21) 做(了)都做完了,还怕说?

(22)写(作业)都写完了,还不让我去玩儿。

从“V1”与“V2”关系上来看,二者虽然同形,但在句法和语义上却有差异。“V1”一般不带补语,如例(20);不能带“着、了、过”等体助词,如例(21);部分及物动词“V1”在构式里不能带宾语,如例(18)。不过,有时候“V1”可以带宾语,如例(22)。

(四)定项“了”的语法属性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了”有两个,即体标记“了1”和句末助词“了2”。《八百词》中认为,“了1”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了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郑剑平(2005)、邢晓文(2011)、梁皓宇(2020)均认为“V都VP了”结构的“了”为语气助词“了2”。本文基本认同“了”在构式中除了起到完句作用以外,还发挥了增强语气的作用,如下例所示:

(23)买都买过了,还不赠送一个灯圈?(小红书语料)

一方面,例(23)需要后缀“了”方能够成句,另一方面“了”强调了“买过”的事实,实际是“我确认[我买过了]”。

四、“V都VC了”构式的语境分布及语用功能

(一)语境分布

从语料用例上看,消极情感语境是“V都VC了”可以生存的优势语境,中性情感语境次之,分布最少的是积极情感语境,如表3所示:

表3 语境分布表

语用环境	比例(%)
积极情感	4.7
消极情感	70.4
中性情感	24.9

1. 积极情感语境

(24)“孩子他爸,还是穿上试试吧,买都买来了,毕竟是儿女的一片心意。”

此时,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接受自己提议,表达一种鼓励的姿态。

2. 中性情感语境

(25)“谁知道呢?他死都死过了,但也许战前在南京时那次撒我传单的就是他吧?”(《战争和人》)

中性情感语境指的是说话人陈述客观事实,不具有明显的情感色彩。

3. 消极情感语境

(26)老戏码,每天总要上演这么一回,唉,实在是看都看腻了。(微博语料)

消极情绪语境是该构式分布的优势语境,该语境中的构式常常与否定句式、反问句式、否定副词、叹词等多表示消极情态的成分共现。

(二)语篇意义

负面评价构式“V都VC了”能够传达大量的语用信息,具有丰富的语篇意义,能现身于多种交际场合,本文将其总结概括为妥协义、规劝义、责备义和比较义,其负面评价呈现出语势的层级性。

1. 妥协义

妥协一般是指说话人面对现实情况而采取忍耐的态度,由于构式的已然义表示某个动作或事件已经完成或已经实现,言者不得不让步接受或承认。

(27)这东西(巧蛋)很多人是不吃的。

因为看上去使人身上发麻,想一想也怪不舒服,总之吃这种东西很不高雅。很惭愧,我是吃过的,而且只好老实说,味道很不错。吃都吃过了,赖也赖不掉,想高雅也来不及了。(《鸡鸭名家》)

例(27)中,尽管大家认为吃“巧蛋”不高雅,但“我”不得不承认吃过“巧蛋”的事实。

2. 规劝义

“V都VC了”表达说话人希望对方接受自己意见,如下例所示:

(28)甲:“看我都放弃了。”

乙:“不行,不行,买都买来了,不贴白不贴。”(微博语料)

例(28)中,乙鼓励甲勇敢尝试,看似是一种鼓励,其实里面多多少少也带“得不偿失”的负面评价义,因为面膜已经买回来了,没有再退回的必要。

3. 责备义

责备义是指说话人向听话者表达不满的消极情绪,按照程度轻重可分为三个等级,如下所示:

(1)埋怨

埋怨的程度最轻,说话人流露出抱怨的情绪,如下例所示:

(29)老张:你还用什么锯子,我拿手拍都拍断了。

如例(29)老张埋怨孩子没必要用锯子,自己用手就能拍断。

(2)嗔怪

嗔怪的语气比埋怨要强烈一些,如下例所示:

(30)“你说可笑不可笑,明明丢都丢完了,还上什么保密课。”(微博语料)

例(30)校方在文件丢失的情况下继续被安排上保密课程,学生因此而有抱怨。

(3) 愤怒

愤怒是等级程度最高的责备,说话人并不谋求双方达成共识,只为宣泄极度不满的情绪,如下例所示:

(31) 某女子:这不是你家店么?不能停你家门口吗?录都录下来了,跟我说这话有用么!公共车位,今天我不停这儿,别人也得停这儿。(哔哩哔哩语料)

例(31)中的女子认为视频已经录制了,再说什么道歉的话也挽回不了损失。

4. 比较义

(32) 我看都看得不耐烦了,人家做得一点都不烦,差距啊有没有。(微博语料)

例(32)中,“看”和“做”在语境之中构成了一组明显对比,即当“看”已经到达“烦了”的程度时,“做”还没有“做烦”,说话人因此而感慨。

(三) 语用功能

1. 彰显主观性

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的一种语言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我”的表现成分(沈家煊 2001)。在交际互动中,该构式多用作说话人对现实不满意的评价,以此来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简而言之,主观性是言者情感立场在话语中的投射。本文认为“V都VC了”构式可以彰显言者主观性,试看以下例子:

(33) 来都来五次了,一次也没见着。

例(33)“来都来五次了”字面意思是客观陈述“来”的次数,实际上说话人是想表现尽管来了很多趟,但没有见到想见之人的遗憾、抱怨、委屈等情绪。

2. 表示强调

“V都VC了”构式有表示强调的效果。一方面,复现在“都”两侧的“V”加强了构式的语势,有没有“V1”对构式的强调作用影响很大,试比较:

(34a) 都累死了,玩会儿手机不好吗?

(34b) 累都累死了,玩会儿手机不好吗?

另一方面,构式经常处在让步转折语境当中,也就是通常先肯定某些于自己不利并且已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后面再说出转折小句,这样更能强调说话人愤怒、敦促、命令等负面情态。

3. 反预期

“预期”即预先的期待,指心理上对未来将要出现的情景、情绪或结果的信念。反预期与预期相对,指的是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或相背离的话语信息。吴福祥(2004)根据反预期信息的不同,将反预期分为三种类型,即:与说话人的预期不符、与听话人的预期不符以及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不符。

第一,与说话者的预期不符。这是最常见的反预期类型,具有表达主观上认为出乎意料的情况,比如:

(35) 我想说,这种东西看都看出来,有隐藏意义吗?(微博语料)

例(35)中,说话人觉得显而易见的东西没有藏起来的必要。

第二,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是指生活在社团中的群体基于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建立起的预期,比如:

(36) 叶民主说过几次,睡都睡了这么多觉,干脆结婚算了,百林却不同意,说是你攒够了结婚的钱吗?(《埋伏》)

例(36)在叶民主所在时代的群体观念里,既然多次“睡觉”,也就到达了可以结婚的程度,可见说话人基于的是一种普遍认知。

第三,与听话人预期不符。这类反预期是因为反预期信息和听话人预期不符造成的,其预期的信息的来源是听话人,因此往往出现在对话当中,比如:

(37) 甲:“你为什么要告诉她咱们要偷溜的事,现在可好了,等她把我们的计划跑去告诉别人,我们如果跑得了那才怪。”

乙:“那你要我怎么办?她听都听到了。”展雪苗没好气道。(《弹琴》)

例(37)展雪苗不理解既然计划已经被听到,告诉那个人也是无奈之举,但自己绝对不应该因此被谴责。通过上例能够发现,反预期往往掺杂和凸显了言谈事件参与者的主观因素,期待和现实的落差造成了消极的情感色彩。

五、“V都VC了”构式的形成理据

下文主要分析语言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构式的形成,主要涵盖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 句法理据:突显与聚焦

突显与聚焦都源自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语言结构的线形顺序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构式在表达程度义时,说话人将“(都)VC了”编码为新信息,是句内的自然焦点,也是句内最得到突显的部分;而当说话人希望表达低概实现义时,“V1”编码的则是新信息,是句内的对比焦点。但是,无论在何种构式义下,也无论哪个部分作焦点,仅仅显示其焦点部分,没有背景的衬托,语义也是不自足的,如下例所示:

(38a) 走都走烦了,跑那么久还不累呢?

(38b)走,跑那么久还不累呢?

(39)怎么不去刷碗?吃完饭就抱着手机,刷都刷半天了。

在例(38b)中,只使用“走”句子完全不合法,只有补出“都走累了”,组成“走都走累了”才更合法可接受。因此,在“V都VC了”当中,“V1”和“VC了”二者互为彼此的焦点和背景(预设),在不同构式义当中突显情况各不相同,但都缺一不可。

聚焦是与突显密切相关的另一识解方式。司卫国(2022)认为,聚焦涉及概念化主体如何选取概念内容编排语言信息,并按照前景和背景的顺序加以排列。“V都VC了”构式当突显动作的结果,即表现已然义时,涉及概念化的推进过程:首先,事态“V1”得到概念化主体(C)的突显,前景化成为焦点,此时的背景为“VC了”。随着概念化进程不断推进说话人的注意力逐渐落在“VC了”上,使其成为焦点,“V1”则成了新的背景。在例(39)中,概念化主体首先让“刷”这个状态得到突显,并激活了与之相关的辖域,如人物、场地等。随着话语的推进,“(都)刷完了”开始成为注意的焦点。因此,从“刷”到“刷完了”是一个聚焦的过程。

(二)语义理据:构式压制

学术界对构式语法的研究普遍认为,构式与词汇存在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司卫国、文旭 2022等),既有顺应(adaptation),又有压制(coercion)。通常情况下,当词项进入构式时,构式整体会对进入其槽位的词项设置一定允准条件。上文提到,可以进入“V都VC了”构式“V1”槽位的词项通常具有[+及物]、[-静态]或[+完成]等情状特征。大部分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满足上述特征,在语义上与构式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V1”槽位的最典型成员。

不过有些时候,从表面上看一个词项的意义与构式义无法融合,甚至是比较矛盾的,但由于构式处于强势地位,会对该词项施加某种力量,迫使其与构式义融合。那些非典型性成员在进入各个槽位,尤其是“V1”槽位时,会受到“V都VC了”构式的压制。我们认为,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是词项与构式融合的最佳结果,而心理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以及大量动词语素的进入,则应被视为构式压制的结果。同时,“V都VC了”构式会迫使不及物动词、心理动词以及谓词性语素,或多或少改变其自身属性,从而和构式的整体语义顺利匹配。

总而言之,“V都VC了”构式不是组成分语义的任意套叠相加,与各个槽位允准条件相契合的词项

能够进入该构式,并获得典型成员地位,不满足允准条件的词项则需要通过压制手段获得非典型成员地位。

(三)语用理据

1. 交互主观性和礼貌原则

“V都VC了”由已然义引申为表达程度,也就是一种主观极量义,其后分句大多对命题表达主观判断,这就要求说话者既需要表达主观性,展示自我的价值、态度和立场的同时,具备交互主观性。“交互主观性”这一术语,指的是自然语言以其结构和正常的运作方式为说话人表达他(或她)对听话人态度和信仰的关注所提供的一种方式。另外,根据吴福祥(2004),交互主观性指的是说/写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读者“自我的关注”,也就是说为了达成交际的目的,说话人在交际会话的时候,会预先构建一个心理空间,其中说话人预判听话人可能持有对偏离自己所陈命题的认识立场,说话者常常从听话者的身份、立场、认识等“自我”角度出发,通过重新编码“V都VC了”为命题提供论据,使其对听者的共情作用得到增强。

最后,构式负面评价话语的浮现,可以看作面子威胁^③的佐证,消极评价的隐退,其动因离不开互动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具体来说,说话人在交际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听话者的“面子”问题,出于对他人的礼貌态度,在结构上体现为前后带有显性责怪、抱怨语气词的分句逐渐消失,语义方面体现为消极义的模糊化,也就导致“V都VC了”在话语活动中能够融入劝说乃至鼓励等较为积极的情感语境当中。

2. 语言的经济性

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并不“慷慨”,总想使用最少的语言要素来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语言的经济性不仅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增强表达的清晰度和准确性,减少误解和歧义。“V都VC了”构式的形成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

首先,“V都VC了”构式表达简洁、省力。在形式上,该构式极为简短,其中“V1”一般是单音节动词,构式内部也一般不插入其他成分。语义方面,该构式通常被整存整取,用于阐释事态的结果。其次,该构式是在认知经济性的驱动下,经过概念整合等过程而形成。如下例所示:

(40)准备都准备好了,咋又说下去了?

例(40)中“准备”没有携带宾语,准备的可以是外出的太阳伞、野餐的食物、看望病人的礼物等,但在不构成歧义的情况下,宾语就没必要以显性的方式展现。而且,“V都VC了”构式可以被重复利用,

可以通过替换、删减、移位等手段从而构建出复杂的“家族式”语言结构。

六、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在共时层面考察了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口语非正式构式“V都VC了”,认为构式整体语义是“(说话人)对事态结果的负面评价”,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已然义和低概实现义,前者表示“事态‘V1’已然结束”,后者表示“V是达成VC最不可能/低概率的方式,但这个很难发生的事件却实现了”。其中,构件“V1”多是活动类、达成类情状的单音节及物动词。构件“都”可以表示“量级性低概率”和“主观性高程度”,助词“了”主要发挥成句以及增强语气的作用。消极情感语境是该构式的优势语境。言语互动中,该构式具有彰显主观、表示强调、反预期的话语功能。在语篇中具有对比、妥协、规劝、责备等多种语篇意义。最后,文章对构式形成理据加以分析,句法层面的理据表现为突显与聚焦,语义上的构式强势压制,语用上的交互主观性和礼貌原则、语言的经济性等原则共同塑造了这类独特的构式。

注释:

- ①义位(sememe)是对虚词的用法进行概括得到的具有区别句义作用的意义单位。
- ②义位变体(alloseme)指属于同一义位的不同用法。
- ③面子威胁(Brown & Levinson 1987)认为,在会话过程中,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而礼貌的会话功能就在于保护面子,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

参考文献:

[1]刘丹青,徐烈炯.普通话与上海话中的拷贝式话题结构

[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86.

- [2]王亚凤.从三维结构看“X都X了”[J].语言应用研究,2008(2):30-31.
- [3]王圣博.试论“V也/都VP”的构造特征及其“也”“都”的表达功用[J].汉语学习,2008(5):69-77.
- [4]邢晓文.现代汉语“V都VP了”结构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1.
- [5]梁皓宇.“V都VP了”结构探究[J].现代语文,2020(4):47-53.
- [6]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施春宏,蔡淑美.构式语法理论的理论问题论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643-655.
- [8]司卫国,文旭.“现代汉语V1OV2的”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形成理据[J].现代外语,2022(6):744-755.
- [9]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0]郭锐.虚词义项划分的原则[J].世界汉语教学,2022(4):435-450.
- [11]周韧.也谈“都”字的义项分合[J].对外汉语研究,2019(20):26-39.
- [12]郑剑平.试论四川方言的“V都Vp”结构[J].西昌学院学报,2005(1):15-17.
- [13]沈家焯.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68-275.
- [14]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04(3):222-287.
- [15]陈昌来,朱皋.“X就X在Y”的整合及原因凸显[J].当代修辞学,2020(6):51-6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Function of “V Dou VC Le”

ZHANG Li, JIN Shengx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V Dou VC le” on a synchronic level, and summarizes it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s “(the speaker’s) negative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situation”.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it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already realized meaning and low probability realized meaning. Syntactically, “V Dou VC le” mainly serves as a clause of predicate and relational complex sentences, with the negative emotional context being the dominant context for its distribution. In verbal interaction, this construction can highlight subjectivity, express the speaker’s emphasis and counter expectation, and has rich textual meaning.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are emphasis and focus, structural suppression,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politeness principles, and the economy of languag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V Dou VC Le”; discourse function; contrast focus; negative evaluation

学习二十大精神 推动中国特色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

曹占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英属非洲殖民地为盟国提供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帮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受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等复杂因素影响,它们的贡献被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忽视。中国的世界史学界理应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真实史料为依据,以为第三世界国家书写信史为目标,加强中非学者间的国际交流,批判欧洲中心论,为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努力。

关键词:世界史三大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殖民地贡献;欧洲中心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8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0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整体实力偏弱,研究还不成体系,且自发端以来就受到外部影响,脱胎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和话语体系迟迟未能确立”。^[1]^[49]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三大体系离不开对非欧美国国家与地区的历史研究。笔者就英属非洲殖民地(包括附属国和委任统治地)的二战贡献研究,谈谈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三大体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2]^[1]众所周知,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包括英属非洲殖民地在内的所有反法西斯盟国众志成城的结果。二战结束后,英美等西方大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关二战资料,并开展学术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殖民地等弱小国家的贡献只字不提。即便有部分著述提及,也

把他们的功劳归在宗主国头上,因此这些弱小国家便成了“被遗忘的盟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距今已近80年,如何破除欧洲中心论,如何正确认识、评价殖民地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及其影响意义重大。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进而推动中国的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而且对推动“一带一路”、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殖民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巨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失去了与其东方殖民地的联系。急需大量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英国,把目光转向了非洲殖民地。英属非洲殖民地在矿产物资、农产品、经济作物的生产与运输、提供财政支持、提供兵员和劳工等诸多方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洲矿产资源对英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从非洲进口大量生产武器和穿甲弹所必需的钒和钴。例如,1943年从南非联邦进口的

收稿日期:2022-11-1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含中国抗日战争)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6KZD020);202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文明新形态”(2023-ZDJH-438);2021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级教改项目“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路径研究”(ZGJG202148B)

作者简介:曹占伟(198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

钒矿石比 1938 年多 50%，而从北罗德西亚进口的钴，几乎为 1938 年的 50 倍。^{[3]15-16}英国的工业用金刚石完全由非洲各地供应，产量占第一位的是比属刚果，其次是南非联邦、安哥拉、黄金海岸（今加纳）、塞拉利昂。根据粗略计算，金刚石的进口量从 1938 年的 1778000 克拉增加到 1945 年 11290000 克拉。战前，英国的非洲属地供应全部石棉消费量的一半左右，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仍旧保持。1938 年英国进口的 5.4 万吨石棉中，非洲占 2.6 万吨；1941 年进口 5 万吨，非洲占 2.2 万吨；1942 年进口 6.7 万吨，非洲占 4.1 万吨。石棉的主要供应地是南非联邦和南罗德西亚，而在战争末期则是斯威士兰，该地 1944 年石棉的开采量几乎为 1939 年的 5 倍。^{[3]18-19}

非洲的矿产在盟军重整军备和战时军火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远远超过了非洲大陆的政治重要性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战争的高峰期，非洲供应了盟国所需铀矿的 100%、工业钻石的 98%、铬的 93%、钴的 90%、黄金的 50%、铬铁矿的 39%、锰的 19%、钒的 24%、锡的 22%、铜的 17%。“由于非洲在某些关键矿物的供应上占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这么认为，非洲的生产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依赖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盟军就不可能满足对这些矿物资的需求。”^{[4]381-408}

英属非洲殖民地对二战的贡献不仅局限在战略物资供应上，还表现在兵员贡献方面。殖民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数百万士兵。英属非洲殖民地士兵被编入盟国军队，跟随宗主国的军队一起参与全球各大战场的军事和后勤保障行动。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各大战场，他们表现英勇，屡建奇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洲也是盟国士兵来源地之一。整个战争期间，仅有 4200 万人口的英属非洲殖民地贡献约 40 万名士兵（包括南非国防部队招募的 12.3 万名非欧籍士兵）。^{[5]144}英属非洲殖民地军队主要由皇家西非边防军、国王非洲步枪队、苏丹国防军、索马里骆驼军团，以及英国在南、北罗德西亚、南非联邦和埃及军队等分支组成。二战爆发前，这些军队主要用于维护国内安全，人数较少。二战爆发后，英属非洲殖民地武装力量迅速攀升至 50 万人左右。二战期间，殖民地士兵绝大多数是作为非战斗人员征召来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建造机场、港口、铁路和公路以支持中东和北非战场。

英属非洲殖民地军队参加东非战役。法国败降后，意大利加紧了控制地中海沿岸的行动。意大利

在东非的扩张始于 1940 年 8 月初，数万名意军士兵突然侵入仅有 1500 名英军驻守的英属索马里，并于 20 日占领其全境。与此同时，近万名意军向苏丹和肯尼亚发起攻击，并攻占了部分地区。然而，英国人并未放弃东非。英属索马里骆驼队得到了印度军队、国王非洲步枪队和新招募的未经训练的北罗德西亚部队的增援，在东非和埃及之间的供给线，英埃苏丹的作用十分关键。英埃苏丹国防军在漫长的南部边境骚扰并击溃了意大利巡逻队。到 1940 年底，英国和印度军队增援，皇家空军轰炸机和来自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部队，使英埃苏丹指挥官根·普拉特（Gen Platt）成功反攻卡萨拉镇，这是意大利人在英埃苏丹控制的唯一城镇。1941 年 4 月，英国军队重新夺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此东非战役结束。东非战役是英属非洲军队参加的第一场战役。该战役结束后，西非的军队被遣送回国，协助殖民地抵御维希政府的威胁。

从 1941 年底开始，英国从非洲各殖民地招募大量人员，他们在北非、中东和意大利战场，充当警卫、卡车司机、码头工人、矿工、厨师、医疗勤务兵和普通劳工。^[6]他们中许多人的工作是为前线的士兵运送弹药、食物和衣服，由于敌人的炮击和迫击炮的火力，他们只能在黑暗的掩护下工作。

英属非洲士兵参加缅甸丛林战。1942 年末，随着维希法国对西非威胁的结束，隶属于英国第 14 军集团军的第 81 师和第 82 师 20 多万非洲军人被派往亚洲支援缅甸和马来亚地区的抗日战争。非洲士兵作战勇猛，给日本法西斯制造了很大麻烦。一本被缴获的日本士兵的日记这样描述非洲军人：敌人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非洲。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怕死，所以即使他们的指挥官倒下了，他们也会继续前进，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体格健壮，非常勇敢，所以同这些士兵作战多少有点麻烦。^{[5]151}

二、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

（一）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的必要性

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受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和关注本国战争作用观念的影响，欧美学界鲜见研究非西方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情况有所好转，欧美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战争表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帝国 50 多万非洲军队在非洲之角、中东、意大利和缅甸等战场上为英国效力的情况^[5]，若开战役（缅甸战场）中隶属英帝国军队的两个非洲师在作战方面的成败分析，非洲黑人士兵的战争

贡献,东南亚沦陷后非洲成为盟国矿产资源和橡胶主要供应地,英属非洲殖民地士兵参战经历以及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7]等方面。

整体上看,欧美学者多从殖民帝国史角度分析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战争表现,但受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影响,这些研究对英属殖民地的二战贡献评价不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贬低。即便有部分著述提及,也把它们功劳归在宗主国头上。比如,隶属于英国第14集团军的第81、82非洲师20多万人,在缅甸和马来亚地区的抗日斗争中表现勇猛,而西方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多强调英国第14集团军的贡献,对于非洲师的表现和贡献则甚少提及,因此这些弱小国家便成了“被遗忘的盟友”。

二战时期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埃及具有典型意义。埃及扼守亚非两大洲,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及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协同国家和重要盟友之一,在政治、战略、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西方学者对埃及的二战贡献评价并不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贬低。他们认为,埃及仅仅是盟国与轴心国发生冲突的战场,埃及军队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很难评估;^{[8]227-239}埃及选择不参战,其角色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甚至有学者认为埃及通过战争集聚了大量财富。^{[9]121}此外,英国官方有意不对埃及的战争贡献给予过高评价,因为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个人发表的言论,都会被埃及人小心地储存起来,以备他们提出独立要求时使用。正如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所言: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对“二战”中有所贡献的盟军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偏差。美国被视为全球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英国已经承认,支持它继续战斗下去的关键来自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贡献。苏联的英勇反抗,牺牲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这成了现在人们对盟军付出意义的主要理解。^{[10]361-362}

苏联和发展中国家学者也在该领域进行了探索,但成果有限。比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亚·施皮尔特对二战在促进非洲人民觉醒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对非洲在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论证,但该著作成书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匮乏。阿拉伯学者希拉勒(Emad Ahmed Helal)的文章高度评价埃及在后勤保障方面为盟国所做的贡献。^{[11]244-245}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无法与欧美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更无法对欧洲中心论等错误史观进行系统性批判。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主要涉

及非洲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12],二战在促进非洲人民觉醒方面的作用^[13]等问题。这些学术成果坚持唯物史观,初步涉猎了非洲殖民地的二战贡献及其影响,但这些成果是以宏观视野来考察,再加上较少利用档案文献,导致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有限。

中国的二战贡献也一直被西方学界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战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研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等学术观点逐渐被欧美学者认可。部分学者开始撰写专著客观评价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比如,拉纳·米特尔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写道:“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淡忘……中国遭受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抗战死亡人数高达1500万~2000万,难民人数有8000万~1亿之多。”“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整场战争,国民党利用了大约400万军队,协力牵制了大约50多万的日本士兵,否则他们极有可能转移到二战的其他战场。共产党开展了游击战,有效地避免了日本人控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阻断了他们的军队和物资供应。”^{[10]362}

综上,欧美学者从殖民帝国史角度对二战中的英属非洲殖民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受欧美中心主义史观影响,他们不能客观地评价英属非洲殖民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而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在非洲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及二战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受资料、研究视角等因素限制,目前关于英属非洲殖民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研究尚处在宏观描述的起步阶段,没有系统性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开展相关研究十分必要。

(二) 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的重要价值

对中国的二战史和非洲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二战史研究不仅要关注英美苏大国以及“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问题,也要关注以非洲殖民地附属国为代表的弱小盟友的作用,以便书写更为全面、完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推动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对于非洲现代史研究而言,本研究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往对于战后非洲民族独立研究偏重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非殖民化等视角,

而从反法西斯战争贡献角度来探讨该问题的比较少见。本文认为非洲殖民地附属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为非洲被殖民地区的战后民族独立创造了条件。非洲各国的独立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它也宣告了存在5个多世纪的殖民主义统治的终结,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战是非洲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深化中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二战之前,中国与非洲殖民地附属国一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经过浴血奋战,这些国家赶走了帝国列强,走上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非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14]445}中国非洲史研究专家李安山教授在《非洲现代史》前言中写道:“如果说20世纪是中非共命运的世纪,那么,21世纪是中非共发展的世纪。”^{[15]前言3}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而且还有强烈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愿望,是中国“一带一路”共建的重要伙伴。从20世纪中非共同的命运尤其是反对法西斯势力斗争中寻找共同的历史记忆,无疑能增进双方的情感基础,促进新时代条件下的中非合作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高双方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利于增强非洲民族自信和集体身份认同。非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然而,在殖民统治时期,这些资源或被故意忽略,或是被选择性遗忘,或是被恶意删除,或是被肆意篡改,导致独立后的非洲人文社会科学面临非殖民化和重建自身体系的重大任务。^{[15]15}打破“非洲的所有文明成就是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带来的”这种所谓“历史空白论”僵化认识,就必须从非洲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着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非洲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和弘扬这一精神财富,有利于非洲人民重新找回文化自信,加强非洲团结,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

三、重构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新路径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我们观察历史的根本方法,是构建新时代世界史三大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欧美国家的档案资料、学术成果是我们开展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的必备条件,但这些资料必须要进行批判性消化吸收。欧美国家的档案资料以殖民帝国视角来记载殖民地的战争经历,贬低、弱化、忽视、删除殖民地贡献时有发生,欧美学者的学术成

果多以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写就,对非西方国家的贡献进行否定、贬低,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时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高辨别能力。

打破欧洲中心论。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曾在欧美列强殖民侵略非西方国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错误观念以某种形态残存在西方的档案资料和学术成果之中,致使我们可以利用和参考的历史档案和成果严重不足。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须首先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制约。但是,“撼动长期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大厦,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6]12}打破欧洲中心论,要求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在“突破”和“构建”两方面着力。目前中国学者在一些点上证伪了西方学者的概念与理论,但并没有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体系,^{[17]69}这要求我们继续推动国际学术界突破“东方 vs. 西方”“殖民 vs. 帝国”“中心 vs. 外围”等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二分法”。^{[18]24}与此同时,要注重中国特色世界史的概念、范畴、发展路线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建构”工作。特别是“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9]

加强中非学者间的国际合作。作为天然具有“国际范”的世界史学科,需要在同国际学术界的不断对话和碰撞中,尤其是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对话中,生发出具有生命力的学术火花,进而形成燎原之势。就英属非洲殖民地二战贡献研究而言,历史学者需要把历史档案寻找的目光从英帝国转向非洲殖民地。以埃及的二战贡献为例,阿拉伯学者依马德·艾哈迈德·希拉勒(Emad Ahmed Helal)依托埃及方面的档案资料,对埃及的贡献尤其是后勤贡献进行了详尽研究,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殖民地二战贡献打开了一扇窗。强化与非洲学者的学术对话,是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

中华民族拥有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应继承历史传统,自觉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 and 行动,埋头苦干、担当作为,加强对包括英属非洲殖民地在内的所有“被遗忘的盟友”二战贡献的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

参考文献:

- [1] 陈恒. 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J]. 探索与争鸣, 2020(6).
- [2] 胡德坤, 韩永利. 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15(8).
- [3] [苏] 亚·尤·施皮尔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 原料与人力资源[M]. 何新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 [4] Raymond Dumett. Africa's Strategic Mineral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J].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6, No. 4, World War II and Africa (1985).
- [5] David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African Soldi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 NY: James Currey Boydell & Brewer, 2010.
- [6] David Killingray. Labour Mobiliza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for the War Effort, 1939—1946 [C]//David Killingray, Richard Rathbone, eds. Afric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 [7] Adrienne Manns. The Role of Ex-Servicemen in Ghana's Independence Movement[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4.
- [8] Andrew McGregor.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Ramadan War [M].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 [9]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M].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6.
- [10] [英] 拉纳·米特尔.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 蒋永强, 陈逾前, 陈心心,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 [11] Emad Ahmed Helal. Egypt's Overlooked Contribution to World War II [C]//Heike Liebau, Katrin Bromber, eds. The World in World Wars: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 and Asia.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0.
- [12] 黄玉沛, 张忠祥. 非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再认识[J]. 历史教学问题, 2015(4): 68-73.
- [13] 顾章义. 非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赢家[J]. 西亚非洲, 2005(5): 14-18.
- [14] 习近平. 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广大 [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5] 李安山. 非洲现代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 [16] 马克焱. 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5(1).
- [17] 顾奎斋.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思考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3).
- [18] 张勇安. 走向国际的中国世界史与新文科[J]. 探索与争鸣, 2021(10).
- [1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Systems of World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O Zhanwe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ritish colonies in Africa provide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elp to the Allies,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However, due to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he Eurocentric view of history, their contributions had been ignored by Western academia and politicians. The Chinese world historians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ing the re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basis, and aim to write a credible history for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scholars, and criticize the Eurocentric theory, making efforts to truly build a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world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icism and style.

Key words: Three Systems of World History; The Second World War; colonial contribution; Eurocentrism

推进共同富裕的宪法基础

——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视角

张隽旖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动因,党的二十大报告凝结了党在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时期的最新发展理念和政治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法治道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宪法的核心原则与规范同“共同富裕”存在价值和逻辑关联,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根本制度遵循,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会在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实践落实与丰富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宪法;法治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19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12-05

党的二十大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历史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回顾总结了党过去五年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工作成果、经验,面向未来提出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中心任务,并极具魄力地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治新命题。在“法治”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共同富裕”事业亦须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轨道上逐步推进。

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共同富裕事业的起承转合

(一)共同富裕的历史推进脉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带领人民奋斗建立和建设国家矢志不渝的目标。“在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理念,共同富裕理念与表述形成于《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成为国家目标与执政党的理念。”^[2]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共同富裕”一词除了偶尔出现在农业问题的讨论中,并未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纲领文件或政治论断的核心话语,但是共同富裕理念是始终内涵于社会主义理想和为了全体人民幸福的初心之中的。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基于当时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社会主要矛盾对共同富裕做出过一系列重要阐释。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3]1990年在论及发展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本质联系在一起,讲道:“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形成了经典论断,并且对推进共同富裕做出了策略安排,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一时期对共同富裕提出分步走战略是基于当时国家财富积累情况和社会生产力条件

收稿日期:2022-12-31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共同富裕的宪法基础及其保障问题研究”(2023-ZDJH-018)

作者简介:张隽旖(1988—),女,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

现实而定的,这一决断延续了党实事求是的优良政治传统,是国家谋求出路和发展转型的重要决策。

新时期,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果和经验,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精准地调整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与前一时期提出的共同富裕分步走发展策略之间存在逻辑联系,事实上在党的战略布局之中也早有预判。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均衡正是“先富带动后富”所基于的客观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不均衡”代表国内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明显高低差距,有一部分地区财富积累水平和发展综合条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有能力带动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因此,新时期党对国内社会矛盾变化的论断,就是推进共同富裕分步走战略向下一阶段迈进的启动器。

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论断,在推进共同富裕事业新的历史阶段,近些年党和国家总结出了现阶段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核心矛盾和问题,同时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发展理念、治理方式和政治决策,它们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梁柱,并集中体现在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比如,“共享理念”“公平正义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民主”“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等。

(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且极具魄力地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命题,将“共同富裕”“现代化”“法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指明了法治路径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依法治国推向了新高度,报告中不仅专章论述了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而且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命题下,二十大报告中围绕现代化目标做出的政策、制度、策略规划安排均将与法治产生联系,影响并落实于具体的法律制度。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

用”,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共同富裕”理念将影响我国未来相关法律制度制定和司法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围绕推进“共同富裕”而提出的政策、方案亦有赖于具体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实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法治道路,而且为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导向,这与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紧密相扣的。与此同时,二十大报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就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明确了宪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工作均应以宪法原则和规范为基本遵循。

二、共同富裕与宪法原则的逻辑关联

(一)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原则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宪法草案时讲道:“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5]“社会主义”一词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出现了50次,在宪法中它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类型概念存在,而且其蕴含的内涵、价值、理念对宪法中的话语、名词、规范存在逻辑限定作用,是保障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不动摇的根基性宪法原则。

社会主义原则成为一项宪法原则起始于1918年的《苏俄宪法》,随后1919年颁布的德国《魏玛宪法》也吸收了这一原则。从宪法史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原则缘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生产力飞跃,资本主义垄断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社会背景。为了修补近代强调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宪法秩序的短板,秉持“社会平衡”理念的社会主义原则应运而生,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矛盾,并成了现代宪法的重要标志。有学者认为,“立足我国的历史、文化和宪法发展,会发现社会平衡的理念有一个中国表达:共同富裕”^[6]。在当前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社会主要矛盾下,正是特别需要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的时刻,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充分彰显其宪法原则的作用和价值。我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事业的宪法依据核心,围绕公平正义价值、共享理念,

以及均衡发展、特别保护弱势群体等政策目标,指导、规范着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关键的社会保障、财政分配等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二) 共同富裕与平等原则

平等是宪法文明发端以来矢志不渝维护的核心价值,也是共同富裕理念遵循的重要基础价值。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有学者对共同富裕之“共同”进行分析,认为它“既表达了主体的全部性与整体性,也表达了社会成员主体间的相同,即人人平等。所以,‘共同富裕’之‘共同’意蕴在宪法上就是表达了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价值、原则与权利”^[7]。

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以促进和彰显公平正义为主旨,具体主要体现为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方面的平等,以打造发展机会平等、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平等的社会生存环境。平等的就业政策、公平的营商环境是共同奋斗的前提基础和验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朴素奋斗法则的土壤条件。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就需要平等的就业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的竞争机制等法制条件做保障,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就是构建公平法治环境的根本依据。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分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并不是阶段性地背离平等原则,事实上,党中央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构想是系统全面的,只是受当时突出矛盾影响,大众对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阐释“先富带动后富”时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起来,并且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3]由此可见,“分步走”只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实施步骤,“共同”始终是目标。党中央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包含了分步走策略,也对先富带动后富阶段的实施途径方式从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层面提出了基本设想和预见安排。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始终是党和国家的理想坚守和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党基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国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的应对策略。

发展至新时期,党中央本着务实态度依然重视对共同富裕事业推动过程中具体目标的规划和安

排。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到,“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8]。新时期对共同富裕具体目标计划描述中的“差距逐步缩小”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等言辞清晰地包含了平等、公平价值色彩。为实现这些指标,国家须围绕平等原则构建完善相关财政、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体系作为制度保障,使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的共同富裕现代化事业与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形成更为鲜明的呼应。

(三) 共同富裕与民主原则

民主是法治坚守的重要价值和原则。我国《宪法》总章开宗明义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9]新时期,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群体要始终坚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治理思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1],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当代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宪法确立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的具体制度、途径、方式规则,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供了基础法治方案。

同时,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民主治理的表述也与民主原则相辅相成,“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当前,共同富裕的推进工作重点在于夯实高质量发展,构建协调的财富初次、二次、三次分配制度,设计均衡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把握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等方面。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宪法民主原则,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决断和安排需要在宪法规范指导下,在法治轨道内通过组织开展民主政治活动来征集意见、充分讨论、达成共识,通过全面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关注民之所愿,回应民之所呼,解决好共同富裕事业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决策命题。

三、推进共同富裕的宪法规范基础

宪法实践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共同富裕事业有赖于具体的国家财政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法律制度系统的配套保障,在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下,以上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工作须以宪法规范为基石。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之一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工作应首先在宪法规范中寻求制度之基。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仅是一种政治共识和政治事实,也具备法的规范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征程历史节点下,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机会公平”“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理念、策略、目标,以改善发展不平衡、缩小贫富差距,与推进共同富裕事业之间存在清晰的目的与方式的逻辑关系。二十大报告内容彰显了党全面推进共同富裕事业的决心,从各个层面提出的系统性建设方案和路径安排展露出了党带领全国人民奋斗走向共同富裕的治理智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也才能确保宪法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出最大功效和优势。”^[10]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宪法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一个规范群,除了《宪法》第十五条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内容的直接表述条款,《宪法》中的所有制条款、分配制度条款、关于经济主体类型的描述条款、财产权条款等因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因此,常被解释归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范畴,共同勾勒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样貌。

我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决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总体决断:作为定性词的‘市场经济’,意味着对自发秩序、自利、自由、竞争的尊重和保护,而作为限定词的‘社会主义’更多指向社会分配的公正与平衡,二者各有规范侧重而又融贯为一体。”^[1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原始张力牵引平衡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价值格局动态发展,证明了没有最好的经济制度,只有最合适的经济制度,而“最合适”的评判匹配对象是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关制度安排也会随之而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公平”与“效率”出现频率形成了悬殊对比(“效率”一词仅出现一次,具体为“提高行政效率”),虽然二者出现的语境并非都于经济制度之中,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当下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心理态度。其实,从功能主体角度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伪命题,市场主导效率,政府保障公平,保障公平不是市场的功能,而是政府的职责。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命题下,不同主体的功能作用应被充分考虑并设计落实于具体法律制度之中,以确保各尽其能。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到“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实于具体的法律制度时,一方面需要以宪法中确立的产权制度为总纲充分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守护勤劳奋斗的原始动力。另一方面要以宪法中的财政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基础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条件。依法保护产权确保市场竞争活力,构建公平竞争机制促进市场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法治轨道上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落实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重要途径,我国《宪法》第十四条第4款明确表述:“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要求在国家经济发展、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同步合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面对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情况,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12]。

未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在宪法规范要求下进行完善,一方面,在共享理念、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保障制度要注重“全体”覆盖面的问题,

对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补短板”的力度,在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区域间促均衡。另一方面,在保障“机会公平”和“精神财富”层面,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需在医疗、卫生、住房、生育、就业等传统社会保障领域基础上进行合理扩展,重视对促进“教育公平”“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从根源上为“勤劳致富”“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制度条件。

四、结束语

二十大报告是党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节点上总结经验、探索道路的最新政治判断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是研究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素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治新命题,其“核心在于,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面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之中,并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亮底色和价值追求”^[12],作为中国式现代本质要求之一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推进事业也必将成为中国法治实践的重要内容。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共同富裕事业的推动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共同富裕事业的推进有赖于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在具体法律制度构建中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宪法原则和制度也将在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充分实践与丰富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 - 10 - 26.
- [2] 韩大元. 20 世纪 50 年代“共同富裕”理念形成及其演变: 以《共同纲领》制定中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J]. 交大法学, 2022(6): 6 - 24.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 - 10 - 28(00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五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51.
- [6] 张翔. “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 39(6): 19 - 30.
- [7] 范进学. “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 自由平等共享与法治国[J]. 交大法学, 2022(6): 40 - 57.
- [8]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先锋, 2021(10): 5 - 8.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 人民日报, 2018 - 03 - 22.
- [10] 苗连营, 陈建.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指向[J]. 江海学刊, 2021(3): 138 - 148.
- [11] 张翔.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互洽: “经济宪法”的视角[J]. 交大法学, 2022(6): 25 - 39.
- [12] 苗连营.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 - 12 - 27.

(责任编辑 许峻)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Juny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key motiv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denses the Party's latest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olitical conclus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centennial journey of struggle, and points out the way of the rule of law for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The core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re value - based and logically related to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compliance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way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core will be practiced and fully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itution;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医学临床实习模式对机械类专业性实习的启示与借鉴

李宏德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医学教育的突出特征是其极强的临床实践性,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向临床医生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培养途径,并在长期实践教学中形成独特的成功模式。文章通过对临床实习的目标、达成途径与基本经验的研究,提出临床带教、预实习和查房讲评等经验做法对机械类专业的实习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并给出应用的方法建议。

关键词:医学;临床实习;机械;专业实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2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17-04

一、引言

在我国,很早就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南宋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强调要行、要做,也就是要实践。教育家陶行知将“知行合一”用于指导教育,逐渐形成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已在制度上确立了实践教学的地位,实践教学成为教学安排的重要内容,通过相关法规文件对实践教学提出要求,保障和促进实践教学的实施。实习是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是获得能力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实习作为必修的教学环节写进文件,列入计划,安排教学。医学教育因其特殊的培养对象和职业服务对象,临床实践性极强,对实习更为重视,要求更规范、更严格。通常,医学实习职业特色鲜明、质量较高。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向临床医生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培养途径,是医学生职业素养、临床技能、临床思维养成的关键环节,并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值得研究探析、总结借鉴。机械类专业的专业性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顶岗实习)与医学临床实习有很多相似之处且对学生职业成长同样重要,借鉴临床实习的经验做

法对机械类专业性实习具有实际意义。

二、临床实习的目标、达成途径与基本经验

(一)对临床实习重视程度高、构建系统的制度体系

早在1951年,《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的决定》中就对医学专修科的医学实习强调要求加主科实习六个月至一年。^[1]在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管理方面,1992年,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教高[1992]8号),要求各级各类医疗单位均有职责和义务承担教学任务,并对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三种类型的临床教学基地在资质、规模、科室设置、床位、设备、师资、应承担的教学任务、临床教学环境和教学建筑面积等均作了规定。在临床实践和医学教育综合管理方面,2008年,卫生部、教育部发布《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卫科教发[2008]45号文),2009年,教育部、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9]4号)。前者对临床实践教学临床教学基地的性质功能、带教教师和医学生的行为职责做出系统清晰的规定。后者统筹医学教育全局,提出临床实践教学的基本理念、原则要求和工作思路,作出宏观指导。

收稿日期:2022-12-20

作者简介:李宏德(1966—),男,河南商丘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研究。

2008年,教育部、卫生部颁布《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2018年,教育部发布《临床医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十分重视临床能力,对临床技能和临床工作能力提出要求,强调必须安排临床实践教学,提倡早接触临床,对包括临床实习在内的临床医学教学质量立起国家标准,是临床医学教育的基本遵循和工作样本。^[2-3]

上述文件对临床实习构成全方位的指导与管理,从综合文件到专门文件,既有宏观指导,又有具体的工作要求。尤其操作性强的专门性文件是对临床实习的进一步强化和推进,是开展临床实习的有力手段,也是管理上的不同之处。

(二) 临床实习政策导向明、实习目标清

医学教育质量标准的实施,使制度从原则要求转化提升为工作标准,其约束作用也更强、更明晰。《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2008年版)和《临床医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临床医学教育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分别作了明确规定,目的使学生获得医学基本训练、具有初步临床能力。其中对技能目标提出13条要求,目的是使学生在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制定和执行诊疗计划、临床操作、临床思维、急诊处理、沟通技能等关键临床能力上得到基本训练。并在临床实习的组织上提出标准,如为确保学生有足够时间接触患者,要求在临床环境中安排临床医学课程;为确保临床实习效果,要求合理轮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主要科室的临床实习;提倡早临床、多临床。^[3]

各医学院校在上级指导文件之外,制订了具有本校特色的操作性、实施性文件,如临床实践教学管理办法或临床实习实施细则等,对临床实习的具体工作做出翔实的作业安排,确保临床实习落到实处,取得切实成效。

(三) 互为有用、促进校院紧密合作

互相之间有用,是临床实习校院合作双方极为可靠的结合点。相互有用是合作者长期合作共赢的可靠基础,这既是医学类实习的有利条件,也是它的特点和经验。容易理解实习医院对实习学生是有用的,学生在这里能学习锻炼,能成长收获,能得到学校里无法给定的诊疗知识、诊疗技能和职业认识。医院能给学生提供临床教学的场所、器材设备、教学规范、技能训练、带教医生、专业指导、医疗程序、诊治经验、患者病历、职业环境等校内无法提供或无法如此真实提供的临床实习成套方案、实习内容、实习条件和实习环境。实习学生对医院也是有用的,为

使学生对医院有用,学校和学生都下了很大功夫,有针对性地开展实习前准备如实习前强化培训、预实习等专项训练使学生获得必要的诊疗基础。

预实习或临床实习前强化训练,是实习前的强化准备,围绕临床实习的相关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仿真训练和强化训练,使学生反复了解医院、了解医疗、接触临床、触碰诊疗,主要为强化临床素养、临床技能、临床思维能力打下良好认知基础和实操技能。同时,预实习具有较强的角色带入感,强化实习生的心理准备,实现与临床实习的零距离接轨。预实习是医学类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个特色,使实习学生在医院有用、用得上。学生在医院能用得上,能帮上忙,学生就可以辅助医生参与基本的诊疗环节,就会增强临床实习的效果。^[4]

(四) 实习基地建设工作实、用得上

承担教学任务包括实习任务是一种制度安排。《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就要求各级各类医疗单位要承担教学任务,对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三类实习基地在条件建设上分别提出量化标准,并在政策扶持、经费投入方面也做出明确规定,对基地开展评估认证,这些措施有效推进了临床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学校对实习医院的选取有明确的标准,医院对实习学生的实习基础也比较清楚。学校对临床实习医院的选择非常慎重,各级各类主管部门有要求,学校更是对医院有具体的遴选标准,详细又有操作性,对资质、规模、条件、师资等有相应规定。医院对学校教学进程及实习学生的学业基础也是心中有数,对临床实习学生所具备的素质、知识和技能准备的程度有基本的了解。双方这种一定程度的了解给实习工作的开展奠定有利基础。

(五) 临床实习方案内容翔实、临床带教成效好

医学院校为保障临床实习实质性开展,一般都制订有《临床实习实施方案》《规范临床带教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化临床带教工作实施方案》《临床带教规范》《带教师资培训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在实习中实行“两栏三卡”制度,开展检查、督导和现场观摩带教,组织管理十分到位。医学院校的临床实习方案内容极其翔实,包括实习教育、实习环节、项目任务、时间安排、科室轮转、实习管理、考核评价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实习环节和项目内容上极其细致的安排,使得实习运行如同机器般运转,稳定有序有效。

临床带教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带教模式,组织有力,特色鲜明。《医学教育临床

《实践管理暂行规定》为临床带教提供了遵循依据:医学生在临床带教教师的指导下,可以观察患者、询问病史、检查体征、查阅资料、讨论病情、书写病历及病程记录、填写检查和处置单、医嘱和处方,对患者实施诊疗操作、参加手术。这种带教模式,将临床实习学生编入带教医生团队,使学生和医生在时间上几乎时时在一起,在空间上几乎处处在一起,就使得学生和医生随时随地的一起教学相长。通过教学查房、案例教学、现场教学、讲小课、临床学术讲座、临床思政教育、出入科考核等将带教工作做得极为细致。^[5]在长期不断的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增加了实习学生和带教医生的熟悉程度,增进了感情,这些都为教学、合作与共事带来较大助力,临床带教和团队协作使临床实习成效扎实。

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为临床实习学生营造不可替代的真情实感。一个个患者,既是服务的对象、诊治的对象,也是学习训练的案例,对患者面对面的问诊、带教医生的查房诊疗讲解等都为学生提供了各具特色的现场教学案例。对不同病情日积月累的认知提高,长年累月的诊疗经验积累,都会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成长,促使学生向职业医生转化。

查房讲评或讲小课是灵活有效的教学模式。针对个别典型病历或典型医疗问题开展查房讲评或讲小课等教学研讨,无疑会很好地引导学生深入地就典型病历病情进行关注、开展学习研究。通过一次次对不同理论问题或不同病历的探讨,会不断积累学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渐渐地会使学生嬗变为获得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的职业医生。

(六)从人的朴素情感切入、临床思政教育入心

临床诊疗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人与人的沟通与触碰,很多时候存在着情感的交流,是思政教育最温情的时刻,也是容易获得共鸣和认同的时候,这些都是开展临床思政教育的优势,引导医学生树立人道主义精神,以同理心认识医患关系、理解医患关系、处理医患关系。^[6]

《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临床教学应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德医风及职业素质教育。《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加强以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关爱病人、尊重生命的职业操守,对思政教育进行了规划引导。

医学院校在临床实习中围绕家国情怀、道德素养、医德医风、生命健康、救死扶伤、医患沟通、伦理

法律等诸多方面构建了思政教育目标明确、教学内容丰富的立体化的大思政教育,尤其是珍视生命、尊重病人是人的最质朴的情感,起到触动学生心灵的作用。

三、对机械类专业性实习的启示与借鉴

(一)借鉴临床实习的制度设计,构建保障有力的制度安排

临床实习的制度设计有三个基本经验,一是制度体系完整,形成全面保障;二是专门性文件操作性强,便于达成实习工作落地见效;三是在机制上形成教育主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共管合力。借鉴这些做法,研究机械类实习的专业特点和实习企业的生产特点,针对机械类专业实习的实际需要,建立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使实习工作的各个方面有可靠的政策支持和指导规范。研究机械类专业实习的各个环节尤其是细节要求,为达成有效实施制订触及实习操作层面的专门性文件。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构建部际合作共管的机制,形成共管合力,尽可能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同时,统筹实习企业的利益和义务两个方面,让企业有承担实习工作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性。

(二)可行方案与有力组织是取得实习成效的重要措施

医学类专业学生的临床实习是对人(患者)进行操作的实习,应该是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实习,是最慎重的实践教学。所以能够安全稳妥地实施,细致可行的实习方案、校院双方的有力组织尤其是临床带教模式是极为重要的措施。对于机械类专业的实习,应深入研究实习过程中涉及的各科室、各工种的工作特点,制订实习流程更详细、操作指导更清晰的实习实施方案。选派能较好满足实习要求的指导教师,建立师带徒的带教模式,形成紧密的指导关系。使学生实习有问题时有章可依,有疑难时有人带教。

(三)预实习让学生成为企业的帮手

预实习或临床实习前强化训练使医学生在心理上和诊疗技能上作了必要准备,使学生在临床上能用得上。而在机械类专业实习中不敢让学生直接操作生产设备,一是怕影响生产,二是怕出现安全事故。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专业实习之前开展针对性的预实习或强化训练。制订为预实习保驾护航的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制订周全的实习方案,建立有力的教学组织,安排得力的指导教师,通过预实习解决学生不能上手的技能问题、不敢上手的心理问题,让学生具备在老师或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生产作业的基本技能和信心,从而获得企业

的信任,获得协助相关人员参与生产过程的机会。

(四) 师带徒做好细节

临床带教是临床实习的经验模式,其核心是带教医生近距离的言传身教。制造类企业中也有师徒制的传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在实习中得到应用。研究分析机械类专业性实习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借鉴医学临床实习的经验做法,建立相关保障措施、激励政策,制订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筑牢师带徒的紧密指导关系,充分发挥师带徒便于增强身份认同和责任意识的优势,强化指导教师带教的指导意识和学生接受带教的学习意识。借鉴临床带教中的一些教学方法,使师徒在实习过程中通过生产现场教学、典型产品制造的案例教学、问题讲评、实习日志记录等各个环节的细致的传帮带,使学生得到切实训练和提高。

(五) 选好触动心灵的切入点是课程思政的关键

思政教育的效果取决于能否触动人心。临床实习课程思政的优势在于学生面对病人易于触及的人文关怀和珍爱生命的质朴情感。同样,在机械类专业性实习中,也能够找到触动学生心灵、给学生成长帮助的内容,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是建立面向机械类专业实习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保障思政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二是在实习中安排专门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块,保障课程思政得到有深度的开展。三是开展全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利用好

实习现场随时出现的思政元素,用身边的现实的事例因势利导,使学生获得最直接的教益。四是选好触动心灵的切入点,建立健全课程思政素材库。贴近学生情感深度挖掘与实习教学密切相关的思政元素,用能够启迪学生心智、产生思想共鸣、满足成长需要的充满正义和力量的感人事迹、奋斗故事来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让打动人心的正能量广泛传播,让触动心灵的情感引人共鸣,使人从中获得教育。

参考文献:

- [1]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年)[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8-89.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300-301.
- [3]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648-656.
- [4] 陈飞,严晓红,聂秀.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习前强化训练方法改革探讨[J]. 考试周刊,2012(8):9-10.
- [5] 郝辉,金超,郭建新,等. “多维度”实习带教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实习模式构建为例[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5):733-737.
- [6] 陈梦云,彭科,邓映霞,等. 课程思政在医学生临床实习教学中的探索[J]. 课程教学,2022(5):67-69.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of Medical Clinical Practice Mode to Mechanical Professional Practice

LI Hongde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medical education is its strong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for medical students transforming into clinical doctors, and forms a unique successful model in long-term practice teaching.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objective, approach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clinical practi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xperience of clinical teaching, pre-practice and ward round is of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practice of mechanical specialty,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application.

Key words: medical; clinical practice; mechanical; professional practice

新时代高等特殊教育理论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实施路径探析

罗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开展新时期高等特殊思政教育,必须要坚持以新时代教育思想为引领,通过加强教育理论学习,筑牢育人信念;弄通新时代高等特殊教育要求,提高思政教育能力;践行高等特殊教育规律,做细、做实、做好高等特殊思政教育工作。培养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高素质特殊人才,引领特殊群体共建共享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成果。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思想;特殊群体大学生;思政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21

中图分类号:G769.2;G7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21-04

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立足发展现状,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精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系统学习这些理论,可以为高等特殊教育开展高质量的管理育人实践提供根本遵循。引导高等特殊院校更好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高效地开展“三全育人”工作,服务学生引领残疾大学生成长成人成才。

一、加强教育理论学习,筑牢育人信念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重视德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德育在我国历代教育体系中都居于核心地位。这一光荣传统从“教育”二字的本义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2]揭示了我国的历代教育都将德育作为核心任务的传统。三千年来,我国的教育实践活动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坚持以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深刻影响着新时代我国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与形式。

(一)深入学习高等教育思想

“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作为高等特殊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掌握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才能开展好教育引导工作。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阐述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提出教育要以德为本,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点与核心任务,为开展高等特殊教育学生管理服务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特殊教育思政工作者,在开展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育人工作中必须以此为基础,以自学、互学、研学等为形式,对新时代教育理论开展深入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与根本任务,领会教育思想的时代精神。

(二)深入学习特殊教育理论

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别在于教育对象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于教育对象的差异带来的教育方式、教学手段的差异。特殊高等教育群体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高等教育的共通性,

收稿日期:2022-09-05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特殊教育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2023-ZDJH-484)

作者简介:罗强(1975—),男,河南正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特殊教育文化及思政教育。

更有特殊群体的特殊性。要做好高等特殊教育的思政教育工作,必须要在掌握高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学习特殊教育理论,掌握特殊对象的生理、心理及伦理特性,以及开展特殊教育的原则立场、方式方法。

(三) 深入学习特殊教育法规制度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参与社会发展进程,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在不同的座谈、会议、讲话中都对特殊教育的发展提出要求,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促进特殊教育的发展。仅从国家层面看,为推动残疾人教育事业,国家先后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与条例。

表1 国家层面的残疾人教育法规条例

序号	法规制度名称	具体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2	高等教育法	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国家采取措施……扶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发展。
5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师、物质条件保障和奖励与处罚做了明确规定。
6	残疾人就业条例	对用人单位的责任、保障措施、就业服务和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

为提高新时期特殊教育育人质量,教育部等部门又联合印发了《“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特殊教育规律……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3]。特殊教育群体由于生理及心理的特殊性,与健全大学生相比,他们有着独特的需求。作为特殊教育的学生思政素养提升的引领者、日常工作的服务者,在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中,需要认真学习相关的规章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认识上重视高等特殊思政教育工作,为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储备良好的理论知识。

二、弄通新时代高等特殊教育要求,提高管理服务能力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4]要开展好针对特殊群体的教育及管理服务工作,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思想作风、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扎实的日常管理能力。因此,要坚持教育者先接受教育的原则,学思结合,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丰

富思想资源,以辩证的思考、深入的钻研,切实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领悟要求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引领自己的教育管理工作。作为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正确三观,提高工作能力的法宝。

(一) 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管理与育人的关系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授知识、培养技能是高等特殊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专业课教师需要通过“解惑”来培养特殊教育群体的专业能力,启迪智慧,引领成长。作为承担特殊高等思政教育的工作者,其着力点在于通过管理实践承担起“传道”的责任。管理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育人的方式与手段,落脚点还在育人工作,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够更好地开展思政教育育人工作。而要更高质量开展思政教育,必须要扎实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注重提高自身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想信念,养成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增强“四个意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刻苦钻研本职业务,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意识与能力,为开展高质量的思政教育管理工作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以扎实的思政与管理服务知识,承担起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进的使命与责任,切实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 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关系

要开展高等特殊思政教育工作,必须弄通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特殊教育的区别与联系。二者在教育对象、具体教育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育目标、教育原则上有所共通之处,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特殊群体大学生由于生理及心理原因,在心理、伦理及接受知识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属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将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理论与特殊教育理论结合起来学习,实现融会贯通。其中要将特殊教育知识的学习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环节,不仅需要学习教育、心理学原理,更需要学习特殊教育理论,深入了解特殊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与认识规律,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通过系统学习特殊教育理论,了解了解特殊教育群体的身心特点、认识特征,全面掌握特殊高等教育规律,提升开展日常教育、专题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

(三) 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高等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高等特殊思政教

育的实践离不开特殊教育理论的指导。同时,高等特殊思政教育的实践成果又能促进高等特殊教育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助推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高等特殊教育理论对思政教育实践具有指导价值。新时代高等特殊教育理论是新时代教育理论在特殊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要求,既有教育的共性,也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开展教育实践必须要遵循特殊教育理论,按照特殊群体的身心特征与认知能力与习惯开展教育。

三、遵循高等特殊思政教育规律,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殊规律。同时,特殊教育群体由于身心的特殊属性,针对其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同样有其独特要求。在教育管理与服务过程中,需要遵循特殊教育规律,运用特殊教育方式做好育人工作。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提高思政道德修养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求的接班人的直接组织者,是广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及成长的直接服务者,是党的形象展示与战斗堡垒,是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使每个师生党员都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为提高特殊群体的思政教育质量,特殊院校基层党组织需要创新工作的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通过严格选拔、教育培训、加强管理、关爱帮助、保障权利等,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高的特殊群体学生党员队伍,发挥这些学生的先锋模范带动作用,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促发展,引领更多的特殊群体学生向先进模范学习,成为政治立场坚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特殊教育人才。

(二)以系统化的工作践行高等特殊思政教育思想

学校德育工作,除了课堂理论教学外,课外的思政教育实践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身体力行教育作用更加重要。学生思政教育的引领者,要以系统化的工作思维构建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以规范科学的实践活动制度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一是思政教育管理制度化。根据不同的年级阶段、不同的时间节点制定相应的教育内容,确保每个关键节点都有相应的教育内容,实

现思政实践活动全覆盖。通过系统化的教育活动,使特殊思政教育与服务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二是教育工作常态化。以班会、团课、师生交流日等相对固定的第二课堂为阵地,加强和学生的沟通了解,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动态,增强与学生的感情交流,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深化思政教育内涵,巩固提升思政教育成效。三是教育内容创新化。结合特殊群体的认知特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开展思政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接受度,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同时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实践育人的潜移默化作用。四要奖惩结合。“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亦乱”。在高等特殊教育管理服务中,要落赏罚结合,实相应的奖惩制度,避免一团和气、平均主义,无法激发学生昂扬奋进、努力拼搏的激情。对于在各类活动表现优秀的特殊大学生,及时给予表彰,树立榜样,并计入年终考核。对于对违反规章制度的学生,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督促转化,避免并因小过错酿成大错。同时,善于引导转化,以校内外,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不良现象为警钟,使学生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养成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良好习惯。

(三)强化服务育人,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

相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各专业的课程思政教育,日常管理服务中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占比更大,也是创设良好育人环境的主要手段。特殊群体大学生由于身心特性,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需要帮助的问题更多。作为管理者与教育者双重身份的管理工作者,更需要以优质的服务感染人、以热情的态度温暖人,在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社会适应问题,以及日常学习和生活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中,引领学生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要坚持“三进”原则要求,经常深入学生内部、及时了解学生不同的需求,关心关爱学生,以“四心”帮助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由于权限所限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并协助协调解决。在应对校园危机事件、指导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等方面以经典案例、优秀人物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带动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尽快成长。

(四)以身作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在特殊群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服务中,榜样示范的力量要大于仅仅依靠言传教育。这就要求教育者自身要具有较高的思想素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以教育者自身的

模范行为带动学生,以出色的工作态度与成效影响学生,将育人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之中,真正贯彻落实“三全育人”工作要求。^[6]

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助力特殊群体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作为教育者,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以生为本、关爱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大学生在生活学习思想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解疑释惑时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才能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将特殊教育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目标,为社会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五育并进的高素质特殊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左丘明.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N].人民日报,2022-01-26.
- [4][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贾丽华,马初,申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4).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Theory in Student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LUO Qiang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new ag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Consolidate the belief in educating people by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theory; get through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the laws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and do a good job in higher speci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e high-quality special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ead special groups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 era; education doctrine; special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刘成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基于国家级精品慕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当今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事业而形成的主流教学模式之一。从课程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模式设计、实践教学模式设计、教学内容构建、教学方式创新、教学资源库建设等方面,对“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如何建设混合式金课,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模式;慕课;翻转课堂;教学资源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1.022

中图分类号:G434;T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1-0125-04

一、引言

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建设高质量的一流本科课程。“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通过引进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施工原理”国家级精品慕课,通过思维创新开拓课程思政建设,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创新育人手段。将思政教育元素等融入到“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教学过程中,用新思维、新思路、新发展、新方法,探索后疫情时代基于国家级精品慕课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课程目标,构建课程教学内容,达成最优教学方案,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提升教学质量。

二、课程建设现状

“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建设方针、相关规范,掌握国内外土木工程施工工艺技术和施工组织,保证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是土木类专业的一门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教学不仅需要解决建筑行业发展的技术问题,也需要解决社会进步、技术变革给青年学生带来的心理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主,课程学时有限,学生学习知识面窄,

很难适应当前建筑工业化、建筑绿色、低碳化、建筑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大班上课,互动有限,导致学生向学力不足,学习效果不理想;教学方式单调,理论讲解过多,重知轻行,实践活动少,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不足,课程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不高。

三、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近年来,中国慕课以提高学生的向学力、让学生回归课堂为出发点,丰富网上学习资源,形成建、用、学、管“四位一体”的中国方案,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构建时时、处处、人人可学的教育生态。以慕课为主的在线课程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开展基于慕课、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广大教育者聚焦的问题。各大院校教师针对基于精品慕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基于慕课、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流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对高校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方法理念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19年以来,“建筑工程施工与

收稿日期:2022-11-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一般项目(2021SJGLX602);河南省2022年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样板课程;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重点项目(ZGJG202102A);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专创融合”特色示范课程

作者简介:刘成才(1973—),男,河南柘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木工程施工方面教学及研究工作。

组织设计”混合式课程建设在线课程平台选择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施工原理”国家级精品慕课,通过整合优化教学内容,突出应用型本科的特色要求,进而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向学力。

(一)课程教学目标设计

我校属于郑州地方本科院校,所以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也应该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应用型人才。通过行业企业调研、专家访谈及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学情分析,了解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了解企业就业岗位及对专业知识能力的需求,确定该课程服务的就业岗位包括施工管理、工程造价、项目开发、工程设计等,课程成为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智能建造、工程管理4个本科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通过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应用到建筑业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祖国的建设发展大业。

(二)教学模式设计

课程教学改革及实施坚持以学生专业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为中心,采用基于国家精品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手段的相结合的多元化混合式教学模式。依据行业、企业调研结果,课程服务6大类就业岗位,确定“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标准,重构重难点,探索课程教学过程中5个关键环节为学情分析、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及评价。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教师的教学活动为主线,将教学活动分解为课前预备阶段(线上模式)、教学策略实施(线下模式)、课后提升与教学评价(线上线下混合模式)三个有机联系阶段,探讨及优化“两主线、三阶段、五环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三)课程内容构建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推广绿色化、工业化、信息化、集约化、产业化建造方式。课程教学内容要考虑行业技术的进步,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教学内容多,理论性和实践性比较强。课程内容构建,传统成熟施工工艺是教学基础,前沿技术是重要补充,增加学生动手机会是必要过程,行之有效的考核是重要手段。把传统课堂进行改革,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合适安排使用翻转课堂和雨课堂,网络教学资源主要采用同济大学国家精品慕课“土木工程施工原理”,另外针对关键分项工程施工工艺等视频按照慕课视频制作标准制作。利用线上教学环境,促使学生分组合作,协同完成课程作业。

充分利用网上资源拓宽知识面,课堂教学内容要精选,强调重、难点,强调联系工程实践,强调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

合理构建课程内容,引入最新施工技术、施工工艺,紧扣工程实际,创造性地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建设思政教学案例库,注重学生专业素质技能的培养。进行知识重构,突出重难点,线上教学增加大量图片、视频、工程案例、参考资料等,拓宽学生知识面。线下教学项目化、模块化,实践教学设计注重应用性、综合性、创新性相结合。

(四)教学方式创新

“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采用基于国家精品慕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下课堂针对重难点教学内容,尽量模块化、专题化,多采用任务驱动等教学形式。充分地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师生交流互动,强调重点知识、点拨难点疑点,以案例启发施工技术与组织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工程应用。教师提出相关问题及学习任务,学生查阅资料完成作业,遇到问题,可以展开讨论,教师做好引导。

(五)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

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应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专业知识资源库与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相结合,纸质、电子、视频、动画等资源按需制作,整合国家精品慕课教学内容,建设、完善课程指导性资源、内容性资源、生成性资源,建设完善立体化教学资源库。第一,依据人才培养目标,修订指导性资源。课程团队多次召开讨论会,修订课程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学重难点,做好第一节课计划,让学生尽早熟悉教学目标。第二,内容性资源设计与开发。课程团队广泛观看了大量网络精品慕课,对慕课内容与质量进行了评比,最后选择了师资力量强,课程质量高,与我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学内容基本一致的国家精品慕课作为在线网课资源。课程团队在充分使用好已有的在线国家精品慕课等网络资源外,围绕关键工序施工技术要点,开发部分课程视频或现场施工视频,出版了具有行业特色的精品富媒体教材。第三,注重教学过程,抓好生成性资源建设。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课堂作业、任务作业、课程设计、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论坛互动等提出的问题,讨论的结论,以及实验实训过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提炼存档。这些生成性资源是下一教学周期的重要教学参考资源。

(六)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设计

土木工程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建筑

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主要研究土木工程实地建造的过程,更是实践性更强的课程。如何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当前学生就业观念转变和考研热潮的冲击下,“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受到很大影响,做好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认真研究人培方案及教学规律,全面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要对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施工组织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时间长短、开始的时机、实践内容上进行统筹安排,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其次,要探索实践教学的管理考核体系,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辅导答疑方案,务实高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第三,高质量建设实践教学基地,重视施工仿真实训室的建设,积极吸纳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竞赛,解决土木类专业施工实习安全问题严重、实习时机难以把握、实习时间短等问题,积极探索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施工仿真、科研与竞赛“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打通课程教学最后一学里。

(七) 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过程中要坚持价值引领导向,靶定课程高度,坚持知识传授导向,锚定课程方向,坚持技能培养导向,锁定课程内容,实现基于课程思政的“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课程顶层设计。课程教学不仅需要解决建筑行业的发展中的技术问题,也需要解决社会进步、技术变革给青年学生带来的心理问题。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培养青年学生成长为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大国工匠精神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课程思政的融入,应该结合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结合当前热点问题,力争无缝融合。如:围绕装配式建筑为核心的建筑工业化、绿色、节能、环保等国家产业政策,培养青年学生工程思维,提高工程创新意识;学习到“楼歪歪、凤凰大桥”等工程事故案例时,培养青年学生“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树立工程安全质量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通过具体工程建设中涌现的新时代先锋队、优秀毕业生等,培养青年学生土木“铁人”精神,号召大家毕业后积极投入祖国的工程建设当中,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等。

后疫情时代的课程思政,要讲好抗疫故事,胸怀大国担当。中华大地在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大量的不顾个人安危、无私奉献的抗疫工作者,他们坚守岗

位,科学抗疫,甚至忍辱负重;疫情阻击战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讲透疫情阻击战体现出的中国精神;介绍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体现出的中国技术、中国速度;通过后疫情时代重建故事,鼓舞人民斗志,促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八) 评价体系设计

基于国家级精品慕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评价体系设计对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十分重要。混合式教学模式决定了课程评价体系要采用线上、线下评价相结合,过程化考核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过程化考核与评价激励学生提高平时性、阶段性学习效果,期末评价主要依据期末考试、综合性大作业等进行评价,但必须重视平时评价和期末评价二者的比例设计,确保评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继续优化课程成绩构成,目前课程综合成绩组成与比例为:线上视频学习:线上测试、论坛:线下考核:期末考试=20%:20%:10%:50%。

四、教学改革成果及应用

(一) 教学改革成果

近几年的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主要探索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探索了“两主线、三阶段、五环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优化。

(2)初步完成了课程立体化教学资源库的设计与建设。引进国家级精品慕课,整合慕课教学内容,依次完善指导性资源、内容性资源、生成性资源,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形成立体化课程教学资源库,特别补充重点施工工艺视频、动画。

(3)探索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施工仿真、科研与竞赛“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旨在做到教、学、做相结合,实现实践能力与理论知识的深度融合。

(4)探索线下课堂采用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等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模块化、任务化,并与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相结合。

(5)课程教学改革考虑了后疫情时代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的变化,旨在进一步提高后疫情时代课程思政教育质量,更好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大国工匠精神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6)研究“线上、线下”评价相结合,过程化考核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评价考核模式。

(二) 应用效果

“建筑工程施工与组织设计”采用基于国家级

精品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土木工程专业开始进行探索、实践,研究成果逐步推广到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智能建造等专业。同时,积极推进研究成果在兄弟院校的推广应用。

通过3年的教学实践,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学生比较认同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明显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主要表现为学生的阶段性作业和综合性作品的质量较以往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五、结束语

(1)探索适合课程特色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加强线上学习与实际课堂答疑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师引导督促作用,锻炼学生自主学习方面需进一步加强。继续探讨教学反馈机制与评价机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持之以恒。需要精心设计慕课教学视频,丰富网上教学资料,加强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授课的能力。

(3)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

(4)继续借鉴学习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土木工

程类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探索新型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 [1] 韦春北. 把握好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四个维度[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9): 22-23.
- [2] 汤苗苗, 董美娟.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2): 54-70.
- [3] 曾雪琴, 王利文, 李鹏波等.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 以土木工程施工组织课程为例[J].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30(2): 90-96.
- [4] 罗勇, 李咏梅, 蒲成志.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工程施工组织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 高教学刊, 2021, 35(2): 18-21.
- [5] 徐文胜, 宋象军. 土木工程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的探索[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0, 29(6): 128-139.
- [6] 蔡小宁, 张普, 胡杰. 土木工程科研资源转化为实践教学资源的探索[J]. 河南科技, 2014(8).
- [7] 吴静. 大数据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方案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20(51): 88-91.
- [8] 姜培杰.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37): 106-107.

(责任编辑 许峻)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Design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Based on Mixed Teaching Mode

LIU Chengca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national top-quality MOOCs and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teaching modes form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From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goal design, the teaching pattern design, the practice teaching pattern design, the teaching content construc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the teaching resources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practices how to construct mixed “Golden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of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design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Key words: mixed teaching mode; MOOC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sources library